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周恩来与共和国元帅

 **eBOOK**  
网络资料 免费下载

## 前 言

周恩来，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早在二三十年代，就已是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袖人物之一，我军的许多高级将领，都与他有着密切的交往，许多人是在他的指引和培养下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因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20年代初的欧洲，朱德在德国结识了周恩来，并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一时期，旅欧的陈毅、聂荣臻也在欧洲结识周恩来，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和斗争。在黄埔军校这一国共双方高级将领的摇篮里，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悉心发现人才、培养人才，许多人在他的教育下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成为共产党的高级将领，如徐向前、叶剑英均是如此。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响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1日后来被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从此，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武装。周恩来作为领导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许多共和国的战神聚集在了他的麾下：贺龙，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刘伯承，南昌起义的参谋长；聂荣臻，起义军第十一军党代表；朱德，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林彪，起义军排长。陈毅则于起义后不久追上革命队伍，担任了起义军的团指导员。以上六位日后都成了共和国的元帅。参加南昌起义的，还有日后成为共和国大将的陈赓、许光达、粟裕等人。可以看出，十大元帅中的九位，在八一南昌起义及其以前，都已和周恩来相识，并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开展了创造革命武装的活动。许多将帅，与周恩来结下了半个世纪的友谊。

周恩来之所以能够征服众多的将帅，除了历史的渊源外，十分重要的，是他伟大的人格力量。他那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献身精神，堪称将帅们的楷模；他对将帅们政治上的关心、生活上的关怀，尤其在将帅们落难时竭尽全力的保护，使将帅们对他从内心深处充满着感激之情。

周恩来那炉火纯青的领导艺术，以及集中华民族人际关系优良传统之大成的处世之道，在将帅们身上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给后人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作 者

1996年11月

## 作者简介

李智舜，1957 年生于豫东太康，毕业于南京政治学院，中校军衔。长期致力于军事历史和军事理论研究。著、编有《毛泽东与十大元帅》、《毛泽东与十大将》、《毛泽东与开国上将》、《毛泽东与开国中将》、《毛泽东与开国少将》、《中国革命战争全景纪实》、《中国历代战争概览》、《高技术战争谋略》、《国防的多维结构》、《按电钮的战争》、《军事千万个为什么》（被国家教委定为全国图书馆装备用书）、《世界兵种在观》、《邓小平新时期政治思想工作思想研究》筹，与人合著各种书籍 10 本，发表各种论文 70 余篇。是十集电视系列片《跨世纪的国防之路》主要编剧，作品多次获奖。

## 周恩来与共和国元帅

## “我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周恩来与朱德

朱德（1886—1976），字玉阶，四川省仪陇县人。参加了辛亥革命。1913年后在滇军任营长、副团长、团长、旅长。1922年赴德国留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到苏联学习军事，次年回国。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1928年参与领导湘南起义，而后率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八路军总指挥（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任总司令）。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二、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八届中央副主席，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本世纪20年代初叶，当在国内要求入党而未能如愿的朱德带着苦闷的心情来到欧洲寻找党、寻找革命真理时，他有幸结识了周恩来，并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朱德开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伟大历程，也开始了与周恩来半个世纪的革命友谊。南昌城头，共举义旗；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文革”狂潮骤起，造反派矛头指向人民爱戴的总司令，睿智的周恩来，通过毛泽东，巧妙地保护了朱德，使他免遭冲击。周恩来逝世，举国悲痛，朱德不顾90岁之高龄，亲自向遗体告别，表达了无限深情。

## 一、在德国介绍朱德入党

1922年9月的一天，朱德和孙炳文乘法轮“安吉尔斯”号离开上海黄浦江码头，开始了欧洲之旅。他要到德国去，到马克思的故乡去，去寻找共产党，寻找革命的真理。

经过四十多天的漫长航程，穿越波涛汹涌的印度洋和地中海，朱德和孙炳文一起在法国马赛登陆，寄宿在一位华侨商人的家里。不久，他们就听说：6月间有一批中国留学生曾在巴黎西郊的布伦森林里开过一次会，成立了“中国少年共产党”。还听说组织者中有一位旅德中国学生的代表名叫伍豪，他两个月前曾经在柏林发表了一篇《共产主义与中国》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很有影响。

听到这个消息，朱德真是喜出望外。他不顾一路奔波劳累，第二天便乘上了开往柏林的火车。去会见伍豪。

1922年10月22日，朱德在柏林经过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他所敬仰的伍豪——周恩来。周恩来热情地把他引进自己简陋的寝室，搬过椅子请他坐下。朱德顾不得坐下便直挺挺地站在这位比自己小十多岁的青年人面前，望着那张英俊的面孔和那双诚挚的眼睛，开始述说自己的经历和急于找党的迫切心情。

他把自己怎样参加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怎样会见孙中山，怎样不满于资产阶级领导的不彻底的民主革命，怎样在上海会见陈独秀而夙愿未了，又怎样为了寻找党，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来到欧洲……滔滔不绝地倾诉给周恩来。最后，他恳切地请求吸收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柏林的党组织。

周恩来尊敬地与朱德面对面站着，习惯地把头稍稍倾向一边，用充满热情的目光望着朱德，聚精会神地听着，直到朱德讲完了，才向他提出问题“朱德对周恩来提出的问题一一做了认真的回答。

亲切而又融洽的交谈，使他们忘却了时间。不知什么时候，夜幕悄悄降临了。窗外，明月皎洁，繁星璀璨。室内，灯光融融，相谈甚欢。周恩来热情地邀朱德住下，并满意地对他说：

“请放心，我一定把你的情况和入党要求如实汇报给‘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这是今年8月经中央批准成立的党组织。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不过，在柏林入党，是要经过国内党组织最后批准的。在此之前，只能暂做候补党员。”

朱德听了，激动地握住周恩来的手说：

“今天是我有生以来最有意义的一天，真可谓再生之日。虽然我已经36岁了，但好像又获得了新生。”

几个月后，经周恩来、张申府介绍，朱德的入党申请得到了国内党组织的最后批准。党组织还决定，为了工作方便，他的党籍暂时对外保密。

苦苦追求的理想终于实现了，朱德沉浸在长久的兴奋之中，以至后来回忆起此事时，他还十分动情：

“我当时真高兴极了。从此，我抛弃了旧我，开始了最有意义的革命的新生。”

经过周恩来慧眼识英豪，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又增添了一名勇敢坚定的优秀战士，共产党员的崇高称号，给朱德带来了数不尽的艰难困苦，同时也带来了革命的青春和无上的光荣。在这以后五十多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

中，他没有辜负这个光荣的称号。用自己非凡的功绩，为党的旗帜增添了灿烂的光辉！

在这以后，他开始了与周恩来长达半个世纪的伟大而动人的友谊。

## 二、周恩来交给特殊任务：使敌人失去指挥

1926年，朱德返回阔别四年的祖国。1927年7月下旬，他在南昌利用自己曾担任南昌市公安局长、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的身份，努力地做着南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27日上午，有位身着灰色中山装、手提黑色皮包的青年人，从容不迫地步入南昌市进贤门内花园角二号院，向在院内纳凉的人打听朱局长是否在家。

这时，左边一间厢房的竹帘撩开了，闻声而出的朱德一见来客，惊喜的神色立刻涌上眉梢。他用那双有力的大手把客人挽进正房，随即吩咐勤务兵安排早餐。

待勤务兵出去后，朱德兴奋地说：

“你好啊，周恩来同志，真没想到你来。一路顺利吧？”

“还好。”周恩来呷了口茶，说，“从武汉乘船到九江，然后坐火车到牛行车站，过了赣江就径直在这儿来了。你怎么样，身体好吧？”

“很好，很好啊。”朱德喜悦地低声说道，“你这一来，我就知道，党一定是最后决定在南昌起义了！”

“是的。”周恩来告诉朱德，“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和叶挺率领的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明天就要从九江开往南昌；四军二十五师已驻在马回岭一带，这你知道；再加上你的军官教育团，我们将有三万多人，另外，卢德明和罗荣桓领导的二方面军警卫团，以及陈毅领导的中央军委学校武汉分校的部分学员也可能赶来，汇集在一起，我们的力量还是很可观的。”

朱德思忖了一下，问道：

“这么多部队集结南昌，不会引起武汉政府的怀疑吗？”

周恩来肯定地说。

“这些问题我都想过，现在看来还不会。武汉政府所谓东征南京、讨伐蒋介石的招牌还没最后扔掉，我们正好可以利用。”

接着，周恩来又交代任务说：

“对了，彭湃、浑代英、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还有许多同志很快也要从武汉赶到南昌。这些同志的住处以及叶、贺部队的驻地，还得请你安排啊。为了让大家休息好，养足精神起义，你这几天恐怕要吃不好睡不好哩。”

“放心吧，这些都包在我身上了。”朱德坚决地回答。

周恩来虑事很细，又询问道：

“这里的情况怎么样？”

朱德没有马上回答，只是笑着说：

“吃过饭，等你休息一下咱们再细谈吧。”

“不，不用休息，我已经在车上睡了一会儿。”

周恩来说完，用那双总是显得炯炯有神的眼睛望着朱德，等待他的回答。朱德知道周恩来那一切以革命事业为重的性格，只好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摊开双手说：

“你呀，还是过去的老脾气，只顾工作，不顾自己。好吧，我这就详细汇报。”

说着，朱德把椅子往前挪了挪，与周恩来靠近些，说道：

“最近，朱培德把师以上军官都召到庐山开会去了，不外乎是研究宁汉合流及如何清共。南昌城里，如今我这挂名的总参议算是老大了。”

周恩来笑着说：

“所以我才来找你这个最高指挥官了解情况。”

朱德也笑了，说：

“我这个指挥官只是个虚衔，而且很不牢靠。前一段朱培德‘礼送共产党’，差点把我这个‘衔’也‘礼送’掉了，幸亏他还不能十分肯定我是共产党。”

说到这儿，朱德的神色严肃起来，把话引上正题：

“目前，敌人的情况是这样的：第三军王均部主力在吉安；第九军金汉鼎部主力在东乡、进贤一带。至于南昌城内的敌人，到目前为止，驻有第五路军指挥部的一个警卫团，第三军的七十三团和七十四团，第九军的一个团，还有临时归朱培德指挥的程潜

第六军的一个团，再加上卫戍司令部和王均住宅的警卫队、省政府卫队和一部分宪兵武装，敌人总计不过万人。除此之外，还有两个保安队和一个消防队，因为我当公安局长，对他们进行过一些教育，估计是不会站到敌人一边的。当然，我们宁肯把敌人的力量想得更大一些。”

周恩来赞同地说：

“这样考虑是对的。不但要把来自敌人的阻力估计足，也要把来自党内的阻力估计足。这次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就是党内许多同志经过斗争才取得的。”

朱德深有感触地说：

“蒋介石这个流氓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给我们上的这一课太深刻了。不管怎么说，党要夺取政权，手里没有自己的军队是绝对不行的。”

接着，朱德拿出了由他亲自精心绘制的南昌城防图。周恩来接过图，仔细地看，真是高兴极了，连连称赞：

“有了这张图，起义后解决敌人就会方便得多，顺利得多。”

这时，勤务兵送来了早餐。他们一边吃饭，一边闲聊了一阵别后的情况。任务紧迫，不允许这两个久别重逢的亲密战友尽情畅谈，饭后，朱德便匆匆外出，按照周恩来的部署，忙着进行起义的各项具体准备工作去了。

中午时分，朱德乘坐黄包车回来。他在经过周恩来休息的耳房时，脚步放得很轻。谁知，当他探头一望，发现周恩来根本没有休息，正不顾一路奔波劳累，伏在桌子上聚精会神地写着什么。

朱德没有进屋，唤来勤务兵，小声叮嘱道：

“一定要细心照顾好这位客人，不管什么事，都要按照他的吩咐去办。另外，有人到咱家来，不要提到他。”

下午，周恩来把勤务兵叫到身边，请他在市内租一栋大房子。

工夫不大，勤务兵跑回来向他报告说，房子已经租到了，是系马桩附近的一所学校，学生都在放暑假，房子既宽敞又安静。周恩来高兴地说：

“很好，你办事很快啊！”

就在这一天，叶挺率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贺龙率第二十军先后进入南昌市。

朱德一直到吃晚饭的时候才回家。饭后，他又同周恩来一起去看新租到的江西大旅社。这是一座五层楼房，准备做起义军的总指挥部。

接着，朱德在江西大旅社一楼的喜庆礼堂参加了一次重要会议。会上，周恩来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在南昌组织武装起义的重要决定，并宣布：领导起

义的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浑代英等四人组成，周恩来任书记。周恩来根据朱德提供的敌情，分析了敌我态势。会议研究了起义的行动计划，作出了相应的任务区分。

散会以后，朱德立刻赶回教育团，部署起义的准备工作。他组织教育团连续打了两次野外，以便熟悉南昌城内外的地形、地物和主要通道。并在夜间进行了几次紧急集合，使部队做到能够迅速集合，准确无误地传递口令，识别记号。

与此同时，参加起义的各部队也都在秘密而紧张地进行着战斗准备，如箭在弦，弯弓待发。

7月31日下午，朱德肩负着周恩来交给他的特殊任务，来到南昌市公安局，找到秘书长，吩咐说：

“今晚我要请驻省会的各位团长、副团长在佳宾楼吃饭，请你马上派人去筹办一下。你要亲自通知各位团长，请他们务必光临。”

听说老局长要请驻地团长、副团长吃饭，秘书长一连声应承着去了。

朱德请各位团长吃过饭后，又邀请他们来到大士院32号搓起了麻将。

正在朱德哄着几个团长玩得正痛快的时候，只见门外进来一个人，慌里慌张地走到一个络腮胡子团长跟前耳语了几句。络腮胡子立刻推开椅子，立起身道：

“诸位，我刚刚接到报告，据说今天夜里有人想缴我们的枪！”

喧闹的客厅一下子静了下来。

朱德暗吃一惊，但他马上镇定下来，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说道：

“如今蜚短流长的话太多了。我看各位不必介意，请接着玩吧。”

一位年长些的团长说：

“这也许是谣言，不过还是谨慎为好。方才我在来这儿的路上，发现往日街上军人很多，今天却明显减少。为何各部队同在今天控制人员？难道这不异常吗？”

这一说，其他一些人都慌忙起身，推倒桌上的麻将牌，急着要走。

朱德本想把这些团长们一直留到深夜，以便使城内的敌人在起义军发动进攻时失去指挥——这是周恩来亲自交给他的任务。现在看来，难以再拖下去。

正当朱德紧张地思考着下一步的对策时，公安局的秘书长进门对他说：

“局长，有人在外等您，说有要事相见。”

朱德连忙对正在穿衣、挎枪、整理服装的团长们拱拱手，说：

“慢待各位了，我去去就来。”

他到外面一看，原来是起义军总指挥部的人来送文件。他立刻打开文件，见上面只写着四个大字：“山河统一。”朱德知道，这是今晚起义时的口令。他面对文件，略思片刻，毅然转身步入客厅。对正要离席的敌团长们说：

“各位稍候，有件紧急的事情要跟大家说。”

朱德见敌团长们留住步，愕然地望着自己，便将手中的文件扬了扬，说：

“我刚刚接到朱培德总指挥的一封密信，信中说——请大家冷静些——我们五路军在庐山开会的长官们，今天不幸被蒋介石派兵包围起来，情况可能有变。”

这一消息，真如晴天霹雳，把敌团长们个个惊得目瞪口呆。一阵沉默之后，接着是一片骂娘声，朱德扬扬手，叫大家安静，接着说：

“朱总命令，‘驻南昌的所有部队，临时由朱德总参议统一指挥。’你们回去后，要向所部官兵传达，有事一定要听从我的指挥，不得轻举妄动。如果你们谁在南昌擅户动枪。动刀，给庐山上的朱总带来麻烦，可别怨我朱德言之不预。”

敌团长们悻悻然地陆续告辞离去。朱德忙看看手表，已近午夜，立刻走出大门。

专用黄包车正在台阶下等候，他敏捷地跳上车，急促地对车夫说了声：

“江西大旅社——快！”

车子立刻飞奔起来。

朱德跨进二楼的总指挥部办公室，看见周恩来、贺龙正和英 他一些领导围在南昌市的地图前最后检查着起义方案，室内显得

异常安静。他立即向周恩来与贺龙报告了起义被叛徒告密的情况。周恩来当机立断，将预定的起义时间提前。

8月1日凌晨2时正，随着“啪——啪——”几声枪响，信号弹拖着红色的尾焰划破沉寂的夜空。顿时，枪声、炮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就像除夕时刻辞旧迎新的漫大爆竹，响彻全城。红色的火光照耀着一座座高大的建筑物，起义军各部队按预定方案同时向敌人发动了突然进攻”

在起义军的突然猛攻下，敌人措手不及。只好缴械投降。只有攻打敌五路军总指挥部的战斗异常激烈。敌警卫团团团长张朝政得到二十军那个姓赵的叛徒告密。提前带着两个营连夜逃跑，留下朱培德的弟弟朱美之指挥一个营负隅顽抗。贺龙和刘伯承冒着枪林弹雨，并肩站在距敌人一街之隔的圣公会楼房的露天台阶上，指挥起义军反复强攻，终于冲进敌总指挥部。经过激烈的白刃战，全歼了敌人。

清晨6时，战斗胜利地结束了。参加起义的士兵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而起义的领导者——周恩来、朱德等人又投入了更加紧张的工作。

苍穹渐渐露出鱼肚白的光亮，灿烂的曙光终于射出东方天地相接处，一个伟大的黎明降临于南昌。

### 三、携手大战南天红

南昌起义后，周恩来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朱德率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一起共同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底，周恩来从上海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左”倾机会主义的中央撤了毛泽东的军职，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面对50万之众敌军的第四次“围剿”，朱德、周恩来毅然挑起重担，率领5万红军，与10倍于己之敌展开了殊死搏斗，并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在共同指挥作战中，他们互相领略了对方那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迷人的风采，其友谊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由于“左”倾机会主义中央的领导，1932年10月前后，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相继失败。红三军离开洪湖根据地，先后向大洪山地区和湘鄂边境转移。红四方面军主力也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向平汉路以西转移，后来到达川陕边地区。这样，国民党当局便将主力调往江西，把“围剿”重点转到中央根据地，策划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但大举进攻的部署一时尚未就绪。

10月14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代总政委周恩来，经过反复分析敌情，制定了破敌方策，在广昌发布作战计划，决定趁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大举进攻的部署尚未完成之机，出其不意地向国民党军事力量比较薄弱的建宁、泰宁、黎川发起进攻，以策应其他苏区红军的作战，并同赣东北苏区取得联系。

朱德、周恩来指挥部队从广昌出发向东急进，一路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在10月18日至22日的五天内，连克建宁、泰宁、黎川、邵武四座县城。11月8日，攻克光泽县城。17日，北上攻克资溪县城。19日，又攻克金溪县城。

连战皆捷，部队一片欢腾，指战员连声称赞朱、周神机妙算，用兵如神。这是朱德、周恩来俩人共同合作的一个杰作。

国民党军进攻中央苏区的高级指挥官陈诚见连失七城，无法向蒋介石交代，禁不住暴跳如雷，急忙命令原驻南城的许克祥部第二十四师和原驻临川的孙连仲部第二十七师，从南、北两个方面夹击金溪。

然而，陈诚怎能是朱、周的对手。11月20日，当第二十四师进到南城东北时，朱德、周恩来乘该师正在运动中，指挥红三军团主力于11月21日迅速消灭该师一个团，打破了这次夹击。红一方面军的北线作战暂时告一段落。

为了准备迎击即将到来的对中央苏区的大规模“围剿”，朱德、周恩来、王稼祥于11月24日向全方面军发布紧急训令，明确指出：“我们要认定，敌人大举进攻的战火就在眼前。”“全方面军及各作战地域的指挥员、战斗员，都应认识目前任务的严重。”“集中一切精力于歼灭敌人的当前的伟大任务上。”

朱德、周恩来久经沙场，具有丰富的指挥作战的经验。面对强敌，朱德向周恩来提出。

“要打破几十万装备精良的敌军的大举‘围剿’，只有政治上的动员是不够的，还必须抓紧时间努力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尤其是加紧军事训练。”

周恩来十分赞同，连连说道：

“老总所言极是，我也正在思考此事。”

英雄所见略同。为此，他们发布了加紧军事训练的训令，指出：“现在‘特别是军事技能更有落后的现象’，‘这在敌人大举进攻中，是不可容有的现象，因此，我们在这战斗间断的瞬间，拟予以迫切的训练。’”

对于即将到来的大战，周恩来指出。

“一定要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准备在整个战线上运动作战，以消灭敌人。我们必须估计到这次敌人的兵力比前三次‘围剿’时增多了，在战略与战术上，都有相当的变更和进步。因此，我们应较三次战役时期更有进步、更加努力地来部署一切政治上、军事上的动员。”

于是，朱德立即就上述意见命人草拟出电报，以密令方式发往各作战区指挥部。

在这期间，朱德还命令全方面军利用敌人没有大举进攻的时机，进行战前改编整顿，精简机关人员，充实连队，以加强前线作战能力。在朱德、周恩来领导下，第四次反“围剿”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12月30日，以何应钦为总司令的国民党赣闽粤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下达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的命令。参加这次“围剿”的兵力共29个师又2个旅，共50万人，分左、中、右三路向中央苏区进攻：右路军由余汉谋任总指挥，由粤、赣边界向中央苏区推进；中路军由陈诚任总指挥，指挥蒋介石嫡系的12个师为“进剿”军，担任主攻任务。

这时，朱德、周恩来指挥的红军只有五万余人，双方兵力为10：1。

1933年元旦，红一方面军在黎川城举行北上誓师大会，当天，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训令，强调指出：“这次行动是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主要关键。争取这次行动的全部胜利，消灭当前的敌人，特别是陈（诚）、罗（卓英）、吴（奇伟）、周（浑元）各部，冲破抚州（河）流域的敌人围攻线，破坏敌人大举进攻的前线布置”，“这是开始1933年四次战役伟大胜利的中心任务”。

兵不厌诈，兵贵神速。朱德、周恩来为了达成战役的突然性，指挥部队悄悄地向北隐蔽急进。神不知、鬼不觉地接近了敌人。1月5日，歼灭黄狮渡守军一个旅，俘虏一千余人，生擒旅长周士达，北上首战告捷。由于红军的行动迅速而秘密，被俘的周士达供称：“红军包围了黄狮渡后，才知道大部红军到了。”

接着，朱德、周恩来又挥师向金溪秘密运动，很快占领该城。

当然，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不是吃素的，许多人毕业于黄埔军校，战役战术上也颇有一套。在红军的进攻面前，驻在临川的国民党三个师经济湾分两路向金溪、黄狮渡增援，在南城的一个师从南面策应，企图南北夹击红军，同红军主力决战于浒湾东南地区。

国民党军队这一作战意图，朱德、周恩来很快就识破了，决定乘敌人尚未会合之际，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于是，他们1月7日下达攻击浒湾的命令。次日上午9时半，浒湾战争打响。由临川增援的国民党军队，得到消息后，立即兔子似地撤退南城。这次战斗共歼敌2000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但红军的伤亡也比较大，红五军团副总指挥赵博生不幸牺牲。

黄狮渡、浒湾战役结束后，红一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是什么？战场应摆在哪里？前方的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同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之间，

又产生了意见分歧。

周、朱、王主张红军主力继续北上贵溪地区，打通同赣东北红十军的联系，在抚河和信江之间开辟新苏区，待北线敌军发动进攻时，将它消灭在运动中。1月12日，周恩来致电中央局、中央政府并转党中央，报告了前方的这个意见。为了实现这一行动计划，同日，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又致电中共闽浙赣省委，指示他们“应将作战中心转到信河南岸”，协同红一方面军将闽浙赣苏区同中央苏区打成一片。

1月16日，对前方情况并不了解的中央局复电周恩来、朱德，不同意前方的意见，提出要“首先打击南城城外敌人，调动敌人，求得战机”。21日和23日，周恩来、朱德两次致电中央局、中央政府急转中央，提出不同意见。

1月24日，中央局复电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命令道：“我们绝对的要你们在将来关于策略上的问题立即告诉我们，不要拖延过迟，我们要你们站在一致的路线上执行以下的指示”，“集中我们所有主力取得南城并巩固和保持它。”最后要求：“立刻将你们和前方的决定，清楚直接电告我们”，“并电告我们执行之结果。”

接到中央局电报，面对这种瞎指挥，周恩来十分愤慨，他对朱德、王稼祥说：

“明摆着的，强攻坚城南城和南丰有五点不利条件：一是暴露我军企图；二是容易受敌人夹击；三是损伤太大，四是不能筹款；五是耗费时日。我们应在敌人部署未完毕前，在抚河东岸连续求得在运动中解决敌人。”

朱德、王稼祥完全同意周恩来的意见，朱德说：

“恩来所见极是，我完全赞同。”

于是，周恩来以其当时在党中央的地位，单独致电中央局陈述前方的意见，特别说明：“上述意见，朱（德）、王（稼祥）等同志大都同意。”

这时，国民党当局加快了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的部署。1月31日，蒋介石在南昌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不久，蒋介石亲自兼任江西省“剿匪”总司令，并设置南昌行营，统一指挥“围剿”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并采取“固守城防”的新策略。在这种新的情况下，朱德、周恩来等原来设想的先发制人、在抚河以东调动并消灭敌人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他们便在2月2日率领部队转移到黎川附近待机。

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的时间日益逼近，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对于中央局不切实际的处处掣肘十分伤脑筋，他们于2月3日联名致电中央局：“连续的、残酷的战斗立刻就到，战争与军事布置更应确定统一指挥。提议中央局经常给我们前方以原则上与方针上的指示，具体部署似宜属之前方。”

最后一句话，就是要求远处后方的中央局不要处处干涉前方军事行动的“具体部署”。

但这个意见仍没有被中央局所接受。次日，中央局给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回电说：“在目前敌人据点而守的形势下，无法避免攻击坚城。”并称根据中央指示电，“在总政治任务之下，应以抚州（临川）为战略区。目前行动，先攻南丰为适宜。”“并乘胜威胁南城、抚州，是我们目前的方针。”“此新计划经中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部署。”

中央局的意思已很清楚：对攻打坚城南丰不容再有争论，必须坚决执行。周恩来再也克制不任感情，平时一直十分理智、冷静的他，此时怒火中

烧，大声说道：

“不行，这样指挥我们不行。这样我们怎样指挥，非打败仗不可。我们还是要再次陈述意见。”

于是，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于2月7日致电中央局并转中央，再次陈述意见，“请求中央、中央局须给前方的活动以机断余地和应有的职权。否则，命令我们攻击某城，而非以训令指示方针，则我们处在情况变化或不利的条件下，使负责者非常困难处置，因在组织上，尤其在军事上，须绝对服从上级命令，不容丝毫延搁。但在责任上、在环境上，我们又不得不向你们陈述意见。”

由于中央局一再坚持要强攻南丰，朱德、周恩来只得在2月9日率领方面军由黎川附近向南丰地区开进。12日黄昏后，命令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各一部在夜雨中向南丰城西北面的外围阵地发起攻击。但因守军工事险要坚固，经过一夜猛攻，未能突破，歼敌不足一个营，而红军却损失四百余人，师长彭鳌和两名团长阵亡。

面对如此不应有的损失，朱德痛惜不已，周恩来甚至流下了激愤和痛苦的泪水。

陈诚深知南丰地势险要，是以后“进剿”赣南的支撑点，因此，除要求陶峙岳的第八师固守南丰外，还令驻在南城的许克祥部第二十四师驰援南丰。并指挥中路军各纵队由北向南挺进，特别是要求罗卓英率领的主力第一纵队（辖第十一、五十二、五十九师三个师）迅速向宜黄地区集中，准备将红军主力围歼于南丰城下。

朱德、周恩来很快看清了陈诚的这一意图，认为如仍按中央局的意见继续强攻南丰，必将遭受国民党大部队的包围，使红军陷于极端危险的境地。朱德提出：

“我们把强攻南丰改为佯攻。留下一部分兵力佯攻南丰城以迷惑对方，命令方面军主力迅速撤离南丰，秘密转移。这样，一则迷惑了敌人，二则也应付了中央局那些不明事理的人。”

周恩来闻听大喜，认为此着确是妙极，连声称赞：

“还是我们老总高明啊，一步棋，管两步的事。”

这时，陈诚所部由吴奇伟指挥的第二纵队也正向南城前进；罗卓英指挥的第一纵队第五十二、五十九两师已于2月21日和22日在乐安集中；罗卓英亲自率领的第十一师正向宜黄推进。他们准备在第一纵队主力同第二纵队会合后，将红军主力围歼在南丰、广昌地区。

陈诚渴求决战立功，好在老蒋面前立一功，赎连失七城之罪。

朱德、周恩来很快看准了陈诚这一意图，毅然决定：派红十一军伪装红军主力由新丰东渡抚河，向黎川地区急进，引诱陈诚部主力东向。而红军主力在2月23日和24日再向南秘密转移到宁都北部的东韶、洛口一带，一边休整，一边隐蔽待机，准备将敌军消灭在运动中。

朱德、周恩来这一正确决策，对于打破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这时，一向自恃高明的陈诚，乖乖地上了朱、周设下的圈套，认为红军主力真的到黎川方面去了，心中大喜，认为立大功的时机到了，立即急令第二和第三两纵队向黎川地区前进，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第一纵队队长罗卓英，为了配合第二和第三纵队的行动，于2月24日亲率第十一师，由宜黄南下黄

陂；李明的第五十二师和陈时骥的第五十九师由乐安南推进，准备到黄陂同第十一师会合。然后，三个师合力奔袭广昌、宁都，截断红军主力的退路。

岂不知，陈诚彻底失算了，因为这样一来，其所部中路军的三个纵队被分隔在两个相距比较远的地区，恰为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加以击破造成有利条件。

朱德、周恩来率领红军主力转移到东韶、洛口地区后，在东韶召开军事会议。

周恩来显得容光焕发，侃侃而谈：

“向黄陂推进的敌第五十二、五十九师现已暴露在我们面前，而且同在黎川地区的第二和第三纵队相距较远，处于孤立地位，正是将他们消灭在运动中的大好时机。黄陂一带山高林密，层峦叠嶂，道路崎岖，地形险要，是打伏击战的良好地势。打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此战十分重要，大家务必齐心协力，密切配合，战之必胜。”

会议决定，在黄陂地区预先设下埋伏，打一个大兵团伏击战，以歼灭第五十二、五十九师。

会后，朱德、周恩来发出向黄陂地区进军的命令，指出：“乐安敌人两个师，有于本（26）日向东进。黄陂前进，宜黄敌人一个师自神岗、党口前进模样。”“我方面军拟于27日，以遭遇战在河口、东陂、黄陂以西，东坑岭、固岗、登仙桥以东地带，侧击并消灭乐安来敌。”命令中还规定，全方面军分为左、右两翼队，平行北上，包抄敌军。

一切部署就绪后，朱德、周恩来立刻率领5万红军迅速向黄陂地区进发。2月26日，各部队先于对方一天秘密到达预定的黄陂、蚊湖地区，隐蔽在深山密林之中。由于当地群众帮助严密封锁消息，红军如此大规模运动竟没有走露一点消息。

朱德神采奕奕，对周恩来说：

“走，恩来，咱们到前线看看。”

于是，二人策马扬鞭，亲临前线了解情况。当他们来到设在登仙桥右侧山头上的左翼队指挥部时，朱德向聂荣臻询问：

“情况怎么样啊？”

聂荣臻介绍情况后，朱德强调指出：

“我们的目的是关门打狗。正像周总政委所说的，这就要先让狗进来，再关起门来打。因此，北面的部队要特别注意隐蔽，不能暴露过早。”

周恩来补充说：

“这是这次战斗成败的关键。告诉战士们，敌人进来时，要沉得住气，放手让他们往前走。东面还有我们的部队，放过去的敌人是跑不了的。”

2月27日上午，细雨绵绵，群山笼罩在一片雾霭之中。红军战士在寒风细雨中悄悄地埋伏着。

国民党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九师还以为红军主力远在黎川地区，有的倒背着枪，有的唱着下流小曲，毫无戒备地向前行进。

朱德、周恩来在总指挥部密切注视着敌军的动向。下午1时许，当第五十二师进入红军左翼队的伏击阵地时，它的前卫部队第一五五旅刚通过，朱德、周恩来立刻命令红军突然发起全线攻击。第五十二师毫无准备，不知所措，顿时丧失抵抗能力。只经过三个小时的战斗，该师师部和一五四旅的一个团被歼，师长李明受重伤被俘后死去。第二天，红三军团将该师前卫部队

一五五旅歼灭千桥头，接着，又在红一军团协同下，将一五四旅主力歼灭于蛟湖地区。第五十二师全军覆灭。

与此同时，第五十九师也进入红军右翼队在霍源两边山坡上的伏击圈。在朱德、周恩来指挥下，红五军团、红二十二军、红十二军迅速冲下山来，将该师截成数段，压到谷底展开激战。经过两天鏖战，将第五十九师大部歼灭在黄陂、霍源地区。该师师长陈时骥率领残部向乐安逃跑时，被红军左翼队歼灭，陈时骥被俘。

黄陂战斗，在朱德、周恩来指挥下，共歼敌两个师，俘虏师长二人，官兵万余人，缴枪万余支。

这次战斗，是朱德、周恩来联手，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战斗舞台上，导演出的威武雄壮的大戏。

朱德后来曾多次忆起此次战斗，他说：那都是国民党最精锐的部队，有最新式的捷克轻机关枪几百挺，还都是一枪未发过的。因为敌人不晓得，来袭击我们，却不料突然遭到我们的袭击。这次的袭击，算是运用最大的部队，取得的最大的成功。

3月1日，中共临时中央致电朱德、周恩来并转全体指战员，祝贺黄陂战斗的胜利。指出：

“这次方面军的空前伟大胜利，是给了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以致命的打击，给了帝国主义完全瓜分中国、镇压中国革命的企图以工农红军的铁拳的回答。”

罗卓英指挥下的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九师被歼后，朱德、周恩来本想乘胜再歼第十一师，由于山地战各军联络与我军指挥均不易达到，各军位置不利于出击；再加上在南城、南丰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第二纵队的三个师，正在西援第一纵队，企图从新丰截击红军主力的归路。为了避免被围，朱德、周恩来于3月1日命令部队迅速向南转移到小布、南团、东韶、洛口地区待机，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当国民党援军到达黄陂、东陂时，只落得扑一场空。

陈诚幻想立功，却反遭大败，当然于心不甘，还想寻找红军主力再战。但他鉴于黄陂失败的教训，改变了作战方式，将原来三路“分进合击”改变为一路“中间突破”。将中路军原来的两个纵队编为前后两个纵队，以第二纵队为前纵队，第一纵队余部和第三纵队第五、九师为后纵队，共九个师的兵力，梯次轮番地向东南方向的广昌搜索前进，目的是直取广昌，寻找红军主力决战。

红军很快侦悉了敌人的用兵企图，朱德不禁笑了。他向周恩来笑谈着对陈诚这一新计划的看法：

“陈诚是蒋介石的宠将，但看来比蒋介石还蠢。他将前后两纵队重叠，以六个师的纵深配备行军，长径达三日行程以上，这是兵家之大忌呀。看来他完全未顾及到这点，只是企图中间突破我红军阵线，占领广昌，求得政治上的影响，欲使粤、闽左右两路军前进，收得合围的效果。”

“老总分析得对呀，我们正好针对他们这一弱点，将计就计，佯顺敌意，分散敌人，寻找对方的薄弱环节，予以各个击破。”周恩来表示赞同他说。

于是，朱、周发下电令：命红十一军到广昌西北地区积极活动，配合独立师团和地方武装，佯攻吴奇伟指挥的前纵队的先头部队，示形于敌，使他们误认为红军主力就在广昌地区，吸引前纵队向广昌方向急进，拉大同后纵

队的距离，为红军主力相机消灭后纵队造成有利战机；同时，命红军主力隐蔽地向北急进，集结于东肢、草台岗一带，准备伏击敌人的后纵队。

陈诚果然被朱、周所调动，再次上钩了。3月20日，他的前纵队已进至洽村、甘竹一线；后纵队第十一师正向草台岗、徐庄地区前进，第五十九师残部尾随跟进，第九师在东陂、五里排。前后两个纵队相隔很远，形成一条长达100里的长蛇阵。后纵队态势孤立。

战场上出现了各个击破敌人的良机。

朱德、周恩来当机立断，抓住这一良机，在当天就向全方面军发出命令：“本（20）日，敌十一师有进到草台岗、徐庄可能，九师当在东肢不动。”“方面军拟21日首先消灭草台岗附近之敌，继续消灭东肢之敌，并击破其增援队。”

当敌第十一师在当天午后进到草台岗、徐庄时，朱德、周恩来再次发出命令：“我军拟于21日拂晓，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岗、徐庄附近之师，再突击东肢、五里排之敌。”

红一方面军各路部队得令，立即动作起来。3月21日拂晓，部分兵力钳制住了东肢地区的第九师，切断了该师同第二十一师的联系。大部队向草台岗第十一师突然发起猛烈攻击，首先争夺草台岗南侧的黄柏岭制高点。

红军战士英勇无畏，所向无敌，经过几次冲锋和肉搏，终于将占据黄柏岭制高点的第十一师和第五十九师残部歼灭。接着，又向在徐庄的第十一师部发起进攻，很快将该师部和一个团歼灭，师长肖乾被击伤。至下午3时许，陈诚的精锐主力第十一师基本被歼。

接着，朱德、周恩来又迅速指挥部队向东肢追击第九师，很快歼其一部。陈诚所部的前纵队因相隔太远，增援已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后纵队被歼。前纵队害怕再被红军歼灭，不得不经南丰向临川仓皇撤退。

红一方面军在朱德、周恩来的正确指挥下，采取大兵团山地伏击战的方法，在黄肢、草台岗两次战斗中，一举歼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近三个师，俘师长李明、陈时骥，击伤师长肖乾，俘虏官兵万余人，缴获了大量枪械，子弹、电台等军用物资。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遭受如此沉重的打击，这在以往各次战役中是不曾有过的。

朱德巡视战场，看着大批俘虏和缴获的军用物资，十分高兴地对周恩来说：

“陈诚几年间所依靠的部队整个被打垮了。四次‘围剿’，也宣告结束了。”

周恩来也十分高兴，谦虚他说：

“全靠朱老总指挥有方啊！”

“哪里，哪里，全仰仗周总政委出谋划策。”朱德笑着说。

红军胜利之际，也正是蒋介石悲哀之时，他在给陈诚的“手谕”中说：

“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

朱德、周恩来指挥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使中

央革命根据地有了新的发展，地跨赣、闽、湘、粤四省，并同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中央红军和地方红军发展到十余万人，加上闽浙赣、湘赣、湘鄂赣、鄂豫皖、川陕、陕甘等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共三十万人左右。这是中国共产党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极端艰难的革命低潮中坚持土地革命战争取得的巨大成就。

#### 四、共为长征突围打开秘密通道

时值第五次反“围剿”的紧张阶段，不甘于对中央苏区四次“围剿”失败的蒋介石，聘请外国军事顾问，调集百万大军，改变战略战术，变本加厉地对苏区发动进攻。

在这次“围剿”中央苏区中，蒋介石为把发动粤系军阀陈济棠绑架在他的战车上，给了个两路军总司令的头衔。但陈济棠出于自身的利益，并不想在江西替蒋卖命，消耗实力。

陈济棠人称“南天王”，控制着广东大权。他与蒋介石争权夺利，历来矛盾重重，同床异梦，曾经3次通电反蒋。

他深知蒋介石其人好险狡诈，反复无常，对他忽打忽拉，居心叵测。蒋介石令他“围剿”红军，乃是“借刀杀人”、“一石两鸟”，想使他与红军两败俱伤，他好坐收渔人之利。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好蒋介石及红军的三角关系，事关他能否独霸广东、永踞“南天王”的宝座。因此，陈济棠“进剿”红军行动缓慢，未完成碉堡封锁线，目的是防堵红军，同时，也防堵蒋介石中央军入粤，力图偏安广东地盘。

在蒋介石威逼和利诱下，陈深知进攻红军没有好结果，而按兵不动又怕蒋翻脸，于是只好对蒋介石耍起了阳奉阴违的两面手法。他一面派部队向红军进犯，一面又同红军拉关系，做试探性的和谈。

1934年4月，敌人攻占了中央苏区的北方门户广昌，向苏区腹地推进，这时，在南方战线，陈济棠不得不同南路军的两个纵队，计六个师，一个航空大队，一个重炮团的兵力，向苏区寻乌、安远、重石、清溪、筠门岭等地区配合进攻。

在这一带，粤赣军区红二十二师是作战的主力部队，对于敌人的进攻，在澄江、岔口、盘古隘连续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给敌以很大的杀伤。

陈济棠为之惊叹，说：“红军勇敢善战，射击技术精良，构筑防御工事的巧妙，是没有想到的。”

但因敌众我寡，筠门岭终被粤军占领。

在占领筠门岭之后，陈济棠就采取了“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一面虚张声势，谎报向会昌城进攻，摆出打的架式。另一方面又极端秘密地派他的高级参谋杨幼敏赴筠门岭向红军做不再互犯的试探。

蒋介石一贯搞特务政治，遍布密探特务，对陈济棠的活动当然不会一无所知。当他发现陈济棠的秘密活动后，虽然怒斥他“借寇自重”，但因疲于“围剿”红军，也莫奈陈何。

说起红军和粤军陈济棠的统一战线，由来已久。

在何长工、潘汉年去寻乌和他的代表谈判之前，我们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就同陈方有过接触，陈济棠曾派人找过红军一位高级将领在广州的亲戚，要他向周恩来传话。那时他主要是想同苏区通商做买卖。毛泽东也曾指示要想办法促陈抗日。

1934年9月，陈济棠派来了姓李的代表，要求和红军谈判。因何长工是南线红军的负责人之一，对方提议由何长工担任共方军事全权代表。

这时，中央红军正在筹划实行战略转移，转移的突破口尚未选定。得到陈济棠与红军和谈的消息，朱德、周恩来都不禁大喜：这不正是天赐良机，

如果与陈济棠谈判成功，红军从陈的防地转移出去，既可少受损失，又可顺利转移。于是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即致信陈济棠，伸张民族大义，指出了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信中指出：

华北大好山河，已沦亡于日本，东南半壁亦岌岌可危。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德等深知为达此日的，应与国内诸武装部队做作战之联合，两年前苏维埃政府即宣告，任何部队，如能停止进攻苏区，给民众以民主权利及武装民众者，红军均愿与之订立反日作战协定。

同时，对协定具体提出了如下几条：

一、双方停止作战行动。而以赣州沿江至信丰而龙南、安远、寻乌、武平分界线。上列诸城市及其附郭十里处统归贵辖，线外贵军，尚祈令其移师反蒋。

二、立即恢复双方贸易自由。

三、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反日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实实行武装民众。

四、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活动，并切实做反日蒋之各项军事准备。

五、请代购军火、并经门岭迅速运输。

如蒙同意，尚希一面着手实行，一面派负责代表来瑞共同协用战计划。日内德当派员至门岭和就近商谈。

1934年10月初，何长工接到通知，要他去瑞金，何长工策马扬鞭，急驰在绵水河畔的崎岖道路上。抵目的地后，周恩来亲切地握着何长工的手说：

“陈济棠电约我们行秘密军事谈判，这很好，我们可以利用陈、蒋之间的矛盾。朱总司令已给他复信。根据目前党的统战思想及政策，我们准备与陈谈判。我们商定，派你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为代表，到陈管区寻乌附近和陈派来的代表第一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谋杨幼敏及两个师长：一个是第七师师长黄质文，另一个是独一师师长黄任寰，举行密谈。”

接着，周恩来郑重地对何长工说：

“长工同志，这是中央给你的重任，望你勇敢沉着，见机而做。”

最后，周恩来向何长工交代了联络密语等项事宜。

陪同接见的军委副参谋长叶剑英边嘱咐道。

“此去白区谈判，任务重大，谈成了，是很有益处的，要尽力而为；谈不成，也不要紧，关键是沉善灵活。”

然后，周恩来拿起毛笔，饱蘸墨汁，以朱德的名义写了一封致对方的信，交由何长工、潘汉年。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黄师长大鉴：

兹应贵总司令电约，特派潘键行（潘汉年）、何长工两君为代表前来寻乌与贵代表幼敏、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予接洽照拂为感！专此、顺致

戎祺

朱 德

十月五日

何长工、潘汉年扬鞭催马，奔驰在去寻鸟的路上。来到赤白交界处之筠门岭羊角水附近，天色已晚，前来迎接他们的是陈部独一师二旅旅长严应鱼心腹特务连连长严直，率领全连和旅长的四名轿夫。

他们把何、潘俩人抬到旅部所在地罗塘镇一处寂静山村，被安排在一幢崭新的两层小洋楼上。对方谈判代表住在楼下。第二天在楼上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谈判秘密开始。由于双方均有诚意，而且事前有过接触，因而谈判比较顺利，很快达成了以下五项协议：

- 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 2.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
- 3.解除封锁；
- 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后方，建立医院；
- 5.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 40 里。红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就在和对方代表谈判期间，何长工、潘汉年接到周恩来事先商定的密语电报：

“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

跟何长工、潘汉年谈判的对方代表很敏感，问何长工：

“是否你们要远走高飞了？”

何长工平静地回答：

“不是，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已天了。”

但何长工心里明白，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瞎指挥，使第五次反“围剿”终于遭到失败。红军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在应付对方结束谈判后，便立即离开寻乌，返回会昌。当时中央军委机关已从瑞金的白石山转移到于都去了，周恩来特地派人等候何长工、潘汉年，并留下了一封信。信上简略他说：

“长工同志，我在于都等你们。”

何长工、潘汉年立即动身前往于都，见面后即向周恩来汇报了谈判情况，他得知谈判成功，达成了五项协议，异常高兴，说：

“这对于红军、中央机关的突围转移，将起重大作用。”

这是朱德、周恩来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抓住陈济棠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为中央红军主力突围打开通道的成功之举。

## 五、一条毛毯，凝结半个世纪的友谊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品里，有一条缀满了补丁的普通红色毛毯。它凝结着周恩来和朱德之间大海一样深厚的战斗情谊。

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人在赵博生、董振堂领导下，在江西宁都起义，参加了红军。为庆祝宁都起义的胜利，并表示对红军总司令的尊敬，董振堂把这条毛毯赠给朱德以做纪念。

这条毛毯在当时红军物质十分菲薄的情况下，已是珍贵之物，且它又满含着战友的深情，朱德对它十分珍爱，带着它粉碎国民

党的“围剿”；带着它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又带着它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不管环境多么恶劣，斗争多么残酷，在长期征战和行军生活中，朱德忍痛丢掉了很多东西，却一直保存着这条毛毯。

1936年冬天，西安事变发生了，周恩来常常顶风冒雪奔波在西安、延安之间。陕北高原凛冽的北风和酷烈的严寒，使朱德为周恩来的身体担心，于是就把这珍贵的纪念品——红毛毯转送给周恩来，让他用来挡风御寒。

1937年5月，周恩来从延安到西安，在劳山遇险，遭到国民党政治匪徒的袭击。周恩来亲自指挥大家奋勇作战，脱险后来到我军驻地三十里铺，但毛毯却丢在了劳山。在红军骑兵部队赶到的时候，匪军气急败坏地在装着毛毯的行军囊上乱刺了十几刀，然后仓皇逃走。这条刀痕累累的毛毯经过洗涤、织补，又回到周恩、来手中。

抗日战争爆发了，朱德即将率领八路军奔赶太行山抗日前线。为了给同生死、共患难的老战友增添御寒之物，以抵挡太行山冬季的严寒，周恩来又郑重地把这条毛毯回赠给朱德。

这条历经战火洗礼的红色毛毯，铺在太行山区人民的土炕上。人民热爱朱德，常常把土炕烧得暖暖的，温暖着人民的老英雄朱德。不料有一次火烧得大旺，这条毛毯在土炕上被烤了一个大洞。朱德舍不得丢弃又让人把它细心缝补好。

这条带着刀痕火伤的毛毯，一直陪伴朱德到全国解放以后。

## 六、“老总，你面见蒋介石，来个借釜酿酒如何？”

1938年10月22日，“飞将军从天而降”，周恩来在武汉机场迎来了朱德，他是应蒋介石的召请，刚从华北战场风尘仆仆赶来的。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两位老战友商议起与蒋介石会谈的对策。周恩来了解此时国民党的底细，告诉朱德：

“目前蒋介石把持国民政府，忙着迁都重庆，不打算放一枪一炮，武汉的陷落是确定无疑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应抓紧两党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为了说清问题，你不妨先对他宣传八路军在前方英勇抗敌的事例。”

“对，对，”朱德连连点头，说，“我们不去评论他大撤退命令是否正确，我们单单讲军队与老百姓的抗战热情！”

朱德说着，用劲拍着随身带来的公文皮包说：

“我这里带来好多份将士们用鲜血写成的请战书、决心书，他姓蒋的不怕亡国，老百姓可不愿意当亡国奴，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他，叫他这位逃跑统帅感到惭愧，感到自己的爱国热情和胆识远不如一个普通老百姓！”

通过商议对策，俩人决定了所应谈及的重点内容，并决定在召见时要在气势上压倒对方，使蒋介石处于被动地位。

这时，周恩来很神秘地对朱德说：

“老总，你面见蒋介石，来个借釜酿酒如何？”

朱德一时不明底里，忙问原由。

原来，周恩来一直在计划创办一个游击战争训练班，训练连以上、师以下的各级指挥人员。考虑国共合作的形势，拟将训练班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问题，由两党共同商议。他想在此时趁蒋介石召见朱德之机，以朱德的名义直接向这位最高统帅报请。

朱德听后，十分兴奋他说：

“好啊，是一个妙着儿，我完全赞成。有你在这里坐镇，有你办事处一帮人‘擂鼓助威’，我这个‘排头兵’士气更高了，等会儿我去冲锋陷阵，定能旗开得胜！”

果然，蒋介石看着那份关于创办游击战争训练班《建议书》，眯了眯眼，摸了摸光头，半个“不”字也没说，就满口答应了。不过，蒋自封为训练班主任，汤恩怕为教育长，叶剑英为副教育长。地点定在南岳。

朱德回来将情况告诉周恩来后，周恩来充满信心对朱德说：

“他姓蒋的只知道抓权。可他完全不晓得自己有多大能耐，他也不知道他手下的骄官宠臣有多大本事，那一班人浮在上面，只会作威作福，什么事也搞不成，只要下面军事教官由我们派，事情就有希望，我们可以用我们党和红军的传统、作风去影响教导学员，把训练班办成一个革命大学校。”

最后，周恩来呵呵笑着对朱德说：

“这训练班由他蒋介石拨钱，为我们培养抗日力量，这种‘借釜酿酒’的好事，何乐而不为？”

## 七、为朱德祝寿

1946年12月1日，是朱德60寿辰，中共中央决定为朱德祝寿。此时，国民党正在全国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人们在这个严峻的历史时刻为自己的总司令祝寿，有着一种特殊的心情，自然把朱德的名字同中国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形成热烈、真挚的感人情景。

祝寿前夕，《解放日报》在11月27日发表了中共中央祝贺朱德60寿辰的祝词和《朱德将军年谱1896—1946》，从11月29日起，延安全城悬旗三天。党、政、军、农、工、商、学各界，纷纷举行庆祝活动。有的献上刚从前线缴获的胜利品，有的献上自己亲手种植的丰收果实。

11月31日，祝寿晚会由林伯渠主持。当他宣布“请周恩来同志致词”时，一天的祝寿活动进入欢腾的高潮。大家用充满信任和自豪的目光齐望着主席台，双手不停地使劲鼓掌。一阵比一阵热烈的掌声，表达着人们对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我们党的代言人——周恩来的尊敬和欢迎。

周恩来健步走向讲台，他把手里的祝词展开来轻轻铺在讲台上，然后侧过身，微倾着头，用真挚的目光望着坐在台下前排的朱德说道：

“亲爱的总司令——朱德同志你的60大寿，是全党的喜事，是中国人民的光荣！”

刚刚平息的掌声和欢呼声顿时又响彻全场。

周恩来高高举起双手，和大家一起向朱德表示衷心的祝贺。然后，他放下手，充满激情他说道：

“我能回到延安，亲自向你祝寿，使我万分高兴。我愿代表那反动统治区千千万万见不到你的同志、朋友、人民向你祝寿，这对我更是无上荣幸。”

朱德谦逊地欠起身，充满感激地回答说：

“谢谢同志们。谢谢。”

周恩来捧起祝词，望望大家，继续朗读道：

“亲爱的总司令，你的60年的奋斗，已使举世人民公认，你是中华民族的救星，劳动群众的先驱，人民军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

“亲爱的总司令，你为党为人民，真是忠贞不二。你在革命过程中，经历了艰难曲折，千辛万苦，但你永远高举着革命的火炬，照耀着光明的前途，使千千万万的人民能够跟随着你，充满了信心向前迈进。”

掌声又一次淹没了全场。

周恩来的眼睛没有离开祝词，此时此刻，他沉浸在往事的回忆里。多少年来，他们从大西洋岸边的德国柏林开始，为了民族的解放同甘共苦、浴血奋战，一起经历了无数次艰难困苦的考验。但是，此时他只能把一切感情、评价和尊敬概括在这篇短短的祝词里。他用深情的语调回顾说：

“在我们相识的25年当中，你是那样平易近人，但永远坚定不移，这正是你的伟大。对人民，你是那样亲切关怀；对敌人，你是那样憎恶仇恨。这更是你的伟大。”

周恩来的声音越来越激昂，越来越洪亮，以致每讲出一句话，都要引起一阵春雷般的掌声。

“在全党中，你首先和毛泽东同志合作，创造了中国人民的军队，建立

了人民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写下了新的纪录。在毛泽东同志旗帜之下，你不愧为他的亲密战友，你称得起人民领袖之一。

“亲爱的总司令，你的革命历史，已成为 20 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辛亥革命、云南起义、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生产运动，一直到现在的自卫战争，你是无役不与。你现在 60 岁了，仍然这样健壮，相信你会领导中国人民达到民族解放的最后胜利，亲眼看到独裁者的失败，反动力量的灭亡。

“你的强健身体，你的快乐精神，象征着中国人民的必然兴旺。”

最后，周恩来放下祝词，目光炯炯地望着全场，用热情洋溢的声音，一字一顿，铿锵有力地祝愿说：

“人民祝你长寿！全党祝你永康！”

这充满着诚挚感情的祝愿，立刻被全场的人们当做口号欢呼起来。

## 八、睿智的周恩来，通过毛泽东保护了朱德

1967年1月，正是“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的疯狂岁月，在江青指使下，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当时担任中央办公厅负责人的戚本禹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办公地点）约集中央办公厅的造反派，鼓动他们在中南海里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朱德等人进行批斗。于是，这些造反派先后冲进刘少奇等家中对他们进行围攻和批斗，也包围了朱德的家，康克清回忆说：

“一天晚上，我回到家，中南海造反团的造反派们围在楼前，高呼‘打倒’‘炮轰’的口号，把大字报、大标语贴到我们家的墙上、地下，到处都贴。还提出要把我们从中南海轰出去。当时，朱总还在玉泉山。他们一直闹到很晚才散去。”

当朱德从玉泉山回到中南海的家中，就接到造反派的“勒令”，要他必须去看批判他的大字报，交代“反对毛主席的罪行”。

造反派在中南海内贴出了攻击朱老总的大字报后，消息很快传到周恩来那里，他立即驱车赶到朱老总的家，安慰他要保重身体，劝说老总到比较平静的玉泉山休息。在老总身边工作的同志悄悄告诉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说：“朱老总已去看了那张大字报，边看边用手中的拐杖敲打着地面，说那张大字报只有两个字是对的，那就是‘朱德’，其他内容不知是从什么地方造出来的。”1月底，戚本禹又煽动中国人民大学的造反派，把批判朱德的斗争引向社会。一时间，攻击朱德的大字报、大标语纷纷出现在

北京大街上。造反派还贴出海报，准备召开万人大会，公开批斗朱德。

北京大学的造反派头子聂元梓得到这个消息后，以为讨好主子江青的机会来了，立刻召集北大造反派开会。这个女人此时已完全兽性化，她在会上极具煽动性他说：

“清华大学揪出了刘少奇，我们这次也要搞一个大的。”

会后，她又立即给康生打电话，探询“中央文革”的态度。

康生老奸巨猾，回答说：

“你们自己搞就成了。要是我们让你们搞的就搞不成了。”

于是聂元梓几次召集会议，组织班子撰写批判朱德的文章登在《新北大战报》上，印了50万份，散发到全国各地。

面对突然袭来的恶浪，朱德泰然自若地向康克清谈了两点看法：第一、历史是公正的；第二、主席和恩来最了解我，有他们在，我担心什么。同时，他还劝慰康克清：

“你不要怕他们批斗，要每天到机关去，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和群众在一起，他们就不会天天斗你了。”

造反派要揪斗朱德的消息传到了周恩来那里。睿智的周恩来知道，要想制止这种暴行，只有让毛泽东说话。他立即去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并谈了自己的看法。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于开会的前一天，他要秘书通知戚本禹，必须立即取消“批判朱德大会”。由于周恩来的干预，批斗大会没有开成。

事后，戚本禹恼羞成怒，责备造反派们：

“你们以为你们很聪明，其实最傻了。要不要搞，你们自己考虑。”

这年5月以后，在“中央文革”小组煽动下，许多地方相继发生大规模武斗，仓检法机关以及军事机关遭到冲击，银行、仓

库、机要档案部门遭到抢劫，铁路交通遭到破坏，违法事件不断发生，

整个社会处在大动乱中。

朱老总听到有些地方武斗很凶，甚至有的部队也参加了武斗的消息后，十分痛心。他说：“用这种狂轰滥炸的方式解决矛盾 怎么行呢？”

这一段时间，朱德一直很沉闷。他想去主席谈谈，可得到的答复是主席很忙，没有时间。有一次，朱总要秘书陪他去找总理，可到了总理门前，他又犹豫了，他知道总理很忙，不忍心打扰他，最终还是没有进去。

朱德同周恩来有半个多世纪的深厚情谊。他是 1922 年在德国由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入党的。五十多年来，他们曾经一起度过了多少个生死与共的日日夜夜。周恩来是在发现癌症两年后的 1974 年 6 月才住院的。朱德同他最后一次相见是 1975 年 7 月 11 日，那天周恩来身体稍好一些，起床后在病房内做“八段锦”运动。

他边运动边对卫士高振普说：

“你去打电话，问一下朱老总的身体怎么样？他现在有没有时间？前些日子他想来看我，因为我当时身体不大好，没能请他来，今天可以了，看朱老总能不能来。”

高振普答应马上去打电话。

周恩来接着说：“现在是 4 点多钟，如果老总可以来，5 点钟可以到这里，大约谈上半个小时，5 点半可以离开，6 点钟他可以回到家吃饭。按时吃饭是朱老总多年的习惯。他有糖尿病，年岁又大，不要影响他吃饭。如果今天不能来，过几天他要去北戴河了，最好在此之前来一趟。”

周恩来住院后，朱老总几次想来看望，只是怕影响总理的正常治疗。周恩来也不愿让年近九旬的朱老总看到他在病榻上的样子，所以一直没有让来。今天，周恩来约朱老总来，是想到朱老总过几天去北戴河，需两个多月才能回来，担心到那时自己的身体条件不会比现在好，所以，请朱老总在去北戴河之前先来见见。

很快，高振普把朱老总可以来的消息报告了周恩来，同时转达了康大姐的问候。周恩来听到后十分高兴，在病房里来回走了几趟，对高振普说：

“帮我换上衣服，到客厅里去见老总，不要让他看到我穿着病号衣服。”

下午 5 时 50 分，朱德到了，他迈着稳健的步子走向客厅，周恩来此时已穿戴整齐，忙起身迎向朱德，俩人同时伸出双手，朱德用颤抖的声音问周恩来：

“你好吗？”

周恩来回答。

“还好，咱们坐下来谈吧。”

朱德已 89 岁高龄，动作有些迟缓，卫士们扶他坐在沙发上。

周恩来关心地问朱德：

“要不要换一把高一点的椅子？”

朱德很是感激他说：

“这个就可，这个就可。”

周恩来示意关上客厅的门，机灵的卫士都退了出去，客厅里开始了两位老战友的谈话。

下午 6 时 15 分，谈话结束了，周恩来送朱德走出客厅，紧紧地握手告别，警卫员搀扶着朱德上了车，周恩来目送着汽车开走，才转身回到病房。谁能想到，这次相见，竟是两位几十年出生入死的老战友的最后诀别！

1976年1月8日，全国人民敬爱的总理不幸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周恩来这样快地去世，是朱德怎么样也想不到、也难以相信的。

元旦，朱德的病刚好一些，就出了院。在生病期间，组织上没有告诉他总理病重的消息。1月8日，总理逝世时，一开始也不敢告诉他。那天下午，他正去接见外宾，接受国书。回来后，康克清慢慢地对他说：

“总理病情最近恶化了。”

朱德听了后，连这也不相信，认为有那么多的好大夫给总理治病，病情不会发展得那么快。敬爱的周总理会这么快去世，他没有想到，也不愿想到呀！晚上8时，当他得知总理逝世的消息后，禁不住老泪纵横。女儿朱敏从来没有看到过父亲掉泪。1974年，她哥哥因病突然去世，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都没有掉一滴眼泪。她知道，父亲和总理有着一种常人难以体会到的伟大友谊，同时，父亲也在为国家失去一巨大支柱而痛惜，而担忧。

当朱德听到总理临终遗言，要把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和江河里时，带着十分崇敬的心情说：

“过去人们死后要用棺材埋在地里，后来进步了，死后火化，这是一次革命。总理为党、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真是一个真正的彻底的革命家。”

他一边说，一边流泪，还问女儿朱敏等人：

“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

朱敏忙说：

“知道一点，看了一些别人的回忆。”

朱德嘱咐子女们：

“你们应该了解总理的革命历史！”

说着，他就开始讲总理革命的一生。朱敏怕他过分伤心，身体受不了，没有让他说很多，但他不时自言自语：“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不难看出，朱德已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

在向周恩来遗体告别时，朱德一路上都在掉泪，在车上他就要脱帽子。在周恩来的遗容前，他庄严地举手致敬！回来后，一句活不说，也不吃东西。治丧委员会的同志征求他的意见，是否只参加一次吊唁仪式，他却坚持要全部参加。开追悼会时，他原来决定是要出席的，但是就在出发之前，90高龄的朱德，由于哀悼周恩来过分悲痛，两条腿说什么也站不起来了，因而没有去成，成为他的一大遗憾。

## “德怀同志是颇具战略眼光的”——周恩来与彭德怀

彭德怀（1898—1974），原名彭得华。湖南省湘潭县人。1916年入湘军，在湘军任营长、团长。参加了北伐战争。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领导平江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军长，红三军团总指挥及军团前委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一方面军司令员，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副总指挥（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任副总司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中共第六、七、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彭德怀与周恩来相识于30年代的中央苏区，彭德怀作为红三军团的军团长，在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的麾下冲锋陷阵。其后，在长征途中、抗日前线、解放战争的西北战场、抗美援朝战争中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彭德怀刚正忠烈，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周恩来不以为忤，大度接受。彭德怀数遭劫难，身陷囹圄；周恩来倾其所能，予以保护。彭德怀遭迫害致死，“四人帮”妄图焚尸扬灰，周恩来以其身后历史深刻的洞察力，竭力保护下彭德怀的骨灰，终使其得见天日。

## 一、彭德怀：宁可丢掉装备，也要把周副主席抬出草地

1935年6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今四川小金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两大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十多万。毛泽东主张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促进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张国焘反对向北发展，认为川北一带地形、给养不利于大部队行动，主张集中兵力西进青海、新疆或南下。

为决定红军的战略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26日在两河口开会，决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会

议还否定了张国焘提出的向川康发展的主张。张国焘表面上接受了会议的决定。

中共中央为维护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其后，一方面军的一、三、五军团改为一、三、五军，九军团改为三十二军。

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进军甘南的“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决定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左路军（由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三军、三十二军组成）从马塘、卓克基出发，向阿坝地区开进。右路军（由一方面军的一军、三军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从毛儿盖地区出发，进入草地，向班佑、巴西前进。

就在这时，与毛泽东、王稼祥一起指挥红军、并有最后决定权的周恩来完全病倒了。但他仍然勇挑重担，随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殿后，由于连续发高烧，转为肝脓肿，身体非常虚弱。莫说过草地，就是在平坦的道路上行军也不行了。

在当时，周恩来、毛泽东就是全军的主心骨，周恩来的健康和安全无疑是全军的大事，大家焦急万分，彭德怀也深感责任重大，他苦思一阵，断然说：

“抬！”

当时，中央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的成员王稼祥也在重病中，也在红三军团，彭德怀深知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抬”并不是容易的。他把上任不久的红三军团参谋长肖劲光找来，交代说：

“你具体负责，组织担架队，实在不行，宁可把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周副主席、稼祥同志抬出草地。”

肖劲光马上从迫击炮连抽出几十人组成担架队，干部团团长陈赓虽然腿有残疾，但自告奋勇来当队长。陈赓把担架队编成几

个组，轮流抬着重病中的周恩来、王稼祥向草地进发。

川西北草原，位于青藏高原同四川盆地的连接段，气候恶劣，变化无常。夏秋雨季，草地泥泞滞水，行人忘而却步，许多地区渺无人烟。红军部队进入草地后，几乎天天下雨，连向导都难以寻找旧路的痕迹。谁一不小心陷入淤泥，就会为沼泽所吞噬。彭德怀和战士一样在队伍中行进，遇到危险路段，他还要赶在队伍前头，指挥排除险情。

在这十分艰难的行军中，只要一有空隙，彭德怀就会来到担架队，看望周恩来和王稼祥，嘱咐陈赓他们一定要不借一切代价，把中央领导安全抬出草地。他十分严肃地对陈赓说：

“周副主席和稼祥同志，我可是交给你了，若有半点差错，我惟你是问。”

陈赓坚决他说。

“老总，请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经过六天六夜草地的艰难行军，周恩来坐着彭德怀为他准备的担架，终于走出了长征中那段最为危险、最为困苦的路程。

## 二、彭德怀电报作战部署，周恩来拍案叫绝

1936年10月，经过长征，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的会宁、静宁地区胜利会师。

蒋介石对红军二大主力会师，惊恐不安，急调十几个师的兵力追击红军，分别由东、南、西三面向静宁、会宁地区疾进。

鉴于敌情变化，毛泽东、周恩来为阻敌南进，遂向中央军委提议，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组织海（原）打（拉池）战役，重点打击胡宗南部。彭德怀就任之后，于10月下旬

旬请示军委和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三个方面军主力协同作战，集中力量，在海（原）打（拉他）消灭胡宗南一至二个师，迟滞毛炳文、王均部的部署意见。这一计划如果实现，可扼制南面敌人进攻的势头，为实现宁夏战役计划创造条件。

接到彭德怀的部署电报，周恩来仔细审阅，不禁拍案叫好，觉得这一部署不但顾及了当前，而且关照到了下一步战局的发展，具有战略眼光。他手持电报，来到毛泽东的住处，以十分赞赏的口吻说：

“主席，彭总来电，提出海打战役部署意见。可以看出，德怀同志是颇具战略眼光的。”

周恩来说着，把电报递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一边看，一边不住地“嗯嗯”着，待到看完，连声说：“老彭的部署甚好，恩来，我看就这样定了，赶快给老彭复电，照此部署实施。”

10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就复电彭德怀，完全同意彭德怀的部署。

彭德怀接到毛、周复电，立即实施作战部署。30日，红一方面军六个师，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准备从东南两面歼灭胡宗南先头部队两个师；其余部队钳制毛、王二部。当两军临战关头，张国焘命令四军和第三十一军后撤，使一方面军完全暴露在胡军面前，破坏了彭德怀的作战部署，战役计划落空。接着，张国焘又贻误了在海原与同心城之间击敌的作战部署，使诱歼胡军一部的目的未能实现，而胡军则得机进下靖远、打拉池等地，打通了增援宁夏的道路。红军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被迫中止，不得不放弃预旺以西的大块土地，丧失了控制西兰公路以至甘肃全省的时机。

对于张国焘拥兵自重，不服从军委部署，毛泽东、周恩来十

分焦虑，为排除张国焘对作战指挥的干扰，毛泽东、周恩来征得中央军委多数同志同意，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在11月15日授权彭德怀，并下令红军“一切具体部署及作战行动，各兵团首长绝对服从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同志之命令。军委及总部不直接指挥各兵团，以便适合情况不影响时机地战胜敌人”。同时指出，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之进攻，然后才能展开局面。”

这一授权，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周恩来对彭德怀的高度信任。

为诱敌军东进，寻机歼敌，红军开始由同心城、王家团庄、李旺堡之线东移，经过几日行军，红一方面军进至预旺东北地区待机。红四方面军四军、第三十一军分别进至红城水、萌城、甜水堡地区待机，红二方面军进至环县地区。这时，胡宗南第一军在攻占同心城后，错误地认为红军不堪一击，十分骄横，急向东进，将所部分成三路追击红军。

11月18日，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领导人联合署名发出《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令》，号召一、二、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服从命

令，英勇作战，克服困难，并准备连续战斗”，“不怕疲劳，勇敢冲锋，多捉俘虏，多缴枪炮”，粉碎敌人的进攻，开展新局面，作为三个方面军会合于西北后赠给苏区人民的第一份礼物。

当日晚，周恩来由陕北亲赴前线河连湾，代表中共中央热烈欢迎和慰问二、四方面军。周恩来慰问完前方将士，专门来到彭德怀的指挥部，一则致慰问之意，二则了解战况，周恩来的到来，更使彭德怀坚定了必胜的信心。为了更好地统率三个方面军，彭德怀坚决要求周恩来留下，以周恩来的崇高威望，指挥三军共同作战，自己协助之。看到彭总如此真诚恳切，周恩来就决定暂留前方，同彭德怀一起指挥作战。

### 三、“彭总，这出双簧你演得好啊！”

国共合作之后，1937年9月初，朱德总司令在三原北的耀县举行红军抗日誓师大会，彭德怀陪同周恩来于9月5日先抵太原，协助周恩来和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会商红军参战事宜。

在日军即将侵入山西之际，阎锡山把他的旧军（晋绥军）部署于大同一带，准备与日军一战。红军出师，也准备首先开赴大同前线，但当周恩来、彭德怀赶赴晋北时，阳高、天镇相继失陷，山西形势急转直下，阎锡山眼看日军长驱入晋，他战无信心，不战又无以回答山西民众。他知道，挽救晋局，必须借助八路军之力，急请周恩来。彭德怀等与他共商防守之计。

周恩来、彭德怀等人从大同驱车，直抵雁门关下大和岭第二战区前线司令部。阎锡山拿出了他筹划的方案：以晋绥军六个军的兵力在平型关、沙河、繁峙一线布置一个口袋阵，要求八路军与高桂滋军正面防守平型关。阎锡山的如意算盘是：让八路军打正面，与日军硬拼，一则消耗八路军的实力，二则保存他自己的实力。

这一切，又怎能骗过机智的周恩来，他对阎锡山的计划，来了个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先是原则同意，同时指出，八路军将发挥特长，运用运动战与游击战的结合，配合友军围歼日军。

彭德怀对周恩来的意图心领神会，在周恩来提出原则性意见之后，彭德怀即做了具体阐述，提出：以友军坚守平型关正面，八路军一一五师隐蔽集结于敌前进道路的侧面，从敌侧后夹击进攻平型关之敌；八路军一二师则位于晋西北地区，待机侧击进攻雁门关之敌。

由于周恩来坚持八路军只能配合友军作战的原则，彭德怀紧密配合周恩来把具体作战方案阐述得具体明了，使阎锡山再不好坚持让八路军打正面的意见，这就奠定了其后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隐蔽设伏、大败日军的基础。

9月19日，一一五师劳师远至，即奉总部命令越五台。出长城，于平型关西边的大营镇集结待命。21日，朱德、任弼时、左权率总部抵太原，中共中央军委前方军分会立即举行会议。会议讨论山西战局及八路军的作战计划，大家一致同意周恩来、彭德怀关于配合友军侧击进攻平型关之敌，争取打胜仗，鼓舞士气民心的意见。23日，总部进抵五台的南茹村。当日，朱德、彭德怀下令一一五师选择地形，进入伏击状态，相机出击。

24日，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亲临前线，指挥所部三四三旅之六八五团和六八六团，在平型关外设伏，25日晨，部队向正在开进的日军板垣师团二十一联队一部及辎重部队发起突袭。以勇敢顽强的近战肉搏，歼灭日军一千余人，缴获大批军械物资。八路军也付出重大牺牲，伤亡六百余人。

周恩来对于这一次彭德怀与他互相配合舌战阎锡山非常满意，高兴地对彭德怀说：

“彭总，这出双簧你演得好啊！”

彭德怀谦虚地嘿嘿笑着说：

“哪里，哪里，都是周副主席导演得好啊！”

自抗战以来，国民党军队纷纷败退，一败千里，日军在华北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至此，遭到八路军的痛击。英国路透社报道说，日军以前没有与中国有名的红军作战，现在碰上了，就不容易占便宜。

其后，彭德怀又陪同周恩来从太原到大同，从雁门关到五台、石家庄、保定各处，与阎锡山、黄绍竑（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程潜（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等人会谈，协助周恩来向友军阐述我军游击战战略方针，说明目前我军数量少，不能正面作战，只能实行游击战，从侧面配合友军作战的理由和重要性，从而使友军理解了我军的战略意图，奠定了日后在华北开展游击战的基础。

#### 四、“我察觉到你们住在城里的人对农村开始有点生疏了”

1949年四五月间，彭德怀从西北前线来到了北京，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并研究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彭德怀来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里，周恩来立即起身迎接。两位老战友相见，分外亲热，望着彭德怀朴素的衣着和疲惫的面容，知道他在辽阔的大西北地区转战和奔波非常辛苦。谈话中，彭德怀向周恩来汇报了西北地区的情况，说：

“西北地区，特别是新疆和青海，幅员广阔，地貌奇异，自然资源丰富，有许许多多奇特而珍贵的动植物，但基本上还是未开发的处女状态。这些地方的形势和问题也都具有一种畸形的复杂性。敌人的武装力量还未完全被消灭，暗藏的反革命势力更是远远未被肃清，人民生活十分艰苦，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任务还很重很重。”

讲完这段话后，彭德怀话题一转，对先进入城市的同志提出了意见，指出干部的办公室里一般都摆着沙发，铺着地毯，又是茶几、花盆、盆景、鱼缸等等。

最后，向来直爽的彭德怀毫不隐讳地对周恩来说：

“前方干部的生活情况与工作条件还极其艰苦，我想说的不只是他们可能看不惯这里的这些情况，而主要的是怕进了城的同志会忘记乡下和边远地区的劳动人民，同他们的感情淡薄起来。我察觉到你们住在城里的人对农村开始有点生疏了，可是时间如此短暂，就出现了这种苗头，日子长了，会怎么样呢？”

毫无疑问，意见是十分尖锐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深刻的。

周恩来不但不以为忤，而且非常重视彭德怀这段话，并以赞许的口吻说：

“讲得好，意见提得及时，很值得警惕，中央将会注意这些问题。目前，我们既要打仗，消灭敌人，又要搞生产建设；既要接收好并学会做城市工作，又要把农村的事情办好，把城乡两方面的问题都解决好。”

恰好这时又走进来一批同志，他们是从东北一些城市和石家庄等地来的，也是进城较早的一些人，于是也参加了讨论。他们听了彭德怀与周恩来议论的话题，肯定说，进了城市以后，不知是因为工作关系，还是生活条件的变化，总觉得离群众远了，离乡村农民更远了，而且同志间的往来关系也和延安时期大不一样了，见面的机会，交换意见的机会也都少了。回忆延安时期的工作、学习、生活，相互交往与互助合作的精神，同志间的团结友爱，以及互相关心照顾的真挚感情，大家都很向往。联系到毛泽东向全党全国提出的关于学习延安时期艰苦朴素作风的教导，大家更认识到彭德怀刚才那段话的意义。大家非常佩服彭德怀政治上的敏锐和直言上谏，也非常钦佩作为党中央领导人的周恩来的从谏如流。

## 五、彭德怀火冒三丈，周恩来冷静处之

1950年10月1日，是中国人民的第二个国庆节，人们载歌载舞，欢庆胜利，欢庆丰收，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然而善良的人们怎能会想到，就是在这天夜里，美帝国主义悍然支持南朝鲜部队突破了“三八线”。美帝国主义组织的所谓“联合国军”，与南朝鲜军队一起，大力向北推进，战火即将到鸭绿江边。

10月2日下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颐年堂开会。毛泽东认为，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原拟派林彪率军入朝，但林彪不大赞成出兵，称病推辞。中央书记处遂决定改派彭德怀来挂帅。毛泽东要周恩来速派专机去西安接彭德怀来北京，参加准备于4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不巧，10月3日华北地区细雨濛濛，云层很低，当时国内只有小型飞机，不宜航行。

10月4日上午，天气放晴，周恩来立即命令机场：接彭总的飞机马上起飞。同时交代去接彭德怀的人员：

“飞机一到，立即接来，一刻也不准耽误。”

飞机按时起飞了。周恩来的心稍稍安定了一些，他的思绪又回到出兵抗美援朝上来，作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他对筹划即将到来的战争负有直接的责任。林彪称病推辞，彭德怀呢？他寄希望于彭大将军，他了解彭德怀的品格，相信他会临危受命，统军出战，并不负重托，战必胜之。

1950年10月4日近午时分，彭德怀正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办公室内埋头审阅西北地区三年经济恢复计划，准备赴京向中央汇报。中央派来的两名干部进来报告说：

“毛主席请您立即乘飞机去北京开会。”

彭德怀一愣，问：

“我已接到北京的电话，是原先通知的汇报会吗？”

来人回答说：

“不清楚。周总理交代说，飞机一到西安，就马上接彭老总来，一刻也不能耽误，还要严格保密。”

彭德怀听到总理交代得这样急，就说：

“那好，我马上去，但我总要给其他同志打个招呼啊！”

于是，他马上把西北局秘书长常黎夫找来，让常分头转告西北局其他负责干部。此时，遇事沉着的彭德怀也感到不解，难道到中央汇报三年经济恢复计划还这么紧张吗？不管开什么会，他还是叫秘书把西北地区各单位报来的经济规划方案。调查报告统统带上。

下午4时，专机呼啸着飞抵北京西郊机场。飞机刚刚停稳，彭德怀就快步走下舷梯，几辆小汽车早在等候着。前来迎候的人传达毛泽东的交代，要彭德怀先到北京饭店休息一下。

彭德怀仍是战争年代那种雷厉风行的作风，说：

“不是不能说耽搁吗？先去中南海！”

车到中南海“丰泽园”，听到车声，周恩来知道是彭德怀到了，忙迎出来与彭德怀握手，解释说：

“会议在下午3点就开始了，来不及等你。”

彭德怀随周恩来进入颐年堂会议厅。毛泽东首先发话：

“你来得正好，美军已开始越过‘三八线’了，现在正在讨论出兵援朝

问题，请你准备谈谈你的看法。”

由于初到，彭德怀没有思想准备，所以未发言。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约彭德怀在中南海谈话，讲了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想让他出兵挂帅。彭德怀沉默片刻，坚定地表示：

“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10月5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颐年堂对是否出兵援朝问题再次进行讨论。发言中，仍有两种意见，彭德怀讲了自己的观点。

“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可是，如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让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

听着彭德怀慷慨陈词，周恩来庄重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

“给你十天做准备，出兵时间初步预定在10月15日。”

10月6日上午，中南海，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主持召开的军委会议，和彭德怀等人一起讨论志愿军入朝方案和更换武器装备、后勤供应及组建指挥所等问题。朱德也参加会议并讲了话。

关于彭德怀指挥所设立的位置，毛泽东的意见，为保证安全，免遭敌机轰炸，可设在鸭绿江北岸一个隐蔽位置。但彭德怀不同意，他主张过江入朝，与金日成在一起，以便直辖中朝两军，统一指挥作战。

1951年2月24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彭德怀一起召集军委各总部负责人在总参谋部开会，讨论各大军区部队轮番入朝和如何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的问题。

周恩来宣布会议开始后，首先请彭德怀介绍了志愿军面临的严重困难，要求国内各方面想办法大力支援前线。讨论到具体问题时，有些人强调国内机构刚刚建立，许多问题难以落实。彭德怀本来就为前线的供应问题焦急不满，会前苏联军事顾问表示不能派空军掩护志愿军的交通线，更使彭德怀十分失望。所以，彭

德怀听到一些人此时又叫困难，不禁把桌子一拍，厉声说：

“这也困难，那也困难，就是你们爱国，难道志愿军不爱国！你们去前线看看，战士吃的什么，穿的什么！伤亡那么多人，他们为准牺牲？现在既没有飞机，火炮又很少，后方运输根本没保障，粮食服装运不上去，又饿死、冻死了许多战士，难道国内就不能克服困难吗？！”

彭德怀火冒三丈，会场气氛骤然紧张，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虽大度维持，会议还是不欢而散。

彭德怀虽然火气冲天，使会议难以进行，但周恩来却认为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就在这次会后，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对加强志愿军第一线兵力和后方供应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即凡国内的部队，都要轮番到朝鲜作战。一则替换第一线部队休整，二则锻炼部队，提高全军现代化作战指挥能力。会议决定，将刚改装的空军和高射炮部队调到朝鲜北部掩护后方交通线，再向苏联购买几十个师的武器装备；调用国内各种物资大力支援前线，由几个大城市为志愿军制作炒面和罐头食品；号召国内各行各业增产节约和捐款购买飞机、大炮。

这些措施对减少志愿军的困难，增强战斗力起了巨大作用。

彭德怀离京后，从3月1日至3日，周恩来又夜以继日地召开一系列会议，将军委会议上确定的各项措施迅速部署完毕。3月3日，即将具体落实方案电告彭德怀和高岗。

彭德怀拿着周恩来发来的电报，对周恩来惊人的工作精神和工作效率大为佩服，许多天来的焦虑和不快一扫而光。

## 六、北京医院，周恩来送来“农业大学王校长”

彭德怀戎马一生，早就患有肠胃病和痔疮。到朝鲜后，长期在恶劣的条件下生活，住在寒冷、阴暗、潮湿的矿洞里，饮食、睡眠无常，精神极度紧张。他已是五十开外的人，指挥百万大军，叱咤国际战场，雄风犹胜当年，但身体毕竟不饶人了，旧病不断发作，经常大便出血，大家都为他的健康担心。1951年8月间，他的前额左眉上方又长了一个小肿瘤。到1952年初，肿瘤越来越痛。正在这时，美国违背国际公约用飞机把带有各种细菌的老鼠、苍蝇、跳蚤、蜘蛛、蚊虫等活物，大批撒在中朝军队的阵地和后方，发动灭绝人性的细菌战。彭德怀接到疫情报告后，既震惊又气愤，立即通报全军紧急防疫。中央得报后，很快成立了防疫委员会，由周恩来亲自主持，先后组织了大批医学专家和一百多个防疫大队到朝鲜，及时控制了疫情。

但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劳累，彭德怀的肿瘤病情愈加严重了。医生怀疑是癌，劝他立即回国割除，他总是说：

“没关系，死不了！我要等李德全（政务院卫生部长）的调查团来，把美帝国主义这一滔天罪行弄清楚，好把真相向全世界公布。”

这时，邓华又病倒，不得不回沈阳治疗，彭德怀更无法脱身。几位副司令员、副政委劝说无效，于3月19日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连发两次电报，其中说：

经昨日戴正华、吴之理及史书翰等（医学专家）会

诊结果为瘤子，估计是挨着骨头生长，大家认为不能轻易地进行手术，但彭说“你们割开一个口子一挤就行了，若是你们害怕，我签字负责”等语。为慎重起见，最好回国治疗。

周恩来接电，连连说：

“彭总啊，彭总，你心中只有祖国、人民，就是没有你自己。”他立即来到毛泽东的任处，向毛泽东建议去入换彭德怀来京割治。毛泽东即派陈赓前去朝鲜代理彭德怀主持志司工作。陈赓在1952年3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

黄昏时到达志司，与彭谈，告以主席意见及我来意，促其归国休养。但彭未表示意见。

陈赓无可奈何，第二天和副司令员宋时轮、副政委甘泗淇任人给毛泽东并军委急电说：

彭总经周校长、史书翰共同诊查后，认为愈早手术愈好，但这里无X光照相检查，因此大家提议他马上回国治疗，绝不能再拖延，彭总意见认为最近还需去金首相处一谈，我们同意这一意见。但这要推迟到5月份才回国治疗，据医生意见似不甚妥，究应如何，请中央决定。

周恩来接到电报，知道非以组织名义不足以说服彭德怀了，经请示毛泽东，于4月2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彭德怀并陈赓等人回电说：

“德怀同志即应按照大家提议，马上回国治疗，绝对不应推到5月。”

电报同意彭德怀去与金日成一谈，但规定：

“动身时间不要迟过4月上旬。至要。”

陈赓拿着中央的电报去让彭德怀看，笑着说：

“中央来电催你马上回国治病，我看你还敢违抗中央命令吗？”

4月4日，中央再次来电催促。

彭德怀是一个组织纪律观念极强的人，中央有令，怎能不从。1952年4月7日，彭德怀离开战斗了一年半的朝鲜前线，在平壤会晤金日成后，乘吉普车北去。沿途所见，到处是一辆辆被烧的汽车和坦克，一座座被炸成秃头的山岗：一处处被毁成废墟的城镇；一群群失去亲人的孤儿寡母。景象凄惨，不忍目睹，彭德怀不禁紧蹙眉头。他已经打了一辈子的仗，渴望着以战争的胜利换取国家的和平和安全。可今天，这个愿望尚未实现……

4月12日，彭德怀回到北京。周恩来立即安排他化名“农业大学干校长”，住进北京医院。经手术治疗后，于5月5日康复出院。

## 七、“我建议彭德怀同志接替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1952年5月初彭德怀出院后,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是很快返回朝鲜前线,但是中央要他留下休养一段时间,由中央办公厅安排他住进中南海永福堂。

永福堂是个小四合院,前院住着任弼时的亲属,西边不远是

刘少奇和朱德的住所,东南边隔着春藕斋是毛泽东住的菊香书屋和举行中央会议的颐年堂,同军委的办公地点居仁堂也只是一墙之隔。不难看出,这种安排是为了方便他与中央领导的接触。彭德怀在这里休养两个来月,中央讨论了他的工作安排。

7月初,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提议:

“我建议彭德怀同志接替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显然,这是一副重担,也是一个重任,周恩来认为非彭德怀莫属。

政治局委员们一致同意。

但彭德怀表示不愿接受这一工作。

根据他在一本笔记中回忆,他是不想再从事军事工作了。而这种念头,并不是在这时才产生的。远在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时候,他就有过离开军队去做地方工作的想法,并且后来还常常在脑子里反复。那个时候,为行么会有这种想法,他没有谈起过。而这一次不愿意接受这个工作的原因,从他后来的笔记中可以看出,主要是“因为当时总参谋部的工作确实繁重,自己难以胜任。原来的总参谋长徐向前久病不能工作,粟裕(1951年10月调来任副总参谋长)也有病,聂荣臻(代理总参谋长)的身体被拖垮了,曾有一次昏倒在地。所以我想推举一个身体强健的人来顶住这个繁重的任务,这样也可以摆脱我自己的军职。”

为此,彭德怀在参加那次政治局会议以后,专门去向毛泽东谈了自己的意见。他提出,自己担任总参谋长确实不合适,可以让高岗来当总参谋长,并且列举了高岗的一些优点。毛泽东没有同意,反而问他,高岗难道就没有缺点吗?于是,彭德怀又推荐邓小平来当总参谋长。毛泽东肯定了邓小平的才能,并认为他同军队有着较多的联系,是合适的人选,可是他从现在的岗位上抽

不出来,交谈的结果,彭德怀的这个想法没有实现。

在抗日战争末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即从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到1947年春天,彭德怀曾经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兼任过总参谋长。后来由于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他临危受命,出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军委的日常工作和总参谋长的职务,便由周恩来接替下来。新中国成立后,徐向前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因病由聂荣臻代理,军委的日常工作仍由周恩来主持。到1951年10月,周恩来实在太忙,中共中央确定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他上班仅三个月,就病倒了,周恩来不得不继续把军委工作管起来,一直兼管到1952年7月。

从1947年3月算起,周恩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这五年多时间,是军事工作极为繁重又卓有成效的时期。但在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身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际外交事务,已经够他操劳的了,把军委日常工作交给另一人专管,确已成急需。

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名彭德怀接替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建议被批准后,即于7月9日向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其他几位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彭

德怀写了一个报告，作为正式向彭德怀交卸工作。

周恩来在报告中建议：“彭德怀同志自即日起过问军委日常工作，直接向主席和中央负责。以后一切经过我处转呈主席或主席交我阅办的军委文电，均改送彭副主席处理。”

7月19日，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发出通知：

“彭副主席已正式在军委办公，从即日起，凡有下列问题之文件、电报均抄送彭副主席。”

接着在后边具体开列了18类文电的细目。

从此，在周恩来的提议下，彭德怀又一次进了统帅部，肩负起新的军事使命。这是他军事生涯中的新时期，也是最后一个时期。

## 八、周恩来智荐彭总，斯大林慨然援助

1952年8月17日，周恩来率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商谈朝鲜战争及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等问题。8月21日和斯大林会谈。周恩来首先说明了中共中央对朝鲜战争和国际形势的看法。

斯大林同意我党的谈判方针，并同意帮助装备中国60个师，但炮弹消耗与敌人之比1：9是不行的，应是20：9，必须压倒敌人。

斯大林精辟地分析道：

“朝鲜战争对美国是败血症，实际上北朝鲜和中国都没有损失领土，美国也了解朝鲜战争对他们不利，迫切需要停战。如果宣布苏军继续驻在旅顺口，他将更伤脑筋。美国在朝鲜既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在其他地方也就更难以实现自己的想法。停战谈判是一大问题，毛泽东主张忍耐、坚持是对的。我们援助朝鲜是不吝惜的。美国扣留战俘是非法的。”

接着，斯大林提出谈判的三个步骤：

“中、朝方面被俘人员以11.6万人计算，如果敌人扣留百分之三十，我们可以扣留敌俘百分之十三左右作为交换，说明我们不相信敌人所谓我方被俘人员有不愿回来的事实。故扣留其比例的半数，促使敌人改变态度。如不成，第二步可主张先行全面停战，然后再解决双方战俘问题。再不然，第三步可将所谓不愿遣

返的战俘，双方交中立国代管，然后由当事国进行访问，陆续接回。”

当时，有人认为朝鲜战争打下去会引起世界大战。周恩来针对这种看法说：

“朝鲜战争推迟了世界大战。毛主席的估计是5年、10年、15年不可能爆发世界大战。”

斯大林高兴他说：

“毛主席的估计是对的。但要说明一点，美国没有本领进行大战，他的英、法朋友更不行，人民也不愿打仗。”

斯大林又强调：

“我们对美国应坚持立场，只有硬，才能解决台湾问题、朝鲜问题。公道对美国是不存在的。美国以原子弹恃强凌弱和吓唬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决定战争，还是靠陆军。”

斯大林同意援助朝鲜五个高射炮团，以增强防空能力。他认为中国空军不能出击“三八线”以南，出击等于正式参战，因为空军不是志愿军的，而是国家的。不管在战略上还是战役上现在都不要出击，不要破坏谈判局面。

周恩来这次访问，朝鲜战争问题是一个大问题。要谈战争，谈苏联对志愿军的武器装备援助，周恩来认为应该请志愿军司令员、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来，他熟悉情况，而且朝鲜战场五个战役下来，打得美帝国主义低下了头来求和，颇受斯大林的赏识，由他直接和斯大林谈朝鲜战争问题，谈装备中国军队的问题，岂不更好！于是，在周恩来建议下，斯大林同意彭德怀、金日成、朴宪永秘密访苏。

9月1日，彭德怀、金日成、朴宪永抵达莫斯科，由苏联军方接待，住在乡下的别墅。

9月4日，斯大林兴致勃勃地约见了彭德怀、金日成、朴宪永，在座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及中国政

府代表团全体成员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

毫无疑问，这是一次高规格的会见。

斯大林询问了朝鲜战局及谈判的情况后说：

“中朝人民是英勇的。中国空军不能出击到‘三八线’以南。因为空军参战就意味着国家参战，而中国公开参战，对和平阵营是不利的。但是，朝鲜人民军的空军应积极行动，苏联可以援助朝鲜三个空军师。可给中国和朝鲜各一个师的喷气式轰炸机，给朝鲜再增加五个高射炮团、2000辆汽车。阵地前沿多布地雷。”

当谈到士气问题时，斯大林说：

“军队没有勋章、没有官阶、没有薪金是不正确的。不要将军、元帅是无政府主义的想法。”

中方就此做了解释：原打算全国胜利后逐渐实行从供给制转到薪金制，后因朝鲜战争而推迟了两年，预计1954年完全可以实现薪金制。

关于谈判方案，斯大林这位钢铁巨人，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俄语斯大林是钢铁的意思），显出了钢铁般的性格，他坚定他说：

“没有必要同意美国方案，这是立场问题。应采取按比例也扣敌人一定数目的俘虏，比例可以比他们少一半，也可以和他们扣一样大的比例。”

会谈结束后，与会的全体人员被邀请到斯大林别墅会餐。饮宴间，斯大林依次向大家祝酒；当来到彭德怀的跟前，他忽然举起一个大酒杯，要彭德怀也给自己斟满一大杯白酒。

随行的著名俄语专家、中国代表团的翻译师哲，在陕北时和

彭总有长期的接触，知道彭德怀有胃病，不宜多饮酒，便要求不要勉强他过饮。

周恩来知道彭德怀有酒量，立即向师哲示意不要干涉。

果然，彭德怀站起身来，以尊重的姿势和表情同斯大林碰杯后，一饮而尽。从表情上看，斯大林当时很高兴，满意地望着彭德怀，端详了好一会儿。师哲不由得想起林彪在斯大林面前的表现。这前后俩人的表现，是鲜明的对照，相形之下，斯大林不能不有所感触。看得出，斯大林是喜欢彭德怀的性格和风度的。

宴会持续了约四个小时。然后，斯大林请大家跳舞、吃点心。

深夜，欢宴结束。大家告辞出门时金日成推周恩来走在前面，彭德怀推金日成走在前面，因此彭德怀走在最后。

宴会上，斯大林一直没有机会和彭德怀单独交谈，这次他认为是个机会，就要师哲把彭德怀请到他的身旁，他们离开大家站在大厅的一角，开始交谈起来。

斯大林十分热情，真诚地请彭德怀转告他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问候和祝贺。斯大林陪着彭德怀在大厅里边走边谈，有说有笑。显然，作为军人出身的他，对彭德怀这位朝鲜战场上的英雄，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感情。

彭德怀的到来，使中苏双方关于朝鲜战争及苏联装备中国军队的谈判顺利成功。这，可以说是周恩来谈判艺术和用人艺术的一个杰作。

## 九、“请以中央和我的名义去电，要绝对保证彭德怀的安全”

1959年七八月间的庐山会议，是彭德怀命运的转折点，由于彭德怀激怒了毛泽东，由于中央领导层认识的偏差，彭德怀被定为三反分子，从此赋闲在家。1965年9月，毛泽东找彭德怀谈话，说：或许真理在你那边，并点将要彭德怀去西南三线工作。从此彭德怀便沉浸在多年不曾有过的无比愉快和惬意之中。

“毛主席还是了解我的。”——这句话成了他的口头禅。每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总有一种自豪而又自得的神情，总是像喝了醇香甘甜的酒一样美滋滋的。

美中不足的是他一直没能见到周恩来。他几次要通周恩来办公室的电话，可周恩来总是不在家。他感到遗憾，又不免有点伤感：

“个个都忙，总理更忙。可我彭德怀却闲呆了六年，惭愧呀！”

这天刚吃过午饭，电话铃急促地响起来，工作人员手持电话，一阵惊喜，原来是周恩来亲自打来电话，请彭德怀马上去中南海周恩来的家。

碰巧，司机赵凤池不在家。他急得火烧火燎地团团转，只好给总理回电话说：

“总理，我的车驮不动了，改日再拜访你吧！”

电话里传来周恩来幽默的话语：

“你的车驮不动，就用我的车去驮你，这叫舍车保帅么！”

很快，周恩来的车开来了，彭德怀立即跨上汽车，风驰电掣般驶向中南海周恩来住处。

汽车到时，周恩来已在门口迎接，两位老战友相见，分外亲热，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半天，彭德怀才说出一句话：

“总理，你还好吗？”

周恩来也十分动情，说：

“我很好，老总好吗？”

邓颖超走出来，看到两位老战友这样动情，就说：

“你们不要在外边说了，到屋里来坐呀！”

在周恩来家里，周恩来和邓颖超热情地款待彭德怀，询问了他六年来的生活情况。彭德怀把同毛泽东会见的情景叙述了一番。周恩来听后，很是高兴，感慨他说：

“是啊，庐山的事过去六年了，教训会使我们清醒过来。我们要认真地总结总结呀！主席说得对，不能分子分到底，要团结，‘风物长宜放眼量’嘛，我们前面有很多很多的大事业等待我们去完成。”

彭德怀眼睛有点湿润，说：

“这六年来，我日日夜夜都盼着能早点出来工作，我实在是闲不住啊！”

接着，周恩来介绍了“三线”的建设情况和要注意的问题，勉励彭德怀振作精神，为人民做出新的贡献。

彭德怀走了，带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鼓励，满怀战斗豪情，奔赴他的新战场——西南“三线”建设的战场。

然而，彭德怀到西南不久，正在他意欲为党、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在这场大动乱中，他被冲击就是必然的了，1966年12月，在江青、戚本禹的授意下，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组织“东方红”

战斗队来到成都“揪（意为抓出来批判斗争）彭”，他们向彭德怀提出了几个问题：你对庐山会议持什么态度？对红卫兵有什么看法？对“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看法？彭德怀——做答。红卫兵听过彭德怀的回答，对彭德怀产生了好感，说：

“你很直爽，我们回去了。”

红卫兵认为“老头子（彭德怀）是对的”，对要不要“揪”彭德怀拿不定主意，派两个人回京请示。戚本禹听了汇报，对“东方红”的头目很不满意，说：

“你立场动摇，受了彭德怀的欺骗”，要“东方红”赶快再派人去成都“揪”彭德怀。

12月23日晨5时，天还没有亮，数十名经过再次“思想武装”的“东方红”红卫兵，按事先侦察好的路线冲进成都永兴巷七号院，直扑彭德怀住室。顿时，他们怔住了：室内无人，彭德怀不知去向……

原来，彭德怀在两小时前被北京另一个“响当当”的造反组织——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揪”走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一天凌晨3点，北航“红旗”八九个红卫兵翻越铁门进入永兴巷七号，把住在东屋的秘书慕魁英叫起来，硬推着他向彭德怀屋子走去。彭德怀闻声开门，问什么事，为首的说：

“奉‘中央文革’之命，让你跟我们到北京走一趟。”

“行，什么时候走？”彭德怀很痛快。

红卫兵说：

“现在就走。”

“红旗”红卫兵也是奉戚本禹之命，紧急来成都“揪彭”的。戚本禹伯“东方红”右倾动摇，来了个双管齐下、互不通气的计谋。总之，一定要把彭德怀弄到手。

“东方红”邀功心切，不甘失败，乘“红旗”不备，将被“红旗”拘押在成都地质学院的彭德怀劫走，还派人抄走了彭德怀住处的全部文件资料。

“红旗”知道后当然不干，双方争吵一顿，最后议定，对彭德怀实行共管，要求“三线”建委用飞机送他们押彭德怀去北京。

戚本禹得知“揪彭”成功，十分得意，马上派出一个记者组去成都，准备召开百万人的“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大会”，还确定在沿途组织若干次斗争大会。

12月26日，戚本禹向江青邀宠：

“彭德怀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要押送回京。北京学生已经做好了斗争的准备。”

再说建委这边，得知彭德怀被红卫兵抓走，“三线”建委副秘书长杨沛急得额头冒汗，随即给建委副主任钱敏打电话请示，钱敏心急如焚，事关重大，向杨沛答复道：

“我立即电话请示国务院，你们要保护好彭总……”

杨沛打电话时，被一个红卫兵听到了，一伙人又追到钱敏副主任那里，围住他提出了派飞机送彭德怀去北京的要求，遭到了钱敏的拒绝。

建委钱敏副主任打电话到北京周恩来家中，秘书接到电话后火速报告周恩来。

工作了一夜的周恩来刚吃过安眠药睡下，得到秘书的报告，忙问：

“彭德怀同志现在在什么地方？”

“已被红卫兵绑架，去向不明。”

周恩来不禁一惊：

“哪儿的红卫兵？”

“北航‘红旗’。”

“他们串得好快呀！”周恩来沉思片刻，当机立断，“立即告诉西南建委和成都军区，马上寻找彭德怀同志，找到后将他保护起来，尔后迅速报告中央！”

秘书认真记录着总理指示：

请以中央和我的名义去电，要绝对保证彭德怀的安全。通知西南建委、北航“红旗”的同学们、成都军区、北京卫戍区：

中央同意彭德怀同志回京。

但要严格执行以下三条：

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和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二、不许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

三、由北京卫戍区派出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生活和学习。

以上三条，同时通知成都军区、北京卫戍区的负责同志，也必须通知北航“红旗”的同学。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绝对保证彭德怀同志的安全，对他的生命安全各单位要向中央负责。

周恩来还不放心，又让秘书将几点指示直接用电话通知“东方红”的“揪彭兵团”，特意说：

“我亲自关心这件事。”

秘书特意叫北航“红旗”的人接电话，要他们必须很好地协助西南建委落实周恩来指示。而后，他又急忙回到办公室问周恩来：

“总理，成都军区给哪位负责同志通话？”

周恩来指示：

“给黄新廷司令员打电话。”

“他已经失去自由了。”

“那……就找甘渭汉政委吧！”

“他也失去自由了。”

“噢？那……是韦杰同志在负责吧？”

“是韦杰副司令员在暂时负责。”

“那就赶快通知韦杰同志！”

秘书忙给韦杰打通电话，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而后，又立刻要通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的电话，通知他立即赶到周恩来办公室接受任务。傅崇碧因正在主持一个会议，实在离不开身，经请示周恩来，便由卫戍区政治部主任周述清代傅崇碧前去接受任务。

周述清一到，周恩来立即以命令的口吻说道：

“你们卫戍区立即组织力量，近日准备将彭德怀同志接过来，负责他的生活和学习，要专人负责。到火车站去接人，绝对不能让红卫兵将人抢走，加害于他。有问题要及时报告。”

周述清走后，周恩来又叮嘱秘书：

“要时刻注意西南的消息。”

得到上述周恩来关于保护彭德怀的讲话，警卫参谋景希珍追踪到地质局，向彭德怀悄悄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彭德怀听到周恩来指示中还称他为同志，非常感动。

杨沛与中共中央西南局办公厅管理局副局长何光，来回奔波成都军区、成都铁路局，联系派警卫人员、车皮。经过协商，军区派出一位参谋、五个警卫战士，成都铁路局运输处负责挂了一节车厢，彭德怀与警卫战士被安排在两个软卧室。12月25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王大宾一伙将彭德怀带到成都火车站，架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彭德怀秘书慕魁英、警卫参谋景希珍不放心，也陪同前往。

1966年12月27日晚8时许，彭德怀所乘的列车抵达北京。再说北京卫戍区政治部主任周述清从周恩来处接受任务后，立即向司令员傅崇碧做了汇报。傅崇碧决定由参谋长刘光甫负责安排彭德怀的生活和学习。刘光甫挑选卫戍区司令部警卫处参谋王金岭作为彭德怀生活和学习的直接负责人。周述清、王金岭去车站接彭德怀，与红卫兵发生争执，相持一小时，红卫兵盛气凌人就是不放人。周述清只好同意红卫兵头头打电话请示“中央文革”。

此时，“中央文革”和政治局正在召开“碰头会”。电话要通后，戚本禹接了电话，眉飞色舞地向会议通报：

“彭德怀已由红卫兵押送到北京站，请示如何处理？”

周恩来马上站起来说：

“这件事我已布置卫戍区了，让他们去接，将彭德怀同志的生活和学习管起来。”

“卫戍区没有来电话，是地院‘东方红’的同志打来的。”戚本禹有江青撑腰，此时红得发紫，回答周恩来的问话时不冷不热。

“噢？”周恩来马上问，“卫戍区没去人接吗？”

“……”戚本禹故意把脸转向一边。

周恩来预感事情不妙，马上离开会场，嘱咐秘书快打电话询问傅崇碧。周恩来跟傅崇碧要通电话，才得知是戚本禹从中作梗，假冒中央名义，要卫戍区把彭德怀交给了“红卫兵”。周恩来立即指示傅崇碧：立即派人去，把彭德怀同志要回来。

周恩来回到会场后，立即把戚本禹叫到一间办公室，极为愤慨地指责他：

“戚本禹同志，你知道你这佯做会造成怎样的恶果吗？如果你以为你的权力还不够，那就把总理的位置夺走吧！把中央的大权统统夺走吧！”

28日清晨，傅崇碧尚未起床接到“中央文革”打来的电话：彭德怀由北京卫戍区和红卫兵共同管理。望卫戍区即派人与红卫兵协商管理办法。当晚11点，彭德怀上了卫戍区的大轿车。

周恩来虽然做了周密布置，但仍不放心，又于29日上午亲自给傅崇碧打电话，询问彭德怀的“监护”情况，再次做出指示：

“彭德怀同志的住处要保密，要绝对安全。不许武斗，不许游街，不许搞逼供信。”

彭德怀被带到北京西郊五棵松卫戍区的一处营房里。这是卫戍区的一个“监护点”。在极度疯狂的岁月里，这确实是既监管也保护其免受造反派的

过度摧残的一个办法。

彭德怀被安置在一间建筑队丢弃的简易工房里，屋内有一桌、一椅、一床、一炉。彭德怀拿出日记本，记下了几天来的经历，最后写道：

“为什么揪我来京，一点也不了解。”

第二天，他发现自己真正失去了自由。不是红卫兵而是解放军战士在持枪看守着他，不许他出屋。他问：

“把我弄到北京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还是算旧账？”

他着急，成都住屋内有许多绝密文件被红卫兵抄走了，他要求看报纸……没有人答复他。

红卫兵住在他的隔壁，整天找他谈话，谈了几天，彭德怀问：

“你们想干什么呀？”

红卫兵并不正面回答他。

但到了1967年元旦，形势急转直下，红卫兵忽然气势汹汹骂了彭德怀一通，说他想翻案，声言要“敲打你，揍死你”，并说：

“对你这样的人（指彭）就得武斗。”

他们在彭德怀屋里夺烟斗，翻书包，辱骂彭德怀“老混蛋”。彭德怀本着毛泽东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教导，始终心平气和。当晚，彭德怀记下这一天的感受：

“今天是1967年元旦，我的生活情况处于另一种生活环境，即被革命群众组织揪来北京待审。时间已过七天，还未宣布罪名，这是我69年生活中所遇到的第一次。”

写完日记，彭德怀从本子上撕下一页白纸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仔细叠好，放到眼镜盒里，随后悄悄要哨兵替他转交上去。

彭德怀的信由“监护点”层层上送到周恩来处，周恩来在中央碰头会上宣读：

主席：

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1967年1月1日

周恩来可谓用心良苦，宣读彭德怀的信，一则是让中央其他领导知道彭德怀的情况，二则让大家明白彭德怀对毛泽东主席衷心拥护的态度。

1967年3月，在中国，“文革”动乱在深入，一大批老干部纷纷被打倒。卫戍区的“监护”任务也繁重起来。彭德怀被转移到五棵松附近的罗道门。周恩来直接指示傅崇碧，所有卫戍区的监护点要严格执行五条规定：

一、万人以上的斗争大会不开；二、不搞喷气式，不打，不挂牌子，不游斗，不抓走，不跑掉；三、可以看病、理发、洗澡；四、每天可以放20到30分钟的风；五、哨兵放在门外。

彭德怀在这一段时间里，按专案组布置的任务，一方面读书学习，一方面写自传和所谓的“交代材料”，一天到晚关在几平方米的小屋里。

3月19日，卫戍区的参谋王金岭特地将他的侄女彭梅魁送的水果、滋补品和一台收音机悄悄交给他，他坚决不要。他向王金岭哀求道：

“王参谋，你给我向毛主席打报告，向周总理打报告，权当历史上不曾有我彭德怀，权当不认识我，让我回老家当农民吧！如果我的罪大于功，就干脆把我处决算了！这里我实在呆不下去了！”

王金岭劝道：

“老人家，这可叫我为难了。一个人的历史并不是他自己也不是其他任何人想承认就承认，想否定就能否定的。再说，现在是‘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上下都乱。说不定等局面稳定了，毛主席会想到你，会让你出来工作的。”

听到这些，彭德怀仿佛得到了一丝安慰：

“那好，我等着。主席只要让我工作，我一定要求再去西南‘三线’。我连做梦，都是又去了‘三线’！”

1967年4月18日上午，彭德怀和每天一样，翻阅当天的《人民日报》，忽然，一条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条消息，讲到国际市场上销售镁的情况。他想到了自己在“三线”了解到的有关镁

的情况，向谁汇报呢？他想到了他一向敬重的周恩来，于是，在4月20日晚，他提起笔，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总理：

前日阅《人民日报》……固而记起去年4月到石棉矿厂（安顺场下游20公里）考察时，该厂矿渣很好，堆积大渡河两岸，未曾利用，已流失不少。此种矿渣中含大量钙镁，其次是磷，还有其他矿物质。加工后即成钙镁磷肥，用于农作物的底肥是很好的。石棉矿渣（矿余）占百分之九十五，年可产四五十万吨，设备简单，成本当然是很低的……此事可能被搁置。小事情本不应打扰您，但我不知应告何人，希原谅，顺祝您永远健康。

石穿

1967年4月20日晚

信写好后，他委托王金岭转呈。王金岭看了信的内容后，不禁感慨万端：这位年近70的老人，处于危难之中，一片忧国忧民之心却仍然没有放下。石穿，作为彭德怀的号，是他青年时从“水滴石穿”这一成语得到启示而自取的。但是，在这“斗斗斗”的年月，“生产”二字像病毒一样被人畏惧……

彭德怀身在囚室心系国家，给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写信，奇怪的是，他没有给“副统帅”林彪写过信。

## 十、“您的手术方案，是总理亲自批准的”

1967年7月19日晚上，根据江青、戚本禹的授意，北京航空学院的60多个红卫兵造反骨干，对彭德怀进行批斗。批斗会上，有人带头高呼：

“打倒彭德怀！”

“彭德怀早就被打倒了！”彭德怀挺直身子，在喧闹声中提高了嗓门。红卫兵头头韩××从桌子上跳过去，指着彭德怀的鼻子吼道：

“你反不反对毛主席？！”

“我不反对毛主席，我只是对毛主席无话不谈。”

韩××为表示自己的“英勇”，一拳出去，打得彭德怀倒退几步，跌在地上，一看头头动了手，其他人忽啦围上去了，对彭德怀一阵拳脚相加。彭德怀认得其中一个红卫兵，说：

“小同志，你不要发火，你不懂事……”

话未说完，就有人一拳猛冲着彭德怀胸部打去，年老体迈的彭德怀怎禁得了这一拳，一头撞在课桌上，跌倒时又撞在水泥地面上，发出重重的响声。

彭德怀忍痛喊道：

“你们怎么这样对待一个快70岁的人！”

会场大乱。有了带头人，原来文明一些的也要表现“革命性”了，胆子小的也“勇敢”起来了。彭德怀被拽起来，打倒；再拽起，再打倒，连续七次！一个穿皮靴的大个子飞起一脚，向躺在地上的彭德怀右胸踢去，彭德怀深哼了一声，昏迷过去。

下午5时50分，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革命英雄和民族英雄彭德怀，在昏迷中被人架回囚室，勒令起身，连夜写“认罪书”。

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当晚得知彭德怀被斗的情况，十分气愤，当即打电话问韩××，为什么不执行总理的“五不”指示。原来，预审会前卫戍区专人去北航向韩××等人传达周恩来的指示：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挂牌子，不准游街，不准武斗，不准开万人以上的批斗会。韩××听后，即打电话报告“中央文革”，戚本禹回答：“对彭德怀的武斗不要限制过多。”

于是，在戚本禹的怂恿下，就有了彭德怀的惨遭迫害。

第二天，彭德怀伤重不能起床，被送到二六七医院检查，病志记载：

“胸部正位像×线所见：（1）右第五肋骨中段骨折；（2）右第十肋骨末端可疑不全骨折；（3）右隔角内小量积液（血）；（4）右肺下叶部分不张。”

诊断结果出来后，傅崇碧怀着不安的心情，即向周恩来报告彭德怀伤势，并附上胸片。

周恩来看到彭德怀遭如此残害，一向不易动怒的他不禁勃然大怒，严厉批评卫戍区有关人员没有尽到责任，并指示：

“马上给彭德怀治病，将结果报我；今后，没有中央的批准，任何人不得私自批斗彭德怀；卫戍区要绝对保证彭德怀的安全。”

然而，风云日紧。彭德怀惨遭毒打的第二天，就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紧接着，林彪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这使已成为囚徒的彭德怀，又成了“军内一小撮”的总代表。报纸大造舆论，掀起“批彭高潮”。而此时，周恩来已陷入困境，无力再保护彭德怀了。

1971年9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于蒙古温都尔汗，自绝于人民。这样，在各处受“监护”的一大批老干部的待遇也明显好转。1971年国庆节前夕，卫戍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通知各“监护”点：在现有条件下尽量过好节日，改善日常生活条件，绝对保证人身安全，一切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应一律废除。

春节前夕，国务院事务管理局奉周恩来之命，给每一位被“监护”人送了一份礼品：糕点、罐头。彭德怀从哨兵手里接过礼品时，不禁奇怪地问：

“小鬼，这罐头、糕点，是你买的？”

“不，是国务院管理局送来的，每人一份。”

“国务院？”

“对！是周总理让送的。”

“总理？啊……总理没有忘记我们哪！”

彭德怀双手捧着礼品，止不住老泪纵横，他久久地站立着，嘴里不停地念叨：

“总理啊，我有一肚子话要对你说，要对主席说呀！为什么还不让我出去呀！”

他怎能知道，这，并不是周恩来说了就能算数的。

1972年12月底的一个寒夜，彭德怀被迁移到第四个监护点——北京西城区木樨地政法干校。

这时，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鼓起勇气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打听伯伯的下落。因为她知道，周恩来是保护伯伯的。

不久，周恩来派人找到彭梅魁，转达了总理的问候，并告诉她：

“总理对此事非常关心，你伯伯身体尚好，东西可以照常送。”

当彭梅魁把这短短几句话告诉彭钢、彭康白后，兄弟姐妹抱头痛哭，他们哭伯伯的不幸，感谢周恩来的关怀。

以后彭梅魁就继续给伯伯送东西。

1973年4月17日，彭德怀经确诊患晚期直肠癌。当晚，专案组在关于彭德怀的病情向中央的报告中才提出：

“鉴于彭德怀病情严重，准其侄女彭梅魁等家属探视。”

报告附三 一医院对彭德怀病情的诊断书说：

“便血原因可以相当肯定为此癌瘤破溃所致，癌瘤位于直肠左后壁，离肛门缘约6~7厘米。癌约5厘米，中心部有一溃疡，癌瘤较大，已属晚期。”

此时正被癌症折磨的周恩来，仍然在关心着彭德怀，得知彭德怀患直肠癌已到晚期，十分着急，指示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卞自强带着他的批示到三〇一医院了解彭德怀的病情，并查问：为什么便血一年多没有发现？在一年多的时间中看过多少次病？哪个医生看的？并问：彭德怀同意手术吗？

24日，手术前医院开会，决定26日手术。晚上，彭德怀拒绝做手术。25日，专案组的人匆匆去找彭梅魁，让她去动员彭德怀做手术。彭梅魁一听伯伯病势严重，五内俱焚。进了病房，只见伯伯坐在病床上，紧闭双唇，凝视着墙壁。彭梅魁不禁悲唤一声：

“伯伯！”

彭德怀先是不做声，慢慢扫视一下，才说：

“我不做手术。”

彭梅魁刚要劝说，彭德怀转头对专案组的人大声说：

“手术前我要求去见毛主席！我有事要见毛主席！明天手术，我今天去见毛主席！把我对问题的看法讲清楚……”

彭德怀越说越激动，从床上下来穿鞋就要向门口走去。

医生和言劝道：

“不要生气，咱们慢慢再商量一下吧！”

彭德怀把手一摆：

“我就走，现在就走。问题搞清楚了再手术！背了一身黑锅，莫须有的罪名，死了也不甘心！”

彭德怀提出要见医院领导，三 一医院副院长和副政委一起

来了。彭德怀郑重提出：

“一、推迟手术，我有一个材料要写，关于‘三线’建设与战略防御方针问题，趁手术前头脑清醒写出来。二、今天晚上你们打电话联系，让主席、总理接见我。”

医院领导人答应替他反映要求，坚持手术还是得做，然后和专案人员一起故意退场，留下彭梅魁一个人。

彭梅魁搀扶伯伯坐在沙发上。彭德怀问当医生的侄女：

“梅魁，我这病只能手术吗？”

“对，手术是最好的办法了。”

彭梅魁又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您现在能去见毛主席、周总理吗？您现在得和医生配合，争取多活些年头，以后会有机会见毛主席、周总理的。您的手术方案，是总理亲自批准的。您现在手术，一点坏处也没有，您还是做了吧。”

彭德怀冷静下来，听彭梅魁说下去：

“伯伯，你冷静点，什么事情不是一下子解决的，您的病不能拖了，早做手术有好处：您如果不做，总理晓得了也会不高兴的。”

彭德怀沉默了，总理亲自审定手术方案，可见对他关怀之深，还有什么好说的。过了一会儿，他看着彭梅魁，说：

“那我就做手术吧。”

26日7点15分，手术开始。三 一医院外科主任、著名治癌专家陆维善大夫主刀，切片检查确诊为恶性肿瘤。即进行根除，并做结肠造瘘。

下午1点40分，手术完毕。

1974年11月29日，彭大将军含冤走完了他76年的人生旅程。身旁没有亲人，没有战友。窗外北风呼啸，大地呜咽。

彭德怀逝世后，专案组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如是说：

“受审人员彭德怀，因患直肠癌，经治疗无效，于1974年11月29日病死。”

“彭德怀是里通外国、阴谋夺权的反党分子，我们意见，将其化名工川，尸体火化后，骨灰存放成都一般公墓。”

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批示：

“照报告上所提办法办。”

1974年12月17日，彭德怀的遗体由三 一医院送北京火葬场火化，申请表上写着：

“申请人：王奎，住址：三 一，与死亡人关系：父女，死亡人姓名：王川，男，76岁，印号 一二六九 。”

专案组的人带着上面贴了一张纸条、写着“王川，男”三个字的骨灰盒和中央专案组的介绍信到成都，指名见四川省委、省革委会和成都军区的三名主要负责人，说明骨灰由来，交代要绝对保密，放在一般公墓即可。同时，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要精心保管，时常检查，不准换盒，也不准转移地方，以免查找时弄错。

已身患癌症且处境险恶的周恩来，可谓用心良苦！

由此判断，在 1974 年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对彭德怀骨灰的处理方法，显然既包藏着“四人帮”的胆怯与祸心，也蕴含着周恩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为保护彭德怀骨灰的策略与苦心。现在看来，周恩来对其身后政局的发展，是有相当准确的预见的，他相信，终有一天彭德怀的骨灰会放到与其贡献、地位相称的地方。

## “林彪之死、天造地合”——周恩来与林彪

林彪（1907—1971），军事家。原名林育蓉。1907年12月5日生子湖北省黄冈县。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入黄埔军校，在校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后到井冈山。任中国工农红军营长、团长、军长、军团长。1937年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东北军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和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1951年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58年5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1959年9月任国防部长，“文革”中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1971年9月8日下达武装政变手令，妄图谋害毛主席，另立中央。阴谋败露后，于9月13日乘飞机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反革命集团主犯。

林彪作为一员战将，在战争年代也受到周恩来的赏识。抗战中期，蒋介石力邀毛泽东谈判，周恩来举荐林彪代行前往，可见对林彪之信任。“文革”狂潮骤起，林彪欲借机扫除一切自己通往最高权力道路上的障碍，周恩来当然首当其冲。为维护党中央的团结。周恩来忍辱负重，不惜向林彪委曲求全。林彪意欲篡党夺权，周恩来运用高超的斗争艺术，与毛泽东一起，彻底挫败了林彪一伙的罪恶阴谋，并智擒林彪死党，消除了后患。

## 一、周恩来致僵毛泽东：可让林彪代为谈判

1942年7月21日和8月14日，蒋介石在重庆先后两次约见周恩来，说他一星期后将去西安，想在那里与毛泽东会面，商量解决国内问题。周恩来迅速将这一动态电告延安。毛泽东很快回电，倾向于与蒋直接会谈。

根据当时蒋介石对中共的态度，以及扣留周恩来在重庆，不让他回延安的情况，周恩来惟恐蒋介石有诈，借机扣留毛泽东，所以建议毛泽东称病，并提出派林彪或其他人代为出面谈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经过反复磋商，决定派林彪前往。

周恩来之所以建议林彪前往，这是因为林彪具备一些别人没有的特殊优势，林彪既是毛泽东的爱将，同时也是蒋介石的学生，

为双方所信任或熟悉，便于从中交流转话；林彪黄埔军校出身，他的一些同学或教官如今高居国民党军政要位，便于处理和解决具体问题；林彪是抗日名将，刚刚旅苏归来，在苏期间又受到斯大林的高度褒扬，有一定的神秘感和较强的号召力。

国共和谈是当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林彪一时成为国共双方关注的焦点。9月14日林彪从延安动身，赶往西安，中途因突下大雨，山洪暴发，路面被毁，未能如期抵达。蒋介石快快返渝。10月7日，林彪飞抵重庆，会见蒋介石。

林彪见蒋，互相寒暄之后，很是恭敬地对蒋说：

“毛泽东非常愿意与校长见面，但他这段时间患伤风感冒，身体不适，又怕耽误国事，特地命我前来与校长洽谈。”

蒋介石最喜欢黄埔生尊称他为校长，听到林彪还是像以前一样校长长校长短的，十分高兴，也很有礼貌地问候毛泽东的健康状况，表示关心。

寒暄过后，转入正题。林彪全面陈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内形势和对国共关系的看法和建议。蒋介石一听到林彪说现在的国共关系会有触发内战的危险，便不耐烦起来，频频着手表，约林彪另择时间再行会谈。

周恩来对林彪非常关心，于10月26日致电毛泽东，认为林彪此来可完成两个任务，一是缓和双方表面关系，二是重开谈判之门。

通过一段时间的谈判和接触，林彪发现周恩来原先的判断十分正确，蒋介石及国民党虽然倾向于以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来代替全面的军事破裂，但确实并不急于从根本上改善两党关系，相反，他们认为时间越延长，中共的困难就越大，越利于逼中共就范。

周恩来在与林彪研究后，决定改变谈判策略，先从具体问题入手，力求争取打破僵局。

12月16日，林彪在张治中陪同下会见蒋介石，提出他和周恩来商定的实行“三停三发两编”的建议。

“什么叫三停三发两编？”蒋介石疑惑地问。

林彪见引起了蒋介石的兴趣，便侃侃而谈：

“三停就是对中共方面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进攻，停止对《新华日报》等中共报刊的舆论进攻；三发就是发放新四军被俘人员，按照统一编制发饷，按照一视同仁的原则发弹；两编就是允许将中共领导下的军队编为两个集团军。”

蒋介石寻思了半晌，含糊地说：

“不要急，慢慢谈。只要我活着，解决问题总会公道，不让你们吃亏。”  
会见结束后，蒋介石便急切地命令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尽快拟制方案，免得被人家追着屁股打。

没等蒋介石喘口气，仅仅八天后，周恩来、林彪就呈上了我方四点谈判方案：（甲）共产党合法化，国民党可到中共区域办党、办报，共同实行三民主义。（乙）扩编四个军十二个师。（丙）边区依现有区域改为行政区，直属中央，改组华北地方政权，实行中央法令。（丁）战后原则上接受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但目前只能做准备工作，保证战后完全做到。情况许可时，可磋商部队移动事宜。

蒋介石阅完中共方案，对身边的白崇禧、李宗仁、何应钦哀叹道：

“黄埔军校数千名教官和学生，都是灌注了我毕生心血而培养出来的，为什么有才华的都跑到共产党的匪窝里去了呢？你们看

周恩来、林彪提出的方案，表面有进有退，实际上是让步少而得多，狡猾之至。甲条，国民党能到共区办党、办报，他们铁壁一块，谁能钻进去？乙条，不提编为两个集团军，只说四个军十二个师，还不是一样，换汤不换药。丙条，服从中央政府是假，想将华北非法抢占的国军地盘合法化是真。丁条把硬顶变成了软施。他们硬是不想做一点牺牲啦！”

蒋介石一连数天催问国方代表方案准备情况，都说“正在加紧研制”，气得个蒋介石破口大骂：

“娘希匹，一群饭桶，将来党国就会毁在你们这些败家子手里。”

1943年6月4日，周恩来约见张治中，敦促加快谈判进程。

“何应钦称前方摩擦继续，情况不明，谈判须搁一搁。”张治中回答时面有难色。

“这是我们意料中的事。”周恩来镇静如常，“在目前情况下，作为谈判代表，林彪在重庆已无事可干，他决定回延安，请通传蒋先生。”

蒋介石同意林彪回延安，还在官邸设家宴为他送行。林彪见气氛融洽，就顺势提出周恩来一年多长期驻渝工作，身心均感疲惫，很希望与自己相伴同行，回延安小休，希望校长允许。

蒋介石没有理由拒绝，也只好同意了。这是他自皖南事变一年多来第一次答应周恩来回延安。

6月28日，周恩来、林彪等一百多人乘卡车离开重庆，绕道宝鸡、西安，于7月16日抵达延安。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亲自赶往城外迎接，欢迎久别的战友。

应该说，在重庆期间，林彪与周恩来配合得还是很好的。他们多次联名致电毛泽东请示机宜，多次一起与蒋方代表谈判并会

见各方人士，可以说配合默契，相得益彰。

## 二、顶庄舞剑，意在沛公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心要爬上权力顶峰的林彪，开始策划打倒老帅的阴谋，以扫除爬上权力顶峰的障碍。然而，周恩来却尽心竭力地保护老帅，这就犯了林彪之大忌，他开始想方设法找周恩来的茬。他知道，周恩来历来谨慎小心，从其工作上和对毛泽东的态度上很难挑出毛病来，就挖空心思从历史中去找可以为己所用的炮弹。

于是，林彪一伙就利用所谓的“广东地下党”问题，对周恩来进行陷害。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上海党组织将一批党员派进国民党部队工作，成立了中共地下党特别支部，直属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这个地下党支部在动员军民团结抗战，反对投降、分裂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抗战争的最终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1967年5月，林彪一伙却提出“要调查广东地下党的问题”，说什么“广东党的组织问题很多，究竟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弄不清楚”。10月12日，林彪死党黄永胜亲自批准要追查华南地下党的问题。不久，在江青支持下，成立了“审查广东地下党专案组（即一九专案组）”。1968年3月，黄永胜又亲自“挂帅”，诬陷、迫害广东地下党支部成员，造成被非法关押审查和批判斗争者达7100人之多。林彪一伙使用极其毒辣凶残的手段，逼那些人承认广东地下党是“特务组织”、“叛徒支部”、“国民党支部”、“美蒋别动队”。还逼迫他们说出“总司令部”，说出地下党的上级领导。

稍懂中国革命史的人都知道，当时整个南方的地下党隶属南方局，而南方局当时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林彪一伙有意制造“广东地下党”冤案，其实是顶庄舞剑，意在沛公，其矛头指向周恩来的阴谋和行为昭然若揭。

### 三、“拍摄到主席和林副主席一起的镜头了吗？”

虽然林彪时刻在盘算着怎样将周恩来打倒，但周恩来为了党中央的团结，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仍然忍辱负重，处处从大局出发，争取团结林彪一道工作，在林彪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后，处处维护着林彪的威信。

那是1971年“五一”之夜，照例，党和国家领导人要走上天安门城楼欢度“五一”。城楼上，毛泽东坐在中间圆桌的东首，紧挨着的是西哈努克亲王，董必武坐在西哈努克右侧……最西侧的位子怎么空着？这是林彪的位子，周恩来的目光在寻找林彪。他不停地看表，显出焦急的神色，派秘书去打打听林彪的下落。

终于，林彪慢条斯理地走进大家焦急万分的视线里。

正值春暖花开之际，他披着一件军呢大衣，皱着眉，一脸枯槁的样子。原来，林彪自从1938年春被误伤之后，身体一直不太好。那天晚上，林彪情绪极差，不想去城楼。是周恩来电话再三请他出席晚上活动，他不得不来城楼，所以才一副委靡不振的沮丧模样。

他冷僻地落座后，一句话没说。和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没有握手，没有说话，甚至没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着脸……

每逢此时，都是记者们最忙的时刻，因为正、副统帅在一起联欢的镜头要登报，要上电影、电视。记者拍摄一般要等正、副统帅交谈时才开始。拍电影的人还在对着毛泽东的方向调试镜头。不知怎地，摄影记者杜修贤被眼前的瞬间吸引住了，鬼使神差地立在董必武的侧面，拍了一张主桌的全景。再看看，人物表情特别是林彪的表情没有进入自己所需要的欢乐情绪，只好放下相机，慢慢地踱到旁边。再回首……啊！杜修贤不禁愣住了：林彪不在了！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了，林彪还没出现。

这时，人们的目光开始注意主桌上醒目的空座位，大家似乎在猜测，林彪究竟上哪儿啦？他怎么可以当着主席的面不辞而别，他这是什么意思？人们无法想像“一贯紧跟、无限忠于”的林彪怎么会做出今天这令人费解的举动来。

人们中间，最着急的还是周恩来，他目光频频望向那个空座位，喉结上下滚动着，他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出来。只是将警卫员叫到跟前，耳语了几句，警卫员飞快地跑向城楼大厅……毛泽东不动声色，和西哈努克亲王继续谈话。

警卫员又一溜小跑回到周恩来跟前，周恩来的浓眉皱得更紧，神色非同寻常地严峻，摄影记者杜修贤一见，心里暗暗叫道：不好。连忙跑去问林彪哪里去了，一问，林彪早就回家了！杜修贤惊恐地倒吸一口冷气：他为什么要先走？为什么不给主席和总理讲一声？

“老杜。”杜修贤又一震，是总理在叫自己，他原地转了个圈，却找不到周恩来。

“老杜，你过来！”

在哪儿？眼前尽是穿梭不停的人影，杜修贤好不容易透过人影缝看见周恩来在大殿前的柱子旁叫自己。

周恩来着急地朝杜修贤招手：

“过来过来，快点。”

杜修贤大步地跨了过去。

“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一起的照片你拍摄了没有？”周恩来劈头就问。

“啊呀，我哪儿知道他坐几分钟就走？来不及...”“我问你照了没有？”

“啊.....照了，就照了一张。”

“电影、电视呢？”

杜修贤刚想说没有，见周恩来着急的样子，话到嘴边变成了“不知道！”

周恩来思索片刻，说：

“老杜，你去把分管新闻宣传的负责人叫来，都叫来！”杜修贤见周恩来脸色严肃，不敢多问，拔脚就朝外走。在大平台上东寻西找找到了七个分管新闻宣传的负责人，有几个是军管会的。他们走进休息室，周恩来立即站起身，迎面走了过去。“电影拍摄到主席和林副主席一起的镜头吗？”

“没有.....”回答声音很小。

“那么电视呢？”

“没来得及拍，林.....”

“没有拍到，对不对？”

周恩来讲一是一、二是二，开门见山，一针见血。“林副主席身体不好，这，大家是知道的。上午他参加了活动，晚上讲身体不好不能来。我亲自请他参加晚上活动，这样的活动面对人民群众，面对全国的观众。最后他来了。你们是新闻宣传

的负责人，你们记者手里拿着摄影机，拍呀，可为什么不拍摄呢？”

不知谁这时小声嘀咕了一句：

“我们想等主席和副主席讲话的镜头。”

周恩来火了：

“林副主席来了没有？他毕竟还坐了一会儿。你们都看见的，你们等什么，等他们讲话？什么时候新闻拍摄规定要等领导人讲话才能开机？你们就是老框框，坐在一起就应当开始拍摄。记者就是要手快眼快，会抢拍。新闻就是时间，新闻等得来吗？”

痛失良机的记者和失职的“头头”们一声不吭。

周恩来沉重地叹了口气。口气也缓了些：

“人民希望党中央团结，国家安定。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城楼上和首都人民一同欢度节日的夜晚，这是多么重要的宣传主题，这是安定人心的大事情啊！组织指挥新闻宣传的领导要充分重视。如果人民问，城楼上观看焰火，怎么没有林副主席啊！你们回答说林副主席只来几分钟。行吗？党中央在人民心中的形象靠你们宣传，不是靠解释。”

说到这儿，周恩来向记者们挥了挥手，示意记者可以走了。就在记者们转身要走的时候，周恩来突然对杜修贤说：

“老杜，你等一下。你快去冲洗照片，一个小时内送来，西花厅。”周恩来吩咐道。

很快，杜修贤冲洗出了照片。这张照片作为资料照片或许比当做新闻照片用更为合适些：

——毛泽东侧着脸，凝神在听西哈努克亲王的讲话，显而易见，他沉着脸不太愉快。

——林彪裹着呢大衣，像农民那样双手插在袖筒里，弓着背，也侧着脸和董必武交谈，脸上说不清是愁容还是病容。

照片上面人物的情绪痕迹太明显，取景的角度也有点偏……可仅此一张，不用它又用哪张呢？

别无选择！于是，杜修贤驱车来到了周总理的住处。走到后院，周恩来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杜修贤轻轻推开门走进去，周恩来没有发觉，正埋头在比头顶还高的一叠文件里。杜修贤轻轻喊了一声，周恩来才停下笔，手扬了扬叫他坐下。杜修贤没坐，赶紧把照片交给周恩来，不想多占用他宝贵的时间。周恩来戴着老花镜，逐一审看照片，看到毛泽东和林彪的照片，问：

“就这一张？”

“嗯。”

“就这一张啊，就这一张。”周恩来捏着照片的一角，一手支撑下巴，凝眉审视着。过一会儿，他问杜修贤：

“这张照片能不能在电影、电视上用？”

杜修贤不好回答，因为他并不满意这张照片的人物效果。

最后，周恩来决定说：

“电视、电影就用这张照片，你去办一下。”

这时已是午夜时分。

5月2日，报纸出来了，仅此一张的照片登在头版头条，标题是醒目的黑体字：《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同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一起观看焰火》。

当晚，这张照片也定格在电视新闻里，谁也没有发现这只是一张瞬间的照片。

林彪从城楼上不辞而别后，有一个多月没有公开露面。

再在镜头里出现时已是6月中旬，天气已渐渐进入夏季，罗马尼亚的客人来到中国，那时毛泽东会见外宾不一定都是在游泳

他，有时他也常到人民大会堂会见客人。

这次会见罗马尼亚客人安排在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工作人员一般称湖南厅为118房间。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抵达118房间不久，罗马尼亚的客人也到了。记者杜修贤忙着拍摄宾主握手的镜头。待宾主落座后，又赶快拍摄会谈的场景。他见会谈的气氛已进入正常轨道，就退到门外的大厅里等会谈结束时再进去拍摄。

晚上，杜修贤将白天拍摄的照片送到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正在大会堂里宴请罗马尼亚客人。杜修贤找到周恩来，将照片交他审阅，他站着匆匆地看了一遍，果断地选了三张。

杜修贤接过这三张照片，心里有点抱不平，周总理为何老是将自己放在后面？明明可以放在前面他还是放在后面，并扣下自己的单独照片不让发。三张照片依次为：

第一张，毛泽东和林彪会见客人。

第二张，林彪单独会见客人。

第三张，周恩来和康生会见客人。

周恩来亲自审阅新闻照片已有好几年了，每次审阅照片他都很细心，该突出什么，不该突出什么，谁该在前面谁不该在前面等等请多细节都考虑得全面周到。

#### 四、周恩来略施小计，叶群露出马脚

在离北戴河西海滩二公里处的联峰山松树丛中，有一栋两层小楼，这就是林彪、叶群住的中央疗养院 62 号楼。1971 年 9 月 12 日这天，是林彪一生中精神最为紧张的一天。此时，他已得知毛泽东安全回到北京的消息，知道阴谋已经败露，内心充满了深深

的恐惧。他自从 1928 年跟随朱德上井冈山起，在毛泽东的培养下，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排长，成长为一名共和国的元帅，现在又成了副统帅。他对毛泽东大了解了，无论是战略战术，还是政治斗争经验，还是在全国的威望，他都不堪与之匹敌。他手底下虽“有几位大将，但这些大将在公开场合也不得不口口声声拥护毛主席，如果谁敢动毛泽东一根毫毛，不要说别人，就是他们的卫士也会把他们抓起来，因为这些卫士都是汪东兴领导的八三四一部队派出的。所以，他们只能搞阴谋活动。

天色渐黑时，林彪、叶群开始在这里调兵遣将。他准备南飞广州，另立中央，搞封建割据。可表面看来，62 号楼却是十分平静。林彪、叶群在接到林立果马上要飞到北戴河的电话后，还要了一个花招，宣布当天晚上要为他们的女儿林立衡与她的恋爱对象张清霖举行订婚仪式。叶群指示秘书和工作人员说，不请人吃饭，但要准备好烟、糖果、茶等，另外再准备两部电影招待大家。他们这样做，显然是要转移工作人员的注意力，以掩盖他们的阴谋活动。

晚间，叶群还故做姿态地与林立衡一起看电影，电影的名字叫《甜甜蜜蜜》。8 点多钟，林立果乘专机飞到山海关机场，9 点钟到了林彪住地。林立果送了一束鲜花给林立衡，表示祝贺。林彪、叶群搞阴谋的事，林立衡当时并不知道。林立衡与叶群平时就有矛盾，叶群有事总是背着她。林立衡是个很聪明的人，她看出林立果到这里后，好像家里有事故意不让她知道。叶群一退场，她也从电影室紧跟出来，到林彪的房间外边去听。她听到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个人在一起谈话，隐隐约约他说要去什么地方。林

立衡似乎明白了什么，马上去向当时在北戴河保卫林彪的八三四一部的副团长张宏和二大队的大队长姜作寿做了报告。

晚上 9 时 20 分左右，张宏、姜作寿得到林立衡的报告，姜作寿立即打电话将情况报告给了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张耀祠立即赶到汪东兴的办公室，汇报完情况后说：“情况很紧急，怎么办？”

汪东兴马上打电话找周恩来，周恩来当时正在大会堂福建厅开会，主持讨论将在四届全国人大会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

汪东兴将林立衡反映的情况向周恩来报告后，周恩来问：“报告可靠吗？”

汪东兴回答说：

“可靠。”

周恩来当机立断：

“你马上打电话通知张宏，密切注视动向，如果有新的情况，立即报告。”

汪东兴和张耀祠当时都守在办公室里。很快，张宏又来电话说：

“林立衡还报告，她听接林立果的汽车司机讲，林立果是乘专机从北京来的，这架专机现在就停在山海关机场。”

汪东兴马上又将这个情况报告了周恩来。

这时，周恩来已经不能继续主持开会了，他来到东大厅的一间小房子里处理北戴河的问题。他打电话给汪东兴，要求他一定不要离开电话机，以便随时保持联系，汪东兴表示：不会离开，就在电话机旁边等着。周恩来随后打电话把正在大会堂参加《政府工作报告》稿讨论会的吴法宪找来，问他知道不知道一架飞机到北戴河去了，吴法宪说不知道，并说他要问一问空军调度室。周恩来要求吴法宪立即去问。吴法宪就到另一个房间打电话去了。

周恩来给吴法宪交代后，又打电话给汪东兴，让他立即转告北戴河的张宏，查一查山海关机场是不是有一架专机？并要求汪东兴，如果有什么新情况，马上向他报告。汪东兴从张宏那里很快就得到答复：已问过山海关机场，确实有一架专机，专机的机组人员正在休息，这个机场归海军管理。汪东兴立刻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周恩来。

这时已是晚上 11 点半钟，机敏的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叶群，不露声色地问道：

“林副主席好吗？”

电话里传来叶群那若无其事的声音：

“林副主席很好。”

这时，周恩来故意问叶群：

“知道不知道北戴河有架专机？”

叶群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她是靠着林彪这棵大树的庇荫才有此职位的，否则的话，最多不过是个聪明一点的刁悍妇人而已。所以，她根本就不是周恩来的对手，周恩来用话一套，她就入圈了，骗周恩来说，她不知道有无飞机。

这一下，阴谋就彻底暴露了，周恩来心里有底了。

叶群在骗了周恩来之后，开始对周恩来深夜来电话询问飞机的事回过味来，稍微停一下，又说：

“有一架飞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要上天转一转。”

周恩来又问叶群：

“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

叶群此时已有警惕，马上回答周恩来说：

“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

周恩来以关切地声音说：

“晚上飞行不安全。”

叶群也就顺水推舟说：

“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

周恩来劝说道：

“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副主席。”

周恩来提出要去北戴河，这一下叶群慌了。周恩来要是一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的阴谋也就破产了。叶群劝周恩来不要到北戴河来，她说：

“你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

周恩来放下了电话。

很快，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开始忙起来。周恩

来派李德生到空军司令部作战值班室去协助他临时负责指挥，掌握了空军的指挥权。派杨德中陪吴法宪去了西郊机场，实际上是监视吴法宪的行动。

13日0时32分左右，汪东兴接到张宏从山海关机场打来的电话，说林彪等人强行登上飞机，已经起飞了。

与此同时，林立衡也打电话对汪东兴说：

“听到飞机响了，好像是上天了。”

汪东兴立即打电话给周恩来，建议说：

“毛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您从人民大会堂到毛主席那里，我从中南海南楼到毛主席那里，我们在主席那里碰头。”

周恩来同意后，汪东兴叫上张耀祠一起去，他们和周恩来几乎是同时到了毛泽东那里。

周恩来、汪东兴正向毛泽东汇报时，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电

话找汪东兴，说林彪的专机已经起飞三十多分钟了，飞机在向北飞行，即将从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吴法宪请示，要不要派歼击机拦截？

汪东兴回答他：

“我立即去请示毛主席，你不要离开。”

当时，毛泽东的房子里没有电话，电话在办公室里，相差几十米远。汪东兴马上跑步回去，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

毛泽东摆摆手，仍然显出非凡的气度，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

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让汪东兴马上去传达给吴法宪，汪东兴只告诉吴法宪不要派飞机阻拦，没有告诉他其他内容。

这时已是9月13日凌晨1时12分。林彪专机从起飞算起，已经飞了40分钟，快要飞出国境了。把这架专机放过去，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这个意见是对的。要是把这架专机拦截下来，那就会在全国造成不好影响。林彪是党的副主席，当时并不知道他要飞到哪里去，做什么事，拦截专机，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后来才知道，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林彪、叶群经过长期策划，认为只要毛泽东健在，无论是威望，还是文的、武的方面，他林彪都不是对手。所以林彪想出三个对策，即：上策是谋害毛泽东，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中策是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下策是北飞叛逃国外，投靠苏联。

9月13日凌晨3点多，大家还没有离开毛泽东住地，空军司令部又打来电话，说调度室报告，北京沙河机场有一架直升机飞走了，机号是3685，机上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和正副驾驶员共五人，现在正向北飞行。汪东兴马上将这个情况报告给毛泽

东和周恩来，毛泽东和周恩来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

“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

这架飞机后被在京郊怀柔迫降。

9月14日上午8时30分，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打电话通知中国驻蒙古大使馆，说副外长额尔郭比列格约见中国驻蒙古大使，要通报一架中国喷气式飞机在蒙古失事的情况。中午12时20分，中国驻蒙古大使将飞机失事的情况报告中国外交部。外交部在代外长姬鹏飞主持下召开了党组会，并将这个情况很快报告给党中央。

周恩来正在主持政治局会议，看到报告后，马上叫汪东兴去报告毛泽东。这个消息虽然很不具体，但它却使毛泽东、周恩来和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我国驻蒙古大使后来到飞机失事的现场去具体了解了情况，飞机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十公里处，是中国民航 265 号三叉戟飞机，机上八男一女，全部死亡。

后来的情况进一步证实，林彪确实摔死在温都尔汗。此时的周恩来十分高兴，即言道：

“林彪之死，天造地合啊！”

## 五、智捕林彪死党

林彪叛逃后，就如何处理同林彪有密切关系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毛泽东仍然胸怀大度，他对周恩来说：

“看他们十天，叫他们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代好了就行。”

但是，黄永胜这些人，在十天中既不揭发林彪的罪行，又不交代自己的罪行，什么都不坦白。

期限到了第十天，毛泽东把汪东兴找到住处交代说：

“黄永胜他们怎样处理了？你去问一问总理。”

汪东兴马上赶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向周恩来汇报，说毛泽东催问对黄永胜等人的处理情况。

周恩来让汪东兴等一下，待他接见完外宾后，俩人一起乘车去见毛泽东。当他们到达中南海毛泽东住所后，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说，黄永胜等人在拼命烧材料。

毛泽东有点失望他说：

“是啊，那是在毁灭证据嘛。这些人在活动，看来是要顽抗到底了！”

周恩来立即对毛泽东说：

“我马上办，今天晚上办不成，明天早上一定办成。”

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后，周恩来对汪东兴说：

“你不能离开中南海，要严加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我们有事时可以找张耀祠、杨德中，必要时再找你。”

周恩来的安排无疑十分正确。在这逮捕林彪死党的前夜，汪东兴一步也没有离开毛泽东，严密保卫着毛泽东的安全。

为了顺利逮捕林彪死党，周恩来做了周密筹划。他找来北京市委书记、卫戍区政委吴德交代任务：

“明天早上李先念要去越南访问，我去送，邱会作也去送，你也去，从机场回来时，对邱会作说有毛主席的指示要传达，这样就可以先抓邱会作。另外再通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来人民大会堂开会，会议是听毛主席指示的传达，黄永胜等人来后，先跟他们谈话，然后再逮捕。”

交代完毕，周恩来让吴德回去同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商量，由卫戍区落实逮捕、押送、关押地点等问题。

对卫戍区是这样布置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来后，周恩来和叶剑英、纪登奎先与他们谈话，然后把他们带走。黄、吴、李分别由卫戍区的司令员、副司令员、副政委陪同，关押地点安排在卫戍区的某师。

布置好卫戍区的准备工作后，吴德到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叶剑英汇报。

第二天早上，邱会作等人在飞机场送李先念时，周恩来镇定自若，谈笑风生。当邱会作从机场回来后，周恩来、叶剑英和纪登奎即向他宣布隔离审查的决定，尔后命人把他带走。

通知黄永胜等人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后，他们过了半小时的时间仍没到，周恩来、叶剑英、纪登奎和吴德坐在那里焦急地等着。叶剑英频频看表，问卫戍区有没有部队在黄永胜等人住地附近。

吴德打电话问了吴忠，然后向叶剑英报告：有一个团在附近。

叶剑英果断他说：

“如果他们不来，或者抵抗，就用硬办法把他们逮捕。”

又过了一段时间，黄永胜等人来了。周恩来、叶剑英、纪登奎到福建厅去与他们谈话、宣布隔离审查决定，周恩来让吴德和吴忠等候在东大厅，招呼卫戍区的人。

周恩来与他们谈了很久，黄永胜不住地嚷嚷，连说他们冤枉。

周恩来对他们进行严厉地批评和驳斥后，命人将他们带走关押。

周恩来对林彪死党的逮捕，及时清除了隐患。

## “三军总教头，非你莫属啊！”——周恩来与刘伯承

刘伯承（1892—1986），四川省开县人。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四路总指挥、暂编第五军军长。1927年参加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后留学苏联。1930年回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中原军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高等军事学院院长

兼政治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刘伯承和周恩来首次相见于1926年7月的羊城广州。翌年夏，刘伯承作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为其襄助戎机、筹划军事，参与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并担任参谋团参谋长。从此，俩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刘伯承对周恩来一向十分敬佩；周恩来对刘伯承也非常尊重，解放后，总是亲切地称他“刘老”，喜欢和他交谈，倾听他的见解。

## 一、“参谋长一定要你来做”

1927年7月11日，刘伯承从四川辗转来到武汉。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得知刘伯承到达武汉的消息后，即召集他和吴玉章、黄慕颜、李嘉仲等人座谈，听取他们对时局的看法和意见，会上，黄慕颜提出，在目前国共两党联合濒于破裂的情况下，可将共产党所掌握的武装西退四川，徐做良图。

周恩来明确表示这种做法不妥。他在深入分析了当前革命正处于转折关头的形势后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运动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业，目的在于求得中国之自由平等，任务在于推翻国内封建军阀的统治，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目前革命势力虽有分化，但革命洪流不可阻挡，终会浩荡前进，共产党人不达此目的，誓不终止。四川的封建军阀力量强大，而且日益反动。重

庆“三三一”惨案和沪顺起义的失败就是明证。现在我们一遇挫折，怎能反而退依本欲打倒的对象呢？

周恩来一席活说得大家豁然开朗，刘伯承对周恩来更是肃然起敬。

1927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并决定周恩来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前往主持。周恩来临危受命，军事上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这个人既要有秘密组织大规模兵暴的经验，又要有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他反复考虑，选中了刘伯承。

刘伯承坚决听党的安排，从接到指示坚决执行，并为能担任周恩来的助手而高兴。他立即启程，从武汉乘江轮前往九江，参与筹划南昌起义。为了迷惑国民党右派，特在武汉《国民日报》发表消息如下：“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刘伯承、副军长黄慕颜，先后来汉向中央陈述与川中反动军阀奋斗情形，极为中央嘉奖。近刘军长因病，特向军事委员会请假调养，其职务交黄副军长代理，已蒙军委批准。”

刘伯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到第二十军军部协助贺龙拟制起义计划，他与贺龙曾在四川讨贼战争中并肩战斗，久已相识。这次在南昌城里重逢，而且又都汇入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之中，都在周恩来的麾下战斗。俩人格外高兴。

计划很快就写出来了。周恩来指示刘伯承征求叶挺的意见。刘伯承初会叶挺，俩人过去是闻名而未见面。叶挺接过计划，看得很仔细。看完，立即把计划退还给刘伯承，可始终一言不发。

刘伯承感到很奇怪，不知叶挺对计划什么态度，他就去问周恩来。周恩来笑着说：

“噢，你还不熟悉他，他就是这个样子，要是不说话，就是表示赞成。”刘伯承一听，也不禁笑了。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胜利后，建立了参谋团，这时周恩来提议：

“我建议刘伯承同志担任参谋团参谋长。”

刘伯承谦虚他说：

“我的能力有限，还是另选贤能为好。”

由于时间紧迫，周恩来不容刘伯承再谦让，果断他说：

“参谋长一定要你来做，请你就不要再谦让了。”

就这样，刘伯承临危受命，担负起起义军军事指挥的工作。

关于参谋团的组建，周恩来后来曾这样回忆：“参谋团当时没有人任主

任。后来我就指定刘伯承同志来做参谋长，他起初谦虚，不肯答应；后来我说一定要你夹做，他才担任参谋长职务。”参谋团的成员有周恩来、贺龙、叶挺、蔡廷锴等。

## 二、周恩来劳山遇险，刘伯承命人解救

1937年4月25日清晨，周恩来又一次离开延安，前往西安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上午8时左右，卡车行驶到距延安六七十里外的甘泉县境内的劳山脚下，突然遭到一伙二百多人的政治土匪的袭击。随行的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和四名战士吸引走了一股敌人，可周恩来这边还有不少敌人。双方展开激烈的战斗。秘书陈友才刚要跳下汽车，便被敌人打伤了腿，下不了车，就在车厢里还击敌人。因他高居车厢内还击敌人，敌人清楚地看到他头戴礼帽，身穿西装，系着领带，脚穿长筒马靴。看到这身装束，敌人误以为他就是周恩来，集中火力向他射击。趁这个空隙，两名警卫员掩护周恩来迅速离开汽车，撤下公路。但没撤出多远，两名警卫员

一亡一伤。敌众我寡，情况万分危急。敌人占据有利地势，凭借着山头工事，居高临下猛烈射击，使用的又是步枪和机枪；而红军只能以携带的驳壳枪进行还击，从各方面看均处于劣势，因此伤亡很大。在这种危急情况下，周恩来当机立断，带领剩下的几名红军战士，突然向敌人一阵密集的射击，旋即迅速地边打边向密林深处撤退，逐渐摆脱了敌人的围击。

驻守在山上的红军通信班，一听到枪声就马上给甘泉我驻军打电话报告，可是电话怎么也打不通，知道是电话线被切断了，他们随即通过另一条线路，把情况直接报告了延安总参谋部。

总参谋长刘伯承接到周恩来遇险的报告后，不禁大吃一惊，立即安排人给三十里铺的驻军打电话，命令他们立即派出部队前往劳山；接着又命令中央警卫团的巨余名干部战士集中起来，把集中饲养的中央首长的军马统统牵来骑上增援劳山。警卫团团团长刚要带队出发，忽然看见毛泽东急匆匆地走来。招呼着，急促而忧虑他说：“什么也不要顾虑，无论如何要把副主席接回来！”说着便挥手示意赶紧出发。

一队人马匆忙上路，直奔劳山而去。

驻在三十里铺的红军部队，接到延安总部刘伯承总参谋长的命令后，当即派出骑兵部队赶往劳山。赶到出事现场时，敌人已经逃跑，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红军战士的遗体，还有那辆被打毁了的汽车。

这时候，周恩来已经脱险，在几名战士的保卫下，沿着一条小山沟，步行十几里山路，安全抵达三十里铺，这就是周恩来劳山遇险惊心动魄的一幕。

### 三、“三军总教头，非你莫属啊！”

1950年夏，刘伯承得知中央军委准备创办陆军大学的消息后，心里非常高兴。立即给党中央写信，请求辞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去参与筹建陆大。他在信中诚恳地写道：“……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党中央很快批准了刘伯承的要求，决定委派这位身经百战、德高望重的著名军事家去办学校，搞教育，把他那丰富的作战、建军经验传授给全军中、高级干部，从教育与训练上更好地完成人民解放军向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转变。毛泽东和朱德给他写了亲笔信，让他把西南的行政工作移交给邓小平、贺龙，尽快到北京领导筹建“陆大”。

刘伯承一到北京，就立即投入到“陆大”的筹建工作。首先是确定“陆大”的校址。以前，中央军委曾考虑把校址建在东北。后来因为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又决定把校址建在北京或其他省市。刘伯承经过两次勘查地形，考虑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还没有根本好转，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百废待举，百业待兴，财力物力都很紧张，要营建这样一个大型的军事学校要花很多的钱，更需要一定的时间。为了早日开学，培养懂得现代战争的干部以支援朝鲜前线，也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他建议：“陆大”的校舍暂不动工兴建，先找一个可以办学的地方把学校办起来再说。刘伯承的意见既能节约经费，又能早日开学，得到筹委会的一致赞同。

这个地方选在哪里好呢？

刘伯承想起了人民解放军进占南京后，设在南京的华东军区军政大学。

华东军大设在南京紫金山下原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国防部”的院内。占地约三平方公里，房屋面积达47万平方米，院内绿树成荫，操场开阔，各方面条件较好。早在1949年5月，刘伯承率领第二野战军开进南京的时候，就曾经去过那里，详细查看过那里的房屋、设府情况，并向党中央专门做过汇报。那时，他就考虑过将来在这里办学校培养干部的问题。所以，他建议把“陆大”暂时设在南京。

毛泽东、周恩来对创办“陆大”非常关心。在筹备期间，周恩来在日理万机之中三次会见了刘伯承和“陆大”筹委会的成员，传达了毛泽东对办好“陆大”的指示，提出了“陆大”临时党委的组成办法、干部配备和组织机构等问题，研究了教学方针和教学内容，对如何办好这个学校做了重要指示。

第一次是在1951年的11月初，周恩来特意把刘伯承等人请到中南海去研究。

当刘伯承等人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时，工作到夜间很晚才休息的周恩来刚刚起床，还没有来得及吃早饭。他和大家一一握手问候，并亲切地对刘伯承说：

“刘老，你来了。我起晚了。”

刘伯承知道，周恩来日理万机，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办公室的灯光经常从天黑一直亮到黎明。深情他说：

“总理，你多睡一会儿吧。我们昨天睡得太久了，早晨睡不着，就起得早，听说你每天夜以继日地工作到早晨三四点钟才休息，太劳累了！”

周恩来微笑着说：

“不要紧，我习惯了。”

一会儿，服务员端来早饭请周恩来用餐。趁此机会，客人们环顾了主人的住所，古老的庭院，已经破旧。北房五间，是会客室和办公室。房间陈旧，设备简单，里面几乎没有什么装饰物。

靠墙排满了书柜，三张方桌接成一个长会议桌，还有几把椅子。最显眼的是那张又宽又长的写字台，上面放满了摞得很高的文件和书籍。

再看主人的早餐：三块烤馒头片、一盘咸菜、一杯牛奶和一个鸡蛋，这一切都表明，住进北京城中南海的周恩来，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那种艰苦奋斗的作风。

周恩来匆匆吃完早饭，就带着刘伯承等人走进会客室，开始谈工作。

“总理，我接到毛主席的电报就来了。”刘伯承微笑着对周恩来说。

“我知道，刘老组织性纪律性是非常强的，只要中央有命令。你就来。”周恩来用非常满意的口气回答。

“我来是来了，就是怕搞不好。”刘伯承谦逊他说。

“你搞得不好，搞得好。你有几个特长：你有学问，又非常严格，严师出高徒嘛！所以，这三军总教头，非你莫属啊！”在笑声中，周恩来既是赞誉又是鼓励他说。

“总理，可不能那么讲，我是能做一点就做一点。我能力实在不足，过去搞‘红大’，那个好搞，两三个月就过去了。现在搞现代化，我是没有经验的。你看能不能给我找几个好助手？”刘伯承诚恳地提出要求。

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了“陆大”临时党委的组成方案，并和刘伯承一起，详细研究了“陆大”的组织机构和一些领导干部的人选问题。

这次会见，大约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因周恩来要接见外宾，谈话就结束了。

#### 四、刘伯承一番建议，苏联顾问改称“专家”

几天以后，周恩来第二次会见了刘伯承等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办好“陆大”的指示。毛泽东指示的基本精神是：“陆大”的方针仍然是延安抗大总校的方针。要在人民解放军建军传统的基础上，认真学习外国军队的先进经验。

刘伯承一边听一边在笔记本上记，还不时地点头，像小学生上课一样认真、仔细，惟恐有所遗漏。

最后，周恩来还告诉他们，毛主席想得很细，为了办好“陆大”，特地聘请了一批外国顾问帮助工作。

听到这里，刘伯承不由一愣。一提到外国顾问，刘伯承就想起1933年，他担任红军总参谋长时，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一起工作的情景。李德不懂中国实际，照搬教条却又仗恃其军事顾问的特殊身份而独断专行、飞扬跋扈的霸道作风，曾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也使刘伯承对顾问的作用产生了疑问。

往事记忆犹新，从刘伯承的内心来讲，是不愿意要这些顾问先生的，谁乐意给自己的头上戴紧箍咒呢？但组织的决定又不好不服从，刘伯承于是向周恩来坦言建议：

“总理，我个人的看法，叫顾问不如叫专家好。顾问，顾问，就是要顾我们的问，叫专家就超脱了。你当你的专家，我们干我们的工作。我请你，你就讲；我不请你，你就不要顾问我嘛！”

周恩来对顾问的历史相当清楚，也吃过不少苦头，所以十分

明白刘伯承的苦衷，但在当时外交“一边倒”的形势下，请苏联顾问不但是为了教学需要，更是政治，外交上的一种考虑，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听了刘伯承这番话，他连忙说：

“对，对，叫专家好。”

为此，国务院专门发了一个通知，统一对外国专家的称呼。通知指出：除过去按顾问名义聘请来华的外国专家仍称顾问外，以后新聘请来华的和过去非按顾问名义聘请来华的外国专家，一律称呼“专家”。

刘伯承深为周恩来这种从谏如流的精神所感动。

办学校是一件很细致的事，周恩来还和刘伯承等人研究了筹建工作的一些具体事宜。

一是校名问题。鉴于将来要开办海、空军科，刘伯承建议将“陆大”定名为军事学院；

二是校址问题。为了早日开学，减少国家的财政支出，刘伯承提出把校址暂时设在南京华东军大所在地。以后有条件营建新校舍后再行搬迁；

三是干部问题。当时朝鲜前线需要干部，新建立的各军兵种及其领导机关需要干部，地方上各条战线也需要军队干部去支援。所以，从全军调干部很困难。刘伯承请求以华东军大和华北军大的一部分干部作为基础，依托华东军区组织起军事学院的各级机构。

这些意见，从大局出发，既照顾了国家建设和军队建设的全局，又基本满足了建校的需要，周恩来完全赞同。

当谈话结束，刘伯承等人起身准备离开的时候，周恩来再次亲切地问道：“刘老，你看还有什么事情吗？”

这时，刘伯承用试探的口气问：

“总理，我想，校址既然设在南京，能不能让陈老总来兼政委呢？”

周恩来马上看出了刘伯承的心思：要请华东军区陈毅司令员兼学院政委，一为尊重“父母官”，二为取得物力、人力和财力等方面的支持。

“我明白你的意思，陈老总是华东军区司令员，你让他兼政委，找他要人、要钱、要房子就好说了，是这个意思吧！”周恩来坦率他说穿了刘伯承的心思。

“是啊！我是有这个‘坏’主意。”刘伯承一面幽默地回答，一面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周围的同志也哈哈大笑起来。

“这倒不是什么坏主意。你这个想法是不错的，但晓得他干不于呢？”周恩来没有直接回答可否。

“你叫他干他就会干的。”刘伯承想尽量争取周恩来同意。

周恩来爽朗地笑着说：

“那也不好勉强。你和他商量一下，他愿意干，你说好就是了，中央同意。”

这件事后来虽然没有实现，但是华东军区和陈毅司令员，无论在人力上，还是物力、财力上，都对军事学院给予了巨大的支援，使学院得以顺利地创建和不断发展起来。

其后不久，周恩来又就如何办好军事学院问题，在中南海西花厅和刘伯承等人做了三个多小时的长谈。

他们首先研究了教学方针和教学内容，军事、政治，文化教育部搞些什么，如何搞法。周恩来特别强调要搞好文化教学，指出：我们的干部文化低，这是历史造成的。只有学好文化科学知识，才能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

接着，又研究了教员问题。

最后，周恩来勉励刘伯承说：

“搞现代化军队建设，许多东西我们都没有经验。虽然刘老是个老教育家，搞了很久了，但搞现代化的军事学院，也还要不断地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现代军事科学，研究现代战争的特点，把丰富的作战、建军经验加以总结提高，传授给全军中、高级干部。”

谈话结束后，周恩来将刘伯承等入送出西花厅，一一握手告别。这时夜已经很深了。中南海显得格外安洋、静谧。但是，一座座庭院仍然放射出明亮的灯光，这些灯光映照在湖面上，投射出一片片闪烁的光影。共和国的领袖们仍然在为人民辛勤操劳。

刘伯承走在中南海湖畔的小道上，回想着周总理的一次次谈话，尽管寒风阵阵吹来，但心里仍然感到热乎乎的。

回到住所，刘伯承顾不上休息，即根据周恩来三次谈话的精神，和筹委会的同志们一起研究起草了《关于创建军事学院的意见书》。

1950年11月13日晚，刘伯承带着这个意见书，又一次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向周恩来和朱德做详细汇报。听取汇报的还有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后改为总政干部部）部长罗荣桓、代总长聂荣臻、军训部长萧克、总政副主任萧华和总干部副部长赖传珠等。

汇报会由周恩来主持。他把座椅搬到他那张又宽又长的写字台前面，背对写字台，面对大家坐下来。然后，拿起意见书，他读一条，让大家讨论一条。遇到有修改补充的地方，他就转过身。伏在写字台上，随手记下来。

就在这一天的深夜，在周恩来主持下，产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第一份历史性文件，绘出了解放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所高级军队院校建设的蓝图。

这份由刘伯承起草的《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书》，由周恩来主持修改后，很快上报中央。三天后，毛泽东就亲自批准了这个报告。从此，开始了军事学院筹建工作的新阶段，并于1951年1月15日，正式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

## “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周恩来与贺龙

贺龙（1896—1969），原名贺文常，字云卿。湖南省桑植县人。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曾任县讨袁护国军总指挥，湘西护国军营长，靖国军团长，四川警各旅旅长，混成旅旅长，建国川军师长。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1927年参加领导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书记，红二军团总指挥兼红二军军长，红二、六军总指挥兼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和湘鄂川黔军区司令员，红二方面军总指挥。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司令员兼晋绥野战军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随着南昌城头一声炮响，开始了贺龙与周恩来40年并肩战斗的风雨征程。作为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贺龙对周恩来十分崇敬；作为在革命最困难的关头毅然参加南昌起义的患难战友，周恩来几十年中都对贺龙充满了信任，并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

## 一、周恩来：“任命你担任起义军总指挥”

1926年6月，贺龙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北伐来到河南开封，不久即去郑州参加军事会议。会上他得到消息：汪精卫等人将在郑州开会，准备结束和蒋介石的对立状态，在北伐军队中“清党”，要共产党交出兵权，将共产党员清除出部队。

共产党员、贺龙所部第二十军的政治部主任周逸群听说贺龙从郑州回到开封，即去看他，贺龙将从郑州听来的消息全部告诉了周逸群。

周逸群不无忧虑他说：

“看来都靠不庄了，宁汉（指蒋、汪）即将合流，可能要一起反共了。”

说罢，他走到窗边凝视着开封那矗立空中的古老铁塔，默默地自言自语道：

“我们党将要受到一场严峻的考验了！”

已经把整个一颗心全部交给了共产党的贺龙，此时“霍”地站了起来，走到周逸群身边，诚恳他说：

“逸群，我虽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我坚决拥护共产党。不管反共气焰如何嚣张，我贺龙都坚决站在共产党和工农大众一边。请你放心，所有在我部队里工作的共产党员，一个也不要离开，继续安心工作，天塌下来，由我贺龙来顶。”

贺龙讲得那样坦率，那样坚决，在这严峻的时刻，他不但没有随波逐流，反而与共产党团结得更紧密了。

正处在焦虑中的周逸群听了贺龙一番挫常有力的话语，受到莫大的鼓舞，紧紧握着贺龙的双手，十分激动他说：

“军长对共产党一片赤诚之心，逸群万分敬佩！”

1927年6月26日，贺龙从河南开封班师回到武汉，受到工农商学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中华全国农民协会给贺龙发来贺电，称他们“夙为民众之武力，党国之干城”。希望他率领铁军打倒罪魁祸首蒋介石，铲除其私立的反革命中心——南京政府。

一到武汉，周逸群就向正在武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汇报了贺龙保护共产党员的情况，说：

“贺龙光明磊落，心地坦荡，是一个坚强的人，正直的人，诚实的人。他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心向共产党，并时刻想党之所想，急党之所急，随时准备听从党的召唤。”

在反共浊流翻滚的时候，周恩来听到这一消息，十分欣喜，高兴地说：

“那好！有这样一位军长同情党，我们就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你应当好好地关心和帮助他。”

6月30日至7月1日，中共中央在武汉鲍（罗廷）公馆召开中央扩大会议期间，军委书记周恩来在周逸群的陪同下，专门到贺龙的军部拜会贺龙。

周逸群已向贺龙介绍了周恩来的身份，贺龙对周恩来屈尊来访，十分感动，早已在门口满腔热情地等待着。

周恩来时年29岁，英姿勃发，与周逸群一起拾级而上，一见贺龙就满面春风说：

“将军逐鹿中原，劳苦功高，现胜利归来，恩来表示衷心祝贺！”

“谢谢周主任的夸奖，我的工作还搞得不好！”贺龙激动他说，“你的

大名，早已传遍北伐军中，我也早就知道了。逸群对你钦佩得很呢！我早就打算去拜望你，不料你屈尊先来了。”

周恩来爽朗他说：

“只要肝胆相照，你来我来不都一样吗！我也早闻将军的大名，两把菜刀起义，愤恨不公，心向人民，威截日轮……我们对你是很钦佩的。”

贺龙谦虚他说：

“钦佩不敢当，我是怀着救国救民的愿望起来闹革命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追求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进行了革命斗争。可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蒋介石竟背叛革命，勾结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镇压革命人民。看来，汪精卫也靠不住了，我才感到追求的目标仍然是那样渺茫遥远，但有幸认识了共产党，才使我的行动真正有了正确的方向。我认为，共产党的主张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说到这里，他像宣誓一样表示：

“我听共产党的！不管形势发生什么变化，我都坚决与共产党、工农群众站在一起进行斗争，决不二心。”

周恩来一边听，一边点头，他深为贺龙的爽直所打动。待贺龙讲完后，他兴致勃勃他说：

“将军对共产党一片赤诚之心，是难能可贵的。我衷心感谢你对党的信任和帮助。一个人，只要能为着一个崇高理想而奋斗，他就会成为一个为工人阶级，为劳苦大众、为全人类自由幸福而做出杰出贡献的人……”

接着，他又讲述了共产党的主张。

听了周恩来一番话，贺龙只觉得一股暖流在心中流淌，更加认清了前进的方向，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贺龙与周恩来这次见面，深深地印在贺龙的心中，奠定了他们之间以后几十年患难与共的深厚友谊。后来，贺龙在对部下讲述自己的思想转变时说：

“周恩来同志与我的谈话，对提高我的思想觉悟，使我接受共产党领导，参加南昌起义，走上共产主义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与此同时，蒋介石、汪精卫分别派了他们的高级将领来拜会贺龙，用封官许愿那一套进行拉拢，但是，都被贺龙拒绝了。

周恩来与贺龙的直接交谈，使他加深了对贺龙的认识，他深信贺龙的革命态度，坚信他是一个堪当大任的人才。7月10日，周逸群向贺龙转达中共中央军委及军委书记周恩来的意见，意欲将正在遭受严重迫害的鄂城、大冶等地的工人武装纠察队三百多人秘密编入二十军教导团，并征询贺龙的意见。

贺龙高兴他说：

“我带了多少年的兵，从来没有哪个上级给我补充过人员，连军晌都要层层克扣，要么干脆不给。肥了大脑壳，苦了当兵的。现

在，共产党给我补充，工农同志愿意编到二十军来，我能不欢迎吗？他们能来，这说明什么呀？逸群，说明我们有一点子进步嘛！”

贺龙说得那样真诚，对共产党员周逸群是那样亲切。

周逸群拉着贺龙的手，不无自豪他说：

“军长，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品格。”

从这里得到启发，贺龙在武汉三镇广贴《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招收学兵、工兵章程》，宣布招收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和有技术的工农人员。这种招兵，

属军队扩编，在武汉政府备案，手续齐备，合理合法，任何人无法挑剔。贺龙用这种办法，将许多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安置在二十军中，免遭敌人的屠杀。在这批人当中，有从张发奎那里逃出来的共产党员黄霖、唐天际；从唐生智那里跑出来的共产党员陈章甫、段德昌。

稍后，武汉工人纠察队队长陈虚、共产党员傅维怔、武汉三镇保安总队队长侯镜如、名记者范长江，都先后经周恩来介绍，由贺龙安排在二十军内担负要职。

7月17日，贺龙在第二十军连以上军官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说：

“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了，武汉国民政府终于撕掉了戴在脸上的假牙套，背叛总理，同共产党公开分裂了。我们本来就是工农大众的队伍，已经闹了多年革命，现在，革命到了危急关头，摆在我们面前的出路有三条：第一条是把队伍解散，大家都回老家去。这条路行不行？不行！第二条是跟着蒋介石、汪精卫去于反革命，屠杀工农兄弟。这条路行不行？不行！第一条路是死路，自杀的路，第二条路是当反革命的路，杀人民的路也是自杀的路，我们绝不能走。我贺龙不管今后如何危险，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绝不走这样的路。我要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路，坚决走到底！你

们愿意跟我搞的，我欢迎，不愿意的，可以对我说，我送你盘缠钱，回到家乡替我向你娘老子问好。可是有一条讲清楚，不许拉走部队带走枪，有敢拉走军队带走枪者，不要怪我贺龙六亲不认。”

贺龙的这次讲话，无疑是对全军的一次政治动员，提高了部队的士气，奠定了该军日后言行一致参加南昌起义的基础。

汪精卫叛变革命后，立即调动军队对武汉实行包围。张发奎也有要“第二方面军之高级将领中的共产党分子如叶挺等退出军队或脱离共产党”的表示。

中共中央在江西的同志认为：局势已到了千钧一发的关头，再不当机立断而稍有迟疑，仅有的这点革命武装力量，必将完全断送，并向中共中央提出“赶快集中武装力量，实行南昌暴动”的主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同意了这一建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领导南昌起义。

7月23日，贺龙率领二十军到达九江，当晚，谭平山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九江饭店二十军司令部会见了贺龙。

谭平山把共产党准备组织南昌暴动的打算直接告诉贺龙，并向他征求意见。贺龙坦诚他说：

“干！为了挽救革命，我贺龙万死不辞。早就该动手嘛！如果早动手，恐怕局势也不会发展到这样严峻啊！不晓得你们怎么搞的？”

谭平山解释说：

“那时，暴动的条件不成熟呀！工人纠察队被迫交枪，何键策动新的‘马日事件’，党中央企图以让步来缓和局势，与汪精卫合作东征。结果，让来让去，让我们人头落地，幸亏还有你和叶挺两支军队给我们撑腰壮胆哟！”

贺龙谦虚地指着在座的周逸群说：

“主要靠这位好帮手呀！”

贺龙立场坚定，态度鲜明，使在九江的几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感到高兴。他们决定贺龙率第二十军，叶挺率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以及其他部队于28日前到南昌集中，28日晚在南昌举行暴动，并急电请示在武汉的中共中

央。

次日，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和第五军总指挥兼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在三国时周瑜操练水兵的甘棠湖烟水亭拜会贺龙。他们倍献殷勤，拉交情，套友谊，动员贺龙靠拢汪精卫，参加反共。贺龙哈哈大笑说：

“我从18岁参加中华革命党以来，就听到汪先生的大名。国共合作后，汪先生慷慨激昂他说：‘一定要联俄、联共，一定要平均地权。’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汪先生发誓继承先总理遗志，维护国共合作。汪先生的话，还在我耳朵边上打转转，如今他却变脸大砍大杀共产党员和工农大众。我在四川看过川戏。川戏里的变脸把戏，也没有汪先生来得那么快哟！奉劝两位老兄，我们这些玩枪杆子的，斗不过那些善于变脸的政客。不然，哪天人头落地，恐怕还不知道怎么落的呢？何不趁手里有枪，为中国人民办些好事，也不在先生在世上一场嘛！”

黄琪翔、朱培德没能说服贺龙，反被贺龙抢白一通，悻悻地走了。

25日晚，贺龙率领与他同生死、共患难，主要由湘鄂川黔边境各族人民的优秀儿女所组成，在血与火中壮大成长起来的第二十军，乘大篷列车，迎着战斗的风暴，向江西省会南昌奔驰而去，于26日进驻南昌。

7月26日，周恩来在陈赓的护送下，抵达南昌。这时，先后到达南昌的有刘伯承、彭湃、聂荣臻、恽代英、吴玉章、林伯渠、廖乾吾、徐特立、李立三、谭平山等。

周恩来一到南昌，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缜密地筹划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组成了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核心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

7月27日，中共前敌委员会在江西大旅社开会，决定成立起义军总指挥部。谁来担任起义军总指挥？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事关起义成败的大事。

周恩来似是早已成竹在胸，推荐贺龙任起义军总指挥。贺龙的坚定立场、指挥才能及所部二十军的情况，前委委员都已了解，是众望所归的总指挥人选，所以，大家一致赞成周恩来的意见。

鉴于贺、叶两部劳师远征，刚到南昌，敌情不明，决定将起义时间改为7月30日晚举行。

次日，周恩来在江西大旅社二十军司令部里会见贺龙。贺龙热情接待了周恩来，周恩来紧紧握住贺龙的手说：

“我来拜访你不是礼节性的，开门见山说，我是来找你商量起义的计划。我们立刻就谈好吗？”

贺龙连连点头说：

“好极了，我洗耳恭听！”

周恩来诙谐而真诚他说：

“洗耳恭听是不够的，你是大将军，光动耳朵怎么行呢？还要动手动脚动枪炮呢！”

贺龙也笑了。陪着周恩来进屋的周逸群，听说他们要谈大事，准备离开。贺龙扬手说道：

“逸群，莫走，一起听听嘛！我都听得，你还听不得吗？”

周恩来也摆摆手说：

“好，坐在一起听吧！”

周恩来将南昌起义的计划告诉贺龙后，说：

“贺龙同志，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贺龙满腔热情地表示拥护，并恳切他说：

“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周恩来点点头说：

“共产党对你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党的前委任命你担任起义军总指挥！”

贺龙听说党把指挥南昌起义的大权交给他，不禁心里一怔，先是似乎有点不太相信，当他看到周恩来正用十分诚恳的目光期待他的回答时，不觉离开椅子，站了起来，缓缓他说：

“我还没有入党……”

周恩来也站起来，紧握着贺龙的双手说道：

“贺龙同志，你虽然在组织上还没有入党，但你在思想上已经入了党，因为你已把自己的一颗心完全交给了党，党完全相信你。”

贺龙激动万分，一向具有大将风度的他，禁不住微颤着嘴唇，说：

“好，我服从！”

“大胆干吧！党相信你。”周恩来说，“南昌敌军有三千多人。朱培德的第五路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很有战斗力。我们决定由叶挺同志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同志任参谋团团长。请你和伯承同志一起订一个具体的作战计划。我想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团就设在你们军部，你看可以吗？”

贺龙听到和叶挺、刘伯承两位名将共同指挥，顿时活跃起来，高兴他说：

“很好，一切服从命令。只是要快。我们这出戏是杨排风上阵，连烧带打呢！”

这句话一说，大家哈哈大笑起来，连刚刚赶来的叶挺也笑了起来。

贺龙肩负党的重托和人民的希望，与周恩来、刘伯承、叶挺一道，夜以继日地投入紧张的工作，审慎、缜密地制定了起义作战计划。

7月31日，贺龙列席了前委在二十军军部召开的扩大会议，决定8月1日凌晨4时起义。

当天下午，贺龙在二十军军部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重申起义命令，进行战斗部署。散会后不久，一师师长贺锦斋和一团团长刘达五赶来报告说：

“一团三营副营长赵福生已叛变投敌。”

贺龙听说后非常着急，立即向前委书记周恩来报告，并经周恩来同意，将起义时间提前为凌晨2时进行。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二万余人的革命武装，举行起义。中国武装革命反对武装反革命的第一枪打响了，从此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历史！

战斗胜利结束了！仅花了四个小时，起义军便在8月1日上午6点钟，将南昌之敌三、六、九军的部队全部缴械，歼敌五个整团和一个新兵团，约三千余人。贺龙与周恩来并肩而立，舒展着疲惫的身躯，分享着胜利的喜悦，望着东方太空一轮喷薄而出的朝阳，心神为之一振。

南昌起义胜利了！8月1日，红日东升，捷报频传，鲜艳夺目的红旗，在起义军总指挥部的五层大楼上，迎风招展。

8月1日上午9时，中共中央部分领导人和在南昌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西省党部委员、南昌市党部和海外党部代表，举行

了联席会议。会议选举宋庆龄、周恩来、谭平山、贺龙、张国焘、林伯

渠、吴玉章、叶挺、何香凝、邓演达等 25 人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由宋庆龄、邓演达、贺龙等七人为主席团委员。接着，宋庆龄很快发表了支持南昌起义的声明。

当天晚上，参谋团在二十军军部召开了会议，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和随第二十军行动的苏联军事顾问纪功等参加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起义军南下广东的具体计划和政治纲领。

贺龙发表意见说：

“我不主张到广东，我觉得湖南边境农民运动做得好，有群众基础。到那里去不致在盛夏时节千里行军，而且兵员也容易补充。”

但南下广东的方针是在共产国际代表指示下，中共中央在南昌起义前就作出的决定。贺龙这一正确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南昌起义的伟大胜利，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武装革命反对武装反革命的新纪元，诞生了共产党直接领导和指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军队。千百万革命群众，在经历了一系列严重挫折后，又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红色火炬，看到了共产党人所具有的力量。

八一起义后，起义军根据中共中央预定的计划，于 8 月 3 日撤离南昌，挥师南下。沿途突破了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围追堵截，歼灭了会昌守敌钱大钧九个团，于 8 月底占领江西瑞金。

8 月底 9 月初一天，金秋的艳阳照耀着瑞金大地，起义军的红旗插满瑞金城头，贺龙满面春风地从一所学校里走出，叼着烟斗，浑身洋溢着活力，一旁的卫士发现，贺总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开心、高兴。是的，这是他大喜的一天，是政治生命发生转折的一天。就在刚才，在那所学校里，贺龙经周逸群、谭平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时此刻，他正盼望着夜晚的到来，因为到了夜晚，他要参加那激动人心的入党仪式。

夜晚到了，党的前委举行了贺龙入党宣誓仪式。参加者有周恩来、谭平山、张国焘、李立三、廖乾吾、浑代英等人。贺龙面向党旗，凝神肃立，庄严宣誓：

“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在会上，周恩来发表了真诚恳切的讲话，他说：

“贺龙同志由一个贫苦农民出身，经过斗争，逐步成长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这是很不容易的。多年来，贺龙同志积极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经过严峻的考验，是信得过的……”

接着，李立三、浑代英、谭平山也讲了话。贺龙入党后，编入中央特别小组。同组中有周恩来、张国焘、廖乾吾、刘伯承、周逸群等。

10 月 3 日，起义军转移途经青宁县流沙时，前委召开紧急会议，认为不能按原计划进行，决定革委会成员回各省分散活动，部

队一部分撤往海陆丰与农民武装会合，坚持武装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经赣南、粤北转入湘南，开展游击战争；高级指挥员因名声太大，要迅速离开部队。周恩来自告奋勇留下处理善后工作。

贺龙再次向前委和周恩来表示：

“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湘西，我要卷土重来

根据周恩来的安排，贺龙与谭平山、刘伯承、林伯渠等八人在汕头包了一只木船转往香港。

## 二、面对人们的担心，周恩来说：贺龙不会变成军阀

贺龙到香港后，想到起义遭到失败，他心急如焚，再也呆不下去了，决心回大陆再大干一场。11月初，他告别谭平山，蹈海踏浪，冒着危险回到上海。

上海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发起地，反动军警、青红帮充斥在大上海的每一个角落。此时，印有贺龙照片的悬赏通缉布告和传单，如雪花飞散，贴满了上海等地的大街小巷。上海城里巡警满街，大肆搜捕贺龙，白色恐怖笼罩大地。

贺龙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一个晚上换了八个住地。周恩来得知贺龙回到上海，立即派人寻找，寻找他的人不认识他，只有跟着线索找，一个晚上也跑了八个地方。贺龙沉着镇定，临危不惊。

一天傍晚，贺龙正在上海一条小街上寻找党组织，却被特务跟踪上了。就在这时，来了一个黄包车夫，他也是党组织派来寻找贺龙的地下共产党员，他见贺龙身后有特务跟踪，立即把他拉上车，七串八拐，甩掉特务，到了另一条街，然后说：

“先生，你在这个旅馆安全些！”

贺龙侧过身子一看，是周逸群、廖乾吾，真是高兴极了，随即跟他们走进屋去。

周恩来听说找到了贺龙，心里非常高兴，马上来看望他。贺龙见到周恩来，见他虽然瘦削但比以前健康，感到十分欣慰，说：

“部队打散了，我一个人来见你，真是不甘心哪！”

周恩来安慰说：

“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嘛！”

接着，周恩来又诙谐他说：“贺龙同志，现在蒋介石悬赏10万。大洋捉拿你，你的头很值钱哟！”

贺龙笑呵呵他说：

“我这颗头早已交给党喽！就是杀头，我也要跟共产党走！”

在座的廖乾吾说：

“我们贺老兄，是一片丹心，满腔热血。他的革命决心，是火车也拉不动的。”

周恩来亲切地告诉贺龙说：

“你的工作，中共中央已做了考虑，决定派你去苏联学习军事，同去的还有林伯渠、刘伯承。”

“服从党安排！”贺龙高兴他说。

周恩来和贺龙谈完工作后，非常亲切他说：

“你去看看你家里的人吧，他们住在霞飞路。”

听了周恩来的话，贺龙一下愣住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周恩来已把他的家眷接来。他刚到上海，就能同妻子女儿见面。这些天来，他一直在牵挂着她们，担心敌人向她们下毒手，这下好了。贺龙深深地感到周恩来对他从政治到生活，真是体贴入微，关怀得无微不至。

当时，由于敌人严密搜查，城内外岗哨林立。党只得把贺龙

严密地隐蔽起来。第二天，刘伯承、林伯渠登船走了，贺龙未能成行。贺龙等了十天，仍然走不成，他反复考虑自己今后如何行动的问题。他想，

既然去不了苏联，我就回湘鄂西去搞红军。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周逸群，请他转告周恩来。

几天以后，周恩来再次会见贺龙。贺龙向周恩来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说：

“南方几个省我都熟悉，我从民国5年开始，就在那些地方拉队伍，和北洋军阀打了十多年仗。从武汉到湘西沿长江一带的驻军，有些是我过去的部属，一些土匪是被逼上梁山的农民，可以收编。那里我人熟地熟，就让我回湘鄂西去搞红军，搞游击战争，搞革命根据地吧！”

周恩来关切地问道：

“一路上的安全，你有几分把握？”

贺龙诚挚地回答说：

“谢谢恩来同志的关心，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了，问题不大。到了汉口，我就能活动了。沿长江走水路回去，我有把握。我叫贺龙，龙归大海嘛！不过，为了无产阶级革命大业，我对生死荣辱，早已置之度外。”

周恩来十分赞赏贺龙坚定的革命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说：

“这个问题，我个人同意，但得请示中央决定。”

1928年1月6日，在中共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把贺龙的要求正式提了出来，并发表了个人的意见，说：

“贺龙同志要求回湘西去搞武装斗争，我看这可以充分发挥他的作用。”

周恩来刚一提出，就遭到了共产国际代表的反对，这位外国人担心贺龙“回去要变成军阀”。

周恩来坚持自己的意见：

“如果要变军阀，他早就变了，怎么还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来参加共产党呢？”

但在当时，共产国际代表是太上皇，党的主要领导人惟国际代表之命是从，不敢提不同意见，致使贺龙回湘西一事议而未决。

1月8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议研究两湖暴动问题。周恩来再次提出贺龙的要求和自己的看法。认为贺龙是一个值得依赖的同志，回湘西对革命事业有利。由于周恩来据理力争，最后，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同意了贺龙回湘西搞武装斗争的要求。

临行前，周恩来要人做了几个菜，请贺龙、周逸群吃饭，为他们饯行。他告诉贺龙：

“中共中央常委已经同意了你的要求，决定组成湘西北特委，由郭亮任书记，贺龙、周逸群、徐特立、柳克明为委员。任务是发展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又说，“你们到了汉口便与湖北省委书记郭亮联系，接头地点是谢弄北里17号。”

听着这一盼望多时的决定，贺龙激动得热血沸腾。他多么感谢党对他的信赖，他又有了驰骋腾翔的天地。像个纯真的孩子，他用天真纯朴的语言宽慰周恩来说：

“恩来同志，放心吧！我决不辜负党和你对我的期望。”

1928年1月中旬，贺龙、周逸群等离开上海去武汉，先到湖北省委，找到郭亮接上关系。以后，他们在党组织的掩护和帮助下，于1928年春到了湘鄂边，在桑植一带组织了红四军。贺龙深记周恩来临行前的嘱咐一边打仗，一边做群众工作，表现得非常勇敢、坚强。他不断派人或用书信形式向党中

央请示报告他们开

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和问题，表现了对党的忠诚和极严格的组织纪律性。

党中央、周恩来对贺龙非常关心，在听了贺龙派来的人的报告和收到1928年底贺龙捎来的信件后，于1929年3月7日，周恩来代中共中央起草了给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既肯定了他们开创湘西革命根据地的成绩，又对湘鄂西苏区的发展做了具体指示。

这些，使贺龙倍加感到党的温暖。他说：

“我在旧军队中工作了那么多年，虽然汪精卫见过我（贺、汪都是同盟会会员），对蒋介石的人，北伐前我也有过接触，但是我并没有见到过像周恩来这样的人。我参加共产党前，天天拖着队伍防备被别人吃掉，参加了革命队伍后，我确实感到党的关心、温暖，我决心要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党。”

在湘鄂西，贺龙和周逸群等人，按照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依靠当地党组织遍撒火种，发动群众，开创了湘鄂边革命根据地。他率领的红二军团，英勇顽强，机智善战，不仅多次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而且同来自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 三、有人向周恩来要官，周恩来调贺龙挡驾

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后，党中央对于那些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的民主人士做了适当安排。贵州的李仲公（原是蒋介石手下的说客）找到周恩来，以他是贵州人，熟悉贵州情况为条件，提出他应当省政府主席。周恩来说：

“你想当省主席，意见嘛你可以提，但是我们要统筹考虑、研究。”

周恩来再三向李仲公讲道理，可这位李仲公脸皮甚厚，利用我们党安排、照顾民主人士的政策，在周恩来处就是赖着不肯走，百般纠缠。大有不当贵州省主席不罢休之势。

这时，周恩来忽然想起，贺龙了解李的底细，于是通知贺龙马上到办公室来。李仲公没防备，一见虎虎生风的贺龙来了，顿时如坐针毡，非常不安，表现得很不自然。

周恩来故意问贺龙：

“这位是李仲公，认识吧？”

贺龙亮着嗓门说：

“岂止认识，我们还是‘老朋友’呢！”

周恩来有意告诉贺龙，他们正在谈李的工作问题，李想当省主席。

贺龙马上明白了周恩来是在向他示意，就对李说：

“李仲公，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了！1926年，我们北伐准备打河南时，你到我的部队干什么去了（当时李是蒋介石派往贺龙部队搞策反的说客，要贺龙跟着蒋介石走，被贺龙严辞坚拒）？我开始是在刘湘的公馆请你吃饭，以后我们还打了麻将嘛。对不对？”

李赶紧点头答道：

“对，对，确有此事。”

贺龙接着厉声问：

“打麻将以后，你坐什么车走的？“怎么把你送到唐生智司令部的（由于李搞拥蒋反共的策反，被贺龙抓了起来，送往当时武汉政府唐生智的司令部）？你当年可没做好事啊！”

李见老底被揭，顿时吓得直出冷汗，连声说：

“惭愧，惭愧。”

见此情形，周恩来双手交叉抱肩，哈哈大笑，边笑边风趣他说：

“噢，原来你们是‘老朋友’了。‘朋友’相逢，你们还有什么再说的？”

李自知无趣，赶紧告退。但我党对李仲公采取宽大政策，任命他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在“文化大革命”中，李仲公为此衔恨对贺龙进行报复，伪造了所谓贺龙向蒋介石的求降信。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藉此时贺龙进行了十分残酷的迫害。这是后话。

#### 四、周恩来点将：由贺龙担任体育“老总”

1952年8月的一天，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正在成都的办公室处理事务，忽然，桌上的电话“丁零零”地响起来，拿起一听，原来是政务院常务副总理邓小平从北京给他打来电话，告诉他政务院决定组建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并说：

“团中央和全国体育总会建议请你当主任。我和总理商量了，总理也感到由你来当最合适。”

贺龙听说总理已同意，心里有了谱，又问道：

“毛主席的意见呢？”

邓小平回答。

“毛主席也赞成。”

贺龙痛快地答应说：

“好。主席、总理叫我干，中央叫我干，我就干！”

11月15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讨论关于成立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的问题。周恩来正式提议由贺龙担任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蔡廷锴任副主任，会议一致通过。

从此，贺龙作为政务院下边一个委的负责人，在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担当起体育“老总”的角色，挑起了开创新中国体育事业的重担。

周恩来鼓励贺龙说：

“贺老总啊，你过去是带兵打仗的老总，现在又当体育‘老总’，两者都有对抗性，你只要把过去用兵打仗的深谋远略用在体育上，也一定能行。”

贺龙的表态铿锵有力：

“总理这样看得起我，拼老命也要把新中国的体育事业搞上去。”

1959年11月，原定的中苏联合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计划，由于苏方毫无诚意无故拖延而搁置下来。

地球上，共有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峰，其中有9座在中国境内或边界上，可是，中国的登山运动在1955年以前，还是空白。

西方人称中国人是东亚病夫，苏联人又持不合作态度，明摆着，那是怀疑中国人登山运动的水平，意思是说，没有我们，你们登不上去。

爱国主义的情怀在激荡着贺龙的心扉，他决心由中国登山队单独攀登。但是，登珠峰既危险，又劳累，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他想听听周恩来的意见。

于是，贺龙将国家体委关于中国单独攀登珠峰的决定向周恩来

作了报告。后来他又约邓小平一起去见周恩来，具体陈述了中国登山队近几年的成绩和攀登珠峰成功的有利条件。

邓小平也说：

“要登珠峰的计划国外已经知道，我们现在要是不登，让外国登上去，就会失去创造世界纪录的机会。”

周恩来为贺龙的无畏精神所感动，最后拍板：

“登，成功了，喝庆功酒；失败了，总结经验教训重来。”

有了总理的决心和支持，贺龙乐得孩子似的，脸上绽开了灿烂的笑容。

为在攀登珠峰的同时进行多学科的科学考察工作，在周恩来、邓小平的支持下，贺龙、李达和黄中在北京组织了力量雄厚的科学考察队伍，制定了详细

的科学考察计划。中国科学院、地质部、中央气象局、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大学、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后勤部都抽出了年富力强的干部、科研人员，参加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支珠峰科学考察队。参加这次攀登珠峰的总共有214人。

贺龙审阅了登山队拟定的登山方案，并报告了周恩来。

周恩来戴上老花镜，对方案进行了认真修改，并亲笔写信给有关部门，让他们帮助购置、调拨登山所需物资。西藏工委组织了有西藏党、政、军和各族各界人士参加的“支援委员会”，全力进行保障。

贺龙对登山队副队长许竞说：

“各方面都下了保证，看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登顶就是你们的事了。一定要登上去，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把珠峰拿下来。”

此时，国际上正出现一股反华逆流，国内又处在暂时经济困难时期。贺龙深知在这种时候攀登世界最高峰具有重大政治意义。

他对队长史占春说：

“现在中国各界都在勇攀高峰，而你们才是真正的攀登高峰。”

史占春向贺龙立下了“军令状”：

“我们中国人凭自己的力量一定可以登上世界最高峰……非成功不可！”

贺龙大加鼓励：

“有这个志气就好！你们要注意‘三气一线’，就是天气、氧气、志气和登山路线。这是确保登山成功的主要条件。要么不爬，要爬就要爬上去。我在北京准备开几万人的大会欢迎你们！”

由于天气恶劣，登山的第三次适应性行军遇到了困难。后来，虽然完成了任务，但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一批在体力和技术上有希望登顶的健将如史占春、王风桐、许竞、陈荣昌、彭淑力等不同程度地冻伤，不能继续攀登。这一严酷的现实，在登山队引起了不安。

正在此时，周恩来访问缅甸后回到昆明，他一下飞机就问：

“我们的登山队登到哪里了？”

当他知道上述情况以后，马上指示说：

“要重新组织力量，争取登上顶峰。”

贺龙知道，总理的指示，就是强劲的东风，会给登山队以巨大的鼓舞和力量，他立即向登山大本营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为大家鼓劲、加油。并命令负责在前线指挥登山的总参军训部副部长韩复东：

“要不惜一切代价，重新组织攀登。剩下几个人算几个人，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登上去！”

登山突击队员王富洲、屈银华、贡布经过艰苦拼搏，终于在5月25日黎明4时20分胜利登上了顶峰！

新华社随队记者郭超人含着喜悦的泪水，立即向北京发出了征服世界最高峰的第一条电讯。贺龙收到了登顶成功的报告，眼里也闪出喜悦的泪花，立即向在外地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做了报告。

此时此刻，周恩来正在参加一个宴会，接到贺龙的电话，他立即兴奋地回到宴会大厅举起酒杯，建议大家为征服世界最高峰干杯。

然后，周恩来又斟上满满的一杯酒，端端正正地放在桌上，满含深情他说：

“这杯酒留着，等我们的登山英雄回来，请他们喝！”

中国人从珠峰北坡登上珠峰，电讯传出，立刻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震动，香港的一家报纸评论道：“这是一场没有裁判的不言而喻的竞赛。中国以3：0获胜。”国际登山界也盛赞中国登山队的这一胜利，说它将作为登山探险的一个里程碑永远载入史册。

这一里程碑式的胜利，是贺龙在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下，指挥登山健儿创造的一个辉煌杰作。

1961年，我国乒乓球队在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荣获男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和双打冠军，消息传来，举国欢庆，周恩来、陈毅、贺龙、彭真等都非常高兴。球刚打完，彭真就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宴请各国运动员。休息时，薛明、张茜、张洁清等女同志在场。陈毅的夫人张茜提议，以后每次得了冠军，都应有所表示，在场的人轮流请客。大家均表示同意。

1963年4月，第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我国男子队以5：1胜日本队，蝉联世界冠军。

周恩来不忘前约，请大家吃饭，大家都很高兴，应约前往。陈毅、贺龙都会见了运动员，纷纷向他们祝贺。周恩来勉励他们“胜不骄，败不馁”。吃完饭后，运动员们高兴地围在周恩来身边，

说开始打球很紧张，一想到为国家争光，就拼死打，终于打胜了。陈毅吃完饭，用餐巾一抹嘴，两手一摊，用浓重的四川话说：

“水果嘞？”

大家告诉他今天没水果时，他双手一摊，说：

“好吧，艰苦奋斗，就不吃了。”

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我国乒乓球队又得了冠军。这回轮到贺龙家请客了。贺龙向体委的同志说：

“上次总理请客是四菜一汤，自带粮票，这次不能超过总理的规格，其他备什么菜我不管，可千万别忘了‘红烧狮子头’，我就要这个菜。”

因为“红烧狮子头”是周恩来最喜欢吃的菜。

连请客吃饭，贺龙也要求“不能超过总理的规格”，充分体现了他对周恩来的尊重。

贺龙作为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之一，协助周恩来贯彻睦邻友好、寻求和平、友谊与合作的外交方针，频繁地参与外事工作。

## 五、争 酒

1957年，我国和缅甸关系很好。缅甸总理吴努来我国昆明访问，周恩来要贺龙陪同，前往昆明。由于吴努出访带着夫人，周恩来特地要求贺龙：

“薛明也去，双方都有夫人。”

当时贺龙的夫人薛明在北京市委工作，为此专门请了假。贺龙夫妇住在昆明湖滨招待所里。过不几天，周恩来来了。他们每天都在一块儿吃饭。当时昆明市正发生流行性感冒，第一天吃早

饭时，周恩来说：

“薛明，给我一杯酒。”

邓颖超没有随周恩来一起来，薛明觉得自己负有照顾总理身体的责任，就说：

“总理，早上起来不要喝酒吧！”

周恩来听后笑着说：

“唉，你不懂得，你们要预防感冒还吃那么多药，我这是消毒，是在预防感冒，这就没说的了吧？”

薛明还是半信半疑的，问：

“能喝吗？”

周恩来说：

“给半杯，就给我半杯。”

当薛明斟满一杯酒，双手递给周恩来时，周恩来笑着说：“小超是不主张我喝酒的。”

说完，周恩来又紧接着问：

“你们两位有联系吗？联系上了没有哇？”

薛明马上说：

“下午，我就给邓大姐打电话。”

在电话中，薛明告诉邓颖超，总理身体很好，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照顾得很周到，邓颖超听了非常高兴。

中缅双方会谈签订了新的边界条约后，云南省为欢送吴努，组织了规模盛大的宴会，很多少数民族的头人也应邀来了，他们见到周恩来，非常高兴，在宴会上频频为周恩来敬酒。周恩来也很高兴，一连饮了三杯。

贺龙担心总理喝多了，影响健康，连忙接过少数民族头人敬的酒，说：

“这杯敬总理的酒，我替喝，很感谢你们。”

周恩来深知贺龙有糖尿病，也不宜饮酒，便说：

“你别喝，这杯我喝。”

贺龙还是抢着要替周恩来喝下去。周恩来当即向敬酒者说：“贺总是有糖尿病的，不能多喝啊。”

宴会上周恩来与贺龙那互相关怀、互相体贴的动人情景，使在场的人无不深受感动。

宴会散后，回到招待所，上台阶时，周恩来对薛明说：“贺总是不应该喝酒的，今天喝多了，你可要好好照顾他呀。”接着，周恩来又说：

“你是1942年和贺总结婚的吧？”

薛明没想到周恩来记得这样清楚，很是感激地说：

“是啊，总理您记忆怎么这么好啊。”

周恩来思绪仍是回到了那烽火连天的革命战争年代，说：“我对贺总的了解可能比你还多。他是功臣啊！你可要记住哇！你要照顾好他的身体。他今天多喝了几杯，以后别喝酒了。”薛明很是感动，立即转告贺龙。贺龙回招待所后，叮嘱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

“总理今天喝多了，要注意他的身体。”

宴会上俩人争相替对方饮酒，回来后又互相关照，此事深深地刻在了薛明的记忆里，尤其是周恩来讲的话意味深长，薛明一直铭记在心。

晚上，又举办了欢送吴努的文艺晚会。晚会上演员们精湛动人的表演，不时激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演出结束后，周恩来、吴努、贺龙等上台接见演员，祝贺他们演出成功。

周恩来和演员们握手祝贺之后，也不知什么时候戴上了一顶十分别致的用白布条缠成的小帽，只见他手提花篮，翩翩起舞。他庄重的仪表，潇洒的举止，熟练轻快的舞步，博得一阵阵掌声。周恩来一跳舞，台上的演员们也欢乐地和着他的舞步高兴地跳了起来，乐队的同志立即奏起乐来了。

吴努见周恩来跳得这么好，也试着跳了起来，嘴里一再说：

“总理，您太热情了。”

贺龙也跟着跳起来。

看到这动人的场景，观众席上掌声哗哗地响了起来，后边的同志们站到凳子上鼓掌，掌声经久不息：

第二天送走了吴努，云南省委请周恩来作报告，地点是在一个开阔的广场上。贺龙陪同一块去，薛明跟在后面。事先安排由警卫维持秩序，可是到了那里，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周恩来到广场上去作报告，要经过一个高坡。可是人们争相挤着要看周恩来，他怎么也过不去。

见此情形，贺龙急了，他怕挤坏了周恩来，便大声说：

“同志们！别挤了！怎么能这么乱啊？怎么这么不遵守纪律啊？警卫都到哪里去了？快维持好秩序呀！”

薛明当时也为周恩来的安全捏着一把汗，生怕挤坏了他。

周恩来很快站在高坡上，向群众挥手说：

“同志们，我今天是来看大家的，和大家见见面。”

周恩来接着又说：

“你们不是想看看我吗？让我过去嘛，过去站在台子上，不就看见我了吗？”

他的话音刚落，人群忽地自动闪开了一条路。他大踏步地走过高地，登上了讲台。周恩来讲完话后，秩序井然，人们一点儿也不挤了。他最后站在一个小山包上，向群众频频挥手告别，连

声说：

“同志们，再见，再见！”

全场掌声雷动。那天，万里无云，阳光灿烂，周恩来不停地向人们招手，神采飞扬，风度翩翩。为了突出周恩来的位置，贺龙主动站到了离他较远的地方。

## 六、苏联元帅侮辱毛泽东，贺龙马上报告周恩来

1964年11月5日至13日，应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邀请，中国派出了以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纪念活动。

7日晚，贺龙同周恩来等出席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国庆宴会。苏联元帅科涅夫见到贺龙很高兴，他对中国代表团成员说：

“贺龙元帅是我的老朋友。”

紧接着，罗科索夫斯基和莫斯卡连科元帅也表示了对中国的友好情谊。

在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米高扬等领导人敬酒后，周恩来同贺龙走到苏联元帅们的席前，向他们祝酒。在场的有罗科索夫斯基、索科洛夫斯基、崔可夫、扎哈罗夫、克雷洛夫元帅及拉索夫斯基空军元帅等。周恩来提议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为两国军队的友谊干杯！苏联元帅们高兴地举起酒杯，表示这一杯酒非干不可！

这时，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走了过来。他先同周恩来寒暄了几句，接着挑衅说：“我们不希望有任何鬼来搞乱我们两国关系，我们要友好。”周恩来不理睬他，只是淡淡地说：

“加强友谊需要双方共同努力。”

马利诺夫斯基则不知趣，仍然挑衅说：

“我们人民要幸福，你们人民也要幸福，不要任何毛泽东、任何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

这是重大原则问题，周恩来当即斥责他说：

“你胡说什么！”

因为有西方的使节和记者在场，周恩来没有多说，也不再理睬马利诺夫斯基。

在场的苏联元帅们见此情景，一时间有点儿不知所措，愣了一会儿神，走到一旁商量了一下，崔可夫便走到周恩来身旁说：“总理同志，马利诺夫斯基的话，不代表我们。”周恩来也以缓和的语气说：

“我了解你们的意思。”

接着苏联元帅们走过来同周恩来、贺龙一一握手，以示友好。周恩来回到了主宾席。

马利诺夫斯基碰了钉子，但并不罢休。他又走到贺龙面前，先是讨好着搭讪说：

“贺龙同志的元帅服很漂亮，这已经不像当年的布棉袄了。”贺龙不冷不热地说：

“还是当年的棉衣好，我舍不得它！”

马利诺夫斯基借着话题，别有用心地借题发挥说：“我也认为棉衣好，元帅服是浮华虚饰。我们的元帅服被斯大林玷污了，你们的元帅眼被毛泽东玷污了。”

接着，他又大放厥词说：

“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会把毛泽东搞掉的，只是时间未到。”

贺龙听罢，勃然变色，义正词严地指出：

“你的话完全是错误的，我根本不能同意。”

贺龙说罢，立即走到周恩来身边，报告了刚才马利诺夫斯基的话。周恩来极为气愤，立即向米高扬严正指出：

“马利诺夫斯基刚才胡说八道。”

米高扬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关系到两国、两党的关系，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忙赔不是说：

“这绝对不代表我们的路线，他多喝了几杯酒，才说这样的蠢话，请你不要认真看待这件事。”

周恩来严肃地指出：

“这反映了一些人的情绪，并不是一件小事。”

8日上午，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到中国代表团驻地拜访周恩来、贺龙等。双方寒暄过后，周恩来代表中国代表团向苏领导人正式指出：

“昨晚马利诺夫斯基在宴会上的挑衅，是对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侮辱，是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国党政代表团的侮辱。这种事连赫鲁晓夫在位时也未曾发生过。如果是内部谈话，或在兄弟党宴会上和一般场合，我们早就回击了。但昨天是你们的国庆宴会，而且有西方使节和记者在场，我们不愿意使亲者痛，仇者快，才没有当场争论。”

勃列日涅夫辩解说：

“昨天马利诺夫斯基酒喝多了，是酒后失言。”

周恩来说：

“这个问题很严重，像这样严重的事，是不能用酒后失言来解释的。中国有句俗话说叫‘酒后吐真言’。”

接着，周恩来质问道：

“你们欢迎我们来的目的之一，是不是为了当众侮辱我们？你们是不是像马利诺夫斯基所说的，要煽动反对毛泽东同志？要知道，这根本是妄想，丝毫不能损害毛主席在中国党内的崇高威望；你们是不是也像帝国主义所说的那样，以为中苏原则分歧只是个人意气之争？所以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才能谈其他问题！”

勃列日涅夫自知理亏，不得不表示：

“感谢周恩来同志、贺龙同志昨晚所采取的有分寸的做法。马利诺夫斯基不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作为中央委员他也没有权力发表（这种）个人意见。他的话同苏共中央和新领导的看法毫无共同之处，决不代表主席团的看法。马利诺夫斯基愿意向中方正式道歉。我也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你们道歉。”

勃列日涅夫一再表示：这“是我们领导集体的看法，是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正式声明”，请求中方信任和做肯定的评价，希望不要因为这事影响了双方已经预定要进行的工作。

另一位苏方领导波德戈尔内也马上说，我们和马利诺夫斯基划清界限。

贺龙与周恩来一起，大义凛然，据理反击，挫败了苏方妄图挑起反对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试探，维护了党的利益和国家尊严，迫使苏共领导人不得不道歉。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赞扬。

## 七、周恩来妙语顿出：薛明管贺总，是桌面上不讲，到家里单个教练吧！

贺龙对周恩来特别尊重。每次周恩来到贺龙家，贺龙一听见汽车响，就开始大喊：“总理来了！总理来了！”

然后，呼呼地穿过长长的走廊跑去迎接周恩来。落座后，贺龙坐沙发总是偏着坐，欠着半个身子，以示对周恩来的尊重。只要夫人薛明在家，贺龙就大声喊：“薛明，薛明，来给总理倒茶。”工作人员在一旁，他并不让工作人员倒，而让夫人来倒，也是表示对周恩来的尊重。

周恩来是喜欢喝茶的。贺龙家里若是有几种茶叶，薛明总是倒两杯，放在周恩来面前，好让他尝一尝，哪杯好喝。

“文化大革命”前，贺龙、薛明陪着周恩来吃了一顿饭。那顿饭是聂荣臻请的客。请客的原因，说起来也很简单。几个老总聚在一起闲聊，贺龙便跟聂荣臻开玩笑说：

“聂老总，你请客吧。”

聂荣臻满口应允。吃饭时，大家都很有客气，特别是陈毅，显得非常拘谨。因为张茜关心陈毅的健康，平时限制他吃肥肉。周恩来有意把张茜支走，笑着说：

“张茜，你去告诉服务员，我们这些人想吃点素菜、小菜，特别是陈老总，要吃点素菜、小菜。”

张茜一走，聂荣臻、贺龙赶紧给陈毅夹了几块回锅肉。陈毅刚吃了两块，张茜已回转来，看见了陈毅盘里的回锅肉，聂荣臻怕陈毅挨“批评”，就赶紧打圆场，说：

“就这一块了，让他吃了吧。他自己不吃，是我们让他吃的。”

陈毅很幽默地说：

“好吧，就最后这一块了。”

张茜关心地边说边用胳膊碰陈毅，周恩来非常坦然地把手摆在桌子上，一边笑一边用手轻轻地敲点着桌子，很随便地说：

“有意思，有意思。”

稍停了一会儿，又说：

“张茜，我也给你说几句话。一般老年人，特别是肥胖的，都不适宜吃肥肉，我也不赞成吃，医生也告诉过我。但是偶尔吃上一两块，也不要紧，不会发生多大问题，你放心。比方说，医生只叫我吃蛋白，我就不喜欢吃蛋白。我蛋黄、蛋白一块儿吃。蛋黄里有胆固醇，但也有卵磷脂。肥肉一块也不能吃，那是形而上学嘛！还是不要硬性规定，我看平时不吃也可以，如果想吃时少吃一点，也没有什么关系，要灵活一点。”

周恩来分析得很在理，大家频频点头称是。

周恩来说完后，聂荣臻看着贺龙和薛明，紧接着说：

“我们几个经常一起外出。我总结了一下，发现还是薛明的方式比较好。”

周恩来也接上去说：

“我今天才发现，吃饭时薛明也不说话，贺总也很自觉，是长期养成习惯了吧？”

薛明赶忙笑着辩解说：

“我可不管，是他自己不吃。”

周恩来一听，又十分风趣地说：

“噢，薛明也许还有别的办法，或者高招。我猜大概是桌面上不讲，等回到家里再上课，给贺龙单个教练吧？”

一句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起来。

当时，周恩来和几位老师都已年过花甲，关系这般融洽，在一起吃饭谈笑风生，给薛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八、“薛明，我没有保住他啊！”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林彪一伙就诬陷贺龙是“黑线人物”，“要篡党夺权”。之后，康生、江青分别到北京师范大学和清华大学诬陷贺龙调兵搞“二月兵变”，煽动学生造贺龙的反。从此，贺龙的家就没有安宁过。家被抄，孩子们也躲到亲友、同事家里去了。同时，体委造反派也闹起来了。

1966年12月24日，体委造反派斗荣高棠那天，贺龙去接周恩来一块去体委。见面后，周恩来亲切地握着贺龙的手说：

“你血压高，我还是建议你休息。”

贺龙和薛明深知周恩来是为了保护贺龙才提出这个建议的，从内心深处感谢总理。但由于贺龙对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起因不清楚，对全国乱成这个样子不理解，又感到不放心，觉得不应该休息。他说：

“我干一辈子革命了，怎么怕群众呢？把我保起来不行，还是想工作。”

周恩来从贺龙犹豫的眼神中看出贺龙心有疑虑，便诚恳地说：

“工作我替你顶着，不要紧。你休息吧，保重身体第一。”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造反派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体委的造反派对贺龙也是纠缠不休的，但听了周恩来的指示不敢违抗，也就同意贺龙休息。

1966年12月25日晚，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把贺龙和薛明安排在钓鱼台住。贺、薛刚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就接到

周恩来办公室的电话，叫他们马上离开那里。原来康生、江青也住在那里，周恩来怕江青、康生一伙发现贺龙后挑动造反派再来揪斗贺龙。按周恩来安排，他们转到新六所住。12月28日，贺龙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但是，体委、政治学院的造反派很快知道了贺龙的住处，又跟踪到了新六所，整天闹得不可开交，要揪斗贺龙。东交民巷的家也被造反派进驻了。

贺龙很是气愤，说：

“群众还不知道我呀，我也了解群众。我不怕，我要回去一趟。”

薛明跟贺龙的警卫员杨青成说：

“是总理安排我们住在这里的，要回去，还是告诉一下总理好。”

1967年1月9日，贺龙到西花厅见到周恩来，讲明情况后，周恩来果断地说：

“你不要去，我顶着。”

说着，周恩来马上把电话接到东交民巷贺龙的家里，严厉地对造反派说：

“找你们的头头，我是周恩来，我是总理。你们到贺龙家里去呆在那里，这不好吧？这不像样子嘛！你们赶快搬出来！有什么事跟我说，今晚7点钟，我在大会堂接见你们！”

鉴于周恩来的巨大威望，造反派马上就撤走了。

周恩来要完电话，转回身又对贺龙说：

“不要回去，不管他，你也不要接他们的电话。”

此时正值“一月风暴”，社会是十分混乱，周恩来对贺龙的安全放心不下，1月11日凌晨，又安排贺龙、薛明俩人住进中南海他家西花厅的前厅。床是他们到后临时搭的。在西花厅住时，贺

龙和薛明亲眼见到了周恩来日夜操劳的情景，他天天夜间出去工作。贺

龙睡不着，每天黎明前都站在窗台前，盼着周恩来早点回来。其时正值隆冬季节，分外寒冷，每天天快亮时，才看见周恩来的汽车缓缓从外边开回。周恩来太疲乏了！太劳累了！看到这些，贺龙心里难过极了。林彪、“四人帮”一伙指使造反派对老师们采取冷攻，对周恩来搞热攻、车轮战，使他不得休息。

贺龙住在西花厅，心情很是不安。总觉得周恩来天天为国家操劳，他却躲在西花厅休息，心里很不是滋味。

周恩来工作这么紧张、劳累，但仍不忘给贺龙以安慰和温暖，有时还抽时间到贺龙的住处看一看，每次来后，他都对贺龙说：

“你就安心住着吧。”

有一次，百忙中的周恩来又来到贺龙夫妇住的地方，为了能多和他们说会儿话，就说：

“我就在这儿吃饭吧。”

薛明马上告诉服务员，把饭给周恩来端过来。周恩来的饭也很简单，仅仅两个菜。周恩来边吃边说：

“我实在没时间。薛明，你给我念念报纸吧，我连看报纸都来不及。你给我念念重要的消息，或当天的社论。”

又问贺龙：

“你看过报纸了吧？”

贺龙忙答：

“看过了。”

“那我们俩人一块再听听。”

薛明拿过报纸，很是抱歉地说：

“我念得慢啊。”

周恩来则说：

“我喜欢听慢的，现在年纪大了，念快了，记不住。你就慢一点念吧。”

周恩来一边听薛明念报纸，一边吃着简单的饭菜。薛明边读着边想，总理啊：你吃饭都没清静的时候啊！

此时的中国大地，没有一块净土，“一月风暴”的飓风，也刮进了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中南海里的工作人员也分成了两派。为了贺龙和薛明的安全，1967年1月19日，周恩来和李富春一起找贺龙谈话。周恩来说：

“对于你的安全我负责。主席不是也说嘛，要保你。我也要保你。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这个地方也是两派，也不安全，连朱老总的箱子都撬了。我给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休息。你可能不习惯，也许过些时候就习惯了。你缺什么东西告诉我。”

贺龙和薛明虽然并不了解周恩来与林彪、江青一伙斗争的内幕，但知道周恩来的处境太难了。同时也不想再给周恩来添麻烦，就答应搬到新住处去。

谈话结束后，周恩来紧紧握着贺龙的手，难舍难分地说：

“你先走吧，到秋天时我去接你。”

稍停了停，周恩来又说：

“家里的事，我顶着。你就别管了，我已安排好了。你不要着急，杨德中护送你，夜间再走。”

周恩来想得太周到了，其虑之细，其关怀之深，使薛明眼眶里禁不住溢

出了激动的泪花。

贺龙怎么也没想到，此去道路坎坷，荆棘丛生。他更没想到，这次分手竟是和周恩来最后的诀别！

1967年1月20日凌晨3点钟，贺龙和薛明离开了西花厅，由中央警卫局杨德中和贺龙的警卫员杨青成护送，乘红旗轿车朝玉

泉山驶去。天蒙蒙亮时到了玉泉山。后改乘吉普车，这时车上就只有贺龙和薛明及护送他们的杨德中了。汽车一直开到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这是建在山腰间的一所平房院落，里边的房子很不错。除了担任警卫的战士，就只有贺龙和薛明两个人。

贺龙走后，林彪、“四人帮”一伙失去了斗争目标，到处打探贺龙的去向，多次闹着要“揪斗贺龙”，要“打倒贺龙”，但都遭到了周恩来义正严词的斥责。

2月18日，周恩来嘱秘书告国家体委造反派：周恩来不同意批斗贺龙，这是中央的决定。

2月22日，周恩来继续嘱告秘书向体委传达：

“总理不同意召开大会批斗贺龙同志，因为中央至今未批准此事。”

贺龙夫妇刚到象鼻子沟住下时，杨德中不断代表周恩来去看望他们，他每次来，贺龙都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不放，问：

“总理好吗？让总理放心吧。”

杨德中每次来后，都转达周恩来的问候，周恩来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并嘱咐贺龙利用休息时间，好好学习学习，练练字，学习毛主席的著作。

杨德中还告诉他们：

“总理估计贺总坐不住，不习惯这个环境，说过一段会习惯的。若有事，找总理。”

自此，贺龙真的练起字来了，练得还很认真。

1967年，国庆节后，贺龙突然高烧至40℃，吃不下饭，稍吃一点就呕吐，周恩来知道后，嘱速送三〇一医院治疗，但遭到江青反对，只好送到二六六医院，安排住在传染科。二六七医院归警卫一师管，平房，一刮风全是土。住院时，杨德中和警卫一师的同志去探视了他。出院后，杨德中又来到象鼻子沟，为烧暖气的事看贺龙，同时带来了周恩来亲切的关怀和问候。周恩来说，山沟里的温度低，比城里凉，要早烧暖气。周恩来是怕贺龙再患感冒。

仿佛一股暖流从身上流过，贺龙紧紧握着杨德中的手，激动地说：

“听到了总理这亲切感人的话，就好像见到了总理一样。请总理也多保重，他身上的担子重啊！”

贺龙夫妇非常感激周恩来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但从此以后，贺龙和周恩来的联系就中断了。

自从1963年林彪患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贺龙代替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后，林彪就一直把贺龙视为自己篡夺国家最高权力的极大障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文革”狂飙起，为林彪提供了乱中夺权的好时机。他在毛泽东面前百般诬陷贺龙，并说贺龙私自藏有枪支——这是忌中之大忌。

贺龙被列为专案审查对象，完全落入了林彪一伙的魔掌。林彪一伙更加紧了对贺龙在政治、生活和医疗等各个方面的迫害。实际上，他们整贺龙，

也不仅仅在整贺龙一个人，是想通过整贺龙，进而整倒周恩来。

在临离西花厅时，薛明悄悄地把西花厅的电话号码记在手心里，以备日后有急事时和周恩来取得联系。到象鼻子沟后，开始杨德中常去，还没感到没电话的困难。自和周恩来断了联系后，才感到没电话的困难。贺龙曾叫薛明悄悄去看看哨兵的电话，能不能趁他们不注意时，把电话拨出去。一看才知，哨兵使用的是手摇电话，要通过总机转，他们连电话也拨不出去了，和周恩来再也联系不上了，心里真难受啊！

此时的周恩来处境维艰，已经无力保护贺龙了，在象鼻子沟，贺龙一直住到1969年6月9日被迫害致死。贺龙去世后，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没有党旗，没有同志和战友，只有一条白色的床单覆盖着他那魁梧的身躯。贺龙的遗体是被秘密火化的。

贺龙含冤去世后，薛明又回到了象鼻子沟。林彪一伙对她的迫害并未终止。他们先用木板把窗子钉死，不让阳光透进来，日夜用大灯泡照着她，使她不能入睡。而后又把她押送到颐和园旁边的北京卫戍区警卫一师四连。继而又把她押送到贵州省某空军干校，进行了残酷摧残。

约在1971年10月的一天，北京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人说：

“你是老薛吧？”

那人怕薛明没听清，又稍抬高声音说：

“你是不是薛明啊？”

薛明疑惑地望着来人，没吭声。

另外一个人说话了：

“你别紧张，我们不是他们那伙的。林彪和叶群叛国出逃，已摔死在蒙古了，他们完蛋了。”

听到这里，薛明赶紧拉着他们的手说：

“你们不是一伙的？”

他们亲切地说：

“是周总理让我们来找你的。为寻找你，我们四处查访，几乎跑遍了整个中国。”

薛明一听是周恩来派他们找自己的，顿时泪如泉涌。

他们告诉薛明：

“叶群的一些事你知道，贺龙最后的日子，也只有你在他身边。周总理要你把贺龙同志遭受林彪一伙迫害的情况，原原本本写出来，报告中央。”

薛明心里热乎乎的，可盼到这一天了。回到北京，她眼含泪水，写写停停，到1978年，终于写好了《向党和人民的报告》。

有一次，邓颖超听薛明讲完报告的内容后说：

“这些材料要是总理听到了，他会非常难过的。”

回到北京后，国务院安排薛明住在新疆驻京办事处。周恩来特地派国务院科教组组长刘西尧来看望她。刘西尧说：

“我代表总理，向你一家问好。希望你一家团圆。”

在周恩来的关怀下，不久，薛明和失散五年的孩子们也团聚了。和儿女团圆时，她依然那佻豁达、乐观，没有给孩子们留下一个挨整的印象。林彪死了，她觉得心里踏实了，周恩来关怀着她，她觉得贺龙平反有希望了。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非常关心贺龙的平反昭雪问题。1973年2月29日，毛泽东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

的人。被他杀了。”并指示要为贺龙平反。1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上说：“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呢。”“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又一次中央会议上，当讲到贺龙时，毛泽东连声说：翻案、翻案、翻案！1974年，毛泽东和邓小平谈话时提出：要给贺龙平反。邓小平立即在政治局会议上做了传达。

1974年底，中共中央发出了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推倒了林彪一伙强加在贺龙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贺龙平反前，周恩来让邓颖超的秘书打电话给薛明，提出“要找一找贺总的骨灰在哪里！”

作为贺龙的亲人，薛明是多么希望能够找到贺龙的骨灰啊！同时，她从这亲切关怀中，看到为贺龙平反的希望。

此后，邓颖超又两次来到薛明家中。第一次来，了解薛明和孩子们的生活及健康情况，虽没明说要给贺龙平反，但邓颖超来本身就是个态度，希望就很大了。第二次来，带来了周恩来的问候，希望薛明保重身体，不要太难过，要向前看。邓颖超还说，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不登报，是中央的意见。

薛明表态：中央怎么决定，我就怎么办。

1975年6月9日，在贺龙逝世六周年的时候，中共中央举行了“贺龙骨灰安放仪式”，此时，周恩来已是癌症晚期，做过数次手术，但是周恩来拖着瘦弱之身抱病参加了。

事先，邓颖超专门给薛明来电话打招呼，说：“总理也许来，若来了，你们双方要控制些感情。”

薛明将邓颖超的话告诉了亲属们。她和儿女们刚进休息室不久，就听到了在休息室外周恩来的声音。他大声喊：

“薛明，薛明啊！”

门被推开了，周恩来走进来，薛明急忙迎上去。周恩来紧紧地拥抱着薛明，声音颤抖地说：

“薛明，我没有保住他啊！都六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啊！”

说着，周恩来的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薛明望着周恩来那被病折磨得瘦削的脸颊，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许久只说出一句话：

“总理，我感谢你对我们全家的关怀……”

接下来，薛明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这时，薛明的女儿晓明走过去，说：

“周伯伯，你要保重身体呀！”

周恩来抬起头来，缓缓地说：

“我的时间也不长了！”

顿时，整个休息室里一片哀天恸地的哭泣声。

这是周恩来生前最后一次参加悼念活动。周恩来严肃地站在贺龙的骨灰盒面前顽强地支撑着本已难以站立的身躯，连续向贺龙鞠了七个躬。

接着，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为贺龙致悼词。周恩来用颤抖的双手拿着悼词，用颤抖的声音一字一顿地念着：

“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做出重大贡献。”

“贺龙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听着这深情的话语，薛明抬起泪眼，望着贺龙的遗像，在心底里默默他说：贺老总，总理了解你。人民爱戴你。党信任你。你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你们的遗愿将会变成灿烂光辉的现实。

## “谁要拦截陈毅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周恩来与陈毅

陈毅（1901—1972），字仲弘。四川省乐至县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南昌起义部队任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参加领导湘南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军委书记、军政治部主任，红六军、红三军政治委员，红二十二军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西方面军总指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领导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新四军代军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陈毅与周恩来相识在留法勤工俭学反对北洋政府卖国的斗争中。陈毅率直坦荡，具有诗人气质；周恩来沉着稳重，一派大家风范。这种性格上的差异，并没有妨碍他们成为知心战友。对于陈毅的巨大功绩，周恩来给予高度赞扬；对于陈毅工作中的失误，周恩来也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评，表现出共产党人间友谊的真诚。

## 一、陈毅被困法军军营，周恩来竭力奔走营救

1919年10月，陈毅勤工俭学抵达法国。周恩来1920年12月来到法国。俩人略有不同的是陈毅到法国后一直在巴黎施乃德工厂做工，勤工俭学；而周恩来则得到南开学校“校董”严修的资助并依靠为天津《益世报》撰写旅欧通讯的稿费来维持生活和求学费用的。

1921年6月，北洋政府派遣专使朱启铃，财政次长吴鼎昌来到巴黎，名义上是代表当时的总统徐世昌来接受名誉博士学位的典礼，实际上是进行秘密借款谈判的，北洋政府已决定以滇渝铁路和两粤铁路的建筑权作为交换条件，以全国50年有印花税、验契税作为抵押，向法国政府商借3亿法郎的巨款。

当陈毅从一位法国工程师那里得悉这一消息后，极为气愤，立即赶去告诉了蔡和森和向警予，又广泛动员同学们分别奔走相告在巴黎的中国各界人士和华工会。

与此同时，周恩来也听到了这一消息，他愤慨地写道：“是一分赃之借款也，而担保品之重，又关系全国命脉。呜呼国人，尚在睡梦中那？”他连忙告知赵世炎等与各地同学、华工联系。

经过陈毅、周恩来的宣传，秘密借款之事很快在巴黎的华人和勤工俭学学生中风传开来。

6月30日，周恩来，陈毅等三百多人在巴黎哲人厅举行拒款大会，会上宣读了各地华人团体来函来电一百多封，把拒款斗争的大旗打了出来，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秘密借款的斗争掀起了高潮。就在这次拒款大会上，周恩来与陈毅相识了，虽然他们未做更多的交谈，但共同的理想和抱负，对北洋政府卖国行为的共同痛恨，将两位年轻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此，开始了他们半个多世纪的战斗友谊。

随后，他们都以笔为武器，继续进行着战斗。周恩来以《旅法华人反对借款运动》为题，向国内作了长篇报道。陈毅也写了多篇文章，揭露秘密借款的真相和危害，在巴黎和国内都引起了很大反响。

然而，借款心切的北洋政府并未就此罢休。待风声稍息之后，吴鼎昌又从英国潜到巴黎，于7月25日和法国政府草签了借款协定，而且将借款数目从3亿法郎增加到5亿法郎。

消息一经传出，周恩来当即起草了一份拒款通告，大声疾呼：“此项借款，确与中国存亡有关，应知借款成功之日，即国内战祸再起之时，陷吾在水深火热之中者，此借款也。”“事急矣，时迫矣！我胞其速醒、其速起，分途并进”，只要“一息尚存，决不愿

亲见此次卖国借款有成功之日。”陈毅则专门跑到巴黎南郊的华工队向华工们进行宣传和鼓动。很快，一场声势更为浩大的拒款斗争掀了起来。

8月13日下午2时，旅法华人各团体在巴黎哲人厅召开第二次拒款大会。大会由周恩来、陈毅、赵世炎、蔡和森等人主持。

哲人厅的斗争给中、法两国政府以很大的冲击，在法国和国内各界的反对声中，中、法两国政府只好停止了这笔交易。拒款斗争胜利了。

通过反对秘密借款的斗争，周恩来、陈毅、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等成为勤工俭学学生中公认的领导人物。作为广大勤工俭学学生的核心力量，他们团结一致，又共同领导了一场争回里昂中法大学的运动，把留法勤工俭

学学生的斗争推向高潮。

里昂中法大学是华法教育会创办的，校长是吴稚晖。长期以来，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一直要求进入该校学习。而校方却以“勤工俭学学生程度太低”为借口，不愿意接受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入校。于是，周恩来、陈毅等人又携手领导了一场以争回里昂中法大学为目标的争生存、争求学的运动。在得知吴稚晖带领从国内新招的学生，将于9月24日抵达里昂，进驻学校的消息后，周恩来、陈毅等人经过认真商议，决定在国内学生抵达法国前赶到里昂，先把校舍占领起来。并决定由陈毅、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等一百多人组成“先发队”先赴里昂。周恩来等五名学生代表留在巴黎，负责同各方面的联系策应。

说干就干，9月20日晚，陈毅率三十多名同学乘火车离开巴黎向里昂进发。随后，各地学生陆续赶来，一百多名勤工俭学学生在吴稚晖等人之前进入了里昂中法大学的院子。但校方十分狡猾，所有的教室、宿舍都已上锁，无法进入。第二天，法国政府出动大队武装警察，把陈毅和一百多名勤工俭学学生包围起来，强行将他们一个个挟上大卡车，押送到一座兵营内关押起来，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一直关心陈毅等“先发队”情况的周恩来，得悉此情后急忙赶到里昂，和徐特立、王若飞等人一起多方奔走，营救陈毅他们，由于法国政府本来就对反对借款学生怀恨在心，这次正好抓住机会，所以周恩来等人的营救未获任何结果。周恩来又多次提出与同学们见面，却进不去军营。10月13日，里昂政府派出二百多名武装军警，将陈毅等104人押送到马赛。以所谓宣扬、煽动“赤化”的“布尔什维克罪”将他们驱逐出境，强令他们登船回国。

## 二、“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

法国一别，数载不见，等到1927年周恩来与陈毅再次相聚时，俩人都已是坚定的革命者了。

1927年5月，被派往川军中工作的陈毅来到武汉，向党中央汇报顺庆、泸州起义失败情况和请示新的任务。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认真听取了陈毅的汇报，然后对他说：

“蒋介石在上海制造了‘四一二’惨案，中国革命正处在胜败存亡的紧急关头，我们需要集中力量，以准备可能发生的紧急事变。我想派你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即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做政治工作。那是我们党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共同领导的，担负着为革命战争培养军政干部的任务。你到那里加强党的领导，为我们党组织新军准备骨干力量。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

望着周恩来期待的目光，陈毅感到了肩上担子的分量，他坚决果断地回答：

“请中央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当时的武汉分校，也处于动荡和分化之中，一些反动军官和学生、动摇投机分子，纷纷逃向南昌、广州、上海。陈毅到校后，马上展开工作，和政治总教官恽代英、政治部主任施存统、工兵大队长徐向前、炮兵大队长郭化若等中共党员组成校党委，并担任党委书记。随即，切实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党的政治工作，使动荡的局面初步稳定了下来。

7月中旬，在武汉的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形势紧急，陈毅冒雨到所属各支部通知积极应变。不久，武汉分校被改编为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调赴广州。中共中央密令教导团乘机赶赴南昌参加起义。但因通知迟到，来不及准备，船到九江后，教导团即被张发奎下令缴械。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陈毅沉着冷静地做出部署：已经暴露身份的同志，迅速离开教导团，追赶南昌起义的部队；能隐蔽的党员一律留下来，将教导团带到广州去。在妥善安排好教导团之后，陈毅不畏艰险，经过两天两夜的颠簸，于8月6日赶到南昌。此时，起义部队已无踪影，张发奎的部队已进了城，好不容易才打听到起义军已去抚州方向。陈毅不顾疲劳，立即决意追赶。

沿途绝少行人，常有反动团练和地痞流氓拦路盘查。途中遇到几个从蔡廷锴部队逃出来的军官，他们说蔡廷锴师本来参加了起义，但在南撤途中脱离了起义军，现在也在“礼送”共产党员。陈毅表示了誓必追上起义军的决心，坚定地向前赶路，终于在抚州城里见到了紧张忙碌而秩序井然的起义军，找到了周恩来。

此时，起义军后有朱培德的追兵，抚州附近是军阀杨如轩的部队。赣东一支绿林武装派人来接头，愿意接受叶、贺军的委任和指挥，条件是给他们一部分枪支。周恩来、刘伯承就要陈毅去联系，到这支绿林部队去做改造工作。但当陈毅带人按预定办法和对方的司令联系时，起义军已经开走，追兵已进了抚州。绿林部队联系代表避而下见。陈毅出城时被哨兵抓住，幸亏说动了哨兵，才得以脱险。

8月10日，陈毅在宜黄再次追上起义军，此时，各军师领导人都个缺编，周恩来与刘伯承等人商量后，决定分配陈毅任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的团指导

员。周恩来有点儿抱歉他说：

“ 派你做的工作大小了。你不要嫌小！ ”

这一职务虽与陈毅的身份不大相称，但他已十分高兴，真诚他说：

“ 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

“ 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说出了陈毅对于中国革命要靠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觉悟。这是他亲历四川保路运动的屠杀、里昂护校斗争被武装押送回国、北京惨案、万县惨案、九江被迫放下武器，并结合当时整个中国革命的现状，所得到的宝贵认识，说明了陈毅此时的思想认识已发生了质的飞跃，这从他坚定不移地追赶周恩来所率领的起义队伍也能看出。

使陈毅特别高兴的是：他要去领导的团正是由叶挺独立团的主力改编而成的“ 铁军铁团 ”。他早就听说，这支部队在北伐中是最出色的先锋，战无不胜。这支部队又是党最早创建并由周恩来亲手组织的武装，训练严格，战斗力强。现有二千多人，是起义军一个坚强的主力团！

### 三、周恩来：解铃还需系铃人，还要由你把毛泽东请回来

陈毅说到做到，没有辜负党的委托和周恩来的希望。1927年9月底，当起义部队在广东三河坝受挫后，成建制的武装只剩下二千多人，被迫向赣南山区撤退。敌人追击，长途跋涉，伤病增加，给养断绝，在日益险恶的处境中，有人逃跑，有人叛变，更有整班、整排、整营地脱离部队。当部队到达信丰县时，只剩下八百多人了，在师、团政治干部中，只剩下陈毅一个人。在他和朱德坚强有力的领导下，这支南昌起义留下来的队伍，经过湘南暴动，而后冲破重重艰难险阻，终于在1928年4月，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了。

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队伍和湘南农军与毛泽东领导的队伍会合后，组成了红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党的“六大”后，已经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并在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主要工作的周恩来，对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率领的红四军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929年6月，红四军党的“七大”上，由于领导内部在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上存在着的分歧未能很好地解决，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留在闽西养病并指导地方工作。陈毅出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红四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8月下旬，根据党中央指示，陈毅代表红四军来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在当时白色恐怖之下，上海党中央机关处于十分秘密的情况下，陈毅不断变动着住所，等着中央来人接头。

正在陈毅焦急地渴望尽快与中央领导人会面的时候，一天，在他所住的五马路新蜀旅馆里，一位蓄着胡须、戴着墨镜、身着长衫，一身商人打扮的人悄然而至。当这位商人模样的人摘下墨镜时，陈毅激动得差点跳了起来，周恩来出现在他面前。

几天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专门听取陈毅的汇报，并决定由周恩来、陈毅、李立三组成一个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周恩来对红四军党的“七人”和处置领导分歧问题的缺点提出了批评，并明确提出：朱、毛俩人仍留前委工作，毛仍应任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四军全体同志了解并接受。

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和周恩来的帮助，陈毅认识到了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正确，按照周恩来的谈话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一封指示信，这就是著名的《中央九月来信》。信中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提出了一个对中国革命运动有重大意义的论断：“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信中还对红军的任务做了明确的规定，强调要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等问题。这一指示信，经周恩来审定后，交陈毅带回红四军。

陈毅就要回红四军了，临行前，周恩来语重心长他说：

“解铃还需系铃人，你的关键一票（据陈毅自己讲，在选举前委书记、对毛泽东的赞成票和反对票相等时，他投了反对票）使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落选，中央要求你再去把他请回红四军。”

接着，周恩来问他：

“对此你不会介意吧？”

此时的陈毅思想已通，按他自己的话说是一通百通，他坚定地表示：

“请中央放心，我一定把毛泽东请回红四军。”

周恩来还特别叮嘱：

“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做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

10月20日，陈毅带着《中央九月来信》回到红四军前委。随即又赶往苏家坡毛泽东住处，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诚恳地请毛泽东回红四军主持工作。毛泽东为党中央的信任和陈毅的坦诚所感动，很快就与陈毅一起回到上杭县红四军军部。

12月底，在陈毅等人的积极协助下，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的“九大”，即著名的“古田会议”，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陈毅等为委员的新的前委。红四军不仅胜利地渡过了危机，并且进一步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成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成为人民军队建设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中央九月来信》最具历史意义的精神，是仍由毛泽东任前委书记，这是由周恩来决定、陈毅起草并负责传达的，这可以说是他们二人对中国革命共同做出的一个巨大贡献。

#### 四、病层里，回荡起周、陈高亢的《马赛曲》

1934年10月9日，躺在瑞金城西国家医院病床上的陈毅，烦躁不安，忧心忡忡。自8月28日在兴国前线老营盘战斗中身负重伤，右胯骨造成粉碎性骨折住进医院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休养，虽然烧退了，但大腿仍红肿疼痛，不能伸直，不能下床。特别令陈毅心焦的是，近来的种种迹象表明，主力部队要有大的行动……

陈正人、周以栗来医院看他，告诉他说：中央机关几天前就在清理文件，准备干粮、草鞋；兵工厂、印刷厂、被服厂把机器都拆散了，打成了驮子。仨人一致感到，主力红军和中央机关要突围转移了。当陈正人和周以栗得知陈毅的伤仍不见好，而且由于医院没有电源无法拍调光片做手术时，建议他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写信，反映情况。但陈毅不愿意为自己的事给周恩来添麻烦。他明白，现在大敌当前，周恩来肩上的担子很重。

当天，护士没有来换药，医生也没有来查房。急促的脚步声、敲打声不时从病房外传来。警卫员告诉他，医院各科室的医疗器械、药品都装箱了。看样子，一两天就要行动了。

陈毅再也躺不住了，他要了解中央的动向，知道对他的安排，希望能做好手术随中央和主力红军一同行动。他急忙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叫警卫员立即送去，警卫员出去后不久，又跑了回来，高兴他说：

“周副主席和贺部长来了。”

8月24日，周恩来和陈毅一同赴兴国前线指挥作战，28日，陈毅负伤住进医院后，俩人一个多月没见面了。老战友的伤治疗得如何，时刻挂在周恩来的心上，只是因为太忙，一直抽不出身来。现在，他和红军总卫生部部长贺诚一起看望陈毅，同时还要传达中央关于陈毅留下来工作的决定。

周恩来健步走进陈毅的病房。陈毅忙欠起身迎接。

“不，不要起来！”周恩来忙趋前一步，扶陈毅躺好，揭开盖着伤腿的被单，不禁大吃一惊：大腿红肿灼热，敷药的纱布被血水渗透染红，周恩来转身问医生：

“伤口怎么还没有好？”

得知原因后，周恩来立即给军委无线电台打电话，要他们马上把备用的汽油发电机送到医院来，并指示贺诚亲自组织医护人员做好拍片开刀的准备工作。

在布置好这一切之后，周恩来不安的心稍稍平静了一些。但他还负有代表中央政治局传达决定的使命，这使他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望着病床上的陈毅，要宣布这样一个决定实在令他难以启齿。但他看到的是陈毅期待、信任和坚定的目光，此时此刻周恩来脑海里浮现出陈毅一次次临危受命的情形，深深感到对这样一位坚强无私的革命战友再遮掩下去是不公平的。他告诉陈毅：“明天下午机关和主力红军就要出发了，方向是去湘西与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建立新的根据地。为了中央苏区今后的斗争，鉴于你的腿伤，中央决定你和项英留下来，坚持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主力红军走后，中央根据地设立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项英任分局书记，你任办事处主任，统一领导苏区300万人民和3万红军坚持斗争。”

周恩来几乎是一口气讲完了这一决定，当他观察陈毅的反应时，只见陈

毅的脸上充满了刚毅和自信，并且爽朗他说：

“中央决定我留下是对的。我了解这块红土地，熟悉这里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这对坚持游击战争极为有利。另外，这块土地也了解我，我跟着毛泽东、朱德同志在这里与人民一起奋斗了六个春秋。我留下来，有利于稳定民心，使民众感到红军没有走，革命有希望！”

陈毅这充满激情的话语，充分表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以革命利益为重的崇高品格。周恩来紧紧握着陈毅的手，眼里充满了激动的泪花。

这时，贺诚带着担架进来说，汽油发电机运来了，X光机重新装好了，开刀手术的准备工作也做好，请陈毅同志就去拍片、做手术。

周恩来与陈毅互相凝视对方良久，还是陈毅先打破了这沉默，说：

“我这一开刀，也许明天就不能给你们送行了，让我现在唱首歌，提前给你们壮行吧？”

“我祖国之骄子，赶赴戎行！

今日何日，日月重光！

随着陈毅那激越昂扬的歌声，周恩来也放声唱了起来。医护人员虽然听不懂他们用法语唱的《马赛曲》，但都被这真挚的战友之情所感动，被这悲壮昂扬的歌声所激奋。

第二天，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一起率领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踏上了战略转移漫漫征程。陈毅留下来和项英等人领导了艰苦卓绝的三年南方游击战争。

## 五、共访亚非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就任政务院总理，陈毅被任命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市市长。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9月29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陈毅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此后，陈毅一直和周恩来工作在一起，协助周恩来主持处理国务院的日常公务、特别是外交工作。从此，两位亲密战友为人民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建设并肩战斗、日夜筹划。

陈毅担任副总理不久，就随周恩来总理出席了第一次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周恩来是中国代表团团长和首席代表，陈毅是团员、代表，是总理最重要的副手。这次会议是由南亚五国总理发起，在中国积极推动、支持下召开的。与会29个亚非国家，代表着14.4亿人民，第一次在没有西方大国参与操纵的情况下召开国际会议，显示了空前的力量，也引起了帝国主义者及各国反动分子的惊慌和忌恨。参加这次会议使陈毅领略了外交斗争的复杂性和周恩来那高超的外交斗争艺术。

1955年4月7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领中国代表团启程离京抵达昆明。而先期启程的中国部分工作人员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在从香港飞往万隆途中爆炸坠海，八名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及新闻记者、三名外国人员及部分印度机组人员遇难！——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事后查明是美蒋特务机关收买香港机场一职工，在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所致。人们在愤慨的同时又不能不担心：周恩来、陈毅是否还能按期到会？

公安部长罗瑞卿再三劝周、陈缓行，毛泽东主席在杭州也为代表团的安全极为焦虑不安，然而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几经商议，仍决定按原计划如期出发。4月16日，专机经停仰光，次日终于安全飞抵万隆。这一行动不仅表现了中国领导人个人的无畏，更显示了中国人民对于亚非团结反帝事业的重视。

大会发言一开始，就有人对中国发出阵阵指责非难，有人端出了“共产主义就是新殖民主义”的论点……言辞偏激刺耳，会场充满火药味。19日上午，某国代表在发言中甚至表示怀疑中国在边境成立民族自治州是为了向邻国搞“渗入”、“颠覆”。

会场气氛极度紧张，简直像一桶火药，一触即爆。

下午紧接着要发言的周恩来将做何说？中国若不反驳岂不当众示弱，若据理力争又会一发而不可收拾。面对会议将要产生分裂甚至走上歧路的危险，周恩来与陈毅决定将原来准备的发言稿改用书面散发，在中午短暂的休会时间内，俩人经过深入研究，决定坚持并更加明确地表述求同存异的方针，而后再起草了一个补充发言稿。

下午开会时，只见周恩来与旁边的陈毅交谈了几句，站起身来，走上讲坛，以诚恳、大度的姿态发言说：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本来，对于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请求会方加以讨论……中国在联合国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也可以在这里提出批评。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存异。”……

发言一完，会沸腾了，各国代表纷纷拥上前来向中国总理表示祝贺、钦

佩、感谢，完全扭转了会议的紧张局面。顾全大局的克制，要求团结的诚意，求周存异的耐性，再加上恰如其分的揭露和反击，这一切为会议排除障碍获得成功打开了道路。也使周恩来受到各国代表的普遍景仰和尊重。周恩来的这一外交艺术，使陈毅大为佩服，自觉获益匪浅，他向人说：

“这是马列主义外交的典范，是最值得我们代表团学习的一点。”

会议上，陈毅爱动感情的性格确实受到了磨炼。在代表团中，他以“学习”和“练习生”自喻，处处突出总理的作用，而实际上他是周恩来不可缺少的副手，尤其在会场内外与各国代表积极

接触，广交朋友这一点上，做了出色的贡献。他和印尼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多次交流经验，向缅甸工业部长介绍中国自力更生建设工业的计划。尽管意识形态各异，但共同的愿望和目标使彼此了解和接近了。菲律宾代表罗慕洛称赞中国代表团的态度和周恩来的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巴基斯坦阿里总理说：“我是带着成见来的，但想不到周恩来总理这样尊重别人的意见。现在成见消除了。只有伟大的中国才能派出这样伟大的代表团！”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会议终于达成了团结反帝的决议和闻名于世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它是在由周恩来与陈毅共同商定，由周恩来提出，并与印、缅总理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扩充发展而成的。经过周恩来、陈毅的共同努力，促进了与会代表的团结，使万隆会议第一次显示了亚非人民争取解放团结的巨大力量，敲响了为自由独立而战的战鼓。

1960年，周恩来和陈毅一起访问柬埔寨，但行前突闻其国王逝世，举国行丧，主人担心形不成欢迎中国贵宾的热烈气氛，周恩来、陈毅商讨后决定按期前往，并为代表团全体成员在国内赶制了黑、白两色服装，供访问期间参加国王吊唁用。柬埔寨朋友们为此深受感动。五天访问期间，正遇柬埔寨40年来最酷热的天气，陈毅顶着烈日在金边“王家田”广场向青年群众演讲，高度评价西哈努克亲王的“中立爱国主义政策”。讲话一次又一次为欢呼声所打断。巴黎《战斗报》评论：“北京头号外交家在仰光、加德满部和金边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周恩来被西哈努克接到王宫中去住。西哈努克安排周恩来参观了柬埔寨的医院和电台，并亲自担任解说。

晚上看过演出后，一同出访的陈毅对周恩来说：

“总理呀，咱们明天可得分开活动了。我去吴哥窟，纯是游玩。你和西哈努克亲王参观白马，可是重头。”

周恩来出自访问，对参观游览性质的活动从不提个人要求，都是客随主便。所以，在柬埔寨活动都是由西哈努克亲王安排的。

第二天，等陈毅走后，西哈努克亲王才来请周恩来动身。

西哈努克带周恩来来到机场。机场上停着两架螺旋桨式的小飞机。

西哈努克亲王兴致勃勃，陪着周恩来上了第一架飞机。这飞机是西哈努克亲王本人的，里面装饰得很漂亮，但机舱很小，装不了几个人。西哈努克亲王带了一个警卫，周恩来只带了一个法文翻译。其他随行人员只好坐第二架飞机。

大家原以为西哈努克亲王要带周恩来去参观白马，因为这是事先商量好的。谁知，西哈努克亲王突然说：

“今天我要亲自给周总理开飞机。”

周恩来的随行人员见状都大吃一惊，谁也没听说过西哈努克亲工会开飞机，而且飞机上还载着我们的总理，万一有个闪失……这后果可真是不堪设想了。

随行人员这时才想到，要是陈毅在就好了。他点子多，一定会巧妙地阻止西哈努克亲王这突发奇想的冒失举动。可陈毅也被西哈努克亲王打发走了。在这种场合，随行人员都没有说话的份，一个个束手无策，只能眼巴巴地看周恩来自己的态度了。

周恩来就像没看到随行人员那祈望、焦虑的样子，他微笑着朝西哈努克亲王点点头。

取得了周恩来的首肯，西哈努克亲王得意地坐上了驾驶位，又说了一句惊人之语：

“总理，今天我们不去白马了。咱们今天去××岛，到那里视察一下。”

说完，他眼睛紧盯着周恩来的脸。

这个岛在南越的边上，本来是属于柬埔寨的。但南越当局在美国支持下搞霸权，非说这个岛应该归南越，经常派武装部队去骚扰。岛上本来就时常发生武装冲突，还出没着一股土匪，更增加了危险性。西哈努克亲王今天就是要亲自驾着飞机带周恩来去闯这个小岛。

西哈努克亲王有他的用意。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给南越看：我有中国朋友！现在中国的总理跟我一道来视察这个岛，就说明中国承认并支持柬埔寨对这个岛的主权。

岛子本来就是柬埔寨的，国际主义义务完全压倒了安全方面的考虑，周恩来同意去。飞机起飞了。

尽管距离很近，飞行时间也不长，却让秘书担足了心。一路上，听到人说话，心里都要咯噔一下。他不住地嘀咕，以一国总理之尊，冒这样大的险值得吗？

好容易，飞机着陆了，秘书赶紧出舱，看到周恩来乘坐的那架飞机，才长吁了一口气。

从吴哥窟游览回来的陈毅一到宾馆就去看周恩来，当从秘书那里听说了这件事后，也不禁大吃一惊：今天这样，明天说不定还会再冒什么险呢。他立即找到周恩来大声说：

“不行，我得去找西哈努克亲王说说，这还了得，这么大的事

周恩来断然做了一个手势，打断他：

“国王、元首给你开飞机，你能说什么？你再高有人家元首高？”

陈毅不以为然：

“可也得打个招呼哟。”

周恩来平静他说：

“人家国王也去了嘛，我们要支持，那岛子本来就是人家的么。”

陈毅感慨他说：

“西哈努克亲工真是够勇敢够敢闯，又开飞机，又拉了中国总理会岛子上向南越示威。”

听了陈毅这没有顾忌的话，周恩来笑了，他接着说：

“人家元首开飞机，我能拒绝吗？越是小国家，我们越是要尊重，决不能损伤小国的自尊心。我们坚持的就是这么一个原则：大国小国一个样，”穷国富国一个样。生活中人与人交往也不能嫌贫爱富啊，何况是国家之间。”

说完，他和陈毅就转了话题，显然，他并没把这件事看得多重。

陈毅不由得大发感慨：

“总理啊，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心中惟有国家利益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就是没有自己。”

1963年12月，周恩来和陈毅开始了访问亚、非的万里行程。

被人称为“黑暗大陆”的非洲，陈毅还从未去过，只在年轻时去法国勤工俭学的路上，沿这块大陆东北的边缘进行过航行，但殖民主义者用种种残忍手段将黑奴像牲畜一样捆绑着卖到美洲去的悲惨故事，曾在他心头留下的痛的烙印。二次大战结束，特别是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非洲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仅1960年一年，就有17个国家取得了独立。英国不得不交还了苏伊士运河，法国殖民军不得不退出了阿尔及利亚，非洲大陆政治局面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作为一个已经获得解放的国家，作为非洲独立运动的坚决支持者，在这种情况下首次派自己的领导人对非洲进行大规模正式友好访问，影响之大，不难想12月5日，陈毅先周恩来总理一步，离开北京，应邀去肯尼亚参加独立庆典。9日，陈毅乘坐的包机穿云破雾，抵达肯尼亚首都内罗毕。

当天，陈毅就拜会了反帝武装斗争“茅茅运动”的著名领导人之一，现任总理乔莫·肯雅塔，对肯尼亚人民长期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表示由衷的钦佩；对肯尼亚获得独立，表示热烈的祝贺。

12日零时，在内罗毕市郊的“乌呼鲁”（意为“自由”）体育广场上，陈毅与来自七十多个国家的宾客，包括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爱丁堡公爵及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同25万狂欢的人群一起，观看了升旗仪式。时钟敲响12下之后，在这片国土上挂了68年之久的英国国旗黯然降落，继而灯火齐明，黑、红、绿三色的肯尼亚新国旗迎着明媚的阳光冉冉升起。欢呼声。礼炮声在空中回响，人们欢歌狂舞，通宵达旦。天亮后，隆重的庆典仪式开始，肯雅塔总理庄严宣布肯尼亚独立。

陈毅参加肯尼亚独立庆典完毕，顾不上休息，就于12月14日晨，乘专机从内罗毕起飞，抵达开罗，迎接周恩来，然后一同进行访问。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是周恩来一行访非第一站。1956年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的斗争，曾得到中国人民的坚决支持。因此，中国客人抵达那天，尼罗河上轮船齐声鸣笛致意，船员们拥上甲板挥手欢呼：“中国万岁！”

参观了埃及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历史馆后，陈毅强烈联想起中国革命历史，他用三句话表达了自己的感想：“中国和埃及都是世界文明古国，都长期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侵略，都经过英勇斗争取得了独立。”

在“阿联”，周恩来提出了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接着，他们又来到位于非洲大陆的阿尔及利亚民主共和国。阿尔及利亚人民经历了75年顽强斗争，于1962年赶走了法国殖民军。中国曾无条件地大力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武装斗争和临时革命政府。为铭记这种友谊，阿尔及尔市一条新修的主要大街被命名为“北京大道”，周恩来、陈毅和阿尔及利亚领导人在那块醒目的路名牌下合了影，并在通车典礼上致词。

在阿尔及利亚，周恩来又提出了中国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与在“阿联”提出的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一样，这都是事先和陈毅等人一起做了充分研究并经毛泽东和中央同意的。这两个“五项原则”，概括起来说就是：一、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

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二、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三、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四、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五、主张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主权应得到一切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略和干涉。

1963年12月，周恩来与陈毅访问了地处北非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美丽的摩洛哥王国，哈桑二世国王对于中国领导人的来访十分重视，举办了极为丰盛的宴会。宴毕，宾主边喝茶边闲谈，无拘无束，十分融洽。闲谈中，哈桑国王提出一个周、陈都意想不到的问题。他笑着说：

“当今世界像我们这样的国王、皇帝已为数不多了，不知以后会怎么样？”

周恩来和陈毅听了都笑起来，这叫一个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如何回答呢？但是，这难不倒两位处事经验十分丰富的中国领导人。周恩来反应极快，说：

“你们可以组织一个委员会，开个会商量商量嘛！”

这种场合，陈毅一向和周恩来配合得很好，接着说：

“亚洲有个西哈努克亲王，我们是好朋友，可邀他参加开会。”

周恩来又说：

“陛下可以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会长嘛！”

言罢，三个人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在阿尔巴尼亚度过1964年的新年之后，代表团本拟直飞西非对加纳等国访问，不料出发前发生了意外事件，1964年1月2日加纳发生了谋刺恩克鲁玛总统的案件，总统受了伤，卫士长被打死，刺客是一名被外国势力收买的卫士。加纳局势一下变得十分紧张，总统不得不搬入一所坚固城堡居住，并停止了一切外出活动。

面对这种情况，是否取消原定的访问？

当晚，陈毅来到周恩来住房中商议，最后决定还是去，他们找来代表团秘书长黄镇，要他明日先飞加纳，与中国驻加纳大使黄华一起去见恩克鲁玛总统。恩克鲁玛当时心情矛盾，既想要周恩来来，又担心自己不便出迎失礼，同时还顾虑中国总理安全。

然而，黄华、黄镇一见他便说：

“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对总统阁下的遇刺表示震惊和慰问。为了两国友谊，访问一定要照常进行，既然你们国内情况有困难，为了总统安全起见，请不必来机场接送，也不要到我们下榻的宾馆来，我们可以到总统的住处来会谈，国宴也可以在城堡里举行。”

恩克鲁玛及整个加纳政府成员，无不深受感动。一个大国领袖能这样细致地照顾对方困难。在最紧张的时刻来表示支持，惟独不提自己的安全，这是世界政治史上罕见的啊！

1月11日，中国代表团来到了加纳首都阿克拉，当晚便前往总统住地“克思里斯兴堡”拜望主人，并接连几天在城堡内进行会谈。这城堡是17世纪贩卖黑奴的丹麦商人所建，在那阴森的地牢里，石桩上用铁链拴过数以千计的黑奴，等待押解上船运往美洲。看到这一切，陈毅心潮难平，在会谈间隙提笔填词一首：《满江红·黄金海岸》。诗中写道：“惊世问残暴竟如斯，两洲血。”并祝愿：“独立非洲西北始，揭竿而起相踵接。看涤瑕荡垢土重

光，全无敌。”

在中国领导人下榻的阿克拉国家大厦，曾接待过西方许多国家首脑，但从未有过像中国总理、副总理与工作人员如此平等的事，以至吃饭分不清身份，上菜上错了。陈毅说：

“没有关系，我们在国内都是平等的，只是职务不同。”

临别前，代表团又举行一次特别的宴会，将宾馆服务人员都请来，中国总理和副总理亲自向他们敬酒。他们一个个感动得直流泪，举杯的手发颤，说：“不敢想像周总理、陈元帅这样身份的贵宾，竟向我们‘卑贱的人’敬酒。”有的说：“这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从几内亚来到马里，与凯塔总统主要是谈经济援助问题。周恩来在马里提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其基本精神是：平等互利，不看单方面恩赐；尊重受援国主权，绝不要求任何特权；尽量减少受援国经济负担；帮助受援国走上自力更生之路；力求投资少，见效快；提供中国最好的设备及物资；帮助受援国人员掌握技术；中国派出的专家不容许有特殊要求和享受。

陈毅全过程地参加了这八项原则的制定。

1月27日，在访非途中；中国与法国正式宣布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又是中国外交的一大胜利。早在1963年10月，陈毅就曾专程从外地赶回北京，与周恩来一起同前法国总理富尔商谈过建交问题，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法国的承认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这正当共产党中国总理周恩来和外交部长陈毅进行另一次显耀力量的访问。他们有理由对中国外交上的成就感到满意。”

访问埃塞俄比亚时，塞拉西皇帝迫于外来压力，把会谈地点安排在远离首都的阿斯马拉。周恩来、陈毅谅解主人的困难，欣然前往。埃塞俄比亚政府和人民都很友好，代表团车队经过，时常有花束抛来，一位男子为了把鲜花抛在代表团车上竟追车跑了半里路。此次访问后不很久，两国终于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中国代表团又来到了“非洲之角”索马里，这是非洲之行的最后一站。像以前在各国访问时一样，周恩来全力投入会谈、记者招待会等重大事项，而陈毅则尽力分担其他工作，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看望中国使馆工作人员，报告国内形势、国际动态、中央方针、出访成果等等。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在即将结束对非洲十国访问之前，陈毅在使馆做了整整六个小时的报告，详细总结了访问非洲的见闻。

1964年，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将西欧、日、加、澳新划为美苏之间第二中间地带，因而中国采取了积极态度发展同西欧国家的关系。在陈毅外长的客人中，还有英国前帝国总参谋长、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他退休后两次访问了中国，以了解西方人眼中这个“神秘、落后而又好斗”的国度。除了毛泽东、周恩来与之进行重要谈话之外，其余时间多是由陈毅陪同游览参观。

有一次宴会，陪客阵容令客人大感兴趣。他们之中有中国末代皇帝溥仪，有原中国的大资本家荣毅仁，尤其还有去年秋天获得特赦的前国民党将领。当周恩来依次介绍到杜幸明时，诙谐地笑道：

“他同陈毅作过战。”

蒙哥马利好奇地问：

“你们谁战胜了？”

周恩来指着陈毅：

“他获胜了。”

蒙转向杜聿明：

“那次战役中你有多少军队？”

杜聿明回答：

“100万。”

“拥有100万军队的统帅，是不应该被打败的。”

杜聿明幽默地回答：

“可是陈毅元帅有200万人，因为我手下的人最后都跑到他那边去了！”  
一时满座欢笑。

在中国所闻所见的一切，给蒙哥马利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回国后在《三大洲》一书中写道，“从长远来看，世界和平的关键在于中国。中国兴起成为一个大国是不可避免的……西方世界必须现在就同新中国和好，并且平等相待。”

## 六、“不是要向我检讨，要向毛主席、向党中央检讨！”

1965年6月19日，周恩来和陈毅率中国代表团离京飞往开罗，并准备由开罗飞赴阿尔及利亚，出席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二次亚非会议。不料，就在他们飞向开罗的途中，接到导航站转来的电讯，说阿尔及利亚发生了政变，前政府领导人本·贝拉被捕，由布迈丁领导的革命委员会掌握了首都局势。

这一突如其来事变，使第二次亚非会议能否如期召开成了问题。

陈毅与周恩来在开罗停留三天，反复研讨了阿尔及尔局势，并与“阿联”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紧急磋商。为了确保周恩来出席会议时的安全，陈毅于22日率代表团部分成员来到枪声未绝的阿尔及尔，实地了解情况。随行的保健医生带着外科手术缝合包和抢救药品以防万一，而陈毅早已将一切危险置之度外，投入了紧张的外交活动。

陈毅走后，周恩来即通过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情况，并建议改变原来的计划。本来这次周恩来并没有访问开罗的内容，由于发生了这一突然事变，周恩来建议此行改为访问开罗，并在访问期间观察亚非会议能否在阿尔及尔准时召开。经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研究，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周恩来留在了开罗。

与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到达阿尔及尔的同时，许多亚非国家的代表也到达了阿尔及尔。面对这样的政局，他们都十分焦急，纷纷来找陈毅，了解中国对是否继续召开这次会议的态度。

因为中国是大国，又一向主持正义，中国的态度举足轻重。

陈毅见到朋友们这么着急，热心劲就上来了。他连想都没多想，就掷地有声地放开了炮：

“这次亚非会议必须开，而且一定要开好！”

结果，由于各种原因，会议无法举行，代表们纷纷回国。本来，许多亚非国家对中国很尊重很信任。陈毅的许诺落空，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

周恩来回国后知道了这个情况，气得在屋子里不住地打转，不住地连声斥责：

“胡闹！简直胡闹！”

第二次亚非会议没开成，陈毅的表态落了空，他自知捅了娄子，一回北京就赶到西花厅，去向周恩来“负荆请罪”。

到门口，陈毅悄悄地问卫士：

“总理干什么呢？”

卫士跟陈老总很熟，对他既很尊重也很随便，就朝他挤挤眼，小声说：

“等你呢。生气了。”

此时已经后退不得，陈毅一横心，跨进西花厅，正正经经地报告：

“总理，我来了。”

平时，作为总理的助手进西花厅很随便，一般都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从来不报告，今天例外。

见到陈毅，周恩来扬起浓眉，两眼冒火：

“你无组织无纪律！”

这句话出口，好像还不足以表达愤怒的程度，周恩来背过身去，握住拳头，在桌子上砰砰地敲了三下，狠狠他说：

“这是不允许的！”

陈毅低下头，诚恳检讨：

“我负荆请罪，我这一炮没放好……”

周恩来却丝毫没被打动：

“就这一句就完了？”

他转过身来，逼视着陈毅：

“你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不请示不报告，你就敢在那里擅自放炮表态，都像你这样还了得？谁给你的权力？这是国际影响问题！”陈毅老老实实地又说了遍：

“我错了，我向总理检讨。”

周恩来激烈地纠正：

“不是向我检讨，要向毛主席、向党中央检讨！”也许是受到了陈毅那始终一致的诚恳态度的打动，也许是激愤已发泄了出来，周恩来的目光和语调都缓和了下来：“外交部不同于其他部门，一言一行都会带来国际影响，一言一行都要慎之又慎。重大问题要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请示，你在阿尔及尔就敢不汇报不请示擅自发表意见，革命大半辈子连这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

陈毅心服口服他说：

“我向毛主席、党中央做检讨。”

陈毅走后，一位秘书向周恩来提意见：

“总理，你是不是批老总批得太重了？”

周恩来看了看他，严肃他说：

“他们都是各路诸侯。在这里我不严厉批评他，回到他的诸侯国准还敢批评他？”

## 七、陈毅大叫“离婚”，周恩来借喻调解

周恩来和陈毅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和国的领导人，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信仰、追求，有着为党和国家的事业而忘我献身的精神，有着卓越超群的领导才干。同样，他们也都有着独特的富有魅力的人格和个性。周恩来具有民主、宽容、冷静和求实的个性，在处理问题上不定极端，待人温和、谦逊、平静、忍让。陈毅具有一种诗人气质，爽朗、率直、坦诚，个性意志较强。两个人性格上的差别，并未影响他们之间的真挚友谊。陈毅对年长自己三岁的周恩来十分尊重，视如兄长，对周恩来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由衷地钦佩，并努力虚心地学习，周恩来对陈毅也十分欣赏、爱护，从各方面给予陈毅许多关心。

1948年5月，中央决定军委后勤部长杨立三帮助整顿华野庞大的后方机构。在河南濮阳，杨立三与陈毅研究过精简方案后，准备出发去朝城，临行前，陈毅托他把缴获的交、直流电两用的收音机一架带去中央送给“恩来、小超”，并附一信说“此美国新出品、许昌战斗缴获品，你们有电灯，利用其开动起来十分好，两夫妇可以在屋内跳舞。”也就是在这信内，却写着：“明日即西去毫无企图留部队之意，并望将来能随军入川。”此信是陈毅5月29日亲笔，“临行清理”在华野的“行李”，铝合金桌椅给了朱德，收音机送与恩来，这轻装“西去”的调子颇有某种抒情意味。

新中国成立后，陈毅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为了及时当面请示工作方便，他不用国务院给他安排的宽敞的办公室，却搬到周恩来办公室隔壁的耳房办公。有的同志看这间房子太小了，建议他另搬到一间大些的房子，他说什么也不同意。

去迎接外宾的时候，特别是当毛泽东、周恩来出席的时候，陈毅总是提前赶到现场，做好一切安全准备工作。他对周围工作的同志说：

“你们大家是警卫员，我也是警卫员，我们大家共同保卫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安全。”

有时，周恩来与陈毅一起外出视察，陈毅总是对医护人员说，我这里没事，快去照顾总理。周恩来却说，我这里很好，你们去照顾陈毅同志吧。虽然随行的医护人员感到很为难，但深为周恩来和陈毅的战友深情所感动。

在出发去万隆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的十几天前，周恩来忽然得了阑尾炎。手术后拆线不久，他就动身出国了。有一天夜里，周恩来、陈毅俩人坐在住地院里谈话。夜深了，陈毅劝周恩来去休息。周恩来说自己的身体很好，然后指着陈毅向随团医生关心地问：

“他的血压高吗？”

同时还问到全团同志的健康情况。当医生告诉他全团同志都好时，周恩来高兴他说：

“希望你没事就好了。”

周恩来对陈毅刚烈而又潇洒、豪侠而又文雅的性格很喜欢。陈毅讲话常常感情激动、热血沸腾，有时难以控制自己，说一些出格话。有人反映说陈毅讲话像放炮。周恩来听后说。

“不要怕放炮么，放炮才能吸引人，震撼人。他比我讲得好，大气势，很符合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国威军威。”

那人又说陈毅有些话说走嘴，讲得不恰当，不够准确。周恩来就加重语

气说：

“句句准确，句句恰当，就不会有这样的大气势，也不会这么吸引人，震撼人了。要看整体效果。他讲得好，比我有气势，比我讲的效果好。”

有一次，中央首长在某地开会，吃饭时周恩来由于右手不方便，掉了几个饭粒，立即就夹起来吃掉。服务员见了感动得掉了泪。他们想到自己平时大手大脚的浪费行为，很惭愧，决心向周恩来学习。休息时，大家挖野菜，煮了一锅忆苦菜汤。周恩来知道后，高兴他说：

“好啊！让我们也尝尝嘛。”

大家都不愿让周恩来吃野菜，可是周恩来非要吃不可，只好端上一盆来。野菜一上桌，周恩来第一个上去盛了满满一碗。

陈毅怕周恩来吃多了，立即从他碗里拨走一半。周恩来认真他说：

“盆里还有，你怎么要我的？”

陈毅嘿嘿笑两声，说：

“我帮你吃一点嘛！”

周恩来说：“那还行！”说着，又盛了一勺，碗里的野菜又满了。饭后，他高兴他说：

“这顿饭吃得很好哇。”

工作人员看到总理、副总理争吃野菜、互相关心的情景，都为他们之间的互相关心所深深感动。

对陈毅和张茜俩人的家庭生活，周恩来也给予过如同老大哥一样的关心。陈毅心脏不好，张茜为此限制他吃肥肉，不准他多抽烟。为此，夫妻之间有时会出现一些小摩擦，周恩来常常给双方做工作，使他们言归于好。

一次，周恩来在北京饭店请陈毅、贺龙两位元帅和夫人吃狗

肉。几杯茅台酒后，陈毅妙语连珠，全然不顾张茜在一旁使眼色制止他再喝。当陈毅乘兴又端起一杯时，张茜用脚狠狠踩了陈毅

随着“哎哟”一声，陈毅向张茜抱怨着：

“你不要踩我的脚嘛！总理请我喝酒，我怎么能不开怀畅饮呢！”

一句话逗得满座皆欢，张茜也不好意思地笑了。还是周恩来劝阻住陈毅少喝一些。

又有一次，陈毅出国访问归来，与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宾馆联欢，吹拉弹唱，跳交谊舞。张茜因担心陈毅的身体，就劝他早些回来睡觉，以养足精神。陈毅也满口答应。但由于联欢晚会散场很晚，陈毅直到凌晨2点方归，张茜生气，一赌气就将陈毅关在了门外。陈毅连连敲门也不开，便真动了肝火，他让卫士找来秘书，见面就嚷道：

“离婚，离婚！”

周恩来知道后，便在第二天饭后，请陈毅夫妇、罗瑞卿夫妇一同散步。

这时，忽有一个风筝在头顶飘过，望着碧蓝的天空中悠悠飘荡的风筝，周恩来微笑着走到张茜身边，指着天空说：

“张茜，我给你提个建议，你管陈老总，也要像放风筝，线头在你手里，你要把线绳拉得不紧不松，如果线绷得太紧，‘嘣’，线绳断了，风筝就会飞了！”

一边的罗瑞卿夫妇不禁笑起来。

张茜呢，马上理解了总理的意思和一番好心，点头称是，心悦诚服。

周恩来非常喜爱陈毅的诗词。有一次，他对陈毅的几个孩子亲切他说：

“你们的父亲是元帅，又会写诗，是位大气魄的马上诗人，你们怎么样？”

接着就鼓励他们向父亲学习，为革命事业要能文能武。

1957年4月，报上发表了陈毅在领导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所写的《赣南游击词》、《赠同志》、《梅岭三章》等诗作，周恩来读后非常高兴，深为赞许。

1959年9月中旬，周恩来和陈毅陪同阿富汗贵宾一同泛舟密云水库，望着碧波荡漾的秋水，陈毅即兴赠诗：

“嘉宾莅止，泛舟同欢。和平友谊，举世所瞻。长城在望，绿水连天。密云密云，气象万千。润我京华，福利无边。”

这首四言诗，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创造力，歌颂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也歌颂了国际友谊。

周恩来饶有兴味地听着陈毅用川腔抑扬顿挫地朗诵出来，当场就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好诗好诗，有韵有味。李白斗酒诗百篇，陈老总是泛舟吟华章啊。”

1961年，陈毅陪同周恩来再次访问缅甸。在一次宴会上，周来到洛阳。参观完龙门石窟后，周恩来因有事回京，就利用专列开车前的一点时间接见洛阳市的负责同志。谈话结束时，人们请周恩来为正在兴建中的龙门伊河大桥命名题字。周恩来微笑着说：

“还是请陈老总写吧，他比我写得好。”

陈毅听罢，连忙摘下墨镜，爽朗地大笑：

“我怎敢‘班门弄斧’？总理的字，遒劲有力，别具一格，还是请总理写吧！”

两位领导人谦虚地互相推让时，专列的开车时间已经到了。周恩来歉意地商量说：

“要不这样吧，现在不写了。回京后，我们商量一下，写好后给你们寄来。行吗？”

洛阳市领导不便强求，只得以此作罢。然而，周恩来始终没有忘记洛阳人民的嘱托。1962年春天，题字寄来了，是陈毅的手迹，宣纸上写着斗大的“龙门”二字和“陈毅题”三个较小的字。这真是画龙点睛之笔，既为伊河桥命名，也有地方特色。题字被镌石四方，分别镶嵌在石拱桥东西两端和两侧。

在“文化大革命”横扫“四旧”时，陈毅的题字也难逃厄运。1973年10月14日，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又陪外宾来到洛阳，发现伊河桥上没有陈毅的题字，立即查询。听了有关人员的陈述，周恩来满面怒容：

“陈毅是好同志，他的题字要尽快地与洛阳人民见面。”

不久，陈毅的题字重新被郑重地镶嵌在飞架东西的伊河桥上。

## 八、“谁要拦截陈毅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恩来和陈毅都感到中国革命的航船已偏入危险的航道，但他们已无力加以纠正。但是，他们都坚守在自己的指挥岗位上，尽最大努力在可能的范围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

在运动高潮的1966年11月13日，陈毅与叶剑英、贺龙、徐向前在工人体育场接见八万多名军队院校学员，陈毅第一个走上讲台，说：

“我今天在这里讲话，我就不是我字当头，如果我字当头，最好不要来讲。我来讲，讲得不好，惹起麻烦，马上就要跑到外交部来揪你、找你，抓起来，要澄清问题，那怎么得了啊……今天，你们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我还是勇敢地来讲……”

接着，陈毅针对学生冲中南海、占领国防部的举动，提出严厉的批评，旗帜鲜明地反对逐步升级、无限上纲、口号越“左”越好的做法。

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批判“资反路线”以来，青年学生首次听到的系统的、严厉的、毫不拐弯抹角的批评。给狂热的青年学生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台下议论纷纷，掌声阵阵。这一讲话很快在全国传开了，广大干部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11月下旬，拥到北京“上访”的工人急剧增多，为说服来京串联的工人迅速返回本地抓革命促生产，周恩来决定召开一次工人大会，海报贴出，入场券发尽，大会讲稿却被陈伯达、江青否定了。已布置的工人大会无人讲话，临时请“救兵”，找陈毅去给工人讲讲国际形势。时间是11月30日晚上7时，地点是工人体育馆，陈毅深知周恩来的苦衷，同时他自己也想借机做工人的工作，欣然前往。

周恩来走上主席台与全场工人见了面，随即宣布由陈毅讲国际形势。

陈毅是天生的演说家，以简洁主动的语言，向听众展示了一张世界形势图，一张中国逐步登上世界舞台，逐渐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形势图。讲话不时引起全场工人振奋、自豪的欢笑声，抓住了听众之后，陈毅话锋一转，讲国民经济是外交的基础，号召工人们尽快回到原地狠狠抓革命，狠狠促生产。

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次日，造反派工人到外交部，要找陈毅当面责问。北京街头贴满了打倒陈毅的大字报。

虽说是元帅亲自挥戈上阵了，但是对方的力量更大，在复杂异常的形势下，斗争必须能伸能屈。

为了顾全大局，为了不影响1967年的工作，周恩来希望尽早结束国务院各部部长被围困批斗的局面，争取各部部长早些检查，早些过关，协助他抓好国计民生的大事。周恩来找来陈毅，讲明自己的考虑，希望陈毅带头检查。

在阴谋家们的指点、支持下，没过多久，首都北京便掀起了一股反击“十一月黑风”的浪潮，首当其冲的就是外交部部长陈毅。

周恩来立即站出来，挺身挡住一颗颗射向陈毅的“炮弹”，竭力保护患难与共的老战友。下面是周恩来两次同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组织代表谈话的部分内容。

第一次谈话的时间是1966年12月3日晚7时，地点在国务院会议厅。谈到北京外事系统院校运动不能开展，“左派”学生受压制时——

众学生：陈毅同志对此要负很大责任，他总是“和稀泥”。

周恩来：你们说他“和稀泥”，他是为了团结大家，是一肚子好心肠嘛！就是有时说话“走火”。我们相处几十年，这个老同志的确为党、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

学生：他说反毛主席不算反党，他就反过两次，毛主席上台后还团结他……

周恩来：说反对毛主席不算反革命，如果是指党内路线斗争，也可以这样讲，他没有把当时情况讲清楚。他是把这个问题孤立起来谈了。“走火”就在这个地方。

学生：11月13日他向军事院校学生讲话，好多学校转播，同学中对立情绪马上增加，停止了几个月的大辩论又开始了。

周恩来：有这么大作用？

学生：“多数派”同学揭发，陈毅骗了他们，见他们时支持“多数派”，见“少数派”时又另说一套……

周恩来：陈老总没有单独见过“多数派”。

学生：他说工作组检查两三次就行了，还说是毛主席说的……周恩来（点头），有这样的事，是讲李雪峰同志。李雪峰检查相当好，主席讲检查两三次就可以了。

学生：陈毅在外交部红卫兵解散大会上还讲“多数派”守纪律。道歉。

周恩来（肯定地）：我听陈毅同志这样说过。

这时，周恩来提高了声调：

我今天没时间多讲陈毅同志的问题。但我要告诉大家，他是我们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你们不能把他一时失言、“走火”，都弄成“黑话”。你们要考虑国际、国内影响。至于对陈毅同志问题的认识，你们不能强加于我。我和他相处几十年，一起管外交，经常一起向主席报告工作，我晓得这个同志，他不会说假话。

学生：他要我们别总揪住工作组不放，说明他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

周恩来：这样说他可能承认。我们也说过不理解嘛！

学生：他总强调个人经验。

周恩来：这是一番好意。可能地点、时间不合适，没讲清楚。当然，这也是这个同志的优点，没有隐瞒观点，脱口而出。他以为用现身说法可以帮助你们，而你们需要的又不是那样的话……

最后，周恩来严肃地告诫在场的学生代表：

不能以任何理由冲击外交部。如果你们要冲，我势必出面干预，最后你们还得走开。

10天之后，也就是12月13日晚至次日凌晨，周恩来连续5小时再次同北京外国语学院红卫兵代表谈话，在场学生仍抓住陈毅的“问题”不放，实际是逼周恩来在此问题上松口、表态。下面是双方谈话结束时的几段内容：

学生：我们认为，现在外事口问题的关键不在别的，而在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例如，工作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还有，陈毅到现在还没有做检查，仍然坚持他以前的观点。他给军事院校学生的两次讲话，保守派很欢迎。总之，外事口“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来自陈毅，因此必须彻底批判陈毅，否则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打不垮！

周恩来：今天我不准备同你们谈这件事，要谈以后谈。你们不能压我。你们送来一大

叠东西（即12月13日接见时外院学生代表要总理转交中央的有关陈毅“问题”的材料），我还没有看。总得先让我把材料弄清楚吧

学生：总理，你要理解我们的心情！

周恩来（生气地）：你讲，我一直在听，耐心地听嘛！但你不能总要我马上回答你的问题……你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你们把一切问题归结于一个人，这不是辩证地看问题。运动发展是波浪式的，不能老是“如火如荼”，天天出大事才痛快。我过去对你们说过，这样大的局面，我做梦也没敢想过；也许你们想到了，算你们有伟大的预见！事物发展常常超过我们的预计，包括各个行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是犯了错误，认识到了，就要马上承认、改正。我这是对你们讲的老实话。所以，在我理解你们情绪的同时，我们的情绪，也请你们理解。总之，我今天没想回答陈毅同志的问题，还发了这么大脾气，对不住了！

说罢，总理退场。

正当周恩来苦口婆心规劝学生、以身做盾保护陈毅之际，12月13日，江青来到中南海西门，向红卫兵发表讲话，宣称：“你们的造反精神非常好，你们是我们的革命战友，你们是我们的革命小将；革命小将要勇敢，要不怕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小撮人！”她还鼓动说，“你们不要怕，要有硬骨头”，“我们是心连心的，我们一块儿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

特别是对11月间陈毅等几位老师的讲话，江青曾在“中央文革”一次会上“定调”说：“军队这些接见，是镇压群众！”

在后台老板们教唆和怂恿下，北京造反派组织闻风而动，纷纷响应，包括军队中的造反派。

1967年1月初，军内造反派背着周恩来和中央军委，擅自决定于1月5日召开“揭发、控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大会“筹备处”指名要求陈毅、叶剑英二人到会“接受教育”。

周恩来得知消息后，即于大会召开的前一天亲自出面加以劝阻，指出：军队造反派把批判矛头指向陈毅、叶剑英两位军委副主席是“搞错了方向”。以陈、叶二人作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不符合实际的”。他还明确表示“不赞成”开这样的大会，也不准备参加这样的大会，“因为于全军不利，攻击的矛头错

就这样，在周恩来这棵参天大树的挺身保护下，持续了一个月之久的来自外交、军队等系统的批判陈毅、反击“十一月黑风”的势头才减弱下来。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1967年1月，上海“一月革命”的狂风骤然刮起，外事口的造反派犹如打了一针兴奋剂，从暂时的收敛又转向了活跃，他们再次寻机就批判陈毅问题逼周恩来让步，要求召开整个外事系统“批判以陈毅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万人大会，并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实际上，这是妄图夺取整个外交大权的前奏曲。

在造反派掀起的阵阵狂澜面前，周恩来镇定自若，稳如泰山。他坚持一贯的观点，毫不退让。对召开外事口万人批判大会的事，他指出，这要经中央同意，我即使到会讲话，也不是代表我个人，而是代表中央的。对“打倒陈毅”的口号，他说，我的看法和你们有距离，我坚持反对这个口号，不能接受这个口号，这样简单不行；必要时我可以和你们辩论一番，但我现在不和你们辩论。

几乎于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在“夺权”问题上产生冲突的同时，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发表了声明，宣布在外交部“夺权”。

对此，周恩来以其娴熟的斗争艺术，教了陈毅一招。1月18日，周恩来委托陈毅前往召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由于事先有周恩来的指点，陈毅一改过去直来直去的炮筒子性格，首先代表部党委表示“祝贺”，就外交部“夺权”问题“表态”。在“祝贺”之后，陈毅又明确指出：“联络站”所夺之权是“外交部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权”，外交部业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仍由部党委研究决定，但可由造反派的“业务监督小组”实行“监督”。这样，就使外交部造反派所夺的不过是“虚权”，整个外交业务大权仍然掌握在部党委手里。

一天，陈毅应召来到西花厅周恩来的办公室，但见周恩来双臂抱胸，位立在窗前，遥望远方，面色严峻，心情显然异常沉重。

陈毅一问坐在旁边的廖承志，方才明白了缘由。前些天，周恩来亲自起草了两篇工人要坚持业余闹革命的社论，陆续在报上发表后，进京串联的工人仍然有增无减。为了防止“文革”运动进一步影响工交生产，周恩来今天委托谷牧、余秋里召开了一次工交座谈会，打算制定一些坚持生产的措施。不料，会议刚开始从不过问地方工作的林彪，竟亲自出席听取汇报，并且当场彻底否定了草拟好的会议纪要。林彪叫嚷：工矿企业、工交系统的修正主义倾向比学校还要严重，必须造反、批判。这将意味着工交系统也要步学校的后尘，整个国民经济将无可避免地遭受到严重破坏！作为时刻关注着6亿人民的吃穿住用，关注着中国发展的总理，周恩来怎么能不担忧呢？！

“不搞生产吃什么？！”陈毅圆睁怒目，动起火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这点基本常识，难道堂堂的副统帅还不懂？！”周恩来回过身来，默默地注视着陈毅，出人意外他说道：“陈老总，你不要讲话了！”

陈毅好不奇怪。

“你写份检讨吧！”周恩来用商量的口吻说，但是很认真，“我想在国务院让你带个头，做个检讨，早日取得群众谅解，早点出来主持外事工作。我的事大多，不能没有几个帮手啊！”

陈毅一向十分敬重周恩来，他曾多次说过，无论从公从私，周总理都是我的兄长。也正因为如此，陈毅在周恩来面前，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从不违心服从。

“我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检讨？！大不了一把刀子……”陈毅的嗓门又粗又响。

廖承志一听着急了，他握着陈毅的手，急切他说：

“老总，我们定个君子协定，无论什么境遇，绝不自杀，好吗？”

陈毅知道年龄稍轻些的廖承志把话听拧了，我陈毅怎么会自杀！为了不让廖承志担心，他点了点头。

周恩来了解陈毅：他想不通的事，是不能勉强的。便拍拍陈毅的肩膀，说：

“国务院副总理、部长都不能出来工作，我们国家的工交生产要瘫痪了。要检讨过关啊，你回去再想想，想通了就来找我。”

怀仁堂里，例行的中央碰头会议开始了。周恩来宣布开会后，“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便操着一口难懂的福建腔，喋喋不休地啰嗦起来，一个一个地攻击政府各部门，攻击老干部。

突然，陈毅注意到叶剑英眼含泪光，怔怔地注视着什么，便循着他的眼光望去，顿时惊呆了：周恩来用手撑着前额，眼睑沉重地向下垂去，终于粘在下眼皮上闭拢了！……但这只是一瞬间的事，很快，周恩来便站起身，往杯子里添了点热水，喝了一口，又似乎精力充沛地听发言了。

陈毅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了，他从不反对打瞌睡，自己也爱打瞌睡。正是因为这个缘由，周恩来特地让陈毅出国访问时戴上了一副墨镜，以便当周恩来主持会谈时，使过分疲劳的陈毅能闭目养养神。可是，陈毅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十多年，看到周恩来打瞌睡这还是第一次！总理太累了！即使是铁找铜铸的人，也经不住每天 20 小时甚至 24 小时的紧张工作呀！

会散了，叶剑英坐进了陈毅的汽车，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才沉重地说：

“这种时候，总理可不能累垮啊！”

陈毅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陈毅的汽车没有回家，而是直驶中南海，一下车，他就快步走向周恩来的办公室，恳切地向刚下车的周恩来说：

“总理，我接受你的指示，从今天起不再讲话了。”

陈毅顿了顿，又说：

“我写检讨！”

陈毅此时已把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不再出席群众大会。对要求接见的造反派，他只说一句：“总理给我的指示，‘陈毅不要讲话’。”

为了保护周恩来这株参天大树，陈毅坐在家中认认真真地写检讨。

1月24日下午，周恩来亲赴人民大会堂出席有外事口各单位造反派参加的陈毅“检查”大会。大会以国务院的名义召集，由周恩来亲自主持。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以及陈伯达、江青等均出席大会。

会上，周恩来首先对陈毅“检查”的事一拖再拖承担了全部“责任”，理由是“我的工作很忙”。

接着，陈毅在大会上念“检查”。

会议结束前，周恩来发表讲话，指出：“陈毅同志的检讨是经过了一个痛苦的认识过程，我们在分工方面，他管的事情多，不能再加重陈毅同志的工作”：“他为党工作了四十多年，当然也犯

了不少错误，但晚年还是跟着毛主席走的同志，希望大家以同志式的态度、以阶级兄弟的态度来帮助他”：“这样，我才可以比较放心外事口的事，让他多出面，我把力量转到别的口上去”。为

了堵住造反派的口，周恩来强调：关于“文化大革命”前的外交工作，“一切外交重大问题，都是主席亲自过问的，这样 17 年来才有了外事方面的辉煌的业绩。”

点出外交工作是“主席亲自过问的”，就为造反派打倒陈毅设置了最大的路障。

整个大会，由于周恩来亲自掌握，精心布置，造反派无空子可钻，江青、陈伯达也只好在一旁静听，不便多插言，因而进行顺利，仅用了 1 小时 30 分钟便告结束。由此，陈毅闯过了万人大会“检查”这一关，成为国务院系统被“解放”的第一位副总理。

陈毅出来工作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于 2 月 6 日批送周恩来一份电报，在这份电报中明确指出：内外有别，驻外使领馆一律不准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周恩来立即呈送毛泽东。2 月 7 日，毛泽东

即签发了这份电报，即外事口的“二七”指示，从而稳住了驻外使领馆。

陈毅如果就此顺势下台阶，以后在一些场合只讲些不痛不痒“应景”话，他的外交部长的座位该是坐得比较稳当的。陈毅自己也明白：“只要我陈毅不吭气，住在中南海是不成问题的。”

然而，陈毅毕竟是陈毅！为了顾全大局和维护党的威信，为了他和周恩来共同开创的新中国外交事业，这位铁骨铮铮与各种邪恶势力拼搏了一生的元帅，决不愿低下自己高贵的头，他还要讲话，还要仗义执言！

这就更加惹怒了江青、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一伙人，他们对陈毅进一步大兴问罪之师。主子一动，奴才们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外事口的各路造反派们纷纷争先恐后，一起动作，把“炮火”集中到陈毅身上。对此，周恩来不顾自己被攻击、受责难的危险，再次挺身而出，坚决顶住外事口造反派揪斗陈毅的狂潮。

1967年5月11日晚至12日凌晨，周恩来连续与外事部门造反派代表谈话，严厉批评他们近来一系列极端行径。

两天之后，周恩来得悉外语学院的一些红卫兵为“揪”斗陈毅已强行冲入外交部，又于15日凌晨紧急约见外交部造反派及外事系统院校红卫兵代表，向他们发出警告：“你们这是犯了一个大错误，是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并立即宣布，“我要下命令让部队开去，以加强外交部的保卫！今后，谁也不许再去冲，不管哪一派，谁去我就扣留谁！”对仍在陈毅问题上无理纠缠的造反派，他严厉斥责：“你们以为想要‘打倒，陈毅，陈毅同志就倒了？滑稽！”

这一时期，陈毅虽因“二月逆流”问题奉命“请假检讨”，但在周恩来精心安排下，他仍时常出现在一些外交场合，或陪同周恩来赴机场迎送客人，或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单独接见外宾。

6月下旬，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在一次宴会席间，与外事系统凤马牛不相及的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组织负责人（即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赫赫有名的“五大领袖”之一）韩爱晶借敬酒机会对陈毅说：

“陈老总，我们喊要打倒你，不是真的要把你打倒，而是要把你‘打’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韩爱晶算是什么东西，陈毅压根儿就看不起他，对这种讨好中夹着挑衅的语言，陈毅听罢不由得怒火中烧，瞪起了双眼。正

卫兵置周恩来多次批评、警告于不顾，组成千人“揪陈大军”，拥至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声称：不把“三反分子”陈毅交出，决不收兵。外交部周围一连数周充满喧嚣之声，严重妨碍了正常的外事活动。

8月7日，因“武汉事件”受伤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拖着伤腿“召见”外交部“革命造反派联络站”代表，听取他们关于外交部运动情况的“汇报”。对陈毅“问题”一直耿耿于怀的造反派代表，凭着他们的“直觉”，感到同这位“中央文革”成员谈话十分投机，便将其想法和不满和盘托出：我们认为，陈毅是外事口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根据其“三反”言行，属于敌我矛盾；我们的口号是：“誓与陈毅血战到底！”有关对陈毅问题的看法，我们多次与总理谈过，但现在外交部运动阻力很大。要发作之时，猛见周恩来正用眼神暗示外交场合，注意影响。于是，陈毅迅速恢复了平静，未置一词，端起酒杯向别处走去，把这位不可一世的造反派头头尴尬地晾在了一边。

几天之后，周恩来对外交部造反派宣布：

“陈毅同志现在外事工作忙，不能下去（检查）了。你们坚持批判‘错误’，我也同意，但对陈毅同志的‘问题’，我早就说过，你们可以提你们的意见，我也可以来听你们的意见，但中央对此没有做结论，你们不能强加于我。即使批判‘错误’，也必须摆事实，讲道理，不能动不动就宣布‘打倒’。”

当造反派提出要对5月间的事做“检讨”时，周恩来把手一摆，轻松地一笑：

“我不听，我不计较这些。计较这些，我还做这个工作吗？年轻人，许可你们犯错误。”

7月25日，就在周恩来离京赴武汉之际，外事口一些院校红卫兵置周恩来多次批评、警告于不顾，组成千人“揪陈大军”，拥至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声称：不把“三反分子”陈毅交出，决不收兵。外交部周围一连数周充满喧嚣之声，严重妨碍了正常的外事活动。

8月7日，因“武汉事件”受伤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拖着伤腿“召见”外交部“革命造反派联络站”代表，听取他们关于外交部运动情况的“汇报”。对陈毅“问题”一直耿耿于怀的造反派代表，凭着他们的“直觉”，感到同这位“中央文革”成员谈话十分投机，便将其想法和不满和盘托出：我们认为，陈毅是外事口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根据其“三反”言行，属于敌我矛盾；我们的口号是：“誓与陈毅血战到底！”有关对陈毅问题的看法，我们多次与总理谈过，但现在外交部运动阻力很大。

因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被称为英雄的王力，此时已经头脑发热，忘乎所以，马上表态：

“陈毅应该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群众呼一呼口号有什么错误？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他犯了错误，又不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接受检查，就是可以揪……方法问题是次要的，不要把人家方法上的问题夸大上纲，说得那么严重！”

有了“中央文革”大员的支持，造反派们开始有恃无恐起来。接连召开“批陈”大会，百忙中的周恩来开始连续出席外事部门的“批陈”会议。他亲自到会，实际上是想以“陪斗”方式来保护自己的老战友，防止发生意外。由于外事口单位多，有时一周内要安排好几场“批判会”，周恩来实在抽不出身来，就委托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李富春代他出席会议，并派出自己的秘书和卫士长一同前往，以便随时了解。掌握情况。在此之前，周恩来还就会议的具体形式、方法等同造反派订下“约法三章”，即：“批判会”要以小会为主；会上不许喊“打倒”口号、挂“打倒”标语；不许有任何侮辱人格的举动，如搞变相武斗、揪人等……造反派当面都一一答应了。

然而，这些造反派并不把信用当回事，从第一次“批判会”开始，他们就出尔反尔，耍起了两面派手腕，导演了一出出撕毁协议的恶作剧：

8月7日下午1时，周恩来冒着盛夏酷暑，驱车赶到外交部小礼堂，准备出席在这里召开的小范围的“批判会”。他刚走到会场门口，便得到卫士长成元功的报告：会场内挂有一条“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已经踏上礼堂门前石阶的周恩来立刻止住脚步，当面质问会议主持人：

“昨天说得好好的，已经达成‘协议’了嘛，你们还这样干！”

说罢，他站在台阶上不动了，坚持要造反派撤下标语后才入场。三伏盛

夏，骄阳似火，暑气蒸人，即便是站在树荫下还觉热得透不过气来。然而，年近七旬的周恩来却抱臂站在烈日之下，等候造反派撤去“打倒”的标语！就这样双方僵持了整整一个小时，造反派自知理亏，才被迫摘掉了会场内的标语……

第二次开会时，周恩来因有外事活动不能到会。被王力讲话冲昏头脑的造反派闻讯后，以为有机可乘，紧急调来几百人冲入会场，准备“揪”走陈毅。为防止陈毅“溜走”，造反派还把陈毅的汽车轮胎放了气。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周恩来派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将陈毅临时藏入一卫生间内，在场的秘书钱嘉东紧急向周恩来报告了情况。

周恩来接到报告气愤至极，立即命令北京卫戍区迅速开来两个连队的战士，保护陈毅。战士们对元帅有感情，与正搜寻陈毅的造反派们对峙、周旋；而陈毅却在成元功等人的保护下，从后门撤出，换上卫戍区的汽车，平安返回中南海。

8月11日下午，外事口造反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批判”陈毅。这次，周恩来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奉陪”到底了。会前，他亲自向北京卫戍区傅崇碧司令员部署应急方案，将警卫部队安排在主席台下，以防不测；同时，再三叮嘱陈毅不可轻易离他外出。根据前几次“批判会”的“经验”，他还把几个造反派头头也都“拉上”主席台，以备出事时找人对案。果然，就在大会发言时，突然从会场二楼吊下一条“打倒陈毅”的大标语！顿时，整个会场上一片哗然。这显然是事先策划好的！

周恩来抱起双臂，逼视住主席台上那几个坐立不安的造反派头头，足有几分钟不说话。随即，他愤然站起，当众退场，以示抗议；同时命令警卫人员保护陈毅离开会场。

在一身正气、满脸威严的周恩来面前，人多势众的造反派却不敢动陈毅一根毫毛，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去……

在周恩来的舍身保护下，陈毅历经大大小小八次“批判会”，虽几番遇“险”，却安然无恙。可周恩来却因过度紧张劳累，引起心脏病发作，不得不几次吸氧。

也就是在这些日子里，因为保护陈毅，招致了‘中央文革’和造反派的不满，一度沉寂的炮打周恩来的标语、口号又再次出现在北京街头……

在王力“八七”讲话煽动下，外交部造反派们更加疯狂了，不顾周恩来的一次次批评、警告，于8月16日砸了外交部政治部，并悍然宣布“夺取”外交部党委大权。一直由毛泽东、周恩来掌握的外交大权“落入”造反派手中。

就在外交部“夺权”的当天，毛泽东在外地得到有关报告，于是，他对一批正来访的外宾轻松地谈起这件事：最近，我们的外交部热闹了，他们要把陈毅、姬鹏飞、乔冠华打倒，那谁当外交部长、副部长呀？……对陈毅，我也不高兴他，但找到一个外交部长也难呀！所以，我主张对他“炮轰”，不“打倒”。然而，这时的造反派已在开始行使“外交部部长”、“副部长”的“职权”；在他们的“批准”下，短短几天内，已有几十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业务监督小组”名义签署的电报飞往各国的中国驻外交机构，其中，还公然写上“打倒刘、邓、陈”的口号，强令中国驻外使馆“贯彻执行”……

8月22日晚，已疯狂到了极点的外事口造反派以及北京一些高校的红卫

兵，在抗议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而举行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的群众示威活动中，置基本国际关系准则于不顾，竟冲击、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

一起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给中国的国际声誉带来了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害。

然而，任何事物发展到极点都会走向其反面，这是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则。1967年夏季外交部“夺权”和“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对其表现来看，极左的一套确实是发展到了极点，对于后来一系列事情发展确实起到了“深刻影响”。它尤其起到那些煽动极左思潮的头面人物所不曾料想到的“历史作用”，这就是：迫使那个一年多来乱党、乱国、乱军的“祸害之源”“中央文革”小组收敛气焰，开始走下坡之路；成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一直坚持主张并亲自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重要契机。

8月23日凌晨，英国驻华代办处大火被扑灭后仅仅两个小时，周恩来就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头头，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他们宣布：不允许夺外交部的权。

忘乎所以的造反派头头不见棺材不落泪。就在这次召见中，有的造反派头头仍显得很不服气，他们甚至公开顶撞、打断周恩来批评他们的话，为了替自己的极端行为辩解、打掩护，还有人抬出了王力的那个“八七”讲话，他们本来是想为自己找后台，然而却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注意。

外事口造反派继续在陈毅“问题”上做文章，8月27日凌晨，他们一再无理阻挠周恩来出席“批判”陈毅大会，并威胁将组织“群众”冲击会场。

对此，周恩来无比愤怒！他义正词严地向造反派指出：

“你们这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你们采取轮流战术，从（26日）下午2点到现在，整整18个钟头了，我一分钟都没有休息，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

这时，总理的保健医生搀扶周恩来离开会场。这时，造反派们仍在后面叫嚷不休：“我们就是要拦陈毅汽车！”“我们还要再冲会场！”……

此刻，走到门口的周恩来陡然转身，眼中喷射出愤怒的火焰：

“你们谁要拦截陈毅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其实，外交部“夺权”前后被造反派多次批斗的陈毅，在这以后并没有真正“沉默”。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他仍以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的身份昂然出现在各种内外场合：

1967年9月30日晚，陈毅出现在周恩来主持的国庆18周年招待会上；

10月1日上午，陈毅与其他“二月逆流”的副总理和老师们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

11月30日，陈毅又与周恩来联名电贺南也门人民共和国独立。

## 九、“儿子交给你，我完全放心”

1968年春天，北京满街乱飞的小报、传单，突然都登出一条骇人听闻的消息：陈毅的儿子陈小虎——其实是陈小鲁，有人改“鲁”为“虎”，其用意当然是刻意渲染残暴凶狠之感——是一反动组织的最大头目，能使双枪，杀人如麻，当时引起社会极大震动的“西单商场爆炸事件”，便是这头“恶虎”策划的。

江青为打倒陈毅，巴不得这些传说都是真的！亲自派人盯陈小鲁的梢。没几天，她就把“陈小鲁身带炸药进入中南海，妄图暗杀‘中央文革’领导，与反革命里应外合”的材料，一齐摆在周恩来的办公桌上。

一天，周恩来把陈毅请去，开门见山他说：

“我了解小鲁，他是个好孩子。可是，现在外面传言大多，我看会影响你，我想让他离开北京，去东北锻炼，你看如何？”

陈毅对总理还能信不过？便点点头，说：

“行！儿子交给您，我完全放心，到哪里都可以。”

晚上，周恩来把陈小鲁叫去了。直到10点钟，孩子才回来。

小鲁神态镇静，他向一直等候消息的爸爸妈妈，复述了周恩来、邓妈妈的谈话内容。当说到周恩来规定他明天一早动身，而且，没有周恩来允许，不准给家中写信时，陈毅和张茜都禁不住一怔。随即，当妈妈的流泪了，她难过地追问小鲁：

“你到底干了什么事？！为什么落到这种地步？！”

小鲁扶着妈妈的肩膀，安慰她：

“妈妈，您应该相信我，我什么坏事也没干！刚才总理也问了我几件事，我对总理说，这都是谣言，中央可以调查！”

“总理说什么？”张茜急切地问。

“总理摇摇头说，‘我没有时间调查。’”小鲁声音哽咽着说。但是，他没有一句怨言。

陈毅心头一阵欣慰：多么懂事的孩子，他能理解和体谅周恩来的困境和难处。

天亮了，在春寒料峭的晨风中，小鲁提着箱子走了。

小鲁一年多扎实苦干、待人诚恳热情的作风，赢得了连队干部战士的信任和尊重。第一年，他这个没有军籍的战士，被评上了五好战士；第二年，他又拿到了五好喜报。他多想让爸、妈也分享他的喜悦，并从中得到些许安慰，但是，他严格遵守周恩来的规定，没给爸、妈写过一封信。五好喜报卷成筒，塞进了箱子里。

1970年元旦一过，连长喜盈盈地拍拍小鲁的肩膀说：

“陈小鲁，去照相馆照张相片吧！要笑得开心些！你已经正式被批准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军龄从1968年算起！”

不几天，指导员郑重地握住陈小鲁的手说：

“陈小鲁，你现在可以入党了，你向支部交一份入党申请书吧！”

陈小鲁绝不会想到，为他正式参军和入党，部队党委的报告直接送到了周恩来的桌上。

隆重的支部大会召开了。指导员在会议上宣布：

“陈小鲁同志的家庭和他过去的表现，由党组织负责，大家不要问了，

我们就是看他这两年多入伍后的表现，以此衡量他够不够党员的标准。”

支部大会全票通过了。

此时此刻，陈小鲁的眼睛湿润了。他感激连队的干部战士，更感激周恩来总理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

## 十、最后的深情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临近结束时，被林彪以战备为借口疏散到外地、现在回京开会的陈毅、徐向前等几位老干部都曾向总参谋长黄永胜提出：能否让他们回北京检查一下身体。黄永胜电话中一口回绝：“哪里来的，回哪里去！”

张茜见丈夫身体日渐消瘦，腹痛加剧，心中着急，催陈毅连夜给周恩来写信，请求批准返京治病。周恩来接信后，立即复函同意。

1970年10月21日，陈毅和夫人张茜回到北京。此时，陈毅

只有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当天便与解放军三 一总院联系，医院回电话：六病室没有床位，等准备好床位，再通知。直到26日才来了住院通知。其实，南楼六病室有五组空病房，只因黄永胜正在住院，听说陈毅要来住院，气哼哼地说了句：他来吧，我走！医院负责人便不敢收治陈毅，直拖到黄永胜出院。

住院难，诊治更难！

陈毅在六病室没住几天，又被搬到五病室。原来陈毅住院的第二天，李作鹏也住进了六病室。当晚，陈毅在走廊里散步，迎面遇上来看李作鹏的邱会作、吴法宪。第二天就被搬离六病室。陈毅后来曾多次对妻子张茜说：“我对三 一医院没有意见。”因为他凭直觉也判断出谁是制造冷遇的幕后总指挥。

下面抄录的是陈毅入院的首页病历：

陈毅，男，70岁，70—10-26入院。

主诉：头痛、头昏，高血压十余年，近两月加重。近两年多来体重下降二十多公斤。

要求住院治疗期间进行一次全面检查。

年逾古稀，体重骤降，这本是患有肿瘤等严重疾病的重要体征，理应及时组织会诊，做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然而，陈毅住院后，医院某负责人专门对医生交待：陈毅主要是治疗高血压和一般查体。此外，又反复向医护人员“敲警钟”，他是“二月逆流”黑干将，你们思想上要划清界限，这是阶级立场问题！

56天过去了，陈毅病历上除了主治医生的病程记录和科、部主任的一般性查房记录外，没有一次各科会诊的记录。

相反，黄永胜因胃疼住院18天，医院某负责人亲自出面为他

组织大小会诊16次，其中请著名专家会诊次数达7次之多。

医生奉命对张茜说：陈毅身体检查不出什么，可以出院。1970年12月2日，陈毅出院了。当然，留在医院病历上的白纸黑字注明：病人自己要求出院。

1971年1月16日下午5时许，周恩来接到三 一医院报告：陈毅阑尾炎急性发作，需要立即做切除阑尾的手术。周恩来批准了，并派自己的保健医生卞志强陪张茜一起前往医院。

晚6时15分，手术开始了。

刚过几分钟，手术室里突然慌乱起来。原来，腹腔打开后，医生们才发现：陈毅的阑尾是好的，真正的病因，是靠近肝曲外的结肠癌，并已有局部淋巴结转移，侵及附近肝脏。由于病发部位较高，只得将开阑尾的切口，向

上延长为丁字形，尽目力所及，把已经转移的部分尽力切除干净。因为手术室根本没有做大手术的准备，手术只能做做停停，原先预定半小时的手术，整整做了五个多小时。

医院个别负责人担心周恩来查问，写了一份不足百字的“检查”，承认重视不够，发生差错，以此搪塞周恩来。“检查”送请邱会作过目。邱会作冷冷一笑，说：

“陈老总手术发现癌是好事，你们有什么错误？！陈老总要长瘤子，你能让他不长吗？！”

说完在“检查”上批示：“暂不要写报告，以后需要写时，再研究。”

邱会作心里有鬼，事后又派老婆专门去找那个医院负责人谈话，要他不要上报检查，自找麻烦。直到陈毅逝世，医院负责人没有向中央、向周恩来交出一个字的检查。

周恩来听卞医生详细讲述了陈毅入院和手术情况，心里十分

惦记。三 一医院是总后管辖的单位，他无法干预陈毅的具体治疗。他十分担心，夜不安寝，陡然想起致力镭放射研究几十年的老专家吴桓兴院长。于是，他请吴院长为陈毅门诊放疗，热切期待着奇迹在陈毅身上出现。

五一节的夜晚，天安门广场前礼花缤纷，灯火通明。城楼休息室里，毛泽东正会见各国外宾。

“主席，您看看，今天陈毅同志来了！”周恩来异常激动地招呼着。

“主席，您好！”身穿军装的陈毅笑容满面快步走到毛泽东面前，尊敬地行了军礼。

毛泽东兴奋地站起身，伸出大手握住陈毅的手，关切地询问他的健康情况。

在场的外宾都看清了，眼前这位面容瘦削的军人，正是近两年没有公开露面的陈毅外长。陈毅与外宾一一握手。西哈努克亲王双手紧紧握着陈毅的手连声问候。翻译们个个喜形于色：陈老总身体很好，还能回外交部领导工作！

深夜2点，吴桓兴院长如约走进人民大会堂边厅，刚刚开完会的周恩来赶忙趋步上前迎过来，没开口先绽出笑容：

“吴院长，我要报告你个好消息，陈老总吃烤鸭了，吃得好香！我甚至有这样的想法，会不会是医生弄错了？陈老总恐怕不是癌症！有这种可能吗？”

吴桓兴被周恩来对陈毅的深厚感情。闪烁着希望的眼神所深深感动了。可是，他是医生，不能向总理隐瞒真情：

“最近三 一医院给陈总拍了片子，怀疑已经有肺转移，不过陈总有毅力，适应性强，只要他有食欲，我一定尽力延长陈总的生命……我要让他亲眼看到中国加入联合国，会见访华的尼克松总统……”

说着，说着，吴桓兴哽咽了，禁不住老泪横流。

周恩来久久握住吴桓兴的双手，用力摇晃着说：

“谢谢你，吴老！”

为了离开暑热的北京，陈毅暂时离开三 一医院来北戴河疗养。北戴河海边，凉爽清新，碧海万顷，白帆点点，海鸥翩翩。在一片平坦的沙滩上，撑着一把红白相间的太阳伞。伞下，陈毅和朱德、聂荣臻三位元帅席地而坐，谈天说地，道古论今。相比之下，这里没有人监视，没有冷眼恶语，几十年

并肩战斗的经历，使他们从哪里都能扯出话题。三位开国元勋每天结伴，欢声笑语从未间断。

这期间，周恩来专程到北戴河会见西哈努克亲王。晚饭后乘隙去看望陈毅，再三嘱咐：安心休养，四届人大就要召开了，希望他早日康复。

农历7月13日，是陈毅70寿辰。陈毅挽着聂荣臻的胳膊，笑吟吟他说：“今年建军45年，我们参军45年，来，我们两个老战友、老朋友、老同乡又是老头子，一块合影留个纪念吧？！”

石阶下，两位元帅穿着一身普普通通的布军装，面对照相机，坦荡、庄重地笑着。

不多久，“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叶群等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在中央召集的老同志座谈会上，陈毅带着病痛两次做长篇发言，满腔义愤地将红军创建初期林彪的历史真实面目做了系统、全面的揭发！这之后，陈毅躺倒了，从此再没有下过床。

周恩来十分难过，为了挽救陈毅的生命，保证治疗效果，他亲自批示：将陈毅转到北京日坛医院，并亲笔批准日坛医院为陈

毅做胃肠短路手术。

与此同时，周恩来走进陈毅的病房，以宽慰病人沉重的心。刘伯承被人搀扶着走进病房，他以手代眼，紧握着陈毅的手。朱德夫妇、聂荣臻夫妇、徐向前、李富春都来看望。玉震经常逗留在陈毅床边，他怕陈毅寂寞，总是带着小孙女。乔冠华带来联合国遇到的老朋友们的问候。叶剑英几乎每天来探望。李先念看罢陈毅退出病房时泪流满面。

1972年1月4日，陈毅体温略微下降，神志恢复清醒，他认出守在床边的妻子和四个孩子，嘴唇蠕动着，女儿姗姗把耳朵贴近爸爸唇边，终于听清了：

“……一直向前……战胜敌人……”这是陈毅留给妻子儿女惟一的遗言。

1972年1月6日深夜11时55分，陈毅永远停止了呼吸和心跳。

哭声骤然四起……

深夜，朔风凛冽，大地冰封，忙了一整天的周恩来乘车来到三 一医院，沿着狭窄的楼梯，一级一级地走进地下雨道，转进右面的太平间，向刚刚去世不久的亲密战友、共和国元帅陈毅告别。

周恩来那瘦削的面容，紧锁的眉头，凝聚着深沉的悲痛和思念。他恭恭敬敬地向陈毅的遗体深深地三鞠躬。然后，径直走到床边，伸手掀起盖在陈毅身上的白布单，久久地凝视着老战友的遗容，缓缓地摸了摸陈毅冰凉的手臂，泪水禁不住潸然而下，他重新为陈毅拉平白布单，又把布单往里掖了掖，动作轻缓、小心。

站在旁边的陈毅夫人张茜哽咽着说：

“总理，您要多保重身体啊！大姐也为您担心。”

周恩来上前紧紧握着张茜的手，欲语无言。当他告别张茜走到门口，又忍不住回过头来，向安卧着的陈毅投去最后告别的目光。

陈毅的追悼会于1972年1月10日下午3时在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由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追悼会，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词。悼词600字，参加追悼会的人数定为500人。

离举行追悼会的时间愈近，周恩来的心情愈加沉重。这种低规格的追悼

会，对为党为人民奋斗一生，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做出丰功伟绩的陈毅，是多么地不公平哟！

可是，中央确定的规格，主席圈定的规格，他又无权改动。

午饭时，周恩来面前的饭菜几乎没动。

饭后，往日宁静的西花厅里，一直响着周恩来踱步的声音。

中南海游泳池，身穿浅黄色睡衣的毛泽东，在一侧堆满书的卧床上辗转不宁，他面色略显憔悴，腮边胡子很长。从1971年11月下旬，毛泽东身患重病，经全力抢救才脱离危险后，身体至今一直没有复原，双脚仍然浮肿。原来的鞋子、拖鞋都穿不上，工作人员只好赶制了两双特别宽大的拖鞋，让毛泽东穿着散散步。当然，受健康制约，他已经长久足不出户了。

宽敞的卧室里，寂静无声。

突然，毛泽东坐起身，摸索着穿鞋，向进来的工作人员说：

“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说着，就向门口走去。

工作人员熟悉毛泽东的脾气，一旦决定去做，谁劝也无用。于是，有的抱大衣扶主席上车，有的打电话通知总理。

“游泳池”打来的电话，立刻抹去了周恩来脸上的愁容，机智的他当即拨通了中央办公厅的电话，声音格外洪亮：

“我是周恩来。请立即通知在京政治局委员，务必出席陈毅同志追悼会，通知宋庆龄副主席，通知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凡是希望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的，都能参加。”

然后，他又打电话给我国驻柬大使康矛召：

“康矛召同志吗？我是周恩来，请转告西哈努克亲王，如果他愿意，请他和莫尼克公主出席陈毅同志追悼会，我们将有国家领导人出席。”

周恩来依据毛泽东参加追悼会的举动（相传毛泽东只参加过两次追悼会，一次是张思德，一次是1946年“四八”烈士追悼会）迅速做出了提高追悼会规格的决定，这既是周恩来对陈毅真情实感的流露，也是他机敏过人的体现。

搁下电话，周恩来的“大红旗”风驰电掣驶向八宝山。待毛泽东下车时，周恩来在八宝山已用电话调来了十几只电热炉（八宝山公墓礼堂休息室简陋冰冷，从这次以后才装上暖气），调来了新影厂的摄影师，报社、电台的记者。顷刻之间，原来灰尘满面，冷冷清清的礼堂内外，放电缆的，挂聚光灯的，架摄影机的，对相机镜头的，人出人进，川流不息。

休息室里，坐在沙发上的毛泽东看见张茜进来，脸上呈现出激动的神情，他两手撑住沙发扶手，想站起来。

张茜立时满脸热泪，快步上前扶住毛泽东，十分动情地问道：

“主席，您怎么也来了！”

毛泽东话语缓重他说：

“我也来追悼陈毅同志！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然后，毛泽东与陈毅的四个孩子一一握手，心情沉痛，说话很慢：

“要努力奋斗！”

接着，毛泽东又说：

“陈毅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了贡献，立了大功劳的，是已经做了结论的！”

在毛泽东与西哈努克亲王交谈时，叶剑英轻轻走到周恩来身边，递过去几页稿纸，周恩来接过来，不解地抬头望着他。叶剑英拱手再三，未语而退。这样，致悼词便由叶剑英升格为周恩来。

在毛泽东谈话将要结束时，张茜真诚他说：

“主席，您坐一下就回去吧！”

毛泽东缓缓摇了摇头，说：

“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

张茜噙着泪连连摆手：

“那怎么敢当呢！”

毛泽东坚持说：

“你们把它套在我大衣的袖子上。我今天是穿着白色衣服，为陈毅同志志哀。”

接着，毛泽东又问候了在场的聂荣臻、徐向前，并与郭沫若握手。

西哈努克亲王搀扶着毛泽东走进会场，毛泽东已经穿上那件银灰色的夹大衣，衣袖上挂着一道宽宽的黑纱。

周恩来站在陈毅遗像前，缓慢、沉重他讲着悼词。不足600字的悼词，周恩来曾两次哽咽住。这对有极强毅力、极强控制力的周恩来来说，是很为罕见的。

在鲜红党旗覆盖着的陈毅骨灰盒前，毛泽东和大家一起深深地三鞠躬。会场里呜咽声已成一片，这是为陈毅，更是为“文革”以来蒙受极大屈辱的广大老干部呜咽……

陈毅的逝世，使周恩来失去了一位手足情深的战友，心中痛

苦是可想而知的。他把对战友的怀念转化为对陈毅一家关心。在得知陈毅的夫人张茜住院并在整理陈毅生前的诗词后，即给予了极大的关切和支持。他派邓颖超两次到医院探望张茜，并诚恳地对诗词选序言提出了一些建议。

1974年元旦，周恩来派秘书赵炜赶到医院，将安徽冒孝鲁先生写的《敬挽副总理仲弘先生》的诗送给张茜看，并写信致意。第二天，处境困难又身患重病的周恩来，亲自来到医院，同院方磋商能否设法延长张茜生命的问题。周恩来走进病房，对躺在病床上的张茜说：陈总的诗选和序言都看到了，“你写的序言很好，陈毅同志的诗词，是他自己坚持战斗。辛勤工作的纪实……”

元月8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西花厅又接见了陈毅的女儿姗姗。在谈话中，周恩来说：

“你妈妈年纪很小就自愿参加革命，一生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在病中能编成你爸爸的诗选，并写出那样的序言和题诗，是值得钦佩的。你爸爸、妈妈在‘文化大革命’中经住了考验……”

这是周恩来对陈毅和张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1974年3月，张茜因病去世。

1976年1月，周恩来因病逝世。

至此，周恩来和陈毅之间，跨越半个世纪的友谊画上了一个光辉的句号。

## “坚持实事求是的模范”——周恩来与罗荣桓

罗荣桓（1902—1963），湖南衡山（今衡东）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一师一团特务连党代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营党代表，第二纵队党代表，红四军政治委员，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一一五师代师长兼政治委员，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中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管理部部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早在红军时期周恩来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和红军总政委时，罗荣桓作为红一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就在周恩来的指挥下冲锋陷阵。罗荣桓的虑事周详，使他的建议屡屡得到周恩来的大力支持；周恩来的为国操劳，使罗荣桓经常挂念心间，并尽量为其分忧。

## 一、协助周恩来百万大裁军

新中国建立初期，罗荣桓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部长，工作千头万绪，都围绕着一个中心，这就是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军队建设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是精简整编。1949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550万人，但是除了少量海、空军和特种兵外，绝大部分是步兵。部队一方面是数量大多，与和平建设时期的形势不相适应；另一方面是单一陆军，现代化程度很低，与现代战争不相适应。因此，部队按中央要求要精简150万人，使总的数量不超过400万，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担任复员委员会主任。罗荣桓知道，这是一项十分复杂繁重的工作，周恩来工作头绪多，担子重，自己要多替他分担一些工作。他领导总政治部和总干部部会同总参谋部，从1950年下

半年开始，就通盘筹划和领导了部队的整编和干部调配工作。为了能顺利地妥善地搞好整编复员，罗荣桓请萧华等首先组织总政机关对部队进行了调查研究。在调查中，了解到有些战士不愿复员，发牢骚说：“打仗的时候用得着我们，和平了就不要我们了。”有些老弱病残的人担心回到农村生活没有保障……但是有一些干部又认为全国解放了，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准备解甲归田，过“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定生活。

针对这些情况，罗荣桓让总政机关起草了《关干部队整编复员的政治指示》，要求各级领导机关首先要做深入的思想动员，使指战员懂得，紧缩部队编制是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克服当前的财政困难，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同时也是为了从根本上加强军队的建设。《指示》号召广大指战员，留在部队的要做保卫祖国的好战士，转到地方的要做模范公民，在生产建设中起带头作用。

《指示》还要求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各级领导一定要采取对指战员对国家负责到底的态度，对每一个人都要慎重地做出适当安排，做到留者安心，走的满意，各得其所，决不能推出了事。由于方针正确，工作细致，在几个月内，罗荣桓协助周恩来领导全军顺利完成了近100万人复员。转业巨大工作，并为以后几年整编部队的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 二、罗荣桓坦言建议，周恩来从谏如流

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涯，锻炼出了罗荣桓虑事周详，办事沉稳的性格，每次向中央军委提建议，不提则已，提则必是深思熟虑，

切实可行。周恩来对罗荣桓也十分尊重，对于罗荣桓的意见，一向从谏如流。

1949年1月初，罗荣桓到达西柏坡。见到分别多年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非常高兴。1月6日，他出席了讨论和部署向全国进军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并于7日做了发言。

在发言中，罗荣桓分析了战争形势，认为结束平津和淮海战役后，再在西安、平汉路战役取得胜利，就基本上打倒了国民党，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结束。因为武汉、西安之敌可能南撤，退至两广和云贵川，需要渡江以后再打，还要做好美军干涉的准备。

他汇报了华北野战军的主要思想倾向，感到要取得全国胜利，将革命进行到底，必须破除在干部中存在的偏安思想和轻敌情绪。在大军南下的时候，要继续反对无政府、无纪律倾向，做到高度的集中统一。

为了南下作战，他建议设立铁道部，迅速修复津浦、平汉、陇海几条铁路干线，同时要修好公路网，搞好粮食运输和加工。为了便于识别，各个野战军服装颜色应该统一。他建议：在南下以后，新解放区的地方军区干部由主力抽调；地方干部则可由较近的解放区抽调，区干部不宜离家太远。

听着罗荣桓的发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觉得其虑细致周详，不住颌首，表示赞同。很快，罗荣桓的这些意见都得到中央的采纳。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类院校陆续兴办后，有一些政工干部给总政治部写信，希望能有一个提高政工干部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化科学知识水平的场所。各大军区也纷纷要求成立政治干部学校，轮训和培养政工干部。

罗荣桓考虑，要在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形势下，保持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做好政治工作，就必须有大批能适合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需要的，具有一定政治理论水平和科学文化知识的政治工作干部。培养这样的干部，像战争年代那样，仅仅依靠实际锻炼已经不够了。必须要有继承“红大”和“抗大”传统的，以培养各级政治干部为宗旨的院校。

为此，1951年12月3日，罗荣桓和傅钟、萧华向毛泽东报告说：此次整编部队，可以节余大量政治工作干部，部队中亦深感连、营政工干部质量低。为保存和提高政工干部，各大军区均要求成立一个能收500至1000学员的政治干部学校，专门培养营、连级政工干部，并要求军委开办一轮训师、团级政工干部的高级政治干部学校。我们感到此事极为需要，待呈请审核批准。

第二天，毛泽东即签署同意。周恩来作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对罗荣桓这一富有远见、对军队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的建议深表赞同，大力支持，并帮助解决各种困难。于是，在罗荣桓领导下，筹办政治学院的工作很快开始。建立了由罗荣桓任主任、萧华和政治干部部副部长王宗槐等七人参加的筹备委员会。校址定在北京西郊永定路的一片砂石地区，经过规划设计，1953年6月4日破土动工，并于1955年开学。

### 三、罗荣桓与苏联顾问意见相左，周恩来坚决支持罗荣桓

解放初期，为了学习苏军经验，从1950年开始，总政治部和总干部部都聘请了苏联顾问。

苏联顾问对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建设和干部工作建设曾提出不少有益的建议。但是由于苏联军队和中国军队的发展历史、传统和特点有很大差别，苏军的政治工作和干部工作经验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军队，苏联顾问的意见也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军队的实际。而他们中有的人又常常认为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非按他们的意见做不可，这样，分歧和矛盾就不可避免了。

罗荣桓很注意处理好同苏联顾问的关系，十分尊重他们。但牵涉到工作中的是非问题，有时又非争不可。1950年秋天，罗荣桓便同驻总干部部的顾问在许多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看法。

如关于干部的任免权限问题，苏联顾问要求实行更大的集中，即：团无任免权，师可任免排级，军任免连级，军区任免营到副团级，正团到副师级由总干部部部长任免。各特种兵司令与总干部部部长有同样任免权限。

罗荣桓认为，苏联顾问的意见可能是适合苏军情况的，但却并不切合中国军队的实际。中国军队干部大都是从下面生长起来的，总干部部尚不可能掌握全军的干部部情况，因此任免不能过分集中。应以团任排级，师任连级，军任营级，军区任团级为宜。师以上干部仍应由军委主席任免。总干部部部长则不需要有任免权。

罗荣桓还认为，从人民军队任免干部的传统和当时的实际状况看，大军区司令员大都是中央委员或政治局委员，级别要高于特种兵司令。因此特种兵司令的任免权限不应高于大军区，而应与大军区相当或再低一级。

罗荣桓就上述问题向苏联顾问说明了中方的理由，希望他们注意中国的特点。但是那位顾问坚持己见。不得已，罗荣桓只好将情况于10月27日直陈毛泽东：

“以上不同意见，一时甚难说服顾问同志同意，请予批示。”

这一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收到报告后，立即转给周恩来，并批示：

同意你们的意见，请周考虑在适当时机与新来军事代表一谈。

周恩来看了毛泽东的批示和罗荣桓的报告，他十分赞赏罗荣桓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联想到战争年代罗荣桓在红军时期、山东战场、东北战场坚持实事求是的事例，周恩来不禁自言自语：“罗荣桓真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模范。”于是当即批示：

荣桓同志，请将此报告抄我一份，以便在适当时机提出。

10月10日

#### 四、弥留之际，仍然挂念周恩来

1963年9月28日，罗荣桓因病情严重再次住进北京医院。这次不只血压不稳，心脏不好，肾功能也不行了。他以无比坚强的毅力同疾病进行着顽强的斗争。

肾功能衰竭引起尿毒症，非蛋白氮指数高达110—120（一般超过100人就要昏迷）。当时医院没有人工肾的设备，只能采取腹膜透析的办法，就是向腹内注射1000毫升生理盐水，停半小时再抽出来。盐水注进去，肚子胀得像鼓一样，看的人都觉得受不了，他却一声不吭，默默地忍受着。由于尿中毒，浑身奇痒，有时把皮肤挠破了也止不住。为了止痒只好做热敷，常常烫出泡来。

在最后的日子里，罗荣桓仍然挂念着国家大事和党的工作，挂念着自己几十年患难与共的战友周恩来。在他逝世的前两天，即12月14日，周恩来和陈毅访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启程后，罗荣桓问身边的同志：

“周总理他们到了没有？”

当别人告诉他已经到达开罗时，他微笑着点点头。在这一刹那，他好像完全忘掉了自己的病痛。

## “咱们一起去做阎老西的工作”——周恩来与徐向前

徐向前，1901年生，原名徐象谦，字子敬。山西省五台县人，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1927年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队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广州起义中任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师第十团党代表、师长，红四军参谋长、军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红军右路军总指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代校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后改为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第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黄埔军校，周恩来领导的朝气蓬勃的政治工作，奠定了徐向前参加革命的思想基础，并使他对周恩来产生了敬仰之情。长征路上，听说周恩来病重，徐向前立即设法搞来牛肉干送去，这在当时可说是十分难得的补品。西路军失败，徐向前单枪匹马返回陕西，周恩来得悉，即从西安赶到云阳远道迎接。其后，他们一起下太原、上五台，共同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文革”狂潮骤起，周恩来又借助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巧妙地保护徐向前免遭林彪一伙的毒手。

## 一、命徐向前任副军长

1924年5月,徐向前考取了黄埔军校第一期,从此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这年11月,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26岁的周恩来一到任,立刻根据中共党组织的指示,大力开展政治工作,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使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出现了蓬蓬勃勃的局面。徐向前在回顾这段军校生活时说:

“在周恩来主持下,军校的政治工作相当活跃,革命性、战斗性很强,有力地激发了师生的革命热忱。”

周恩来到任不久,就指导成立了黄埔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成为团结青年军人探讨革命的核心组织。徐向前积极参加,成为该组织的骨干成员。

1925年1月15日,广东革命政府发表《东征宣言》,决定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周恩来作为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随军东征。此时徐向前已经毕业,留在入伍生队任排长,参加东征。东征中,军校的政治工作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成功,周恩来由此在国共两党内、特别在黄埔师生中受到广泛的尊敬。

作为排长的徐向前,很少与周恩来直接接触,但他从周恩来的演讲中,在斗争实践中认识了这位中国革命的杰出人物。正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传播的共产主义思想,对徐向前的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

1925年,徐向前告别黄埔,于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四五月间,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任队长的徐向前又见到了周恩来。这一天,徐向前接党内通知、要他到蛇山西面的粮道街开会。到了会场,只见周恩来端坐在主席台上,不由得十分高兴。这天,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主报告。

这是徐向前入党后第一次参加党的重要会议,听得特别认真。他又一次听到了周恩来那熟悉的声音,又一次看到了他那讲话时常常挥动的臂膀。蒋介石唆使夏斗寅偷袭武汉,形势十分危急,但周恩来非常沉着坚定,他号召大家行动起来,打垮国民党反动军阀的进攻,保卫武汉。徐向前从周恩来的演说中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会后,武汉军校组成独立师,配合叶挺的二十四师作战。徐向前率领学生军,一边行军一边教练。学生军热情很高,作战勇敢,在武汉以西的桃花镇,将“川老鼠”范绍曾部和杨森第九师

打垮。叶挺部也在纸坊将夏斗寅部打垮。革命军胜利返回武汉。

徐向前于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后,随起义部队进军海陆丰,与彭湃会合,坚持了东江的游击战争,成为红四师的师长、游击战争的主要领导人。1928年底,徐向前奉命离开东江,1929年5月到达上海,不久被派到鄂东北领导军事斗争。

1930年3月,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在上海召开会议,为统一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决定成立鄂豫皖特区,在湖北省委领导下建立鄂豫皖特委,郭述申为特委书记,徐向前为特委委员。上海会议还作出了《中央关于成立红一军及军事工作的指示》。决定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统一编为红一军。并决定由黄埔第一期学生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往副军长。

徐向前没有辜负周恩来的期望,率部驰骋于大别山区,创建了红四方面军并任总指挥。后来又率部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 二、徐向前大难不死归来，周恩来远道百里迎接

1936年底至1937年春，徐向前奉命率部西征。由于种种原因，西征失败。徐向前经过一个月的艰苦奔波，于4月下旬的一天，在一个叫小屯的地方，遇上了带侦察分队执行任务的红四军参谋长耿飏，被迎到了司令部。

1937年4月30日，刘伯承派人把徐向前接到援西军总部镇原。老战友相见，悲喜交集。任弼时、张浩和杨奇清等也都赶来了，大家就像庆贺打了胜仗一样，欢迎徐向前的归来。当天，刘伯承向中央军委发了电报：“我们的徐向前同志已于今日19时到达援西军司令部。”同时电告了彭德怀和周恩来。

5月20日，周恩来从西安专程赶到云阳看望徐向前。这时周恩来已经剃去了长胡须，显得神采飞扬，格外年轻。徐向前和周恩来从1924年在黄埔军校相识，十多年来几次相聚又分别。这次见面，分外亲切，周恩来对徐向前嘘寒问暖，照顾得无微不至。接着是互相就形势问题进行长谈。徐向前关心大局，谈话的主题是西安事变后的局势发展，是抗日民族战争的前途与战略。

徐向前急于去延安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汇报，因牙疾发作，周恩来和彭德怀、任弼时都让他到西安去治疗。于是便随周恩来一起去了西安。

临行前，他把身上带的十多个金戒指交给了彭德怀，说：

“这是从石窝下山时，组织分给我做路费用的，路上只用了两个，剩下这些，我用不着了，全部缴公。”

在西安，徐向前住在红军驻西安联络处。这个联络处，是西安事变发生不久设立的，在北新街七贤庄一号院。林伯渠、谢觉哉都在这里。他们和周恩来一样，也都十分关心徐向前和西路军失散人员的命运，想方设法营救被俘的指战员。在联络处，徐向前还见到了陈赓和宣侠父。

在徐向前到西安之前，他的消息一直没有对外公开，为的是要国民党允许红军派部队到黄河沿岸接回徐向前、陈昌浩和他们率领的部队。徐向前到西安时，国共合作已有了新的进展。5月间，国共双方组织了一个考察团，红军参谋长叶剑英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顾祝同（又是重庆行营主任兼西安行营主任）为负责人，准备到陕北、陇东红军驻地考察。借这个机会，周恩来安排徐向前参加考察团，成为28个成员之一，以便公开露面，并利用黄埔生在国民党军界受重视的条件，做抗日统战工作。

消息一公开，立即震动了国民党各界，顾祝同抢先会见并宴

请了徐向前。在黄埔军校时，徐向前是第一期第一队的学员，顾祝同是教官。他讲课不大受欢迎，曾有一次发生过被学生轰下讲台的事。当时徐向前就在场。这次见面，徐向前避而不提黄埔军校的注事，而把话题转到抗日上，问：

“顾主任对抗战有何打算？”

顾祝同抬起头，看看徐向前，说：

“我想先听听徐将军的高见。”

徐向前语调平和他说：

“我没什么高见。当今之大计，莫过于民族独立；实现民族独立，莫过于民族团结；若要民族团结，首先国共两党要真诚合作。”

徐向前停了一下，又说：

“我赞成国共合作，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要把民众发动起来，让全

国人民都投入到抗战中去，胜利就一定是我们的！”

徐向前有点激动，到后来声音高了一点。可是顾祝同听到“拥护蒋委员长”这几个字时，眼睛里闪出了一道光；当听到“要把民众发动起来”时却神情黯然。徐向前后来说，他们就是对群众不感兴趣，你一讲发动群众，他就听不进去。国民党输给共产党就是因为他们脱离了人民，失掉了群众。

徐向前在西安公开露面之后，没有随考察团去考察，在治好了牙病后，于6月18日同周恩来一道飞向延安。

行前，周恩来安排了两架国民党军队的教练机。这种飞机，一架只能搭乘一人。周恩来乘坐的一架先起飞；徐向前乘坐的一架后起飞。飞机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起飞不久，周恩来坐的前面那架就没了影儿，前后失去了联络。徐向前是第一次坐飞机，舱内发动机的轰鸣声很大，驾驶员问他话，他完全听不清，结果，驾驶员写了个条子问：“我们飞到了什么地方？”这可把徐向

前问住了。他没到过陕北，说不清到了什么地方。过了一会儿，看到下面有一条河，他判断可能是洛河，就让驾驶员顺河而上，没多久，看到一个飞机场，正是延安。他们于上午11时30分从西安起飞，下午3时才到，在空中转了3个半小时。

徐向前一走下飞机，忙问周副主席到了没有，接的人说还没有到，徐向前不禁大吃一惊，说：“这下可糟了！”因为他已经领教过了，驾驶员辨别航向的能力太差。这时接机的人也着急起来，担心周副主席出事。徐向前进到延安城里，立即又打听周恩来的情况，这时才有电报来，说周恩来乘的那架飞机迷失方向，油不够，又转回西安去了。

直到这时，徐向前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

### 三、“咱们一起做阎老西的工作”

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扩大会议,徐向前参加了会议,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对徐向前说:

“你这个山西人,和阎锡山是老乡,下一步,你跟恩来一块下一趟山西,去太原做做阎老西的工作。”

和周恩来一道去,徐向前当然高兴,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使命。徐向前与阎锡山不仅是五台同乡,他还在阎锡山办的国民师范上过学,阎军中有许多军官是他的同学。这对谈判抗日、争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些有利条件。

周恩来已先期到达西安。徐向前与朱德由洛川乘卡车出发,冒雨赶路,半路卡车抛了锚,下车推了一段,弄得满身是泥。还是不行,只好弃车步行。先到了贺龙的指挥部,遇到了林彪、聂荣臻,次日同行,过渭河,在渭南乘火车去西安,与周恩来会台。

周恩来看到徐向前到来,十分高兴,说:

“你熟悉山西情况,咱们一块去做阎老西的工作。”

而后,他们一起乘蒋鼎文安排的专车到潼关,过黄河到风陵渡。阎锡山派的上校秘书梁化之带着两节专列火车来迎接。阎锡山搞独立王国,到山西境内必须换乘他的窄轨列车才行。

抵太原后,梁化之根据阎锡山的交代,想安排周恩来一行住绥靖公署的高级官馆,被周恩来谢绝了。周恩来对徐向前等人说:

“这里出出进进都是阎锡山的人,我们谈事情不方便,还是搬到彭雪枫那里住吧!”

彭雪枫是1936年中共派到阎锡山处的联络代表。红军改编后,成为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的负责人。

工作稍事安顿,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彭雪枫一起去岭口行营见阎锡山。阎锡山正为日寇逼近太原发愁,对周恩来一行的到来,表现出很高的热情,想借助八路军的兵力为他挡日寇。阎锡山对徐向前这位同乡,这位当年的学生更是刮目相看了,他更想借国共合作之机,把徐向前拉到他这一边去。他对部下说,“徐向前缺粮少弹,蒋介石剿了他几年,都没有剿垮,你们要多加留意。”甚至还谈到,“政治上依靠薄一波,军事上依靠徐向前。”阎锡山有他的如意算盘,他对部下说,“抗日要准备联日,联共要准备剿共。”

周恩来对阎锡山的如意算盘当然不会不知道,但为了推动他抗日,仍对他表面上主张的“联共”态度和“守土抗战”主张,给予积极的评价。同时也对他提出希望:

“希望百川先生不负国人期望,履行诺言,与我们合作抗战到底。我们共产党主张建立各党各派各界人士的共同联盟。要让山西人不当亡国奴,只有联合起来,发动民众共同抗战。”

土,在太原,徐向前配合周恩来,夜以继日地工作,会见各界人士,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太原国民师范是徐向前的母校,他就陪周恩来去做讲演。周恩来讲了两个多小时,强调各界一致团结对外,反对西太后的“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

思想,号召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徐向前还利用同乡关系到阎锡山的机关里去做讲演,还到太原教育公会自省堂给平津流亡学生讲话。

并抽暇会见一些开明士绅和新闻记者，向他们做抗日统战工作。

由于周恩来、徐向前等人卓有成效的工作，八路军得以顺利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徐向前则更领略了周恩来高超的谈判艺术。

#### 四、战友情深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周恩来与徐向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表现在为共同的理想而奋斗方面，也表现在生活上的互相关心方面。

1934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的懋功地区会师。在这里，周恩来和徐向前又相见了。对周恩来，徐向前有一种故人相见之感。周恩来看到这位少言寡语的黄埔生，竟成了使敌人闻风丧胆的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感到无限欣慰。

不久，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徐向前就军事工作发表了言。他汇报了红四方面军的特点，分析了敌情，表示坚决听从中央指挥，周恩来在发言中认为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是不对的。撤出通南巴是为了迎接中央红军，是正确的。他充分肯定了红四方面军的长处，指出，红四方面军是有胜利信心，执行命令坚决，遵守纪律，又能动员群众的部队，并说，这些长处是红四方面军取得胜利的条件。

周恩来实事求是和中肯的分析，使徐向前十分佩服，并从中受到很大的鼓舞。

不久，周恩来患病，发起高烧。徐向前得知后很是关心，也十分着急。他经常询问周恩来的病情，并设法搞了一点牛肉干送去。在荒无人烟的川西草原，一袋青稞面可以救人一命，牛肉干算是最好的补品了。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周恩来的深厚感情。

解放后，周恩来日理万机，但仍然关心着徐向前。1950年，徐向前生病未愈。有一天，他去中南海参加会议。到后即坐在会议厅的后排，周恩来进来后，扫视了一下会场，指着身边一张空着的沙发说：

“向前同志，你是病人，来，换个座位！”

在场的人都为周恩来无微不至地关怀别人而深深感动。

1951年，徐向前身体刚刚恢复，就肩负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重托，率兵工代表团访问苏联，商谈抗美援朝急需武器装备的订货和建设我国兵工工业问题。代表团的工作日程徐向前都向周恩来报告，再由周恩来报告毛泽东。徐向前在莫斯科经过四个月的艰苦谈判，圆满完成了中央赋予的任务。

10月，徐向前结束了苏联之行，率代表团由莫斯科回国，11月6日，进入满洲里，在列车上举行酒会，庆祝“十月革命节”。

由于长时间的疲劳，徐向前身体素质下降，感冒发烧，肋膜炎复发，住进了长春空军医院。周恩来得知后，当即派卫生部副部长、著名医学专家傅连璋率医疗组乘专机到达长春，将徐向前接回北京治疗。

## 五、周恩来面授对付造反派机宜：“务听少说，多问少答”

一个人在危难的时候，更感到友谊的重要。徐向前忘不了“文化大革命”艰难岁月中周恩来对他的关怀和爱护。1967年1月，徐向前由毛泽东提名，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深感力难胜任，几次推辞不准才接受下来。1月11日，周恩来在全军“文革”小组名单上批示：“军委通过，中央批准。”徐向前走马上任，面对全国和军队的混乱局面，他忧心如焚，对于造反派无休止的纠缠，常常发火，头疼症也频繁发作。

周恩来得知情况后，十分关心地对他说：

“和他们（指造反派）打交道，你要掌握八个字，就是‘多听少说，多问少答’。”

徐向前上任一个多月，和其他老师一起，“大闹京西宾馆”和“大闹怀仁堂”，与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结果

被林彪、江青一伙恶人先告状，告到了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虽然批评了徐向前等人，但并不宣布打倒，而且在五一节时还让他们上天安门城楼。这一下就激怒了林彪、江青一伙，加紧了他们迫害老师们的步伐。他们把怀仁堂事件诬蔑为反党事件，诬蔑为“二月逆流”。徐向前作为打头炮的人，连连受到批判，三次被抄家。

1967年武汉发生“七二〇”事件后，徐向前又被诬蔑为武汉事件的“黑后台”，陈再道的“黑后台”。7月29日，清华大学造反派抄了徐向前的家，强行拿走了文件、书信和照片。

周恩来闻讯后立即批示：（一）所进人员全部撤走；（二）保证徐向前及其家属子女和工作人员的安全；（三）东西一件不准拿走，已抢走的文件柜和材料，责成卫戍区到清华大学全部追回。

由于周恩来这三条指示，徐向前的家属和工作人员才从危难中得到解脱，被抄走的文件、资料和信件，才陆续找了回来。

1967年八一建军节，是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作为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徐向前希望出席纪念建军节的招待会，借此机会看一看危难中的战友。可是会不会要他这个“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二月逆流”的成员到会呢？

也就在此时，周恩来正在为元帅们出席招待会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着斗争。7月31日，出席招待会的名单，整整讨论了一个下午，争论不休；林彪、江青一伙对老师们出席持反对态度。周恩来只好去请示毛泽东最后决定。周恩来请叶剑英通知徐向前，做好出席招待会的准备。叶剑英还带着理发员为徐向前理了发。

刚刚理好发，周恩来就打来电话说：“毛主席指示，今天的招待会，朱德要出席，徐向前要出席，韩先楚也要出席。”

为了避免发生意外，周恩来还亲自布置有关部门，选定了徐向前从西山到人民大会堂的行车路线，并对沿线布置了警卫。

徐向前乘车离开住处后，周恩来又亲自打电话问黄杰：

“徐帅走了没有？”

听到周恩来亲切的声音，黄杰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报告说：“已经走了……”就再也没有说下去了。

周恩来理解黄杰的心情，安慰她说：

“你和徐帅要保重啊！”

接着，周恩来又亲自到大会堂门口迎接徐向前。  
在困难的时刻，周恩来为徐向前夫妇送来了温暖。这使他们终生难忘。

## 六、借助主席护徐帅

林彪、江青一伙对老师们的批判步步升级，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又掀起了高潮。黄永胜在总参谋部布置批判几位老师，并发动者帅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组织揭发批判，要求和老师划清界线。徐向前办公室党支部不敢违背黄永胜的旨意，写了报告，请示批判徐向前和他的夫人黄杰。

周恩来看到报告后，不禁皱起了眉头，但他知道黄永胜所作所为的后台是林彪，便在报告上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并当即转呈毛泽东。这正是周恩来的高明之处，因为他知道，毛泽东虽然批评了老师，但并不主张打倒老师。只要毛泽东批示予以保护，林彪、黄永胜一伙即使有斗胆也不敢公然违抗。果然，1969年1月3日，毛泽东亲笔做了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

由于周恩来的保护，由于毛泽东的批示，再一次挽救了徐向前。

林彪自我爆炸后，徐向前从疏散地开封返回北京。从1972年到1974年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承担了接待西哈努克亲王的任务。1973年11月2日，徐向前和黄杰专程到广州迎接西哈努克亲王的母亲哥沙曼王后。周恩来在北京车站迎接，远远地看到黄杰，他问身边的人：

“那个妇女是谁？”

工作人员说：

“是徐帅的夫人黄杰。”

周恩来听后哈哈大笑，说：

“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啦。”

据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周总理很长时间没有这样笑过了。

1973年5月，徐向前受周恩来委托，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使，出访斯里兰卡，出席中国援建的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落成典礼。7月，又根据周恩来指示，率高级军事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表达了加强团结，维护中阿友谊的愿望。同时，徐向前还协助总理接待了一些国家来访的元首。“总理太累了，”徐向前常常这样想，“能为总理分担的，就尽力分担吧！”

## “全国知识分子名副其实的‘老总’”——周恩来与聂荣臻

聂荣臻（1899—1992），四川省江津县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赴苏联学习。1925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特派员，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1927年任中共前敌军委书记，南昌起义军第十一军党代表，同年参与领导广州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中央红军先遣队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副师长、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司令员、平津卫戍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市市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代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科学小组组长，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科委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21年，在法国的聂荣臻听到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周恩来。从此，在法国巴黎、黄埔军校、南昌城头、黄浦江边、中央苏区、长征路上、延水河畔、西柏坡村、中南海里，留下了他们共举大事、共谋宏图的坚实脚印和身影，留下了生死与共的战友深情，也留下了他们两个家庭激动人心的友谊佳话。

## 一、相识在巴黎

本世纪 20 年代，在中国青年学生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涌现了一批著名的共产党人，周恩来和聂荣臻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

1920 年 1 月 24 日，21 岁的聂荣臻到达法国，开始了留法勤工俭学的历程。1920 年 12 月，周恩来到达法国。他在勤工俭学学生中有很大影响，聂荣臻早闻其名，希望早日结识周恩来。

1922 年 3 月以后，周恩来与赵世炎等同志一起，致力于建党建团活动。他是位讲求实际的人，对任何事情决不盲从。在欧洲一年多的时间里，对各种社会思潮做了反复比较。开始，他曾密切注意过无政府主义的思潮动向，对这派学生浪漫主义的革命热情，有过某种同情，以后逐渐认识到，无政府主义想抛弃一切束缚，要求“彻底的自由解放”，这在阶级社会中，纯属空想。经过比较，觉得只有以苏联“十月革命”为榜样，才能解决人类和中国求解放的问题。1921 年，他确定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2 年春天，他在德国与几位同志商量，勤工俭学学生绝大部分是青年人，其中许多人革命热情很高，有建立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基础，从团结教育青年方面讲，也有这个必要。于是，他就写信给赵世炎，请他出面筹备。在赵世炎、周恩来等努力下，1922 年 6 月，召开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即后来的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1922 年 8 月，聂荣臻加入“少共”组织。不久，刘伯坚告诉聂荣臻，周恩来等倡议，需要筹一笔钱做路费，赶紧派人回国，与团中央取得联系，接受领导，以加强团的活动。虽然大家当时生活上都很困难，经济拮据，还是凑了一笔款子，由李维汉带信回到国内，终于与团中央取得了联系。此时，陈独秀正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他去信说，不宜叫“少年共产党”，应改称青年团。聂荣臻等人建议，“少共”改称“共产主义青年团”，附属于国内青年团，获得团中央批准。当周恩来在 1923 年 2 月“少共”临时代表大会上宣布与国内取得联系的喜讯时，大家都非常高兴。

在“少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选举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为宣传委员，李维汉为组织委员。1923 年 2 月，由于赵世炎要去莫斯科学习，周恩来接替他任书记。从此，周恩来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旅欧组织的主要领导人，聂荣臻在他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工作。旅欧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中的党团活动，是中国共产党初期建党建团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恩来和聂荣臻在这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3 年 2 月，在巴黎举行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临时代表大会上，聂荣臻与周恩来第一次接触。周恩来英姿勃勃，待人亲切，讲活精辟，思路敏捷，充满朝气，给聂荣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年夏天，聂荣臻在德国柏林又见到了周恩来。7 月，聂荣臻放弃在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的学习，回到巴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担任旅欧共青团训练部副主任、执行委员会委员，以主要精力从事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训练工作，经常与周恩来接触，互相之间了解就更多了。

周恩来到法国后，主要是考察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以记者身份给天津《益世报》写通讯，靠稿费作为革命活动的经费，可以说是位职业革命家。早在国内，周恩来就参加了五四运动和其他进步学生运动，已经成为有强烈社会革命愿望的青年领袖，周恩来到欧洲后，与一般勤工俭学学生不一样，

并没有进工厂做工。是揭露帝国主义的垂死性和共产主义的必然性，肯定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用以批驳国家主义派的反动论点。周恩来在上面发表的《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在旅欧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中影响很大，也给了聂荣臻以很大的影响和教育。1924年1月，国共两党在国内正式合作，为适应高涨的革命形势，进行有效的宣传，旅欧党团组织决定改《少年》为《赤光》。无论是《少年》还是《赤光》，文章都短小精悍，笔锋犀利，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周恩来在归国前，一直主持《赤光》的工作，他为《赤光》撰写的文章最多，内容也最深刻，最有分量。

《少年》和《赤光》的编辑部，设在巴黎南部第十三区戈德弗鲁瓦街17号一座三层楼旅馆的一个很小的房间里。这里既是旅欧支部的所在地，也是周恩来旅居巴黎时一直居住的地方。党团组织的事情，都在这里办理。80年代，法国政府在这里挂了牌子，以纪念周恩来。聂荣臻从电视上看到了这间小屋子，想起过去在那里的峥嵘岁月，想起和周恩来的友谊感到特别亲切。

当时无政府主义在青年中影响比较大，因此，大家第一个论战的目标，就对准了无政府主义派。周恩来在《共产主义与中国》等文章中，都着重批判了无政府主义。他说，离开了阶级斗争，高唱真善美，要求绝对自由，反对一切组织和纪律等，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思潮，根本行不通，对青年毒害很大，要革命必要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除了写文章外，周恩来还经常作为团组织的代表，与无政府主义派进行面对面的辩论。周恩来立场坚定，才思过人，口才雄辩，说理透彻。协助周恩来工作的聂荣臻，每每看到周恩来把对方批驳得哑口无言，甚至有的还为他的演说鼓掌，真为自己遇到这样才华横溢的好领导而高兴。由于周恩来的领导和聂荣臻等人的努力，到1923年底，无政府主义派终于瓦解了，其中一部分人还转到了马克思主义方面，像陈延年、陈乔年的转变，就是典型的例子。

瓦解了无政府主义派以后，周恩来紧接着领导聂荣臻他们向以曾琦、李璜为首的国家主义派展开进攻。国家主义派是勤工俭学学生中的主要右派，他们以“爱国主义”为幌子，极力鼓吹反苏反共，反对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统一战线和国际统一战线，污蔑周恩来、聂荣臻他们搞统一战线是假，要吞并国民党赤化全中国是真。针对国家主义派的谬论，周恩来在文章中，聂荣臻在说理斗争中，反复举例说明，苏联和共产国际是支持各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是为了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他说，我们的第一步，是搞革命的三民主义，“打破私有制”、“无产阶级专政”是走完前面第一步以后的问题，像人走路一样，没有走完第一步，是不可能走第二步的。周恩来的上述论点，驳得国家主义派理屈词穷，其中有些人有所觉悟，改变了立场。但曾琦、李璜之流十分顽固，组织了“中国青年党”与之对抗，而且后来把这种论战带到了国内。当然，中国革命的进程，给他们做了历史结论。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国共合作开始后，旅欧党、团组织也相应做出决定，1923年6月，八十余名旅欧团员均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同年11月25日，国民党旅欧支部成立时，周恩来当选为执行部总务主任，李富春当选为宣传主任。1924年1月，国民党驻巴黎通讯处成立，选举聂荣臻为通讯处处长。

周恩来在法国的生活十分艰苦。他住在巴黎南部戈德弗鲁瓦街17号一家小旅馆里，真可谓身居斗室，惟一的一间住房不到十平方米。这里既是他的

住所、又是党组织办刊物和进行党团活动的中心。人多了，实在坐不下，就只好到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活动。每当聂荣臻到周恩来那里，总见他不是在人谈话，就是在伏案奋笔疾书。吃饭常常是几片面包、一碟蔬菜，有时连蔬菜也没有，只有面包就着开水吃。

当大家确定了共产主义信念以后，都更加关心国内的政治形势，日夜思念着在黑暗中痛苦挣扎的祖国人民，向往能尽快回国参加革命斗争。1924年6月，周恩来接到国内党组织的通知，要他回国工作，他真是高兴极了。

聂荣臻也为周恩来高兴，他决定在自己的住处为周恩来送行。

这一天，巴黎的阳光十分明媚，聂荣臻兴冲冲地买来了葡萄酒，并邀约了几位朋友作陪，与周恩来一起开怀畅饮。

周恩来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感谢聂荣臻的盛意，嘱咐道：

“我回国后，你们在这里的工作担子更重，要团结同志，好好工作，多学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待国内通知，争取早日回国参加革命斗争。”

别国四载，聂荣臻无时不在关心着国内的斗争情况，也想早日回国，以十分羡慕的眼光看着周恩来，并表达了自己早日回国的愿望：

“希望回国后，还能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

周恩来十分高兴，举杯提议：

“为国内相见干杯！”

“为国内相见干杯！”聂荣臻等人同声应道。

由于高兴，颇有点酒量的周恩来以及聂荣臻都微微醉了，大家尽兴而散。大革命时期，聂荣臻与周恩来先后在广州、上海、武汉等地一起工作。

## 二、聂荣臻：如果按恩来的意见办，当时的中国革命就可能是另外一种局面

1925年9月，聂荣臻由苏联回国，经上海到达广州，在广东区党委见到了周恩来。此时，周恩来担任广东区党委军事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兼一师党代表，佩带少将军衔。阔别一年，战友重逢，倍感亲切。各自倾诉着别离后工作情况和互相思念，周恩来告诉聂荣臻：

“我自今年2月份起进行东征，率部讨伐陈炯明，打了几个月仗，把陈炯明的军队赶出了东江地区。6月，为讨伐军阀刘震寰、杨希闵叛乱，又回师广州。因为黄埔学生军觉悟高，纪律好，所到之处，各界群众热诚欢迎，大力支持，所以东征和镇压刘、杨叛乱的作战，都很顺利。”

但廖仲恺被刺，国民党右派极力阻挠革命，使革命阵线不能同心协力，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周恩来又显得忧心忡忡。说：陈炯明趁东征军回师之机，又卷土重来，霸占东江，因此正忙于组织第二次东征。

10月初，第二次东征开始，周恩来又担任了东征军的领导工作。东征军的主力，仍然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其中有大批黄埔学生参加，所以，黄埔师生人人都在关心着第二次东征的动向，聂荣臻也一样。由于周恩来组织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使东征军仍然所向披靡。10月中旬的惠州之役，陈炯明以精锐部队凭坚固守，两天未能攻克，蒋介石动摇了，想放弃攻城。由于周恩来坚持，并直接参与指挥，在东征军、特别是黄埔学生前仆后继的浴血奋战

下，终于攻克惠州，歼灭了陈炯明主力，为第二次东征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到11月中旬，第二次东征胜利结束。下旬，周恩来被任命为东江地区行政委员，在那里建立政权，革新政治，组织群众团体等，同样成绩卓著。聂荣臻听了这些喜讯，真为周恩来高兴。

两次东征，周恩来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再次表现了他出类拔萃的组织领导才能。

聂荣臻到黄埔军校，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被任命为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周恩来指示聂荣臻，在工作中要利用一切机会，积极开展党团活动。周恩来说：

“蒋介石要限制我们，我们就要教育党团员，开展各种活动，争取进步青年，以反对他的限制。”

黄埔有党团领导小组，由鲁易（当时是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负责，以后由熊雄负责。聂荣臻去后，周恩来要聂荣臻作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配合鲁易在学生中发展党团员，壮大左派力量，削弱右派势力。

周恩来还向聂荣臻介绍了左派“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右派“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情况，要他们和鲁易等人积极指导“青年军人联合会”。聂荣臻和鲁易、熊雄等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工作，由于指导思想明确，又有周恩来过去在黄埔的工作基础和重要影响，所以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各方面都取得了成绩。

当时的黄埔军校，为北伐培养了大批军官。这其中，周恩来以及聂荣臻等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蒋介石是极端看重军权的。在他看来，共产党所进行的工作，是在挖他的墙脚，所以非常仇视。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施展了第一个大阴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这一天，聂荣臻和其他一些共产党员，被突然扣留在中山舰上，周恩来被软禁在造币厂。经过我党的交涉，蒋介石自感羽毛未丰，慑于左派势力强大，不得不于当天释放了他们。

聂荣臻获释后，立即来到区党委，陆续等到了陈延年、周恩来。黄锦辉等，当他看到周恩来安然无恙时，心中才松了一口气。大家在一起议论，无不义愤填膺，一致主张给蒋介石以反击。周恩来做了具体分析，他说：

“2月份蒋介石驱逐了一名左派师长，就有反共苗头，他曾向组织报告过，但没有引起重视。现在的情况是，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只有第一军是直属蒋介石指挥的，其他五个军都不会听他的，有的还想乘机搞掉蒋介石。而在第一军的三个师中，有两个师的党代表是共产党员，九个团的党代表，我党占了七个，团长中有金佛庄、郭俊是共产党员，营以下各级军官和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也不少，至于同情左派的革命力量就更大了，第一军又是黄埔军校教导团的底子，党的传统影响很大，我们是完全有能力反击蒋介石的。”

聂荣臻非常同意周恩来的分析，坚决主张向国民党右派进行反击。

同时，不少人也感到，把蒋介石搞下台，其他几个军长同样是些军阀，只要革命侵犯到他们的利益，他们也是会反共反人民的。

周恩来组织观念极强，说，究竟怎么处理，要由党中央决定。大家在紧张中等待中央的决策。过了几天，周恩来向军委的几个同志传达，说陈独秀决定向蒋介石让步。于是，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

聂荣臻后来回忆说：“中山舰事件”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重大挫折。但周恩来在这一事件中的头脑是清醒的，立场是正确的，如果按恩来的意见办，当时的中国革命，就可能是另外一种局面。

“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被蒋介石免去了在第一军的职务，聂荣臻被蒋介石免去了在黄埔军校的职务。这样，聂荣臻就在周恩来领导下，专门从事区党委军委的工作。不久，军委以主要精力为北伐战争做准备。

1926年5月，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先遣队途经广州，周恩来要聂荣臻跟他一起去独立团，并召开了连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会上，周恩来讲话，分析了形势，指明了任务，他要求共产党员身先士卒，使独立团完成好北伐先锋的光荣使命。并且用“饮马长江”的豪言壮语鼓励大家。叶挺领导的独立团，后来在北伐中做出了特殊贡献，被誉为“铁军”。这期间，周恩来还常召集各部队的共产党员布置北伐任务，并作为区党委军委负责人，协助苏联军事顾问加仑将军制定了北伐蓝图。

7月，震撼整个中国的北伐战争开始了。周恩来通知聂荣臻：区党委决定聂荣臻做军委特派员，到北伐军中从事联络工作，沟通区党委、各地党组织与北伐军中党员之间的关系。

聂荣臻立即进行准备，争取尽早出发。原定聂荣臻由陆路北上，就在将要出发时，周恩来获悉，粤北、湘南霍乱流行，立即决定聂荣臻改道上海、武汉、岳阳经水路秘密赶赴长沙，与北伐军会台，并要聂荣臻经过上海时向中央军委汇报北伐计划。

聂荣臻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积极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周恩来交给的任务，为北伐做出了贡献。

1927年3月，周恩来与赵世炎、罗亦农等一起，成功地领导了著名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

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中共中央命聂荣臻和李立三立即赶到上海，了解情况，帮助处理善后事宜。他们到上海后，很快找到周恩来，在赵世炎家中碰头开了会。会上，周恩来沉着冷静地分析了形势，提出了应变措施。聂荣臻向他转达了中央意图：要聂荣臻帮助他整理工人赤卫队，以减少损失。周恩来表示同意。于是他们共同拟定了计划，将工人赤卫队迅速转入秘密状态，把枪支弹药隐蔽了起来。

针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周恩来起草了致中央的意见书，建议中央推动武汉国民政府令北代军东征讨蒋。当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仍然不多，在全国许多地方进行的大屠杀，引起了共产党员、左派人士和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如能按周恩来的意见，缜密组织，采取行动，当能给蒋介石以致命打击。可惜这个意见未被有关各方重视，中国革命再次失去了胜利的机会。

### 三、“你一个人拉出敌人近一个师，是十分了不起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的“五大”以后，国共分裂已成定局。共产党怎么办？7月初，中央组成五人临时政治局，排除了陈独秀的错误领导，发布了7月13日宣言，确定了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在武昌蛇山旁的嘯楼巷，中共中央开会，做出了一个大胆而正确的决定：举行南昌起义。

这天晚上，周恩来在嘯楼巷开完会，匆匆回到中和里军委办公机关，连夜召集军委工作人员进行传达。

聂荣臻知道中央已经有了重大的决定，心情格外激动，聚精会神地听着周恩来讲活：

“……国共分裂了，我们党没有别的办法，惟一的出路就是武装起义。今天，中央会议上已经做出决定，要在南昌举行起义。为此，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指定我为书记。”

听到这里，大家情不自禁地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聂荣臻不禁轻轻鼓起掌来。

周恩来示意大家静下来，然后说：

“现在，我以前委书记的名义，指定聂荣臻、贺昌、颜昌颐三同志组成前敌军委，聂荣臻同志担任书记。你们的任务，是先到九江去通知我们党内的同志，让他们了解中央的意图，做好起义的准备。至于何时起义，要听中央的统一命令。”

聂荣臻听了，感到中央的决定和周恩来的指示是非常正确的，因为九江是个屯兵之地，有叶挺的二十四师、贺龙的二十军。张发奎的二方面军的其他部队也都驻扎在九江一带，在这些部队中有不少共产党员。提前把中央起义的决定传达给这些同志，对起义的成功具有决定的意义。另外，九江位于长江南岸、素有“江西门户”之称，是由长江直通南昌的必经之路，战略位置也十分重要。

想到这里，聂荣臻站起来，表示了坚决的态度，说：

“我完全拥护中央决定，坚决执行中央交给我的任务。”

周恩来继续交代任务：

“荣臻同志，你们到九江以后，第一个要通知叶挺同志。”

聂荣臻点点头，说：

“我明白你的意思。”

因为叶挺本人是共产党员，所率部队战斗力强，素有铁军之称。

周恩来最后说道：

“会议就开到这里，你们三人做好准备就赶快出发吧，我处理完这里的工作，随后就去。荣臻同志到九江以后，要设法把这些情况告诉在九江养病的刘少奇同志。”

列车在原野奔驰，聂荣臻衔周恩来之命，即赴九江。

到了九江，聂荣臻首先找到叶挺，就在叶挺的司令部住下了。当时，因为讨蒋在九江调集的部队已达六个团的兵力，党内许多

负责人也因武汉形势险恶，纷纷来到九江。而张发奎为了在二方面军中排斥共产党员，开始实行“分共政策”，让他的部队中有名气的共产党员退出中国共产党。在这种形势下，7月20日，一些中央负责同志开了个碰头会，聂荣臻作为前敌军委书记和叶挺一起参加了会议，在会上，他见到了谭平山、

邓中夏、李立三、浑代英等中央委员。

李立三不住地用手绢擦着脸上的汗水，显得非常急躁，他说：

“现在形势异常紧迫，我们应该立即行动，不必等待。”

聂荣臻牢记周恩来何时起义要等中央命令的指示，严肃地反对说：

“这不行，我们没有权力擅自行动，必须等待中央的统一命令。”

李立三仍然坚持说：

“既然已经向部队传达了中央的决定，起义工作已经进行了组织准备，下个命令就行了嘛！”

聂荣臻坚持说：

“事情并不这么简单。我们到九江来的任务是做好组织部队起义的准备，准备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嘛！”

这时候，有几个中央委员表示赞成李立三的主张，要马上动

中央的！你听不听党中央的命令？”

李立三语噎了。

会场气氛非常紧张，争论得十分激烈，由于聂荣臻坚决执行周恩来的指示，原则面前毫不让步，据理力争，最后大部分同志还是主张按聂荣臻坚持的那样办，等候中央的统一命令。

7月的九江，正是酷暑盛夏，炽热的日头，烤透了江边饱和着水分的大气，使大地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蒸笼，只要一出房门，就会大汗淋漓，浑身黏腻，而呆在屋里又闷热得透不过气来。

为了在起义前把中央决定传达到各部队的党员领导干部中去，聂荣臻每天从早晨开始，就穿梭似地往各部队跑，每天回来，他的衣服都被汗水浸透。

聂荣臻他们三人把通知传达以后，驻在九江的部队开始陆续向南昌方向集结了，聂荣臻亲自送走了叶挺的二十四师。贺龙的二十军、蔡廷锴的第十师也都分头向南昌开进了。

但是，二十五师却仍然在九江马回岭一带驻扎着。

这时候，周恩来从武汉来到了九江，在叶挺原来的司令部里，周恩来听取了聂荣臻、贺昌和颜昌颐的汇报，然后说：

“感谢你们出色地按中央部署完成了传达任务，我很快就要去南昌，你们下一步的任务有两项，第一，是负责接应赶到九江的部队和零星人员，使他们及时赶到南昌参加起义，第二，是设法把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

说到这里，周恩来强调道：

“记住，这第二项任务，既非常重要，也十分艰巨，拉出二十五师参加起义，就能大大增加我们起义的分量。”

接着，周恩来拍了拍聂荣臻的肩膀，说：

“荣臻，能不能拉出二十五师，就看你的啦！”

聂荣臻默默点头，表示已经领受，然后问道：

“起义的时间决定了吗？”

周恩来告诉他：

“还没有确定，待我去南昌以后，根据形势发展再研究确定吧。”

聂荣臻又问：

“起义以后，我们没有电台，民用电报又不保密，如何同南昌方面联系？”

这，确是一个难题。

周恩来很欣赏聂荣臻虑事周到，用赞赏的目光看了他一眼，又沉思一会儿，说道：

“这样吧，南昌一开始行动，我让他们立刻放一列火车到马回岭，你见到火车就说明南昌已经动手了。”

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办法好，火车来了不但报了信，而且可以运部队和辎重去南昌，于是一致同意了。

形势复杂，情况紧迫，周恩来交代完任务，马上离开九江，直赴南昌。

聂荣臻对颜昌颐说：

“我们的任务很重要，也很紧迫，为了圆满完成恩来同志交给的任务，把工作尽快做好，咱们也来分一下工吧，我的意见是你留在九江做接应工作，我立即到马回岭去拉二十五师。”

颜昌颐坚定地点了点头。

聂荣臻又说：

“恩来同志已经动身去南昌了。起义随时都可能举行。我们就分头行动吧。”

九江到马回岭只有两小站，火车用不了半小时就到了。聂荣臻下了火车，直奔二十五师的驻地。他边走边想：看来在二十五师的传达动员范围应该扩大一些，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央的意图。因为二十五师是预定参加起义的主力部队之一，叶挺曾任过该师的副师长，而且该师的七十三团就是原来叶挺的独立团，我们党的基础比较好，扩大传达范围也不会出什么差错。但是他也清醒地认识到，要想把二十五师从张发奎手里拉出来，及时赶到南昌参加起义，也不是一件易事，必须进行细致的研究和周密的计划。

聂荣臻到二十五师以后，找了许多基层党员干部个别谈话，有的时候他还召集一二十人集体传达，每天都累得汗流浃背，口干舌燥，十分疲劳，白天动员完，晚间还要考虑自己的行动计划。就这样，他在马回岭连续工作了三天，几乎没有睡过一宿完整的觉。人明显地消瘦了。

8月1日这天，突然有人向他报告说：

“从南昌发来的一列火车到了！”

聂荣臻一听，知道是南昌城里起义的枪声打响了，心里不觉一阵亢奋。他见同志们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脸上闪着红光，

身上憋足了劲儿，都眼睁睁地等待着他的行动命令。

聂荣臻看到大家政治热情如此饱满，而纪律又这样严明，心里非常高兴。他穿好衣服，带上手枪，立即找到七十三团团团长周士第，同他研究了一下，决定立刻将部队的辎重装上火车运走，部队随后按预定计划向马回岭南面二三十里以外的德安集中。

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是张发奎的亲信，这个师共辖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等三个团，其中七十四团的团长不是共产党员，党在这个团的基础也比较差，把七十四团拉出来参加起义没有把握。七十五团团团长叫孙一中，黄埔一期的学生，是一个忠于党的好同志，根据这一情况，聂荣臻和周士第决定先把七十三团拉出来，并且命令七十五团随后跟进。

七十五团出发前，聂荣臻对孙一中团长说：

“你们七十五团和帅部住在一起，行动起来很容易被李汉魂发觉，开始行动时，你们不要带背包，不要带行李，也不要带伙食担子，只把武器弹药带上就行了。”

孙一中点头答应了，但他马上又问：

“我们一旦被李汉魂发觉，应该如何回答？”

“你就说拉出去打野外。”

“是！”

七十三团往德安进发以后，七十五团也跟上来了。但是七十四团只带出一个侦察连，侦察连连长是一位共产党员，琼崖人，他不顾一切危险，勇敢地带领全连跟着聂荣臻出发了。

部队冒着盛暑的酷热，急速地前进着，向德安集结。

七十五团还没有完全走出来。突然从九江方向开来一列火车。

原来，张发奎听到七十三团要去南昌参加起义的消息以后，又听说七十五团也动起来了，心里一阵恐慌，赶忙登上火车朝马回岭赶来。

在这种时候，张发奎的火车在一座大铁桥的北头停下，他仍不忘摆他第二方面军总司令的臭架子，站在车门的台阶上，气势汹汹地高声喊道：

“你们要干什么！马上停止行动。”

这时，聂荣臻正在大桥南头的火车上，他听到喊声，定睛一看，正是张发奎。于是对旁边的一个同志说：

“很显然，张发奎匆匆忙忙上来，一定是想制止七十五团的行动。”

那位同志担心他说：

“张发奎如果制止无效果，会不会狗急跳墙，把七十四团拉过来同我们对抗？”

聂荣臻略一沉吟，说：

“估计他不敢。十师、二十四师都走了，九江一带只剩下十二师和二十五师的七十四团，靠这点兵力，他不会冒险的。但是，如今恩来已经在南昌城里开始行动，我们绝不能把张发奎放过去，这样就会增加恩来的压力。”

说完，聂荣臻马上命令跟在他身旁的李排长：

“李排长，你告诉张发奎的司机，让他马上开车回九江，要是他们不开车，你就开枪。但是只准朝天上打，不能打入。”

“是！”

李排长应着，奔向车门，用手搭成喇叭，朝桥北的火车大声喊着，要他们马上开车。然而，由于车上有张发奎坐镇，司机没敢动。

这时聂荣臻对李排长说：

“开枪！”

李排长和其他的士兵拉开枪栓，“啪……”一连放了一排子弹。这下张发奎吓蒙了。他慌里慌张地跳下火车逃跑了，身后还跟着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

张发奎仓皇跳车逃跑，连手枪和望远镜也都没来得及带走。他的卫队落在了车上，结果全部被起义部队俘虏。

阻力排除了。聂荣臻率领着二十五师开始向南进发。火车开到德安，在站台上停留的时候，李排长突然来到聂荣臻的车厢，报告说：

“张发奎派来一个参谋，请求见你。”

“让他上来。”

聂荣臻很奇怪，不知张发奎派人来找他是何用意。

那位参谋上车以后，恭恭敬敬地向聂荣臻行了个军礼，双手捧过一只黄纸红框的大信封。

聂荣臻打开信一看，不由得笑了。原来是张发奎请求归还望远镜。他想。虽然张发奎阻止起义，又搞所谓“分共政策”。但党同他的关系并没有决裂，还是应该做工作，尽量争取的。于是，聂荣臻让李排长将望远镜交给了张发奎的参谋，同时把俘虏的卫队也放了回去。

部队在德安稍事休息以后，聂荣臻命周士第带领七十三团，他亲自带领七十五团继续朝南昌开进。

正要开车的时候，站台上的值勤人员报告说：

“德安以南的铁路不通了。”

聂荣臻斩钉截铁地说：

“铁路不通我们就步行，连夜赶到南昌，和恩来会合！”部队出发不久，天就黑了下來，恰好这天天气晴朗，明月皎洁，正好照着行军的大路。聂荣臻一心想着恩来指挥起义急需大量的部队，所以脚下刻不容缓，带领部队以急行军速度向前、向前……

8月2日拂晓，天刚麻麻亮，一夜急行军的队伍，就踏着晨露，赶到了南昌附近。

聂荣臻率部队进南昌城以后，城里的战斗已经结束。但是大街之上，到处都是战火留下的痕迹，有些墙壁上弹痕累累。

在一所学校里，聂荣臻找到了周恩来，把九江和马回岭的情况和经过报告了一遍。

周恩来有点儿喜出望外，他没有想到聂荣臻拉出这么多部队，高兴他说：

“真是太好了！你们的行动很成功。我原来没有想到会这样顺利的。”

聂荣臻则有点惋惜他说：

“可惜七十四团只拉出一个侦察连。”

周恩来安慰他：

“你一个人拉出敌人近一个师，是十分了不起的胜利，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接着，周恩来向聂荣臻介绍了南昌城里的战斗经过：

“这次起义，我们消灭了敌军四五千人之众，缴获武器五千多件，子弹七十多万发，胜利还是很大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党建立起了一支由自己指挥的武装力量。”

聂荣臻听了周恩来的介绍，心情振奋，高兴得把连日来的疲劳全忘掉了。半晌，他又关切地问道：

“取得初步胜利后，下一步我们怎么打算？”

周恩来向他解释了中共中央的事先安排：

“按预定计划，部队要立即南下，攻占广东，取得海口，以求得国际援助，然后再举行北伐。”

#### 四、起义失败，聂荣臻抬着重病的周恩来来到海边

南昌城里的枪声停止以后，起义部队进行了全面整编。共编成九、十一、二十，三个军，沿用日的番号，仍叫第二方面军。任命朱德为九军副军长；贺龙为二十军军长兼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叶挺为十一军军长和前敌总指挥兼二十四师师长，聂荣臻为十一军党代表。

部队整编以后，就开始南下了。

南昌起义部队在南下途中被打散。

聂荣臻和叶挺带领部队到达了普宁县境的流沙。

流沙是一个小小的村落，只有一条不长的街道。他们在道旁的一座小庙里找到了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们。

聂荣臻先进了庙堂，只见庙堂之内坐满了人，他所熟悉的有李立三、谭平山、浑代英、张国焘等大约二三十人，一个个显得十分疲惫。原来革命委员会正在这里开会。

聂荣臻扫视了一下人群，却没有看到周恩来，就急切地问旁边的人：

“ 恩来同志为啥子不在？ ”

那人回答：

“ 在里面躺着，他病得很重。 ”

聂荣臻不禁吃了一惊，疾步穿过人群，进到里面，看到在供案旁边一副临时扎成的担架上，周恩来闭目躺在那里，正处于昏迷状态，只见他面色苍白，满脸病容，显得极为痛苦。聂荣臻伸

手摸了摸他的额头，简直烫得的人。

这时，李立三对聂荣臻和叶挺说：

“ 你们来得正好，就坐下来参加会议吧。 ”

会议讨论了很多问题，改变旗号、政治路线、土地革命、政权等等都研究了，最后又讨论下一步的行动问题。有人主张向海陆丰方向撤退。这时叶挺说：

“ 我不主张去海陆丰，那地方已经有了敌人，我们到那里以后，又容易受到广州和汤坑两方面敌人的夹击。海陆丰是个不大的地方，又面临大海，到时候我们势必背水一战，是相当危险的。 ” 聂荣臻听了叶挺的话，认为叶挺的意见正确，说：

“ 二十五师被隔在三河坝，失掉了联系，二十四师伤亡很大，再打下去是很困难的。 ”

这时候有人进了庙堂，向大家报告说：

“ 二十军在前边走的两个师被敌人打散了。 ”

这一消息，无疑使在座的人感到十分震惊，会场上顿时静了下来，有人非常气愤，也有的人显得十分沮丧。争论之中，意见更难统一了。

聂荣臻见有的人信心有些动摇，就说：

“ 依我看这也不奇怪。通过这件事，我们可以吸取一些教训，旧军队要改变成新的革命军队，不经过彻底改造是不行的。否则，一旦有什么风浪，那是经不起考验的。 ”

会议还没有开完，庙外就“ 噼噼啪啪 ” 响起了枪声，有人在大声地喊：

“ 敌人袭来了！敌人袭来了。 ”

起义部队二时也乱了起来。二十四师撤下来的部队同革委会的人混在一

起，部队已经不成建制了。形势十分危急。

会场人员迅速地撤离了。大家分散突围。

聂荣臻和叶挺始终守护着周恩来的担架。周恩来病情依然很重，他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眼下仍然连稀粥也无法下咽，有时神志不清，昏迷之中，还不时地喊着“冲啊！”“前进！”等话语。部队散乱得已经不见踪影了。聂荣臻和叶挺带几个人护着担架前行，道路不熟，当地话又听不懂，几个人中间只有一支小手枪，如果真的遇到敌人，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情况十分危险！

幸亏早在北伐以前，彭湃在海陆丰地区领导农民运动已取得很大成绩，并且有了相当的工作基础，沿途的农民群众对他们都很好，这才没有发生意外。

这天傍晚，他们一行人来到一个小村子里，聂荣臻同叶挺商量，想找一个当地党的负责同志，请他帮忙解决困难。

天渐渐黑下来了，他们抬着周恩来，在一家老实巴交的农民家里用过了饭。不一会儿，当地的老乡从外面领来一位农民打扮的人。

这人一进门就被聂荣臻认出来了，聂荣臻兴奋地握住来人的手说：

“这不是杨石魂同志吗！”

那人看了看聂荣臻和叶挺，也惊喜他说：

“是啊，是啊！万万没想到是你们几位同志，这不是恩来同志吗？他怎么病成了这个样子？”

聂荣臻、杨石魂相当熟识，因为杨石魂也曾在中央工作过。于是，聂荣臻就把南下以来的情况介绍了一遍，最后说：

“你是当地人，对这里的情况熟悉。恩来同志病很重，你就不要离开恩来同志了，我们很需要你。”

杨石魂问道：

“你们准备到哪里去？”

聂荣臻看了一下重病的周恩来，考虑了各种情况，并且同叶挺商量了一下，说道：

“你设法把我们送到香港去吧，只有在那里，恩来同志才有养病的环境和条件。”

杨石魂知道周恩来是党中央领导人，对周恩来也很崇敬，就果断他说：

“好吧，我一定想办法护送你们去香港。”

第二天，太阳隐入大山以后，聂荣臻和其他同志用担架抬着周恩来，艰难地朝陆丰的甲于港转移。这里是一个海滨小市镇，港湾内停泊着各种渔船，桅杆如林，白帆点点，海滩上到处晾晒着鱼网。

杨石魂领着他们来到海边一家渔民家里，先把周恩来安顿好，然后说道：

“你们在这里等一下，我设法去搞一条船来。”

杨石魂颇有办法，不到一个时辰，就匆匆地回来了。他说：

“船搞到了，不过只是一叶小舟，没有办法，实在搞不到大一点的了。”

窗外已经开始发亮，趁着人们还在休息，聂荣臻他们抬着周恩来悄悄来到海岸边。岸边果然有一条小船在等候他们。

那船也实在太小了。聂荣臻他们小心翼翼地将昏迷中的周恩来安顿在带小席棚的舱里以后，就再也没有空隙能够坐人了。聂荣臻、叶挺和杨石魂只好坐在棚子外面狭窄的船板上，船老大一个人在后面摇橹。

小船渐渐离岸，沿着岸边航行。一阵晨风吹起，海浪在晨风的掀动下越来越大，越来越狂。船老大不敢离岸太远，远了海浪太大，容易翻船；但也不敢太近，因为太近了容易被岸上的人发现。

小船在风浪里像一片飘忽不定的轻羽，一会儿被托到浪峰上，一会儿又被抛入浪谷中，船身摇晃得非常厉害，人在船上也随着小船颠来簸去，根本无法坐稳。

周恩来的病情丝毫也没有减轻，高烧、昏迷，而且水米不进，还经常大声他说着胡话。

聂荣臻坐在船板的最前端，风浪中，他的身子一会儿被晃到这边，一会儿又被晃到那边，在清醒时还可以用双臂紧紧地抱住桅杆，有几次因疲劳打盹，差点被掀下海去。

他觉得这样的航行简直太危险了。便问船老大：

“老大，这里离香港有多少里水路？”

“三百多里的样子。”

“我们会不会遇到更大的风浪？”

船老大笑了笑，风趣他说：

“就看我们五个人晦气不晦气喽。”

一天过去了。太阳晒，海风吹，聂荣臻感到脸上火辣辣地疼，像是撒上了辣椒面似的。

进入夜间航行以后，他困乏得直想睡觉，不住地打盹，有几次差点掉进波涛汹涌的大海。

聂荣臻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一个好办法来。他对船老大说：

“老大，你有没有手指那样粗的绳子？”

“船上别的东西没有，要绳子可多得很。”

聂荣臻要了一条绳子，将自己的身子牢牢靠靠地拴在了桅杆上。叶挺笑道：

“亏你想得出这样的‘好办法’。”

聂荣臻说：

“这办法受点罪，但绝对安全。我可以放心大胆地睡一觉了。”

小船在海上整整搏斗了两天一夜，终于在一个晴朗的早晨驶进了香港的鲤鱼门，在铜锣湾的海面靠了岸。

下船以后，杨石魂说：

“你们在这里照看恩来同志，我去找省委联系。现在广东省委在香港办公。”

没过多久，杨石魂就回来了，他把周恩来接去，安置下来治病，然后又匆匆回海陆丰去了。

不久，聂荣臻和叶挺也同广东省委联系上了。叶挺将家眷由上海接来，在香港安了家。聂荣臻被分配到广东军委工作。

## 五、周恩来：“我是吃喜糖来了”

1927年12月11日至12日，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聂荣臻等人的领导下，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这一起义，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起，共同进入了创建中国革命武装的新时期。1928年1月中旬，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会议，全面检查广州起义问题。参加会议的人相当多，有张善铭、恽代英、周文雍、陈郁、黄平、吴毅，杨殷、邓发等同志。当时张善铭虽然是省委代理书记，但实际上是李立三主持会议。李立三独断专行，把起义说得一无是处，完全抹杀了起义部队指战员的革命热情和大无畏的英勇献身精神，指责这次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省委领导犯了军事投机和盲动主义的错误，在关键时刻动摇，对起义指挥不力等等。

会上，许多同志不同意他的意见，有的还举出“巴黎公社”的例子，要他正确对待这次牺牲了几千名同志的革命起义，但李立三根本听不进去。最后，他采取惩办主义的政策，决定处分大批同志。与会同志坚决反对他这种蛮不讲理的态度，聂荣臻也感到非常愤慨。

会后，李立三自己担任了广东省委书记，并把处分决定上报给中共中央。中央收到李立三的报告后，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认为李立三的做法不妥，于同年三四月间派周恩来来到香港，重新处理这件事情。

周恩来到后，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全面分析了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与经验教训，对有错误的同志也提出了批评，并宣布原来的处分决定无效。大家认为周恩来是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

对于周恩来的决定，聂荣臻作为起义领导人，表示衷心的赞同。

一天，聂荣臻给周恩来看了一张剪报，上面有周文雍、陈铁军在敌人屠刀面前举行“刑场上的婚礼”，然后英勇就义的消息和照片。

周恩来深情他说：

“我跟你同感，我与两位烈士也熟悉，烈士的事迹确实催人泪下，他们是共产党人为革命视死如旧的典范。”

对烈士的哀思，使周恩来、聂荣臻相对沉默了许久。

1928年4月，正是香港的大好时节，春光明媚，和风拂柳。一个花好月圆之夜，聂荣臻和张瑞华结婚了。

为了表示良好的祝愿，周恩来到他们家做客。那是他们结婚

忆说：“一见到总理。印象就非常深刻，总理对人亲切、可敬、非常有礼貌。我虽然是毛孩子，但总理不是把我当成毛孩子，他是那样温和、亲切，我一下子就记住了。第一次的印象就是这样。以

后印象一直是这样。”

## 六、“荣臻工作勤奋，虑事周详，是我的好参谋长”

1930年初，聂荣臻由香港调天津顺直省委任组织部长，途经上海向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受领任务。周恩来告诉聂荣臻：顺直省委书记张慕陶有托派嫌疑，中央决定以调离工作的方式，免除张的职务，所以，你和贺昌去后的主要任务是夺他的权，但要注意不动声色，以免打草惊蛇。聂荣臻遵照周恩来的指示，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1930年5月，聂荣臻调到上海中央特科工作。周恩来当时正在苏联，8月，周恩来回到上海，立即为准备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而紧张地工作。不久，聂荣臻调中央军委做周恩来的助手。9月下旬，周恩来与瞿秋白一起，主持了六届三中全会，会议做出决议，批评了李立三要组织全国总起义，以及集中红军主力攻打中心城市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聂荣臻列席了这次会议。周恩来是这次全会的实际主持人，但他很谦虚，总是把瞿秋白推到前台，让他主持会议，作报告，发表结论性意见。因此，三中全会使瞿秋白成为党中央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

1931年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聂荣臻、陈郁、陈赓等七人组成中央军委，周恩来任书记，聂荣臻任参谋长，以加强对各苏区军事斗争的各项支援工作。

面对各苏区不断取得的胜利，聂荣臻深受鼓舞。在周恩来主持下，他与刘伯承、叶剑英、傅钟、李卓然等一起商量，决定翻译苏军的步兵战斗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作为各苏区军事斗争的参考。于是，刘、叶负责翻译步兵战斗条令，傅、李负责翻译政治工作条例。后来这两本书送到根据地，发挥了积极作用。

1931年4月，发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的严重事件。聂荣臻得悉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报告的消息后，深知问题极端严重。特科是党中央的安全保卫机关，顾顺章几乎知道中央机关和负责人住址的全部情况。他的叛变，使中央领导机关面临遭受毁灭性破坏的威胁。毫无疑问，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负责人、军委书记是顾顺章要加害的首要目标。于是，聂荣臻首先火讯奔赴周恩来住处，向他报告和商定对策。周恩来不在，聂荣臻见到了邓颖超，把情况告诉了她，要她带上必须带而又能够带的东西，立即离开住处，越快越好，由聂荣臻到别处继续找周恩来。

当天，周恩来得到了聂荣臻的报告后，即与陈云商定了对策，又找到领导军委特科的陈质、李克农、李强等几位同志，分工负责，在两三天的时间里，把顾顺章知道的所有机关和负责同志的住处都搬了家。结果，顾顺章指引特务来上海搜捕时，一一扑空。

聂荣臻是军委参谋长，陈赓是特科反间谍工作的负责人，他们平时就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这次在处理顾顺章叛变事件中，做

出了突出贡献。通过处理顾顺章事件，聂荣臻再次领略了周恩来沉着镇静、临危不惧的品格和非凡的组织领导才能。

1931年春天，聂荣臻逐渐发现中央各苏区程度不同地出现了肃反扩大化的倾向，到处在抓“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等所谓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阶级敌人。他与大家议论，各地红军在不断打胜仗，如果内部真有那么反革命分子，这些胜利的取得，就不可想像，也是不合逻辑的。1931年夏

天，欧阳钦到中央苏区了解情况，回来汇报了那里肃反扩大化的事例，使聂荣臻更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聂荣臻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周恩来也正在思考这一问题，听了聂荣臻的汇报，颇有同感，立即向中央写信建议予以纠正。中央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通知各苏区注意。此后，各地逐步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聂荣臻在任军委参谋长期间，协助军委书记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受到了周恩来的高度评价。他不止一次称赞聂荣臻说：

“荣臻工作勤奋，虑事周详，是我的好参谋长。”

1931年12月，中共中央的负责人逐渐离开上海，到各个苏区。周恩来、刘伯承、叶剑英等人相继离沪。

革命斗争虽然艰险，但周恩来、聂荣臻等职业革命家仍然充满乐观主义精神。应聂荣臻之约，周恩来临走之前，与邓颖超一起，专程到聂荣臻家里吃饭。张瑞华知道周恩来喜欢吃“狮子头”和饺子，特意准备了三鲜（虾仁、鸡腿、冬笋）馅的饺子。

晚上，周恩来和邓颖超冒着寒风如约而至，聂荣臻提早半小时赶回。张瑞华已经煮了一锅饺子，有的还煮破了。先把好的吃了，然后又吃破的，最后连汤都喝光了。

周恩来一边吃，一边对邓颖超说：

“真好吃！真好吃！等于过了一个年。难忘得很。”

对于这顿称不上便宴的便宴，邓颖超一直不忘，直到80年代，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邓颖超每次见到张瑞华时，还常常提起：

“那个饺子怎么那么好吃呢？！”

张瑞华便说：

“那是在艰苦的环境啊！”

1934年10月，历史上著名的长征开始了。

长征之前，一军团在福建打了温坊，奉命回到瑞金待命。军团政委聂荣臻和军团长林彪提前一天赶到瑞金。周恩来找他们单独谈话，说明中央决定红军作战略转移，要他们秘密做好准备，但

目前又不能向下透露，也没有说明转移方向。转移之前，同时向他们部署战斗任务，要一军团先到兴国抗击和迟滞周浑元纵队的进攻，以便掩护各路红军到预定地域集结。

1935年8月，红军长征到班佑的前一天，聂荣臻给后面的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李富春打了一个电报，把自己沿路经过的情形和后续部队要注意的事项，特别是把自己的经验教训，告诉了他们，并请他们转报周恩来。其中有一段是：

一军团此次因衣月良太缺和一部分同志身体过弱，以至连日来牺牲者约百余人，经过我们目睹者均负责掩埋，在后面未掩埋的一定还有，你们出动时，请派一部携带工具前行，沿途负责掩埋。

从这封电报，不难看出当时斗争之艰苦。

十天以后，聂荣臻收到周恩来的复电：

据三军团收容及沿途掩埋烈士尸体统计，一军团掉队落伍与牺牲的在400以上……同时，周恩来嘱咐聂荣臻要“特别注意改善给养，恢复体力”。

长征中，环境十分艰苦，许多同志在作战中那么英勇没有牺牲，却在缺粮少药、饥饿、寒冷、疾病、高原缺氧的艰苦征程中痛苦地倒下了。

周恩来此时也正在病痛之中，一直坐着担架行军和指挥打仗。但他时刻关心着同志，不忘要聂荣臻“注意改善给养，恢复体力”，使聂荣臻深受感动，感受到了周恩来那博大的胸怀和同志式的温暖。

## 七、共撑“两弹”创辉煌

1955年1月和195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分别做出了研制原子弹和导弹的决定。1956年11月16日，中央决定聂荣臻任国务院副总理，接替陈毅主管全国的科技工作。从此，聂荣臻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与周恩来一起，开始了组织“两弹”研制，实现中国人“两弹”梦想的奋斗历程。

聂荣臻受命之后，周恩来立即委托他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研究确定调集三十多名专家，到即将组建的国防部五院（负责导弹研制）工作。

1956年10月，聂荣臻在国防部五院的成立大会上，要求大家把“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研成果”，作为五院的建院方针。这一方针，很快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赞许，并被批准作为我国导弹事业发展的方针。

1956年10月以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苏联的赫鲁晓夫在对我国的新技术援助方面出现了松动的迹象，聂荣臻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机会。立即向周恩来建议说：

“是不是再和他们谈一谈，让他们援助一下，派一点专家，提供一些资料和样品，由我们自己搞。”

周恩来表示赞同，说：

“可以先找苏联顾问谈谈。”

1957年7月，聂荣臻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找当时苏联驻中国负责经济技术的总顾问阿尔希波夫，提出希望苏联在尖端武器的研究制造方面，对我国给予技术援助。阿尔希波夫平时对华很友好。听后热心他说：

“我本人同意，待请求我国政府以后再予答复。”

1957年7月20日，聂荣臻得到阿尔希波夫的答复，苏联政府对中国的要求表示支持，他受权宣布，同意中国派代表团去苏联谈判。聂荣臻随即把这个消息报告了毛泽东。周恩来。

1957年9月，经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批准，聂荣臻与陈赓、未任穷等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同以别尔乌辛为首的苏联代表团进行了认真谈判。历时35天，于10月15日双方达成协议在莫斯科签订了苏联在火箭和航空等新技术方面援助中国的协定（以下简称《十月十五日协定》），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谈判任务。

《十月十五日协定》签订以后，1957和1958这两年执行得比较顺利。虽然苏联只是向我国提供了几种过时的寻弹、飞机和其他军事装备的实物样品，交付了相应的技术资料，派了些技术专家，但这些，都使我国争取了时间，缩短了差距。

1960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举行扩大会议。会上，聂荣臻将中、苏经济援助与科学技术协作方面的变化和趋势，首先报告了毛泽东与周恩来，以后又在会上就此做了发言。聂荣臻在发言中提出，苏联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终止与中国的协议。他说：

“米格—21飞机和导弹的技术资料，苏联都卡住不给了。看来，靠苏联援助肯定靠不住了。苏联为了保持领先地位，加上对中国不放心，所以在国防新技术方面加紧限制的情况，已经越来越明显。我们已经摸盾了他们的根本意图，就是在尖端武器装备的科学研究上，使中国与他保持相当的距离，

只同意我们仿制苏联即将停产甚至已经停产了的装备。总之，他们是想长期使用中国停留在仿制阶段，处于依附地位。”

周恩来对聂荣臻的报告十分重视，仔细看了数遍。然后，他又在这份报告上，密密麻麻地写了许多批语，并把报告转给外交部，以引起外交部的警觉。

聂荣臻的报告，为毛泽东、周恩来进行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到1960年8月，苏联从我国撤走了全部技术专家。至此。《十月十五日协定》已经被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彻底撕毁了。

随着中苏关系的这种变化，聂荣臻一直在考虑我国在独立自主地发展科学技术上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同一些同志商量研究以后，他于1960年7月3日向党中央写出报告，提出了三点建议，而这些建议，首先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并在建议书一旁做了许多中肯的眉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一、苏联在重要技术关键上卡我们，令人气愤，但气愤并没有用，一定要争口气。事情有可能这么一逼，反而会成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动力，会使我们更加坚决地在科学技术上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不是指望外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重要建设的设计。设备和技术大都是成套进口，这一段对我们很有帮助，使我们能迅速掌握技术，但是，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某种科学技术上的依赖心理，有些同志总想伸手向人家要，无形中放弃了自力更生的方针。目前国民经济中一般技术问题大体上解决了，还有一些重要的环节尚等解决，只要我们努力是可以解决的，尖端技术方面虽然还差，但也已经从无到有，打下了一些底子。在科学技术上已经找到了我们自己的一些路子。因此，在新的形势面前，我们继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是可能的。

周恩来阅时在此旁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显然，他是赞同这一方针的。

二、今后科技来往应采取新的做法。凡协议上有的项目，我们到时候就要询问，仍然要，但对方不给，绝不再催，挂上一笔账。协议以外的新要求就不提了。对例行的年度中、苏科技合作，也以少提为好。我方已签字承担的义务，如提供苏方技术资料，接受来华考察等，在一般科学技术范围内，我们仍应按协议如约完成。对苏联专家，要贯彻中央所指示的方针，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多做工作。派留学生的方针也要重新考虑，对方限制重重，去了学不到什么新技术，因此，最近应少派，但不中断。三、独立自主，立足国内，绝不意味自己封锁自己。

周恩来在此旁批：“关于科学技术，一要，十分必要的仍然要提，他们不给，不强求。二学，留学生、实习生、研究生已经去的必须学好，不给学就不学。来我国专家，必须派人向他们认真学习，不教就不学。三买，凡可以购买的重要技术资料，应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千方百计地买到。四钻，不管要到、学到、买到与否，或者多少，主要还靠自己钻研，自己不钻，不仅不能有独特的创造发明，而且也不能把要到、学到、买到的用于实际和有所发展。”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历来对科研工作非常重视，积极支持，他们很快就批准了这个建议。陈毅看了聂荣臻的报告，甚

至表示，当掉裤子，也要把我国的尖端武器搞上去。他还多次对聂荣臻风趣他说：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现在还不太硬，你们把

导弹、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就硬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决心和陈

毅的鲜明态度，给了聂荣臻以莫大的鼓舞。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研制原子弹、导弹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由周恩来、贺龙、聂荣臻等 15 人参加，周恩来任主任，以领导、协调各有关部门、单位的工作。

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识到国防尖端武器对于中国的迫切需要，所有的研究院、所、工业部门、大专院校，都对国防科研开了绿灯。国务院各大部，都有一名副部长专门对五院和二机部（负责核武器的研制）负责，这是周恩来亲自安排的。一是为了迅速解决国防科研问题，二是为了保密。国家计委、经委也都有国防科研的计划，经费和物资专管部门。周恩来怕这些当家理财的人手头太紧，一再交代，“两弹”方面要钱，要多少钱就给多少。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两弹”攻关经费完全保证使用。聂荣臻却经常提醒大家要节约办一切事情，他深知周恩来是十分节俭的。操持这样一个大国、穷国，拨出每一笔经费，都要反复掂量。聂荣臻的态度是，该花的就花，不该花的，一分钱也不要乱花。在苏联专家撤走之后，“两弹”研制又面临着另一个重大困难：由于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严重失误，加上自然灾害，饥荒迅速在中国大地上蔓延。

酒泉导弹发射基地缺粮的情况反映到周恩来那里。总理一直在思谋着办法。一天，军委正在开会，周恩来突然来到会场，对大家说：

“我这次来，是为火箭部队募集粮食的，聂老总告诉我说，他们正在大西北沙漠深处挨饿，那里连挖野菜也没有条件呀……”

周恩来有些说不下去了。

整个会场都沉默了。

杨成武第一个说话：

“宁可勒紧我们这些人的腰带，也要保证科技人员的需要。我们的导弹、原子弹要上天，不能让它饿死在摇篮里！”

周恩来果断他说：

“我们一定要争取半个月之内，最好一个星期之内给酒泉运去一列车粮食。”

聂荣臻强调说：

“导弹，这是共和国的鲲鹏大鸟，只有让它吃饱，它才能飞得高。”

好几个军区的领导马上表态：

“请总理和军委放心，我们保证按期节省出一列车粮食来！”

周恩来焦虑他说：

“苏联人撤走的时候。我们夸下海口。不出三个月，一定让火箭起飞。这件事西方记者已经放风到全世界了。如果火箭不能按期放，那我们国家和军队的形象可就要受损害了。”

几天之后，果然有一列满载粮食的列车向西北开去。

11月5日，中国自制的的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从苏联8月撤走全部专家算起，果然是不出三个月，我国自制的火箭按时放飞了。

1960年12月，由于过度劳累，聂荣臻又住进了协和医院。在病床上，他仍时刻在惦记着国防科研战线上科技人员的生活困难问题。21日，他对秘书说：

“我想了好久，你今天去找张爱萍同志，让国防科委的同志们商量一下，五院的科技人员一定要劳逸结合，决不能让他们搞坏身体。”

接着聂荣臻要通了周恩来的电话：

“总理，可不可以以我个人的名义再向各大军区和海军呼吁一下，请他们支援一些腊肉、黄豆、鱼、海带之类的东西，分发给科技人员？”

周恩来立即表态：

“这个办法好，我支持。”

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病中的聂荣臻一个个给各大军区领导打电话，请他们慷慨支持。过了两天，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到医院看望老首长。聂荣臻对郑维山说：

“我知道你们的家底，你们有生产，有东西，你一定要拿出一些来，你可不能小气呀！”

郑维山对老首长的回答也很干脆：

“东西我一定搞一些，另外还可以打些黄羊。”

“募捐”进行得很顺利，海军、北京、广州、济南、沈阳等军区价拨给国防科研战线一大批腊肉、鱼、海带、黄豆、水果等，有些还是无偿赠送的。

陈毅听到消息，到医院看望聂荣臻时说：

“听说你在为科研单位‘募捐’，也加上我的名字。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宝贝，要爱护。我这个外交部长要想腰杆硬，也要靠这些人，我们不吃，也要让他们吃。”

东西运来之后，聂荣臻让有关方面以军委的名义，把它们全部分给专家和科技人员。

经过周恩来、聂荣臻的精心组织，经过广大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1964年10月16日15时整，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终于试验成功，蘑菇云升起在红戈壁！

从1956年开始组织研制，到1964年爆炸成功，整整八年，凝结了周恩来和聂荣臻八年的心血。中国人的梦想实现了，周恩来、聂荣臻的梦想实现了。

这一天，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的办公室里，指挥核试验。聂荣臻则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聚精会神地紧盯着专线电话。张爱萍通过二机部办公楼刘杰部长的办公室，与周恩来、贺龙、聂荣臻、罗瑞卿保持联系。

当电话里传来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消息时，聂荣臻高兴极了，立即要通了周恩来的电话。俩人在电话上互相表示热烈的祝贺。打完电话，聂荣臻随即便要秘书起草贺电：

爱萍、西尧同志：消息传来，甚为兴奋，特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全体参加这一试验工作的同志们，致以热烈的祝贺。

聂荣臻

1964年10月16日5时30分

核爆炸试验成功后，知情人都在兴奋之余又表现出焦急。这么天大的喜讯，为什么不早点公布，让全国人民也分享这胜利的喜悦？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不解地问聂荣臻。聂荣臻笑呵呵他说：

“刚才与总理通了电话，总理说，毛主席指示，我们先不忙公布，要等外电报道证实以后再公布。”

由于中国一开始就提出了原子弹试验的高标准要求，所以第

一颗原子弹的试验结果，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指挥部根据各种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是，这颗原子弹的爆炸威力为2.2万吨TNT当量。

不多久，西方各大通讯社对此纷纷作了报道。美国也侦察到，中国在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万吨级原子弹。深夜 23 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才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散发了套红大字的号外。

原子弹爆炸成功了，下一步，就是怎样用导弹将原子弹输送出去的问题。1966 年 9 月 5 日，聂荣臻召集有关单位负责人会议，听取了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试验的准备工作情况汇报。聂荣臻说：

“这个试验一定要搞下去，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停下来，要防止有些人思想不集中，而影响产品质量，导致试验失败。”

1966 年 10 月 20 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专委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这次试验要冒极大的风险，万一核弹头在发射场爆炸，或发射后中途掉下来，或偏离弹着区，都将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试验只许成功，不能失败，而且只能进行一次。任务是艰巨的，执行任务时的危险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周恩来叫大家提出困难和可能发生的问题，他都一一做了细致周到的安排。然后，语重心长他说：

“要百分之百地保证成功，百分之百是指一切检查结果都没有问题了，二机部、七机部（即原五院）、国防科委，从今天起一心一意抓好这件事，在十天或更多的时间内，要做到‘一心无他’。”

说到这里，周恩来停顿了一下，环顾四周，好像在问，谁去主持这次要求万无一失的试验呢？

聂荣臻当即说：

“我深信我们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和基地的工作同志，都具有高度的负责精神。听了各方面的汇报，我认为，我们的设计工作做得是扎实的。我们自己研制的中近程地地导弹，已经多次试射，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发射成功率是经得起考验的。再说，为了使我们国家的导弹能够真正成为具有强大作战威力的武器，也必须进行实弹结合试验。为了使同志们增强信心和使各项工作力争做到万无一失，我决心到现场去主持这次试验。”

然后，聂荣臻以恳切的目光紧盯着周恩来。

周恩来满意地点点头，因为，他对这位共事四十多年的战友和部下太熟悉了，确实是位最合适的人选，于是微笑着说：

“聂总如身体好，到现场去也好，亲临现场，鼓舞士气。”

临了，周恩来讲了一句极富哲理的话：

“精神的原子弹转化为物质的原子弹，物质的原子弹证明精神原子弹的威力。”

四天以后，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就这次重要的试验，又驱车来到钓鱼台国宾馆，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批准了这次试验。任务就这样定下来了。

10 月 15 日上午 9 时 30 分，聂荣臻带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嘱托，从西郊机场登上军用专机，经过三个多小时飞行，到达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的飞机场。下午，又乘专用火车到达基地办公区。稍事休息，即召集钱学森、二机部副部长李觉、国防科委副主任唐延杰和张震寰、基地代司令员李福泽等汇报准备工作情况。

根据周恩来万无一失的要求，聂荣臻着重询问了核导弹飞行中发生意外时完全自毁系统的情况如何？回答是：这一系统已经模拟试验过多次，均获得成功；现用的这套装置，经全面测试，各项参数全部合格，接着，聂荣臻

又仔细询问了核导弹飞行经过地

区居民的安全情况，得知居民已进行了必要的疏散。有关单位还就近准备了许多汽车和救护分队，万一发生意外，可以紧急将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区或进行救护。核武器试验基地，就这次核导弹弹着区的安全防护问题，也已经撰写了各种有效的预案。

得到了这些满意的回答，聂荣臻这才宣布结束汇报。

第二天上午，聂荣臻先到地地导弹准备阵地，了解导弹准备状况。后来，又到现场了解核弹头的准备状况。经过向专家们仔细询问，确信准备工作已达到万无一失的要求后，他才下令将地地导弹和核弹头转运至发射阵地。下午，他又赶到发射阵地，鼓励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两弹”对接和通电试验。这是一项最危险的工作，人们劝聂荣臻离开。他干脆拿把椅子坐下，并说“你们什么时候对接通电完，我就什么时候离开。”

聂荣臻的言行，令在场的人深为感动，也极大地鼓舞了现场操作的科技人员。对接通电完，应大家的要求，聂荣臻高兴地与在场的专家、工程技术人员、领导干部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在中国第一枚核导弹前合影留念，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镜头。

再过十几小时，也就是27日上午，核导弹就要发射了，大家的心情激动而又紧张。晚饭前后，聂荣臻注意到周围的人员一个个话都很少，表情严肃。于是，他有意在这天晚上把主要专家、工程技术人员、领导干部请到一起，看电影《奠边府战役》。临散场，还嘱咐大家松弛松弛，睡好觉，养精蓄锐，好迎接明天的战斗。

发射时间预定在27日上午9时。聂荣臻8时整就赶到指挥所指挥发射，正当各项准备工作紧张进行之际，临发射前15分钟。突然传来电讯，核导弹预定弹着区高空出现了一股预报之外的强风，怎么办？聂荣臻想起了周恩来“要百分之百保证成功”的要求，立即拿起电话，请示周恩来。

周恩来的回答对聂荣臻充满了信任：

“一切由你在现场决定。”

聂荣臻沉思了一会儿，离预定的发射时间还剩十来分钟，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指挥中心的大厅内静得出奇，没有一点响声，一切似乎已经凝固，只有倒计时指示针的闪光亮点，在仪器上不停地跳动，催促着聂荣臻早下决心。

聂荣臻是最讲科学的，他与在场的专家紧急磋商了一下，几分钟以后，聂荣臻重又要通了周恩来的电话，陈述了按原计划发射的理由：

“这股意外的高空风约六级左右，风向西南，而且比核弹头预定爆炸点要高得多。弹着点可能有些偏移，但不会超出允许的公算偏差之外。核爆炸的烟尘，不会影响到核试验基地工作和生活区的安全。”

周恩来听过聂荣臻非常细致的分析。当即表示同意。准备发射的指令，从指挥中心传向四面八方。

9时许，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的火焰，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飞离发射架，直指苍穹，渐渐地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外，只有雷达的电波仍在严密地监视，跟踪着它。

时间一秒一分、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显得那样漫长。导弹发射现场所有的人，都在紧张地等待着。终于，若干分钟以后，从弹着区传来了核导弹于9时9分14秒精确命中目标区，在预定高度实现核爆炸的消息。

聂荣臻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摘下墨镜，眼神和脸上流露出发自内心的喜悦。因为他清楚，这一胜利，在中国国防建设和建军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指挥大厅的人们纷纷走来，他微笑着与大家握手，然后脱下防护服，走出指挥大厅，向欢呼雀跃的人群挥手致意，共庆胜利。

晚上，在基地庆祝大会上，聂荣臻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毛泽东、周恩来，向全体参试人员表示亲切的慰问和热烈的祝贺。他强调指出：

“这次试验，是在过上导弹和核弹头分别试验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次综合性的更高级的试验，是检验战斗实用性质的试验。试验结果，证明我们的设计是成功的，水平是不低的，质量也很好……还初步摸索了这种战略性武器的综合使用性能，对今后部队的装备、训练、战斗使用，基地建设，都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10月27日，《人民日报》号外以套红大字标题，发表了我国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的消息。消息指出：中国在本国国土上，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试验。导弹飞行正常，核弹头在预定的距离，精确地命中目标。实现核爆炸。

消息传出，举国上下，无不欢欣鼓舞。

10月31日，为检查这次导弹核武器试验的效应情况，聂荣臻第一次来到西北核试验基地。他让飞机先到弹着区上空转了一圈。从机上往下看，由于这次核试验是在高空爆炸的。地面弹着区的巨大白十字标记仍非常清晰，布置的效应物受破坏的状况，也大至依稀可辨。聂荣臻感到十分自豪，让随行人员也注意观看。11月3日，他又从核试验基地乘飞机赶到弹着区，检查了这次试验的效应详情，向在这里以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冒着巨大危险参加试验工作的英雄们，表示了亲切的慰问和敬意。

在这里，聂荣臻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首先借用周恩来的话说：我们爆炸的是物质的原子弹，但它产生的巨大威力，却来自不知要大多少倍的精神原子弹。他又说：这次试验，响在罗布泊场区，但却打在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心上。这几天，西

方通讯社报道说，中国导弹核武器试验是世界“特等重大事件”，“好像亚洲上空的一声巨雷，震撼了全世界”，“中国已经在世界核技术竞赛中，超过了英国、法国，成为世界第三个原子超级大国”，“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对西方来说，是神话般地不可思议”。

聂荣臻接着激动他说：

“我们已经做出了我们前人所不敢想像的伟大事业，我们一定要做出更加伟大壮丽的事业！”

在研制导弹核武器的同时，氢弹的研制工作也在夜以继日地进行。氢的研制，在理论和制造技术上比原子弹复杂得多。实现聚变爆炸，需要1000万℃的高温，迄今为止，除了原子弹爆炸，人们还无法获得如此高的能量。

中国科学家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除了理论原理以外，没有任何实际资料可以借鉴。经过摸索，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设计原理。

聂荣臻立即向中共中央专委主任周恩来报告，周恩来十分重视这一新原理方案，即于1966年12月11日，主持中央专委会，批准了新原理方案。聂荣臻再次向周恩来要求到现场主持试验。

受周恩来和中共中央专委的委托，聂荣臻再次奔赴核试验基地的途中，他于12月26日到达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主持了中程地地导弹首次发射

试验，获得成功。

第二天，聂荣臻马不停蹄，乘飞机抵西北核试验基地，于 28 日主持了首次氢弹原理试验。他在试验结束后说：

“这次试验是成功的。试验结果表明，新的原理方案切实可行，而且非常简便。”

于是，聂荣臻向周恩来和中央专委建议，集中力量按新原理方案进行设计，争取直接进行全当量的氢弹试验。周恩来和中央专委很快批准了这个建议。后来，在专家座谈会上，聂荣臻亲自部署了氢弹试验任务，研制工作随即全面展开。

1967 年 5 月，第一颗氢弹的加工装配，以及试验准备工作已全部完成。5 月 9 日，聂荣臻参加了周恩来主持的中央专委会议，讨论氢弹试验的准备工作。会议认为，中国第一次全当量的氢弹试验，在政治上有重大意义，在军事上，它将使中国的核武器技术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会议要求 6 月 20 日以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6 月 12 日，聂荣臻出席中央专委会议。在这次会上，周恩来再次委托聂荣臻去核试验基地主持这次氢弹试验。

为了完成周恩来的委托，为了使氢弹试验顺利成功，两天以后，聂荣臻乘飞机又一次抵达核试验基地。这次他正发着烧，是抱病来执行任务的。15 日和 16 日两天，他全神贯注地听取了试验准备工作的情况汇报。汇报中，有两个技术上的问题存有疑点。他一再询问检查，直到确信已排除为止。然后，又看了氢弹实物。登上空投飞机检查时，他紧握着机组人员的手说：

“这可不是一个一般的炸弹，一定按操作规程执行好任务，但也不要紧张。”

飞行员信心十足他说：

“请元帅放心，我们保证胜利完成任务。”

聂荣臻使劲地握着飞行员的手：

“好，好，我相信你们。”

6 月 16 日傍晚，聂荣臻坐汽车来到核试验场区。看到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立即与北京的周恩来、叶剑英通电话，报告氢弹试验可随时进行。周恩来的答复仍然是核爆炸时那句话：

“一切由你在现场决定。”

于是，聂荣臻与张蕴钰、张震寰等商定，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的零时定为 17 日上午 8 时。

17 日清晨，聂荣臻来到现场指挥部，下达了试验的命令。

8 时前，飞机的轰鸣声由远而近，人们都翘首以待。8 时整，飞机到了预定空域，没有投弹，拐了个弯飞走了。

“怎么回事？”聂荣臻严肃地问。

空军地面指挥员报告说：

“飞行员操作中少了一个动作，请求再飞一圈。”

聂荣臻是严格要求按科学规则办事的人，觉得飞行员的请求是认真、科学的表现，当即答复：

“可以！”

于是，20 分钟以后，飞机再次飞临预定空域，在预定高度投下了氢弹。飞行员报告，飞机脱离危险区。

氢弹在预定高度爆炸。这时，天空出现了两个太阳同时高挂的壮观场面，一个自然太阳，一个人造太阳。然后，是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氢弹爆炸成功了！人们从指挥部掩蔽壕里跳出来欢呼，一阵强风带着热浪迎面扑来，有的人几乎被吹倒，指挥部有的帐篷被吹倒了，这是氢弹光辐射和冲击波的威力！

聂荣臻因为上了年岁，无法像年轻人那样跃出掩蔽壕。但他手握电话，激动地凝视着天空那个人造太阳渐渐演变成的蘑菇云。摄影家孟昭瑞，拍下了聂荣臻的这一珍贵的镜头。

人们面对着这朵比原子弹的蘑菇云要壮观美丽得多的伞状烟云，慢慢上升、扩大，逐渐由红色变成了白色时，欢呼声仍经久不息。

聂荣臻却在焦急地等待着。他要秘书催问有关方面，尽快汇集各种数据，计算出这次核爆炸的当量，够不够得上是氢弹级的？

叶剑英则代表中央军委，向参试的指战员们表示祝贺！

聂荣臻走出临时架设的指挥部帐篷，向守候在外面对他热烈鼓掌的人群挥手致意，并大声转达了周恩来、叶剑英在电话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大家的祝贺和慰问。

此时此刻，聂荣臻禁不住回顾起世界有许多国家发展原子弹和氢弹的历程：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六个月；而中国只用了二年零八个月，并且赶在法国之前试验氢弹。这引起了全世界的巨大反响，公认中国已进入世界核技术先进国家的行列。如果从氢弹原理试验成功算起，那时间就更短。

此时此刻，聂荣臻禁不住想起周恩来为实现两弹爆炸所做的巨大的组织工作和贡献。

## 八、“我同意荣臻的意见，大家都要克服本位主义”

1956年，正是中国百业俱兴、大干快上的年代，所以，中国科学院、高教部、国家技术委员会都互相争有关的研究单位和研究人员。矛盾难以解决，聂荣臻要武衡了解情况，居间调停，但收效甚微。三方争论愈演愈烈，一直闹到毛泽东那里。

有一次，毛泽东在见到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时说：

“你们两个有意见，不要吵了，划个‘三八线’嘛！”

聂荣臻听说后感到问题严重，报告了周恩来，建议开会讨论解决。1957年6月，周恩来召集聂荣臻、黄敬、张劲夫、黄松龄、范长江、武衡等人开会。会议开始时，会场沉默，谁也不讲话。

周恩来把脸侧向聂荣臻，要他先讲讲。

聂荣臻全局在胸，讲话高屋建瓴：

“中国科学院这个‘火车头’不能削弱，应该加强，我认为苏联组织科学院的经验是可取的，但要再调很多科学家进来，现在看不大可能，只能逐渐加强。工业部门和教育部门也不应该挖科学院的墙脚。大家都不要有本位主义，现在总的说是人才太少，国防科研方面也碰到了人才奇缺的困难，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我们还是应该强调互相协作，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为好。”

聂荣臻讲完后，周恩来以欣赏的目光看了聂荣臻一眼。接着要大家发表意见。张劲夫、黄敬、黄松龄发言都表示拥护聂荣臻的意见。

周恩来最后讲话，说：

“我同意荣臻的意见，大家都要克服本位主义，顾全大局，以推动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这场郭沫若、杨秀峰之间的激烈争论，经过周恩来、聂荣臻的调解，至此结束。

## 九、“荣臻同志，你很会发动我呀！”

从 1956 年开始，聂荣臻就受命主管全国的科技工作，而要搞好科技工作，人才是根本。为了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聂荣臻可说殚精竭虑，想方设法。周恩来对聂荣臻的工作十分支持，并非常满意，多次表扬他：“你是全国知识分子名副其实的‘老总’。”

60 年代初，聂荣臻思考得最多的问题，是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因为这是关于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出人才、出成果的重大问题。他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确下了功夫，多次召开会议，或找知识分子个别谈话，想弄清楚到底应该怎样正确贯彻知识分子政策，怎样才能发挥科学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做出更大的贡献。经过几个会议和深入调查，聂荣臻发现在这些重大的政策性问题上，过去是若明若暗的，有的同志甚至连科研工作的根本任务都不明确。科研人员的心情不够舒畅，他们是有意见、有看法的。

为了搞出一个科学工作的条条来，使各级在科学工作和知识分子工作上 有章可循，聂荣臻组织国家科委、国防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在几个研究所抓了座谈试点工作，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并且组织专门班子，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前前后后搞了几十稿，还在杭州讨论了一个多星期，最后搞出了《科学十四条》。《科学十四条》初稿提出来以后，聂荣臻又组织北京、东北两个地区的党员研究所所长开会，扩大党内科学家与会，共同进行讨论修改。并在一些部属的研究单位，像钢铁研究院，地质研究院、农业科学研究院、中国医学科学院以及若干国防科研单位进行讨

论和试点。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党组也进行了多次讨论。这样，经过反复讨论、实践、修改，《科学十四条》也就比较成熟了。最后由聂荣臻签署，上报中央。

1961 年 7 月 6 日，政治局开会讨论了聂荣臻的报告。虽然毛泽东没有参加会议，但政治局的大部分同志都到了。

在会上，聂荣臻先将《科学十四条》产生的过程和内容作了说明。接着张劲夫简要地补充了《科学十四条》在中国科学院试点后的情况和反映。

科学工作有了章法，周恩来十分欣喜，听完汇报，手里掂着文件，以十分满意的口气说：

“这个文件，财经、文教等系统也都可以发。要向我们的干部讲清楚，我们为科学家服务好了，科学家就为社会主义服务得好。总而言之，都是为了社会主义。”

邓小平则称《科学十四条》为“科学宪法”。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了这一文件。后来又送经毛泽东批准，于 1961 年 7 月 19 日正式以中央文件下发。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人拼命地攻击《科学十四条》。周恩来则强调说：“《科学十四条》是‘红线’；‘红线’在科研战线占主导地位。”批驳了他们的谬论。

1962 年 2 月 16 日，聂荣臻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科学家有 310 人。

那次会议的目的，起初是想借《科学十四条》贯彻以后的东风，搞出一个新的科学规划来。大家集中到广州以后，聂荣臻先

找少数科学家谈心，发现知识分子仍然顾虑很大。有人问他，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提法如何理解？并说，一提起知识分子，就

是资产阶级的，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子女也因此受到歧视，从没听到有人提谁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过去在国务院开会，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就有争论。聂荣臻说：

“革命这么久了，大学为我们培养的都是知识分子，难道都是为资产阶级培养的？这不能理解嘛！”

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就很同意聂荣臻的意见，她很激动他说：

“办那么多学校，都是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干什么！那是不合乎逻辑的。”

聂荣臻颇有同感，觉得这个问题需要解决。他首先请示当时正在广州的周恩来，因为他知道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和他持相同的观点。

周恩来肯定他说：

“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人民的知识分子。”

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聂荣臻更加坚定了信心，感到这次会议应该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把会议的要点改为两个：一是进一步搞出新的科学规划；二是进一步深入贯彻《科学十四条》，突出地调整一下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为了解决好这一问题，聂荣臻特地请周恩来作报告。因为他知道，周恩来作为党的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讲话具有很重的分量。

周恩来十分支持聂荣臻的工作，于3月2日特地为会议作了长篇报告。尤其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讲得很清楚，他说：一方面，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过去大多数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的确曾经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要忘记了自己的老根；新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由于种种原因，也容易接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因此，知识分子要警惕自己，要继续进行自我改造。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有了很大进步，就是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12年的锻炼，一般地说，也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不能把他们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待。

周恩来的讲话，激起了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

周恩来接着讲道：当然，知识分子中还有极少数的人，至今仍然保持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怀疑或不同意社会主义。但是只要他们服从国家的要求，从事正常的劳动，我们就应该团结他们，给予合适的工作，使他们对祖国有所贡献。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长期的、艰苦的过程，往往要经过自己的科学实践，经过带有一些自己特点的道路；因此，要善于团结他们，争取他们，帮助他们，对他们的改造要求过高过急是不适当的。

聂荣臻也向正在广州的陈毅谈了知识分子的思想顾虑。陈毅历来豪爽健谈，他在讲话中干脆提出了“脱帽加冕”的口号。他说，就是给你们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

周恩来和陈毅的讲话，使科学家们激动得热泪盈眶，大大地启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他们说：

“帽子脱掉了，责任加重了。”

“是脑力劳动者，自己人了，不能再做客人了。”

通过周恩来和陈毅的讲话，科学家们的主人翁感大大提高。聂荣臻目睹这一情景，心情也十分激动。心中对周恩来和陈毅充满了感激、敬佩之情。此后，我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空前地改善了。

国家经济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一直惦记着共渡难关的科学家们。 1962

年元旦前夕，他把国管局的同志们找到他的办公室。说：

“科学家是无名英雄，成天默默无闻地工作，新年到了，应该请大家聚一聚。”

周恩来决定1月5日在人民大会堂同各行各业的科学家们共进晚餐。5日晚上，周恩来及陈毅、聂荣臻、陆定一等出席了这次简朴的晚宴。科学家们全神贯注地聆听周恩来的讲话，心潮翻滚。国家遭受这么大的困难，党和政府并没有忘记他们。虽然宴会上没有特殊的菜肴，但周恩来对科学家及广大知识分子的深厚感情，如甘醇的美酒，把醉人的芬芳长久地留在科学工作者的心里。

在五十年代，“白专道路”与“红专道路”是知识分子队伍中经常议论的话题，而“白专道路”，是知识分子最害怕被戴在头上的一顶帽子。为了使广大知识分子放下沉重的思想包袱，为了不使“白专道路”一词成为整人的棍子，聂荣臻又想到了周恩来。

1962年6月19日，在一次文艺工作会议上，聂荣臻请周恩来谈谈所谓“白专道路”问题。

周恩来欣然接受，并开玩笑他说：

“荣臻同志，看来你很会发动我呀！”

很快，周恩来到会做了十分重要的、也是令人难忘的讲话，他说：

“一个人只要在社会主义土壤上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虽然政治上学习得少，不能算‘白’。只有打起白旗，反对社会主义，才是‘白’。例如有个外科医生，开刀开得很好，治好了很多病人，只是政治上不大开展，因此就说他是‘白专道路’，岂不是荒谬？再如有一个人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政治上懂得少一些，但是两年把导弹搞出来了，对国家很有贡献；另外一个人，天天谈政治，搞了五年也没有把导弹搞出来。你投票赞成哪一个？我投票赞成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只好请他去当政治教员，他不能在导弹部门工作，他只能在导弹部门‘捣蛋’。”

听着周恩来的讲话，聂荣臻这位全国知识分子的“老总”，和全体人员都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

## 十、情到深处始见真

“文革”狂潮骤起，林彪、江青一伙把矛头对准了聂荣臻等老师，说起其间周恩来对他的保护，有三件事使聂荣臻终生难忘。

第一件事。

事情是这样的：抗日战争时期，在晋察冀根据地，有一次聂荣臻和彭真聊天，聂向彭讲了“胡地涂”的故事。北平市委书记是胡锡奎，是经过莫斯科学习回来的。五一节前，地下党写了个稿子，由胡锡奎带去印，准备五一散发。胡锡奎是个近视眼，又是黄昏，到预定的地方，没想到敲错了门。发现门敲错了，你就赶快走啊，他没有。他这个人穿得很不像样子，又不修边幅，人家以为他是小偷，就抓了起来，送到公安局去了。公安局也把他当成小偷，根本没有审问，第二天早晨揍了他一顿，叫他滚。他的传单稿子还在身上，敌人没有搜身就把他放了。所以，聂荣臻和他开玩笑：“你是糊里糊涂进去，又糊里糊涂出来。”有时就叫他“胡地涂”。

两个人笑了一阵后，彭真接着说：不仅胡锡奎有“胡地涂”的故事，陈伯达也有过。他也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糊里糊涂地被抓了进去，后来，被福建军阀张贞花了点钱保了出来，因为他和张贞是同乡，又在张贞那里做过事。可是他出来之后，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就又糊里糊涂地回到了监狱。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次聂荣臻在西山叶剑英寓所聊天，又向叶聊起陈伯达的这个故事。当时，并没有别的任何意思，只是当做笑话说说而已。不知怎么回事，很可能是那里装了窃听器，因为在场的只有聂、叶俩人，没有第三个人，他们这次谈话的内容，却被陈伯达知道了。而且，陈伯达所说的和聂、叶俩人讲的完全一样。

这件事，当然犯了陈伯达的大忌，一直在伺机报复。机会终于来了，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陈伯达和聂荣臻编在一个小组，陈伯达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灵手可热，他想整聂，但又不敢正面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拿不出什么材料，就责问聂为什么在背后议论他的历史问题。

事情反映到了周恩来那里。周恩来知道陈伯达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大权在握，又得到林彪、江青的青睐和支持，为了既阻止事态的发展，又能给聂荣臻以警示，他专门就这个问题打电话给聂荣臻，问是怎么一回事。

聂荣臻听到周恩来亲自过问此事，知道陈伯达到处告黑状了，就向周恩来汇报说：

“我们是讲过，但不是为了抓他的辫子，为了整他，我们没有这个想法，只是聊天而已。”

周恩来有了底数，也就不怕陈伯达到处乱告和胡乱纠缠了。

陈伯达做贼心虚，他对这于事情很敏感，手段也很毒辣。表面上一套，而暗地却大肆活动。叶剑英也跟聂荣臻讲过，陈伯达这个家伙很坏。他想了许多坏点子，妄图消灭他这一段历史罪证。南汉宸知道他这一段情况，他就把南汉宸逼死了。他还在天津、北京等地，到处查找与他这段历史有关材料，把许多材料都收去了。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政变阴谋以后，把他抓了起来，他才交代说，之所以如此敏感，就是在那一次被捕时，他向敌人自首了。但这种情况，过去党组织并不知道，当时聂荣臻对这个人连认识都不认识，只是向彭真讲到胡锡奎的故事时，才听彭真说的。彭真那时也不知道底里，还

当做他真是糊里糊涂进去，又糊里糊涂出来的呢！但是叛徒终究难逃被历史惩罚的下场。

第二件事。

1968年3月，林彪一伙策划“杨余傅事件”，打倒杨成武等人，并影射聂荣臻是杨成武的黑后台。

当聂荣臻得知这些情况以后，马上预感到林彪的黑手已开始伸向他。果然，从4月1日起，应该发给他的一些文件、电报停发了。

聂荣臻对秘书说：

“不管他，文件他们爱发不发。‘杨余傅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弄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谁是‘黑后台！’”

4月6日，聂荣臻给叶群打电话问：

“你们说的黑后台究竟指的是谁？”

叶群在电话里说：

“并没有点名嘛。”

她没有说黑后台就是指聂荣臻，但也没说聂不是黑后台。当时社会上“炮轰聂荣臻”轰得很厉害。叶群的意思是，反正外面在轰，让人家轰嘛，轰到谁就是谁。

4月7日，聂荣臻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对杨成武的看法和历史上同杨成武在一起工作的情况。信上还要求同毛泽东面谈一次。

毛泽东很快做了批示，并将批件转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看到批件，真是喜出望外，知道聂荣臻不会受到牵连了，立即让秘书

打电话告诉聂荣臻，毛主席在他写的信上批了16个字：

“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

听了这个批语，聂荣致已明白，林彪搞的这一套，并不是毛泽东的意思。

第三件事。

1969年10月18日，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借口战备，发出所谓的“一号命令”。

接着，他们发出通知，要老同志疏散到外地，而且要马上离开北京。他们通知聂荣臻疏散到郑州。聂荣臻表示，既然是战备嘛，郑州那个地方是铁路枢纽。中原地区我也不熟悉，还是到河北省、晋察冀这些地方我熟，如果打仗，还可以起些作用。后来决定让聂荣臻到了邯郸。

1969年12月22日，一个冷风劲吹、滴水成冰的日子里，聂荣臻来到了邯郸，住在一个招待所里。隔墙就是公园，虽是寒冬，但他几乎每天到公园去散步。那个地方很多同志是他的老部下，对他客气得多。到了1970年1月份，聂荣臻得了皮肤病，痒得不能睡觉，从北京搞了些药也不见效。他决定将病情报告周恩来。

周恩来接到报告，很快同意聂荣臻回北京进行治疗。

当年五一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聂荣臻，问他身体怎么样。当他告诉毛泽东自己的病情以后，毛泽东说，你不要出去了，就在北京吧，北京好治病，出去干什么。

通过这次治病，聂荣臻一方面感到毛泽东、周恩来对老同志的关怀，同时也发现林彪搞的这一套并不是毛泽东的意图。聂荣臻回北京并没给林彪和“四人帮”打招呼，是直接给周恩来报告的。

聂荣臻对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非常崇敬，多次讲到

毛泽东的伟大功绩，谈到周恩来时总是称赞不已。

周总理去世后，有一次聂荣贵去看望聂荣臻，聂荣臻的女儿聂力告诉他：

“你要多谈家乡的情况，最好不要提周总理，因为一讲到周总理他就会伤心。”

聂荣贵事先得到聂力的关照，在和聂荣臻谈话时，一直未讲周恩来的事。

可是在吃饭的时候，他们边吃边看电视，电视上的播音员正以充满感情的语调说道，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

聂荣臻听到后就掉泪了，禁不住老泪纵横，眼泪顺颊而下，甚至滴落碗中，饭也吃不下去。大家都劝他不要伤心，但他还是泪流不止。他说：

“周总理的一生光明磊落，勤勤恳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值得好好学习。”

说到这里，聂荣臻的思绪又禁不住回到革命战争年代那如火如荼的峥嵘岁月，他说：

“我与周总理长期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有着深厚的感情。在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有段时间，只有周恩来、叶挺和我三个人在一起，周恩来又生了病，我们把他抬起走……”

说到这里，他止不住又流泪了，大家只好谈别的事情，以打断他的回忆，免得使他伤心。

##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周恩来与叶剑英

叶剑英（1897—1986），原名叶宜伟，字沧白。广东省梅县人 1917 年入云南讲武堂。参与筹建黄埔军校，任教授部副主任；1926 年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第四军参谋长。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领导广州起义。1928 年赴莫斯科学习。1930 年回国后，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红军学校校长，瑞金卫戍司令员，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参谋长，中央军委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北平市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广东军区司令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军区代司令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训练总监部代部长，军事科学院院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国防部部长。1955 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共中央副主席，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在中国现代军事人才的摇篮黄埔军校，有两位威望很高的领导人：一个是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一个是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他们互相倾慕、配合默契，共同为大革命培养人才，相得益彰。正是周恩来的磊落胸怀和远大抱负，使叶剑英看到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后来经过周恩来的批准，其愿望得以实现，从此，开始了他们共同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光辉历程。在抗日战争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他们身入虎穴五年整，在重庆与国民党进行了曲折复杂的谈判和斗争；“文革”十年，他们通力合作，力挽狂澜，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殊死的较量，构成了中国现代史上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

## 一、蒋介石、叶剑英激烈争论，周恩来：我支持叶剑英

叶剑英同周恩来的革命友谊，开始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4年初，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喜讯，就像和煦的春风，很快吹遍了中国的大地。1924年9月初，周恩来奉中共中央指示，从欧洲返回大革命策源地广州，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区委宣传部部长，后改任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

周恩来到广州，第一件大事就是坚决维护孙中山主持的革命政府的权威，参与指挥平息商团的反革命叛乱。叶剑英奉命率建国粤军第二师部分官兵，同其他革命军一起，也参加了平叛作战。在这次平定商团的叛乱中，叶剑英第一次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参加战斗。

平定商团叛乱不久，周恩来调至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在周恩来来到黄埔军校之前，已经担任军校的教授部副主任，并亲自执教，成为当时学校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周恩来到军校后，立即投入政治部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向教职员和学生灌输革命精神，教育他们不贪财，不伯死，精诚团结，救国救民，实现孙中山提出的武力与民众相结合的建军宗旨，使军校的政治工作日趋活跃，卓有成效。

在办校与教学的过程中，叶剑英通过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直接和间接的交往，从周恩来的举止言谈中，具体感受到了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看到了共产党人的磊落胸怀和远大抱负，从而产生了由衷的敬佩之情。他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第一次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但是，由于中共党内少数同志认为他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不能轻易接收入党，使其愿望未能实现。

1924年底，盘踞在东江流域的广东军阀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之机，进犯广州，企图推翻广东革命政权。在中共广东区委的推动和支持下，广州留守政府决定东征，讨伐陈炯明。

周恩来作为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参加东征军的领导，负责政治工作。粤军第二师编在东征部队的右路军，充当先头部队参加作战。叶剑英作为第二师参谋长同师长率部于1925年2月底从广州沿广九路向淡水进发。出发前，他根据周恩来提出的要求，向部队官兵讲明此次作战的目的和意义，鼓励部队奋勇进击，很快到达淡水城郊。

叶剑英制定作战方案后，赶到右路军司令部，向蒋介石、周恩来和苏联顾问报告，拟定与黄埔校军联合进攻淡水的作战计划。周恩来与叶剑英一起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周恩来谦逊亲切的态度，机敏周密的思考，使叶剑英受到了启示和教育。特别是在作战中，周恩来与各级党代表率先垂范，鼓励黄埔校军英勇杀敌的精神，更使叶剑英敬佩不已。淡水一战，革命军大获全胜，淡水转危为安。

淡水之战后，就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发生了激烈争论。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力求先打惠州，令部队掉头西进；叶剑英和二师师长张民达，则主张对惠州围而不打，而以主力东进，直捣叛军老巢潮汕。双方坚持己见，互不相让，谁也说服不了谁。

周恩来冷静地听取了双方的理由，认为暂时放弃重镇惠州，集中兵力歼灭当面敌军力量，夺取最后胜利，是正确的作战方针。虽然蒋介石是黄埔军校的校长，周恩来是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但周恩来以共产党人的特殊身份，

果断地支持张民达、叶剑英的意见；加之，总司令许崇智和苏联顾问加伦也支持张、叶的主张，于是，右路军乘胜追击，取得全胜。战争的结局表明，周恩来在争论的关键时刻，所作出的判断是正确的。

看着眼前的胜利，回想周恩来对自己的支持及所作的判断，叶剑英十分佩服周恩来的胆略和智慧。同时，共产党的纲领、政策，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周恩来等著名共产党人的革命言行和奋斗精神，使叶剑英的思想受到极大熏陶和影响。

正是由于有了上述思想基础，因而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叶剑英毅然决定与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彻底决裂，迎着白色恐怖的逆流，再一次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 二、“叶剑英的底子我知道，应当欢迎他入党”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以后，已担任新编第二师师长的叶剑英通电反蒋后，来到了武汉。

当时，叶剑英在武汉还有两位老相识，一个是邓演达，一个是张发奎。邓演达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主持武汉三十多万人的群众大会，声讨蒋介石，积极开展反蒋斗争。蒋介石派人拉拢不成，就通电解散邓演达为主任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邓演达毫不理睬，继续坚持反蒋斗争。

张发奎在参加北伐后，因战绩卓著，升任被称为“铁军”的第四军军长。此刻他正踌躇满志，到处网罗人才。他听说叶剑英来到武汉，就邀请叶剑英来四军军部，留在自己的身边工作。

不久，叶剑英被正式任命为第四军参谋长。

叶剑英在第四军军部这一段时间，进一步受到进步的思想影响。四军里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比较多，政治工作比较活跃。在这种环境下，叶剑英对时局有了新的认识。他看到了汪精卫这些人已经越来越走向反动，国民党官僚只谋一己私利，腐化堕落。只有共产党人大公无私，真心实意地为工农大众谋福利，能够救中国，把革命进行到底。因此，他更加坚定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然而，此时此刻，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加入共产党，显然要冒很大风险。“道路艰险何所惧，只身偏向虎山行。”尽管前进道路上布满荆棘，这条救国救民的道路，叶剑英是决心走定了。

此时此刻，黑云压城，到处是腥风血雨，全国和武汉的形势，错综复杂，到哪里去找共产党呢，有些公开的共产党人并不熟悉，又多隐蔽起来，一时找不到；即使找得到党，党又能够吸收曾是蒋介石嫡系的高级军官吗？自己过去申请入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被搁置起来，现在再要求入党会不会如愿呢？叶剑英困惑着，思索着。

当时，武汉有股出国留学风。不少革命者都想留学苏联，或到其他国家去。叶剑英也想到列宁的故乡去探求共产主义。听说邓演达同苏联大使馆有联系，便去找他帮忙。

邓演达对叶剑英虽然抱有好感，表示赞成叶出洋。但他考虑到形势复杂，要自己出面介绍，比较为难。因此，邓演达没有答应介绍叶剑英去苏联。

叶剑英又找到他们熟识的共产党员李世安。他把自己渴望入党的要求和几年来在找党、入党问题上遇到的波折和苦恼都告诉了李世安，希望李世安能想办法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李世安此时在武汉市公安局当秘书长，以这个公开身份做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了解叶剑英的过去，也了解叶剑英的现在。他从在第四军的中共党员、广东同乡柯麟、李文一等人那里早已听说过叶剑英的政治表现和革命志向，知道他曾多次表示过要跟随共产党革命到底的愿望。

李世安紧握着叶剑英的双手，动情地说：

“现在，革命正处于低潮。有些意志薄弱的共产党人，畏缩了，甚至叛变了。而你却在这样的時候要求加入共产党，同党共患难，这表明你是一位对党的理想具有坚定信仰的真正革命者，我个人非常欢迎你入党，我一定把你的要求报告给党组织。”

当然，李世安心里也明白，像叶剑英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即便是已经通电反蒋，但要在基层党组织讨论他的入党问题，还可能发生波折。于是，

他想到了与叶剑英早已熟识的周恩来。周恩来是中共中央领导人，水平高，办事讲求实际，此时正在武汉，他便带着叶剑英的热忱希望，秘密找到周恩来向他汇报了这件事。

周恩来一听说叶剑英在党十分困难的时候要求入党，当然十分高兴，回忆起自己同叶剑英这位年轻将领的交往，回忆起叶剑英的进步思想和英勇善战，当即肯定地说：

“叶剑英的底子我知道，应当欢迎他入党。”

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1927年7月上旬，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为中共正式党员。为了保密和特殊工作的需要，党组织暂时不要他和其他党员进行联系，只让他与李世安等少数党员保持接触。

当李世安向叶剑英传达了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他已经成为中共正式党员的决定后，叶剑英激动地握着李世安的手，坚定地点了点头。

他感谢李世安对自己的信任，为他入党的事直接向中共领导汇报；更感谢周恩来，能够知人识人，接纳他这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加入中国共产党。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叶剑英从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的时候起，就在漫长的道路上不断地追求和探索。现在，他终于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实现了从一位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他眼前展开了一条既艰难曲折又充满希望和光明的大道，他决心沿着这条大道为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和国家富强英

勇拼搏，奋斗终生。

### 三、周恩来电示：由叶剑英任军委参谋部负责人

叶剑英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根据党组织的指示，率部南下广州，于1927年12月，与张太雷、聂荣臻等人一起发动了举世震惊的广州起义。1928年秋，中共党组织决定，叶剑英等人去苏联学习，周恩来指定叶剑英为学习组组长。12月，叶剑英带领大家到达苏联莫斯科，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1930年，叶剑英结束在苏联的学习生活，回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书记周恩来汇报了在苏联学习的情况。周恩来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并留他暂时在上海军委工作，与刘伯承一起翻译苏军步兵战斗条令。经过一段努力，条令译好成书，送往各个根据地，对我军建军作战起到了参考作用。

1931年初，周恩来找叶剑英谈话，征求他对今后工作的意见。叶剑英说：“我过去一直在军队工作，现在回国来，还是想搞军事工作，希望组织派我到苏区去。”

周恩来根据叶剑英参加东征、北伐、广州起义的经历，认为他是一位很有军事才干的指挥员，决定派他到中央苏区去工作，并特意发报给苏区中央局，让叶剑英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部负责人。1931年11月25日，中央军事委员会成立，正式任命叶剑英为中央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后改为工农红军总参谋长。

不久，周恩来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治委员。在反“围剿”作战中，叶剑英第一次作为周恩来、

毛泽东、朱德的助手，在军事指挥中表现出了突出的才干。

1932年5月，蒋介石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调集大批军队向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与此同时，他下令组成以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指挥江西、广东、福建、湖南的国民党军牵制中央根据地红军的主力，并为大举进攻中央根据地做准备。

叶剑英积极协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组织指挥苏区军民，昼夜反击敌人第四次“围剿”。6月3日，毛泽东签署电报至朱德、王稼祥，要求东路军各军在“三天内整理完毕，准备9号出动”：“8号下午2时在官庄总司令部开军事会议，军长、军政委、军团总指挥、军团总政委、军团参谋长均到会。”叶剑英于6日上午赴上抗县官庄。7月初，红军发起南雄、水口战役，打击了向江西“进剿”的国民党军粤军部队的气焰，基本稳定了中央根据地的南翼。叶剑英亲自到前线视察，了解敌情，并作战役部署。

8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兴国举行会议，确定红军向北行动。叶剑英根据会议的决定，领导参谋人员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为周恩来等人指挥作战提供了依据。按照这个计划，第一步先攻打乐安，得手后，再攻取宜黄。中革军委据此向部队下达了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军事训令。在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的直接指挥下，红一方面军于8月17日攻克乐安，20日攻取宜黄。此役共歼敌约三个旅，俘敌五千余人，取得了重大胜利。

叶剑英制订的切合实际而周详的作战方案，深得周恩来的嘉许，他在8月28日给中央局的信中说：

“本来过去军事行动向无方案的，所谓专于机动而不果决，这次我们力矫此弊，本着这个方案去做，实现和完成了第一步作战计划，获得伟大成功。”

在这里，周恩来高度赞扬了叶剑英领导的参谋部的工作。

攻下乐安、宜黄后，红一方面军按原定计划向东袭取南城，但在南城近郊受阻，与敌形成对峙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叶剑英认真分析了战场的敌我情况，向中革军委领导人提出分一部兵力牵制南城之敌。而以主力直取距南城较远的崇仁县县城的建议。他具体分析说：

“崇仁守敌仅一个骑兵师的兵力，我军可以长途奔袭，出其不意地先攻下崇仁。届时，敌军必定来援。我军则可以逸待劳，聚歼敌增援部队。”

然而，叶剑英的这个积极建议未被采用，以致坐失战机。这使颇具军事才华和眼光的周恩来十分痛心，他在给中央局的信中说：

“这一计划，原是根据敌情变动而提出的，我们因为坚守原定计划，企图先消灭朱绍良一路。故未采用，这确实是不善于机动的错误。”

在异常残酷紧张的反“围剿”作战期间，叶剑英始终精力充沛，工作极富成效，受到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的高度赞扬。红军的高级将领都尊敬地称他为“叶参座”。

周恩来不仅在军事工作方面十分重视叶剑英的意见，在其他工作方面也注意发挥他的才能。这年10月，周恩来代表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和十九路军派来瑞金的代表吴明等人进行谈判时，就常偕同叶剑英一起参加，听取他的意见。

1933年5月，蒋介石又调集50万兵力，策划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

为了反击这次“围剿”，根据中共中央局提议，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时府下令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前方移至瑞金。增加博

古、项英为委员，由项英代理主席。同时，在前方另组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红一方面军司令部。5月8日，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叶剑英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兼第一方面军参谋长。

叶剑英受命以后，先是在沙洲坝的乌石垄村组建起一个精干的司令部机关。不久，又奉命调往前方协助朱德、周恩来指挥红一方面军作战。

其后，即使叶剑英遭到“左”倾领导者的排斥，由福建军区前线调回军委任第四局局长时，周恩来仍然一如既往，照样器重他，信任他，并赞扬他是能上能下的好干部。

长征开始前，“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的统治达到高潮，他们极力打击排挤与他们观点不同的人，并力图将这些人留在即将被敌人占领的苏区，不带他们长征。这时，中央决定将军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队组成野战第一纵队，任命叶剑英为纵队司令员。叶剑英利用职务之便，向周恩来提出保护被“左”倾领导者排斥打击的党的骨干，有些可以安排到一纵队的建议。这一建议，正是周恩来想要向中央提的建议，叶剑英提出使得他有了更加充足的理由，他以自己中共中央常委委员的身份，尽最大努力，保护和安排一批干部，参加了长征，其中，毛泽东就是在“左”倾领导者妄图将其甩在苏区的情况下，由周恩来以他是红一方面军创始人的名义，提出让其参加长征的。

长征开始后，叶剑英协助周恩来、朱德处理繁忙的军务，及时传达并贯彻执行军委的各种命令、指示，随时处理部队行军作战遇到的各种问题。他

经常找负责人碰头，研究如何应付遭遇战和防止敌人空袭问题，组织部队克服各种艰难险阻，通过一道道封锁线。许多小事，他也非常细心。路过湘西少数民族地区时，住在老百姓的木板房里。这种木板房容易起火，他特意制定防火措施，防止发生火灾。

一路上，为了使周恩来、朱德能更好地指挥作战，叶剑英非常关心掌握敌军的部署和动态。。那时中共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已经失去了联系，有关敌人的情报来源主要靠两条：一是地面侦察，二是通过无线电台侦听，破译敌台情报。叶剑英精心组织电台的同志分几个梯队交替行军，昼夜坚持工作，保证通信联络畅通无阻，及时地为周、朱提供准确的敌我情况动态。电台的人员少，工作很辛苦，叶剑英在艰苦的行军中，常去看他们，称他们是无名英雄，时时处处为他们着想，帮助解决各种困难。

红军渡过湘江，一战人员减半，继续艰难前进。下了山，涉过一条小河，前面是一片开阔地。叶剑英带领队伍迅速通过开阔地，向对面的小山上走去。这时，周恩来走过来，告诉叶剑英：

“命令部队切勿休息，立即前进，防止敌人空袭。”

叶剑英马上具体布置各单位注意防空。就在这时，敌机飞来了。叶剑英命令部队在路边隐蔽。敌机越飞越低。突然向着叶剑英及部队隐蔽的山腰处俯冲投弹。叶剑英见势不好，赶快跑开。刚跑了几步，一颗炸弹正好落在附近，“轰”地一声爆炸了，叶剑英摔倒在地。

“参谋长，你受伤没有？”警卫员范希贤见状，马上奔过来扶他。叶剑英自己爬了起来，踉踉跄跄地继续往前走。这时，他才感到右大腿靠臀部的地方，一阵阵疼痛。用手一摸，鲜血已经渗透了裤子，不断地往下流。范希贤将他扶到一处平坦的地方，让他躺下，然后叫马夫立即去报告卫生部。

周恩来听说叶剑英受伤，立即派总卫生部部长贺诚赶来，贺诚当即把叶剑英扶上担架。当抬到总卫生部临时所在地时，伤口还在流血。同志们都关切地围上来询问他的伤势，他虽然感到疼得厉害，但却坚强地忍住，平静地回答说：

“没关系，不要紧。”

医生检查，发现了一块弹片打进了靠近臀部的地方，有好几厘米深。由于环境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弹片无法取出，只好留在体内了。医生对伤口做了简单的包扎，叶剑英便坐着担架，继续上路了。警卫员把棉大衣给他盖在身上。才发现大衣被炸穿了许多窟窿。原来炸弹爆炸时，叶剑英正用右手拎着大衣。如果不是这件棉大衣护着，说不定还会有生命危险呢！叶剑英每当谈起这次负伤留在身上的弹片，就风趣地说：

“留着它做纪念，可以使自己不忘过去。”

长征途中，尤其是在遵义会议期间，叶剑英在军委总部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作战，得到了极大信任。特别是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叶剑英将张国寺的密电及时送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党中央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避免了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维护了团结，事后，周恩来多次表扬叶剑英在关键时刻，为党立了大功。

#### 四、西安，纵横捭阖助周公

1935年12月，党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后，周恩来担任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领导进一步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接着，周恩来同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进行了直接会谈。张学良接受了我党提出的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其后，叶剑英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月25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等红军将领名义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提出：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收复失地。并表示，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接着，李克农与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王世英分别到洛川、西安，与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谈判，达成初步协议。4月9日晚，周恩来亲赴延安城一座教堂内，与张学良就抗日救国问题举行会谈，双方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

6月中旬，叶剑英同李克农等奉命去蟠龙、琉璃坡、石家砭等地，了解中央军、东北军的兵力部署、进军动态，及时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敌情。并尽一切可能，利用各种关系，向东北军一七师、一一七师官兵进行政治宣传，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对如何防止敌军进攻瓦窑堡提出许多建议。并根据毛、周指示，进行了大量救护伤员、保障供给、修补道路等方面的工作。

从6月15日至22日，一周之内，叶剑英亲笔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14封，并派卢伟良等专人送去。这些信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叶剑英辛勤工作的情形，内容涉及敌、我、友等各个方面，不仅反映了当时抗战与统战形势任务的复杂与艰巨，也反映了红军内部机构、人事和教育以及协助延安地区干部开展工作等诸多问题。对毛、周制定正确的政策起到了很好的参谋作用。

1936年7月下旬，为了进一步解决我党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团结抗战问题，中央委派叶剑英、朱理治等在安塞领导开展东线东北军工作。

叶剑英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很快到达安塞，并主持召开安塞，延安两县工委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健全机构，明确任务，然后组织力量，分头调查研究，结交工作对象，积极开展各种活动。

在此期间，叶剑英给周恩来写过许多信，请示汇报工作。从7月28日至8月29日，一个月时间内，就亲笔写了十封信，派人送去。信中对东北军驻防、移防等活动情况，官佐与士兵关系，军队与百姓的关系，部队思乡抗日情绪，以及红军与东北军之间友好往来、交换枪支弹药、开展联欢活动等等，都作了详细的汇报。

周恩来见信后，总是立即答复，能解决的问题，及时给予帮助解决。如根据叶剑英的请求，周恩来派出人民剧社到安塞演出抗日剧目，发放书籍传单，对于激发东北军官兵的抗日热情起了很大作用：

叶剑英在开展东北军统战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做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并向周恩来提出做好工作的建议。他在给周恩来的信中说：

“十七路军工作，依我所知，不能完全按照东北军工作指导原则，因该部与东北军有许多差异。”

在周恩来的具体领导下，经过叶剑英和东线工委的共同努力，延安地区的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不仅停止了敌对行动，而且和睦相处，互派代表，互通情报，互相帮助，变成了真正的友军。

1936年9月，中共中央根据张学良的要求，派叶剑英作为我党代表，秘密到达西安，同张学良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和联络工作。每遇重大问题，叶剑英都及时用电台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情况，并得到他们的指示。

在西安，叶剑英果然不负毛泽东、周恩来之重托，通过张学良向蒋介石转达了我党提出的《国共两党抗日救亡协定》。经过谈判，张学良帮助红军解决了部分棉衣、经费等问题，一次就借给红军10万块银元。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周恩来率叶剑英等人作为我党代表，在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一道，与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等谈判，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蒋介石回到南京以后，背信弃义，采取政治欺骗、军事压迫的办法，妄图搞垮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内战又面临一触即发之势。周恩来、叶剑英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同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协商，发表通电，抗议南京政府扣押张学良和企图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同时与杨虎城一起制定了有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参加的联合作战方案，以对付国民党中央亲日派“讨逆军”的进攻。接着，周恩来、叶剑英为解决东北军内部的战与和两派的尖锐矛盾，冒着危险，多方奔走，调解矛盾，避免分裂，并主动接受、帮助处境十分困难的杨虎城将军处理各种棘手问题。周恩来离开西安以后，叶剑英留在西安，担任联络任务，继续为使西安和南京达成和解的协议，创造条件，贡献力量。

那是1936年12月初，蒋介石带领大批随从，杀气腾腾地来到西安，西安形势顿时紧张，一片黑云压城的气氛。叶剑英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携带张学良送给红军的10万块大洋，悄然离开西安，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

担任中革军委委员和中国红军副总参谋长的叶剑英回到延安后，毛泽东立即召开有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的会议，听取叶剑英汇报西安情况。会议进行过程中，机要秘书送来张学良发来的电报。电报中说，形势十分危急，请叶先

生即来西安，共商大计。会议没有开完，毛泽东、周恩来决定让叶剑英马上返回西安，并嘱咐他把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带去，通过张学良的关系，送王到新疆转赴苏联治病。

叶剑英一行衔命而动，立即动身去西安。他们走了三天，当到达苏区和东北军防区交界处时，却没有找到接头的人。叶剑英立即发电报向中央询问情况，中央回电说：西安发生了事变，张、杨在临潼扣留了蒋介石。中央决定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为中共代表赴西安，已请周恩来先去。你们即刻去延安城、张将派飞机来接。

于是，叶剑英一行掉转马头，迎着黄沙朔风，快马加鞭，北返延安，坐上张学良派来的飞机赶往西安。

叶剑英到西安以后，才了解到西安事变的详细情形。

原来，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在多次向蒋介石进谏，最后“哭谏”无效，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了使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

安内”的误国政策，抗日救国，毅然实行“兵谏”，在临潼华清池扣留蒋介石，同时在西安拘禁了一批国民党军政大员。

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后，通电全国，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八项政治主张，并宣布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安军事委员会，张、杨分别担任正副主任委员，事变当夜，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立即紧急商讨对策，经过反复研究，确定采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毛泽东、周恩来等应张学良的请求，即复电张学良，表示对张、杨全力予以支持，拟派周恩来等到张处协商大计，并向张、杨提议调整防务，配合他们粉碎国民党“讨伐派”的武装进攻。随后，中共中央以红军高级将领名义给南京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两次发出通电，表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西安事变，如同平地一声惊雷。华清池的枪声，不仅震惊了中国，也震惊了世界。

事变发生后，在中国和全世界都激起了不同反响。中国人民大众拍手叫好，国民党南京政府一片混乱。亲日派头子何应钦急于取代蒋介石的地位，极力主张“讨伐”张、杨，炸平西安，欲置蒋介石于死地。日本帝国主义则欲加剧中国的分裂，扩大内战，以便独占中国，极力支持何应钦的行动，与此相反，以宋美龄、宋子文为首的亲英、美派，力主用和平方式营救蒋介石，反对“讨伐”。

错综复杂的形势，使周恩来、叶剑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12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一行乘张学良所派专机抵达西安，当晚立即与张学良会晤，谈到深夜，次日上午又拜会杨虎城，紧张地展开了各方面的工作，很快，叶剑英到达西安，立即协助周恩来进行工作。根据分工，周恩来侧重于政治方面，负责上层统战和群众团体工作；秦邦宪侧重于中共组织内部工作；叶剑英侧重于军事方面工作。

南京方面由于何应钦的操纵，剑拔弩张，随时准备“讨伐”西安，内战一触即发。张学良、杨虎城不但政治上需要共产党的指导，军事上也需要共产党帮助筹划。张学良经过与叶剑英的接触，十分钦佩叶剑英的军事才华，他对周恩来说：

“周副主席，有件事想跟你商量，我想向你借一个人。”

“借一个人？你们、我们，都是一家人，只要能给，我都借给。”周恩来爽朗地答道。张学良正式提出：

“我想请叶剑英出任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的参谋长。”

周恩来先是一惊，继而是喜，这充分说明了张学良联合抗日的诚意，于是马上回答说：

“这件事我个人表示同意，不过我个人不能做主，还要请示中央。”

接着，周恩来为此专电报告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叶剑英以参谋长身份参加西北联军参谋团，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一起制定了抵抗亲日派“讨逆军”的作战计划和军事部署。同时他还积极参加谈判和其他工作。

这期间，南京方面在弄清了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国共产党无意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这次事变的态度后，于22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从23日起，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和张、杨一起参加谈判，并

首先提出停战及改组南京政府的六项主张。经过两天的谈判，同宋子文、宋美龄最后达成改组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驱逐亲日派、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条件。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蒋当面表示同意谈判协定的六项条件，并表示他回南京后，周可去南京直接谈判。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叶剑英协助周恩来日夜奔忙。他会见了各方面人士，同他们进行座谈，听取意见。他还采取出席报告会、个别出访等形式，进行统战工作，并将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意见及时向周恩来和中央请示报告。

12月23日，叶剑英致电中央，报告说，各方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有怀疑，主要问题是：共产党能否真正放弃

阶级革命，改取“社会民主制”？红军能否取消，归中央改编，听从命令？今后能否割断同莫斯科或第三国际的关系？最近的政治主张是什么？党中央认为，叶剑英反映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中央立即电复叶剑英，要求进一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叶剑英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广泛向各方人士进行解释，消除误解，扩大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

就在西安事变即将和平解决的最后关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12月25日，张学良没有同周恩来、叶剑英等商量，就放走蒋介石，并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经洛阳飞回南京。此事在西安立即掀起了轩然大波。叶剑英后来回忆此事，曾这样说道：

“后来张学良出了个岔子。他说抓是我抓的，放我亲自送。张学良亲自乘飞机送蒋介石到洛阳。张学良想当个梁山英雄，他不晓得蒋介石的立场顽固得很。张学良刚一出门，孙铭九就向周恩来和我报告：副司令走了，送蒋先生回洛阳。我们说，不行，你马上坐汽车把他请回来！待他坐汽车到机场，飞机已升空了。结果，蒋介石一到洛阳，就把张学良扣留起来了。”

叶剑英对张学良送蒋之行，十分惋惜，一直关心他的处境，张学良也很珍视与叶剑英的患难之交。若干年后，他在美国见到吕正操，表示很怀念老朋友“叶参座”。

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慨。他们通宵达旦地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同杨虎城、王以哲等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协商，确定由杨虎城领衔，于1937年1月5日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的通电，强烈抗议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将军的行径，揭露蒋介石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

在此期间，叶剑英尽力协助周恩来奔走于国民党留守西安人员和东北军、西北军之间，艰苦工作，维护团结，稳定局势。

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在事变时负伤，此时住在西安养伤。叶剑英陪同周恩来特意去看望了钱大钧。接着，周、叶又去邵力子（事变前任陕西省主席，事变时也被张、杨拘留）家里走访，表示慰问。他们向钱、邵俩人转达了中共中央对和平解决事变后的期望。希望钱、邵俩人以大局为重，说服留守西安的国民党大员，坚持团结，抗战救国。同时，又劝说杨虎城派人到南京、奉化与蒋介石会谈。

张学良被蒋介石扣留后，东北军、西北军内部在战与和的问题上产生了尖锐分歧。受命于张学良代理指挥东北军的杨虎城，在外有重兵压境，内有和战之争的情况下，处境越来越困难。这时，叶剑英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主动接近杨虎城，帮助他出谋划策，处理各种棘手问题。

为了防止“战祸起于萧墙之内”，周恩来指示叶剑英，要他多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主战、主和两派交谈，开导他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认清形势和前途。

但是，坚持同中央军交战的“少壮”派继续闹腾，有人竟扬言：“向叶参谋长来个兵谏！”1月27日晚间，张学良的卫队长孙铭九带人找到周恩来、叶剑英，在他们面前长跪不起，哭着要求红军出兵帮助他们打仗，救张学良将军回来。周恩来、叶剑英反复劝说也不听。

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为防意外，周恩来决定将共产党派到西安工作的大多数人转移到三原红军驻地。叶剑英则留下来，陪同周恩来继续奔走于各方，耐心工作，平息风波。

1937年1月30日，天空乌云密布，雪花纷纷扬扬飘洒着。这时是西北高原最为寒冷的季节。

冒着严寒，叶剑英陪同周恩来乘车到三原云阳镇红军司令部，同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等开紧急会议，反复讨论是否帮助东北军出兵与中央军打仗问题。会后，周、博、彭、任等联名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等，提出两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大家认为，这一仗本来是不该打的，但是考虑到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是我们的朋友，只要他们两方意见一致，红军可以暂时保留自己的意见而支持他们的主张，配合他们一起打。

当晚，周恩来、叶剑英不顾疲劳，又驱车赶回西安，分别将这个决定告知杨虎城，东北军将领和少壮派军官。他们听后都感到高兴。接着，叶剑英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参谋长一起具体地研究了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

然而，东北军中主战的“少壮派”和主和的“元老派”意见仍不一致。在“少壮派”提议下，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以上军官在渭南东源张家堡召开军事会议。叶剑英也接到了邀请。他请示周恩来，周恩来立即指示：

“去，宣传我们的主张，团结他们，也做他们之间团结的工作。”

叶剑英立即赶赴渭南，出席会议并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

“我们大家应该团结起来，加强‘三位一体’，巩固统一战线，争取张将军早日返回，共同抗日，收复失地，使我们祖国能够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强大的国家。”

杨虎城也在会上讲了话。

在他们讲话之后，和、战两派仍然争论不休。争到最后，形成如下决议：在张学良未回以前，坚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借决不死战。到会的四十余名军官在决议上签了字。1月31日晚上，在西安粉巷王以哲家里又召开三方最高军事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周恩来、叶剑英再三说服，最后做出宜和不宜战、促进和谈成功的决定，并决定派代表李志刚赴潼关与中央军代表在和谈文件上签字。

然而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少数人仍然坚持主战意见。2月2日上午，“少壮派”突然下手，闯人工以哲家中，开枪打死了主和派王以哲。“二·二”事件，严重地破坏了东北军的内部团结，破坏了西安与南京谈判和营救张学良的行动。

爱国将领王以哲被害，激起了东北军广大官兵的愤慨。西安城内谣言四起，到处笼罩着恐怖气氛，东北军内部的武力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为了平息风波，制止事态扩大，周恩来亲自到王以哲家吊唁，帮助处理善后。同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叶剑英立即派刘澜波到渭南，向驻防前线的东北军

将领说明“事件”的经过，宣传中共中央反过“二·二”事件的态度，继续维护“三位一体”，坚决贯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接着，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经过研究，派刘鼎护送孙铭九、应德田等几个肇事者到三原云阳镇红军驻地，再转往平津，避免，“东北军内部报仇性的互相残杀。

这一段工作，异常紧张和危险，稍有不慎就会使西安事变的成果毁于一旦。西安事变后，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在军事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因为他过去在国民党中是知名人士，对西安方面也比较熟悉，在军事、情报这方面也很内行。周恩来对叶剑英也非常信任，有关军事方面的问题，一般放手让叶剑英处理。

经过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努力工作和有力斡旋，西安方面在“二·二”事件后不久，终于同南京方面达成了避免武装冲突的协议。

在西安市新城北门外，有一处名为七贤庄的地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我党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红军联络处”。这里的房子，原是德国医生海伯特开办的牙科医院。海伯特是德国共产党党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被希特勒法西斯驱逐出境。他受德国共产党派遣，到上海帮助我党进行工作。后来，为了解决陕北红军的医疗器材和药品供应，他便在西安七贤庄一号开设了牙科医院，掩护我党的地下活动。西安事变那一天，海伯特外出，不幸被流弹击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此后，根据党中央指示，叶剑英领导李涛等人，正式在这里建立联络处，开展统战工作。

一天，叶剑英意外地收到一封信，皱皱巴巴的信封上，写着“叶剑英收”几个字，寄信人地址只写了“本市”的字样。是谁写来的？叶剑英急忙拆开信看起来。

看着看着，叶剑英的脸色变得严峻了。原来，信是黄鹄显写来的。黄鹄显是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参谋长，红军西路军过黄河后，作战失利被俘，国民党当局把他秘密关进了西安的监狱。一同被关押的还有三十多名红军营以上干部。有一天，在监狱站岗的一名士兵偷偷对黄鹄显说：

“现在国民党和共产党谈判了，西安市有红军的联络处，你们的周恩来、叶剑英先生都在那里。”

黄鹄显闻听十分高兴，通过做工作，那个士兵答应把黄鹄显写的信放入邮政信箱里。就这样，黄鹄显的信终于寄到了叶剑英手中。

我党这时也正在到处寻找西路军作战失散的同志，黄鹄显的信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叶剑英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经过研究，他们派联络处秘书孔石泉，按照信封上的地址，以探监的形式到达监狱，从黄鹄显那里将三十多人的名单拿到了手。

周恩来、叶剑英拿到这份名单，即找到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希望他们以团结抗日的大局为重，把这些红军干部放出来。经过几次谈判，对方迫于形势和各方面的压力，终于同意放人。当黄鹄显等三十多位同志从监狱出来，到达七贤庄红军联络处时，周恩来、叶剑英亲自迎接。劫后相逢，大家都禁不住热泪盈眶。

## 五、火里逃生长沙城

1933年10月25日至27日，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华中重镇武汉。国民党的军政要员们纷纷逃到长沙。蒋介石也在这里就势召开军事会议，布置所谓抗战事宜。眼看着日军又要南进，军政大员们又都转移到衡山去了。

叶剑英随周恩来带领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从武汉撤到了长沙。几天来，他们紧张地开展各项工作，并根据整个撤退计划，将办事处的同志和郭沫若带领的一批进步文化人士，分批撤到湘潭，再撤往衡阳。

为了及时了解前方的战局，周恩来、叶剑英不断同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张治中进行电话联系。11月12日上午，周恩来打电话问张治中：

“前方战况如何？”

张治中回答说：

“风平浪静，风平浪静！”

晚上，叶剑英又询问：

“敌情有什么变化？”

张治中的回答详细了一些：

“敌人进到岳阳，已停止进攻，还在汨罗江那一边。”根据这一情况，周恩来与叶剑英商定，在长沙八路军办事处再住一晚，第二天一早撤往湘潭。

但谁知道，蒋介石在离开长沙之前，就已制定了一个准备火烧长沙的秘密计划，并美其名曰“焦土抗战”，把放火大权极秘密地交给了长沙卫戍司令酆悌，连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也不知道。

这天晚上，日军还在三四百公里之外，但畏敌如虎的酆悌就开始实施“秘密计划”了。半夜刚过，他派出士兵，带上大桶汽油，在城内到处泼洒。没过多久，巨大的烟柱腾空而起，熊熊大火映红了整个长沙城，到处是木料燃烧时的噼啪之声。

周恩来、叶剑英注在八路军办事处，都被蒙在鼓里。凌晨1时左右，几个穿警服的人背着枪，提着汽油桶，拿着小火把跑到了办事处门口。

睡在汽车里的办事处司机发现后，急忙走出汽车，大声问道：

“你们是什么人？要干什么？”

那几个人气势汹汹他说：

“你说干什么！你们他妈的还不快走，等着烧死呀！”

“里边住的有人，你们不能烧！”司机争辩说。

“就是要烧，这是上边的命令！你们走个走我们不管！”

说着，提起汽油桶就往八路军办事处的房上泼油，接着，“呼”地一下点着了火。

恰在这时，负责办事处警卫工作的邱南章听到吵声下了楼。他一看房子烧着了，慌忙返身上楼，“砰砰砰”，使劲敲打叶剑英的房门，大声喊道：

“参谋长，参谋长，房子着火了，房子着火了！”

叶剑英翻身下床，出门一看，火光冲天，忙跑到周恩来住的房间，喊醒周恩来：“副主席，副主席，赶快起来，烧房子了！”

周恩来迅速穿衣起床。三人提上简单的行李，走下楼来。到

门口一看，糟糕！汽车不见了，司机也不知去向。眼见得火势越来越大，他们决定硬往外冲。冲出大门，是一条巷子。巷子里浓烟滚滚，烈焰烤人。天黑火大，他们一时也弄不清方向。恰在这时，遇到几个从火海中逃出的人。

邱南章便上前打听：

“到湘江边走哪里？”

有好心人指路说：

“往右边走。”

他们立即按着指引的方向，跑到了江边。

此时的湘江边上，挤满了从大火中逃难出来的人群。周恩来、叶剑英沿着江边在人群中挤着往前走，直到天亮时分，才来到长沙至湘潭的公路上。

在长沙到湘潭的公路上，周恩来、叶剑英和邱南章继续步行前进。走了一阵，叶剑英心里琢磨，照这样走法，什么时候才能到达湘潭？他提出搭顺便的车，其他人表示赞成。

于是，他们拦上一辆军车，一直坐到离湘潭不远的地方才下车。

到湘潭后，他们找到了先期撤回的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和郭沫若带领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人员。大家见面后，心情都十分激动，犹如生死重逢，有的人当场掉下泪来。

叶剑英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立即布置八路军办事处下一步的工作。接着，又陪同周恩来乘卡车折回长沙，察看灾情，组织救灾了。

## 六、龙潭虎穴共腾翔

抗日战争前期，周恩来、叶剑英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在党的统一战线的工作岗位上，共同战斗了近五年的时间。这期间，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在魔窟里与敌人打交道，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同时，他们之间的接触和交往，比以前各个时期都更直接，更密切。他们之间的友谊，发展到了一个更新、更深的层次。

武汉、广州相继失守之后，中国十壁河山沦入敌手，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在全国人民奋起抗战的形势下，国民党当局接受了共产党人的建议，决定在湖南南岳衡山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简称南岳游干班），这是抗战时期国共互相合作，发展统一战线的一个创举。

此举酝酿已久。早在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即将失守前夕，朱德到武汉与周恩来面见蒋介石时就提出国共合作办游干班的建议。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周恩来、叶剑英出席蒋介石在南岳召开的军事会议，再次向蒋提出这个问题，蒋介石这时对游击战的重要地位已有认识，在会上明确表示：“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

同时，蒋介石决定办游干班，要中共派干部去教授游击战战法。会后，周、叶就有关办班的具体问题与国民党方面达成协议，并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毛泽东对周、叶的建议十分赞赏，在同中央几位负责人研究这一问题时说：

“去吧，讲我们的一篇道理。”

随即，中共中央决定，派叶剑英带一批得力干部去南岳，参加办游干班。

接到中央电令，叶剑英在衡阳八路军办事处即与周恩来反复商量此事，决定抽调李涛、边章伍、薛子正、吴奚如、李崇等去担任教官，刘澄清、徐天宝、陈宛文、李蕴玉等参加工作，配备一个武装警卫班，立即着手从组织上、教学上进行准备工作。

这期间，中共中央正酝酿对党在南方国统区的组织领导机构进行新的调整。1938年冬，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领导华南及西南备省的工作。南方局的成员有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凯丰、张文彬、徐特立、吴玉章、叶剑英、廖承志、吴克坚、邓颖超，刘晓、高文华、董必武，以周恩来为书记。1939年1月13日，中央书记处复电南方局：以周、博、凯、吴、叶、董等六人为常委。南方局遵照党中央指示，讨论了组织分工问题，叶剑英负责对外联络工作。

游击干部训练班成立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汤恩伯为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不久，改由蒋介石兼任训练班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周恩来被聘为训练班的国际问题讲师。

叶剑英接到通知后，立即率领中共方面参加办班的教官、工作人员、武装警卫班共三十余人前往南岳报到。

1939年2月15日，训练班举行开学典礼。第一期学员共招收了1046人，编为八个大队。

当时国际新闻社的一位战地记者高咏，听了叶剑英的讲课后大为赞赏。他在一篇通讯中，用一大段文字描绘了叶剑英在讲授“游击战争概论”一课时受到学员热烈欢迎的情景：“在课堂上，游击战争战略家叶剑英先生的游

击战争概论一课，最为学员们所爱好。这一门课，在课表上规定是 20 小时，占全班军事学科七分之一，每次上课两小时，总要发生学生提延长时间的要求。每一次上课，都是肃穆的空气统治着课堂，游击战争的革命意义，游击队产生的客观条件，游击战的运甲……每一个单字，都在每一个听众的脑子里爬过，也都在每一个听众的笔记簿上爬过。下课的号声响了，听众还是不愿意走，‘再讲 5 分钟好不好？’这个问题常常发出来，这话语里充满了迫切的求知心与战士的要求。”

周恩来十分支持叶剑英在训练班的工作。4 月中旬。他特地赶到南岳，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检查游干班的工作，并应大家的请求，给学员们作了题为《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的长篇报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周恩来、叶剑英在南岳还广泛接触各界爱国人士，引导和支持他们采取各自的方式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叶剑英到半山亭寺庙进行宣传讲话，题写了抗日诗词，还陪同周恩来一道会见了祝圣寺法师幕前、演文、巨赞等人，和他们讨论抗日救亡工作。周恩来在幕前的纪念册上亲笔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强烈地触动了南岳宗教界。

周恩来离开南岳训练班后，叶剑英继续他和周恩来一起开创的宣传、组织宗教界抗日救亡的活动。

1939 年 6 月 9 日，叶剑英来到中国西南山城重庆。

这时的重庆，是中国抗战的陪都，国民党政府所在地，也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出的代表机关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所在地。叶剑英到来后，担任南方局常委兼军事部长、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委员副书记，协助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进行了紧张有序的工作。

此时的全国抗日战争局势，正朝着日益恶化的方向发展。日本侵略者占领武汉、广州以后，开始对南京国民党政府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在继续对华南、华中地区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加紧进行政治诱降活动，积极筹划“蒋汪合流”，企图诱使蒋介石集团就范。早已沦为汉奸的汪精卫正在与日寇进行卖国谈判。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和反共的倾向日益增大，连续制造了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并准备掀起反共高潮。

面对困难复杂的局势，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重庆，周恩来、叶剑英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继续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与大大小小的投降分子、反共分子制造的切投降阴谋和反共行为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叶剑英来到重庆的当天，就与周恩来一起认真分析了在国共两党发生摩擦的情况下，日军下一步的新动向，做出如下预测：从军事观点看，日军如攻西北，主力仍会在晋西南三角地区渡河，目前还未准备好，从政治观点看，日军有单独攻入陕北以降低我们的影响，并增强国民党进攻我方借口的可能。

随着电键嘀嘀嗒嗒的响声，上述预测通过红色电波发向陕北，发给了毛泽东，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行军事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6 月 10 日，也就是叶剑英来到重庆的第二天，就陪同周恩来面见蒋介石，商谈近期抗战与国共合作中的问题。由于蒋介石此时正热衷于策划反共阴谋，双方话不投机，致使商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周恩来于 18 日离开重庆返回延安。

就在日寇大举进犯之时，国民党冒天下之大不韪，制造蓄谋已久的“平江惨案”。真是外侵正凶，内患风波又起。6月12日，国民党军第二十七集团军根据蒋介石的密令，突然包围袭击设在湖南平江嘉义的新四军留守通讯处，残杀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和通讯处军需员吴贺泉，并将八路军少校副官罗粹铭等人活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平江惨案”。

由于国民党当局严密封锁消息，叶剑英直到7月1日才获悉此事。当他得知这一消息后，不禁勃然大怒，拍案而起，当即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军政部长何应钦，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

22日，周恩来、叶剑英联名致电军令部长徐永昌并军委会及各部长官，严正驳斥国民党军政当局歪曲惨案经过及对新四军平江留守通讯处的诬蔑，要求派员驰赴肇事地点，查明真相，为死难者雪冤，将凶手治罪。

在周恩来、叶剑英义正辞严的抗议下，蒋介石不得不责成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进行所谓调查。而薛的报告，依旧将“犯法者文饰为有功”，“无辜者武断为有罪”。

28日，周恩来、叶剑英再电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并军委会及各部长官，据理驳斥国民党的诬蔑攻击，要求另外遴派公正大员前在平江嘉义调查，将其肇事者交法庭审判，并保障被害人家属及同事有陈诉与质证之自由。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尽管中共方面一再表示出改善国共两党关系，继续团结抗战的诚意，然而蒋介石并没有停止制造反共摩擦，制造了一系列袭击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杀害共产党员及其家属的严重事件。

为了克服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逆派，挽救时局危机，1940年6月上旬，刚刚从苏联疗伤回国经延安返渝的周恩来，与叶剑英一起，又与国民政府军委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就共产党的合法地位、陕甘宁边区的承认、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的扩编以及作战地区的划分等问题，进行了多次唇枪舌剑的谈判，并向他们递交了中共关于解决目前危局，加强团结抗战的提案。

周恩来、叶剑英在提案中要求：国民党政府保障各抗日党派之合法存在；释放一切在狱之共产党员；停止查禁各地之书报杂志，给《新华日报》的出版发行以法律保障，允许其登载中共之文件及领导人之言论文章；承认陕甘宁边区（23县）隶属行政院，以林祖涵为边区政府主席；准许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扩编为三个军九个师，新四军增编为七个支队；军械粮饷及医药卫生、交通器材供给应与中央军同等待遇，并划分国共军队的作战区域。7月2日，国民党方面将一复案交与周恩来、叶剑英。

接着，双方代表围绕两案中所涉及的各项问题，展开了一场反反复复的、拉锯式的谈判。

6月以后，国民党驻苏北的韩德勤部、江南冷欣部及皖南的五十二师，多次包围袭击新四军部队，并切断交通，事态日益严重。周恩来、叶剑英于7月7日两次致函何应钦，要求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立即制止韩德勤等部袭击新四军，制止石友三集团军对第十八集团军的进攻。

同一天，国民党战时新闻检查局无理扣压了叶剑英撰写的《第十八集团军抗战三年的几种统计数字》及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所写的《三年来坚持大江南北敌后抗战之新四军》两文。

周恩来对此极为气愤，立即指示《新华日报》发表启事，声明两文“奉

命免登”，揭露了国民党当局进行新闻封锁的丑行。

国民党顽固派在皖南及其他地区制造的反共摩擦，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叶剑英在周恩来领导下，同国民党政府展开了一连串的谈判和斗争，并将所了解的顽军动态及时报告周恩来和中共中央。7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联名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项英并转刘少奇等：鉴于顾祝同正利用重庆国共谈判的机会，企图切断江北、江南新四军的交通，制造摩擦；李品仙也在压迫李先念部退过平汉路西，建议此时宜专打顾祝同和李品仙，以分散中央军和广西军联合逼我的阵势。

7月11日，周恩来和叶剑英就国民党军陈长捷部三个团在日军掩护下，分两路由晋西东渡汾河，向我晋冀豫边区所辖的安泽县晋家山一带进犯一事，再次致电何应钦，要求予以制止。

9月6日，周恩来、叶剑英电告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国民党军令部已向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发出“扫荡”长江南北新四军的命令。当天，中央军委即将周、叶所报情况转告中原局和新四军，正式发出《关于新四军应准备自卫行动的指示》，指示强调：“请叶（挺）、项（英）、胡服准备自卫行动。皖南尤须防备。”

此时，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由于受到国际形势影响而急剧恶化。9月27日，德、意、日在柏林签订协议，正式结成三国同盟。与此相应，英、美也签订了协定。这两大集团势力，此刻都在重新衡量中国这个砝码，极力拉拢蒋介石。同时，蒋介石还在继续得到苏联的援助，如此一来，蒋介石身处国际上的三大势力之间，自感处于“左右逢源”、“待价而沽”的地位。便有恃无恐起来，急欲在国内再度掀起反共高潮。

一时间，黑云压城，乌云滚滚，形势险恶，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做了充分的估计和准备。根据中央的部署。南方局决定把重庆整个党的组织由公开、半公开状态转入地下，彻底改变领导方式。10月4日，南方局讨论了内部组织分工，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南方局设立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由董必武任书记，叶剑英任副书记，下分军政、党派、社会、青年、妇女五个小组。分别由叶剑英、秦邦宪、董必武、蒋南翔，邓颖超负责，并专设“叶剑英工作处”。10月16日，南方局致电中央，就此做了专题报告。

果然不出周、叶所料，形势急转直下。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向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叶挺军长发

出“皓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自抗战以来“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敌人，专事并吞友军”等，并迫令八路军、新四军所属各部队，“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问题所规定之作战地境内，并对本问题所示其他各项规定切实遵守，静候中央颁发对于执行提示案其他各问题之命令”（所谓“中央提示案”，即将活动在江南和整个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全部赶到黄河以北）。

这个“皓电”，预示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到来。11月中旬，毛泽东东电周恩来、叶剑英，对反对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的具体斗争做出部署。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面对极为险恶的局势，叶剑英和周恩来一起，度过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认真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对如何答复“皓电”的内容、时机和形式等重大问题，以及共产党在政治上、军事上应采取的策略措施等，都及时地向党中央、毛泽东提出了很多切实、有益的建议。

11月30日，周恩来和叶剑英根据毛泽东对国民党采取“表面和缓，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就新四军北移问题，同国民党代表、军令部次长刘为章进行谈判。刘称蒋介石表示可以将北移限期推迟，但各地冲突必须停止。周恩来、叶剑英表示，江南新四军决定移动，其余有困难；停止冲突必须由国民政府军队“立即停止军事行动”。12月5日，周恩来、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电复刘为章，要刘顾全大局，停止桂军和霍守义师对江北新四军的进攻。12月中旬，周、叶又联名电告毛泽东、朱德：李品仙歼灭新四军渡江军队的计划是经何应钦批准的。

为了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在此期间，叶剑英陪同周恩来同刘为章和张冲在重庆进行了多次谈判。在谈判中，为了击破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叶剑英和周恩来紧密配合，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由中共中央确定的12项谈判条件：（一）我同意将皖南部队北移，但需延缓开动时间。（二）我苏鲁皖部队不能开动，只是皖南的移动。（三）我华北八路军因无粮饷、弹药，准备南下。（四）国军应停止进攻陕甘宁边区。（五）国民党释放罗世文，我释放孙启人。（六）应停止在陇海路、咸榆路捕人扣车。（七）张国焘、叶青不应聘为参政员，否则中共参政员将退出参政会。（八）桂林八办不能撤销。（九）国民政府应给八路军、新四军发饷，欠饷亦应补发。（十）停止石友三隔离黄河的行动。（十一）保障我在各地办事处之安全。（十二）拒绝同何应钦、白崇禧谈判，要求与蒋介石直接谈判。

在12月24日的谈判中，叶剑英郑重表示：

“中国共产党的让步是有限度的，‘佳电’提出新四军过江，已表示让步，如果国民党再不停止进攻，陕北封锁仍不解除，那么，兵戎相见，演成内战，责任完全在国民党。”

谈判在继续进行，周恩来、叶剑英每天都在紧张的谈判桌上度过。谈至12月30日下午，国民党代表在谈判中正式宣称：奉蒋介石指示，“中央提示案”内容不变，日期可以延缓。要求12月底，江南新四军移到汪北，江北八路军移到老黄河北。明年1月底，江北新四军移到老黄河北，否则冲突避免不了，一切谈不上。

周恩来、叶剑英再次向对方郑重声明：第一，江南新四军已经决定移动，其他我军不动；第二，冲突如有，其原因决不如此，最近霍守义师南下，攻击十八集团军彭部，他们已再三让步，故

目前国民党必须停止在陕北、皖南和苏北的军事行动。

在同国民党代表谈判的同时，叶剑英协助周恩来，通过各种渠道揭露了国民党制造摩擦，破坏国共合作的行径。他们布置工作人员把国民党制造摩擦的文电和反共文件汇集成册，秘密发出，还寄往八路军驻桂林和西安的办事处，广为散发，同时委托国际友好人士王安娜等通过外国朋友把材料带到香港向国外散发。

尽管局势发展已如此严重，但是作为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的项英，却没有坚决执行党中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对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估计不足，缺乏准备。这就使新四军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1941年1月6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了。1月4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和所属部队九千余人，于6日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突然遭到预先埋伏的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所指

挥的七个师八万多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被迫抗击，血战七天七夜，弹尽粮绝，除二千余人突围外，其余六千余人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军长叶挺被扣，项英、袁国平、周子昆遇难。

事变后的第五天，也就是1月11日，周恩来、叶剑英和办事处的同志正在《新华日报》报馆举行该报创刊三周年纪念活动，突然接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新四军在皖南惨遭国民党包围袭击的告急电和中央关于向国民党提出严正交涉，并向各方呼吁的指示。

周、叶接电，无不义愤填膺，立即中断纪念活动，迅速驱车外出，找到国民党谈判联络代表张冲，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急电制止”。同一天，周恩来、叶剑英复电党中央，报告了同国民党代表刘为章交涉的情况，电报说，已告诉刘为章：我华北、华中将士得到新四军在茂林被围攻恶讯，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只有迅速解除围攻，才能免除危机；提出要蒋介石、何应钦立令顾祝同解除茂林包围，让出新四军经苏南渡江的道路。同时直函向蒋抗议，坚持非经过苏南过江不可。请中央询问叶（挺）、项（英），究竟他们采取哪条道路折进苏南，以便做具体交涉。

与此同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叶剑英在曾家岩亲自给在上饶的国民党军将领上官云相打电话，痛斥其袭击新四军军部的暴行，上官云相狡辩说是“误会”，叶剑英驳斥说：

“什么‘误会’？你们所讲的‘误会’就是何应钦、白崇禧一手策划的阴谋！你们‘围剿’了新四军军部，但是新四军的部队还在，八路军也不会袖手旁观的，你们要对后果负一切责任！”

叶剑英又通过电话责问三战区参谋长邹文华，对新四军之北移，你们不但不予以帮助，反借口阻击，这是破坏国共关系，将使问题更难解决。

13日，周恩来、叶剑英向何应钦、白崇禧、刘为章、张冲提出最严重抗议，并要他们立刻转达蒋介石，要求立即解除对新四军的围攻，否则国共关系破裂之责将全由你方担负。14日，周恩来、叶剑英再次致函蒋介石，要求他下令立即停战撤围。17日，周恩来和叶剑英获悉国民党反动当局发布通令，诬蔑新四军叛乱，悍然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再次向张冲提出了严重抗议。

17日夜晚，《新华日报》关于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社论被新闻检查官扣压，周恩来立即为《新华日报》题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二幅题词，要报馆将题词手迹制版登在被扣去的稿件位置上，加快编排和制版印刷，组织好发行力量，抢在次日各大报发出之前送到广大读者手中。第二天一早，载有周恩来题词的《新华日报》便到达读者手中，并出现在重庆大街小巷的阅报墙上，报纸销量从平时的1000份猛增到5000份。

蒋介石看到报纸，不禁大发雷霆，把陈布雷、戴笠痛骂了一通，并说：周恩来的题词比篇社论还重要。

在这些日子里，叶剑英常常是通宵达旦地协助周恩来工作，经常陪同周恩来与国民党当局抗议交涉，不仅力解救新四军之危急尽最大努力，还帮助解决贵阳、桂林等八路军办事处、交通站等遭到的破坏问题。与此同时，还与梁漱溟、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伯钧、黄炎培、张君勱等爱国民主人士多次交谈，揭露国民党制造摩擦的真相，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1年1月14日，叶剑英又同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崔可夫商谈，听取他的建

议。

为彻底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和欺骗宣传，周恩来和叶剑英商量，决定写一篇传单广为散发。叶剑英立即召集军事组和其他有关人员共同研究，连夜赶写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一文，概括了八个问题，列举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和阴谋。传单写好以后，叶剑英做了反复修改，于19日晨送给周恩来审阅定稿。

周恩来看完，高兴地称赞说：

“剑英文锋犀利，可谓写得恰到好处。”

接着，周恩来又亲自修改了几个地方，指示赶快印刷，秘密散发出去。传单印好以后，大家分头出动，冲破国民党特务的重重阻挠，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散发到山城重庆，使皖南事变真相很快大白于天下。

为了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皖南事变的严正立场，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同一天，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对新华社发表谈话，提出了中共关于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办法。

1月24日，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报告皖南事变后各民主党派的动向，说他们对国民党大为失望，痛感有加强团结的必要。已与我们交换意见，我等深表赞同。有些民主人士近因当局之压迫，日渐“左”倾，提出以联苏、联共为中心，主张与我党更密切合作，我们已表示赞同。

第二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回电：必须采取尖锐对立的步骤回答蒋介石1月17日的步骤，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周恩来将中共中央解决皖南事变、挽救时局危机的12条办法面交张冲转国民党中央。

由于我党的严正立场，由于周恩来、叶剑英卓有成效的工作，使皖南事变真相大白于天下，使国民党日益孤立。不久，蒋介石通过张冲找到周恩来、叶剑英，希望恢复两党谈判，并以允许中共在江南部队集中延期北移，新四军归入八路军扩大其编制等为条件。

这样的条件，虽比原来有所变化，但仍是十分苛刻的、不合理的。周、叶很快答复：不实行12条，决无谈判可能。叶剑英针对蒋介石曾以番号、枪支、子弹、医药四者为诱饵，诱降中共某部失败这一历史事件，写下“两手弹四弦，目送飞鸿去”的诗句讥讽之。

叶剑英在重庆期间，与周恩来、董必武等先后住在红岩和曾家岩50号，一直受到国民党特务、宪兵、警察的严密监视。面对一片白色恐怖，叶剑英毫无畏惧，协助周恩来进行了大量公开与隐蔽相结合的斗争。对于叶剑英协助周恩来与敌斗争的情景，当时的工作人员钱之光曾这样回忆说：“从武汉到重庆，叶是周的得力助手，声望比较高，有的事情周出面，有的事情叶出面，皖南事变，叶花了很大的力气。有好几个晚上都没有睡觉。有时，快要开饭了，我说：‘叶参谋长，吃饭了。’他说：‘不吃了，还要打个电话。’我们那时紧张得很，新四军军部被包围了，我们办事处也准备被包围。重要的东西都清理了。准备跑不出去，进集中营。”

在这龙潭虎穴，叶剑英与周恩来一起，带领南方局的全体人员，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艰难，险恶的环境中，顽强地坚持斗争。他们经常对大家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有一次，在南方局召开的全体人员大会上，他和周恩来讲完话后，领着大家高唱革命歌曲。第二天国民党特务部门就在南方局驻地周围增加了人员，进一步加强了监视。面对这种情况，叶剑英坚定地对大家

说：“我们共产党人天不怕、地不怕，要沉着应付，处于虎口，稳如泰山。”

这一年，叶剑英在重庆读到了地下党辗转转来的方志敏烈士狱中手稿，诵读再三，深为感动，立即建议《新华日报》刊登《可爱的中国》，并向在场的同志讲述方志敏烈士的斗争业绩，然后挥笔写下《看方志敏同志手书有感》：

血染东南半壁红，  
忍将奇迹作奇功。  
文山去后南朝月，  
又照秦淮一叶枫。

后来，叶剑英又将这首诗题写在方志敏遗照上。

周恩来非常喜欢叶剑英的这首诗，在一次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大会上，周恩来对大家进行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气

节教育，他在讲了方志敏、陈铁军、周文雍在刑场上的故事后，又特意背诵了叶剑英这首诗，号召大家向烈士学习。

在场的同志深受感动和教育，纷纷向叶剑英索诗，一时间竞相传抄，互相诵读。邻沫若读后，特以叶韵和诗一首：

千秋青史永留住，  
百代难忘正学功。  
纵使血痕终化碧，  
戈阳依旧万株枫。

随着形势的发展，根据中共中央“驻渝干部要尽量减少”的指示，1941年2月1日，叶剑英奉命从重庆飞返延安。离渝时，周恩来将给毛泽东的信及南方局为中央筹措的经费交给叶剑英带回。邓颖超又特意取来自己的照片，托叶剑英送给毛泽东。此外，叶剑英还带有南方局直接领导下的党与非党干部及所联系的同情分子的撤退、疏散和隐蔽计划。

叶剑英于2月2日飞抵延安，到达延安后，顾不得休息，立即到杨家岭面见毛泽东，将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以及邓颖超送给毛泽东的照片亲手交给他，向他汇报了皖南事变前后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俩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谈话。当晚，毛泽东致电周恩来：

“剑英本日上午10时抵延，畅谈五小时。收到来示，欣慰之至。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往。小超同志照片收到，谢谢。”

从此，叶剑英结束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在国统区的统战工作，回到了延安。从南京、武汉、长沙、南岳、桂林到重庆，叶剑英以他特有的胆识和才智，协助周恩来同国民党进行了多方面的接触和多种形式的合作与斗争，在统战工作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建立了不巧的功绩。

## 七、精心护帅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叶剑英一开始就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他都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与保护。在1966年11月13日、29日先后召开的两个10万人大会上，陈毅、叶剑英都作长篇讲话，批判了极“左”思潮和打、砸、抢的一套。林彪、江青一伙对几位元帅既害怕又痛恨，就指使“造反派”纠缠陈、叶，批判他们在两次“10万人大会”上的讲话，硬逼他们检查。此事上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想为陈、叶开脱，说：“检讨一下，了此一案。”

12月31日，年末岁尾，叶剑英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被迫到军队院校革命师生大会，即所谓“师生代表”会议上违心地进行“检讨”，算是“送旧迎新”。但是此事并未了结。军内造反派在“中央文革”一些野心家的策动下，成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筹备处”，确定1967年1月5日联合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指名要陈毅、叶剑英到会检讨。开会的“通知”有两种颜色、两种写法，发给陈毅、叶剑英的是“到会接受再教育”，给其他人写的是“到会指导”。

叶剑英接到通知后，心中不免一阵悲枪，他想到了总理，立即向周恩来做了汇报。

周恩来听后，气愤不已，当即质问：是谁同意他们开这个大会的？为什么不报告？果断地说，不能叫他们开这个批判大会，即使开，老师也不能参加。

然后，周恩来拖着疲惫之躯立即驱车来到人民大会堂，连续两个晚上接见群众组织代表，说：

“陈毅、叶剑英几位元帅都是拥护毛主席的，你们把他们作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不符合实际的，明天的会，我不赞成！”

经过周恩来的耐心说服教育，终于制止了这次批判大会的召开，又一次保护了陈、叶等元帅。

这一期间，叶剑英在参加和主持军委的一系列会议的同时，还经常出席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像在重庆时他与周恩来密切配合同国民党作斗争一样，在会议上，只要有机会，就同江青等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针对搞乱军队问题，再次强调指出：

“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不然，敌人乘虚而入怎么办？”

接着，叶剑英列举大量事实：

“全国13个军区，有7个军区在搞运动。全军157所院校都在搞运动。到处抓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目标就是抓各个军区、军种兵种的领导人。三个总部，总后瘫痪了，总政几乎瘫痪，总参部分瘫痪，海军瘫痪了，空军瘫痪了。凡瘫痪了的单位，所有的办事机构、会议室、招待所全部被占领，领导人来一个抓一个。”

说到这些，叶剑英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气愤，激动地说：

“现在空军指挥部只好转移到战备工事中去。如果全国空中有什么事，指挥中断了，事情谁去办？”

叶剑英据理力争，手里拿着全国军分区以上单位受冲击的统计表指给江青看，严肃地说：

“内忧必然引起外患，稳定军队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

江青一伙想到的只是乱中夺权，哪里管这么多！

听着叶剑英有理有据的分析，周恩来不时投来支持和赞赏的目光。

经过叶剑英等人力争，在周恩来支持下，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强调军队担负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任务，不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这个通知对稳定军队发挥了重大作用。

会上，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争论十分激烈。

叶群突然向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发起攻击。她捏造种种罪名，强加在萧华头上，要他当晚向军队院校师生做检查。

接着，陈伯达摆出“中央文革”组长的架势，指责萧华：

“你是绅士，不是战士，是要把人民解放军变成资产阶级军队。”

江青则旁敲侧击，竭力帮腔，对萧华进行辱骂攻击。她指着萧华的鼻子问：

“今晚在工人体育馆召开10万人大会，你敢不敢去？”

逼迫萧华到会上说清问题，萧华以沉默表示对抗。

这时，江青一伙转而向会议提出，由徐向前主管总政工作。会上没有人表态。很明显，“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江青、陈伯达一伙围攻萧华的险恶用心是妄图从总政打开缺口，搞乱军队，以便他们进而打倒叶剑英等元帅，夺取军权。

叶剑英、聂荣臻对此看得非常明白，极为愤慨，未等会议结束，就退出会场，以示抗议。叶剑英回去后，立即将会议情况报告了毛泽东和周恩来，要求制止批斗萧华。

很快，周恩来就打回电话，明确指示：

“没有我的命令，萧华不能去大会检查。”

1967年2月14日和16日，叶剑英等中央军委和国务院的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的政治局会议上，与江青一伙进行了面对面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后来被江青一伙恶人先告状，诬为“二月逆流”。对于所谓的“二月逆流”，周恩来一开始就不赞成这样提。为“二月逆流”的平反问题做了很多工作。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亲自找几位元帅谈话，并于1969年1月3日在一份简报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李大章、张国华等人，当叶剑英走进会场时，毛泽东对到会的人员说：

“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和‘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师。老师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

1972年1月初，毛泽东又对周恩来、叶剑英说：

“‘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现在我有事，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

为了慎重起见，周、叶当场核对了记录。1月6日16时20分，叶剑英匆匆赶到医院向重病的陈毅做传达。

1968年底，毛泽东亲自抓北京的“六厂二校”作为指导“斗、批、改”的试点单位。1969年春节，毛泽东找几位元帅谈话，要他们到工厂去蹲点，

做点调查。叶剑英被指定去新华印刷厂。

叶剑英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二里沟车公庄的新华印刷厂，同陈云、谭启龙一起学习、劳动。他在装订车间，一面参加学习、劳动，一面接触工人搞调查研究。在车间里，他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工人群众中间，和工人同吃同劳动，尽自己最大努力干些体力活，同时参加学习班的批判会、讨论会，虚心向工人学习。为了学到更多的东西，他还在厂里的安排下，到别的车间去参观访问，详细了解生产的每道工序，并同工人们座谈劳动的经验体会，支持革新创造，关心群众疾苦。厂里的干部和工人知道他是军队元帅和中央领导人，七十多岁了，身体又不好，就主动照顾他，劝他多休息，单独开伙吃饭。但他一再表示，自己是来学习的，都婉言谢绝了，始终遵守工厂的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坚持同工人们一起作息，一起到大饭堂就餐。工人们很是感动，都亲切地叫他“老叶”，愿意同他说心里话。工人普遍反映，“老叶”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和咱们心连心。这期间，叶剑英常给在自己身边的子女和侄儿选钩等谈自己在新华印刷厂劳动的情况和收获，说自己“每天向工人学习，受到教育根深”。

对于叶剑英在新华印刷厂劳动，周恩来十分关心，特意派杨德中几次去看望他，并带话嘱咐千万注意身体。

叶剑英专门给周恩来写报告，谈自己在工厂锻炼学习的体会。报告中赞扬工人的革命品质，谦虚地表示自己“落后了，要赶上去”。

1969年3月，苏联军队悍然入侵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珍宝岛。

这时叶剑英虽然被迫离开军委领导工作岗位，但对“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这一重大事件极为关注。3月初，毛泽东、周恩来指示叶剑英，同其他几位在北京“六厂二校”蹲点的元帅一起讨论国际形势，3月18日，他们即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写出报告，提出了七条具体建议。3月下旬，叶剑英又同其他几位元帅一起多次研究了珍宝岛反击作战问题，并根据研讨的意见，由叶剑英负责整理了一份《从世界森林看一棵珍宝岛树》的报告，呈报毛泽东主席。报告站在世界全局高度分析了苏联军队突然入侵珍宝岛的原因、目的及其发展趋势，进而揭示了美、苏称霸全球的战略企图、与各国之间的矛盾斗争。报告最后对民兵建设、军事训练、军工生产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

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国际国内形势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召开。在这次大会上，由林彪作的政治报告中再次批判“二月逆流”。叶剑英在会上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珍宝岛事件，在发言中强调要保持军队的稳定，争取时间加强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准备打败敢于来犯的任何敌人。而林彪、江青一伙则鼓吹国际“中心转移论”，强调军队要“突出政治”，对叶剑英继续进行围攻。

但是，毛泽东、周恩来仍然没有忘记叶剑英，亲自提议他进中央政治局。由于有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提议，加之德高望重的叶剑英受到大会绝大多数代表的拥护和爱戴，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九大”以后，叶剑英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几位元帅，接受周恩来总理交代的任务，从6月7日开始，多次在中南海武成殿聚会，在陈毅主持下，全面深入讨论国际形势和战略问题。

叶剑英不负周恩来重托，经过认真思考，对国际形势和战略问题逐渐提出了明确的思路，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的见。在会上，他做了几次很有见地的

发言。在发言中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他强调要利用美国、苏联和欧洲各国之间的矛盾，尽快打开中、美之间的僵持局面，恢复中、美会谈。他说：

“现在美国不得不从南越逐步撤军，苏联在大力推动建立‘亚洲安全体系’，尼克松访问亚洲五国，是怕苏联接管‘真空’。美国国务院宣布‘两个放宽’，步子虽然不大，但表明尼克松想拉中国的新动向。”

后来，由参加会议做记录的熊向晖等人根据元帅们讨论的情况，整理成一份书面报告《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于7月11日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签署，上送周恩来总理转呈毛泽东主席。在这份报告中，四位元帅对中、美、苏“三大角”的战略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全面地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着重地对苏美矛盾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并判定：

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报告全面地勾画了国际战略新格局，为打开中、美关系，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制定了重大战略决策提供了依据。

周恩来看到这份报告，深为里面的精辟分析所高兴，立即转呈给毛泽东主席。

但是，林彪一伙并没有放弃对叶剑英等人的迫害。1969年10月，他们借口所谓“紧急战备”需要，迫使叶剑英等许多老同志离开北京奔赴外地，年过六旬的叶剑英被“下放”到长沙，以后又辗转流徙于岳阳、湘潭、广州等地，含冤受屈，受尽林彪及其追随者们的冷遇、刁难和折磨。同时也受到许多领导人和基层工作人员及群众的关怀和爱戴。

周恩来身在北京，心中却仍在时时关怀着叶剑英，多次打电话给他，表示慰问。

1970年7月6日，叶剑英突然被告知，由长沙乘机返回北京，为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做准备。叶剑英刚到住地二号楼，电话铃声就响起来了，原来是周恩来专门打来电话，表示欢迎和慰问。

1971年9月13日，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的林彪，在妄图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的阴谋败露后，从山海关机场仓皇爬上256号三叉戟飞机，叛逃国外，折戟沉沙。周恩来得知这一意外事件，很快向叶剑英做了通报，并让他转移到北京西郊玉泉山九号楼待命应变。叶剑英密切注视国内外局势，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突然事变。

## 八、“我来给你们参谋参谋，一定要请总理讲话”

1972年9月，我国的两枚运载火箭已经开始组装，并可望于月底测试完毕，在国务院六机部担任领导工作，分管军工科研生产的杨国宇将这一进展情况写成报告，呈报给了周恩来。

9月10日上午，国防科委的刘西尧召集人员开会。他兴奋地告诉杨国宇，周总理看了杨国宇的报告特别高兴。因为科研部门终于冲破重重干扰，东方“巨龙”即将腾空起舞。

刘西尧还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

“叶帅很关心国防尖端科研，准备到装配运载火箭的车间视察。政治局、国务院业务组、军委办公会议的同志，能去的都去看看。”

周恩来布置工作总是非常周密细致，他把来车间视察的人数、日期，甚至从几点钟开始，到几点钟结束，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并且做了“六不”规定：“不准搞群众欢迎场面”，“不要鼓掌”，“不要事先发预告”，“不许照相、拍电影和电视”，“不要摆糖果招待”，“不要搞欢送”。

当夜，杨国宇等就把各项准备工作布置就绪。

9月12日下午，装配运载火箭的车间里，东方“巨龙”威风凛凛，横卧在轨道上；几种型号的导弹排成一列；人造卫星小巧

玲珑，银光闪闪。七机部的几位负责人和有关部门的干部、科研人员、工人，怀着激动的心情，静候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到来。

不多时，朱德来了，叶剑英来了，人们的那个高兴劲就甭提了，领导人参观完车间，给大家许多鼓励。

朱德走后，杨国宇扭头一看，但见叶剑英一个人还站在那里。部里的领导同志此时提不起勇气见叶剑英。“文化大革命”中七斗八斗，把大家都斗得抬不起头来，尤其是七机部的头儿被整得心情沉重。杨国宇也在部里的“批判会”里被捅了几下，但毕竟不像有的同志那样被“触及”得厉害，所以精神稍好一些。于是，杨国宇又被部里几个领导推举去见叶剑英。

杨国宇走近叶剑英，问：

“叶帅，对我们有什么指示吗？”

叶剑英过去就认识杨国宇，就说：

“是你呀！在这里负责？”

杨国宇回答：

“我不是主帅，只管生产。”

叶剑英叹道：

“可惜呀！你们今天没请朱老总讲几句话，哪怕是一句也好。”杨国宇不知该如何回答是好。

叶剑英若有所思地说：

“明天总理来……”

一说到周恩来，杨国宇就心情激动。他到国务院七机部工作以来，经常直接听取周恩来的指示。周恩来那宽广的胸怀，乐观的情绪，无时无刻不在感染着大家。那时候，杨国宇经常遇到不顺心的事，重重干扰弄得难以开展工作，但周恩来许多指示的话外音杨国宇听懂了；他因此受到了鼓舞，工作起来也有了劲头。所以，当叶剑英说明天周恩来要来，并问杨国宇做好准备没有，他高兴得连声说：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叶剑英又问：

“总理为什么选在明天来，你知道么？”

杨国宇摇了摇头。

叶剑英告诉他：

“明天是‘九一三’，是林彪叛逃摔死一周年的日子。巧么？无巧不成书嘛。总理选这个日子，就是针对林彪来的呀！总理来了不讲话不好！这样大的事，这么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么隆重的视察，没有一个人讲话，这不好！讲讲也是对你们的鼓励嘛！”

杨国宇说出了他们的难处：

“总理怕下面为难，有言在先，一切从简。怕不好办呀！”

叶剑英笑了：

“我来给你们参谋参谋，明天一定要想法请总理讲话。”

说着，叶剑英把杨国宇引到车间的一条道轨旁，用手指着说：

“视察不是从运载火箭开始的么！这样吧，当视察快要结束时，你迅速把车间里所有穿白工作服的同志集合在这里坐下，等总理过来，你们就鼓掌，请他讲。他会讲的。”

杨国宇一阵高兴，心想道是叶帅主意多，扭过头即把叶剑英的这个主意和部里其他领导讲了，大家都说是条妙计：大家在车间里鼓掌，又不是到大门外欢送，算不上违反总理的“六不”规定。

这时，叶剑英又对杨国宇说：

“这事就由你来办，一定要完成！”

杨国宇又问：

“叶帅是不是对我们讲几句？”

“我就不讲了。”叶剑英一向谦虚，但对运载火箭的关注又使他不得不提出严格的要求，说，“就只给你们丢下一句——这个东西要早点儿搞出来，国家需要它早一点去放哨！”

叶剑英说罢即上车离去，此时已过下午6时。

9月13日，天气还是那样晴朗。下午4时，第二批视察的同志坐着小汽车准时抵达。首先来的是王震，接着万毅、王观澜、李先念、粟裕、周恩来、姬鹏飞、余秋里等人都来了。

看上去，周恩来又比几个月前瘦削了，但眉宇间仍透着那种为人们所熟悉的刚毅神采。他两眼布满了血丝，显然这些天又熬夜了。

周恩来兴致勃勃地视察着，看得很仔细。他能叫出许多仪器、装备的名称，不时地向其他领导介绍着，还讲了一些技术难关是怎么攻克的。在场的专家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有的地方不懂，就寻根究底地问，甚至连装配时什么人在场都问到了。

参观快要结束了，杨国宇按叶剑英的妙计，赶快集合人员。因为事先都讲好了，所以一招手，大家都过来了，席地而坐，一片雪白。待周恩来一走过来，同志们就开始热烈鼓掌。杨国宇趁势说：

“请总理讲话！”

掌声一停，周恩来推让其他领导讲，其他领导推周恩来讲。周恩来推卸不开，就开始给大家讲话。他首先赞扬了在座的同志为研制国防尖端武器做出了贡献，最后说：

“大家要团结起来，反对派性，把精力全部集中到科研生产上，争取这两枚运载火箭比上次打得更好，为党为国争光！”

一晃，时间已经过去两个多小时。

夕阳西下，周恩来身披晚霞上了小汽车……

由叶剑英亲自导演的周恩来的讲话，大大鼓舞了七机部那些被批斗的领导，鼓舞了那些戴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科技人员。他们日夜奋战，精益求精，终于按预定的时间，使东方“巨龙”成功地腾空而起。因为当时通讯社、报刊没有发表新闻消息，所以全国人民都不知道这件大事，只有周恩来等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深知战斗在国防尖端科研第一线的专家、知识分子——这些无名英雄，在国家遭到如此浩劫的年代里，默默无闻地干着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 九、周恩来：“由你负责，到总参谋部指挥作战”

年龄稍大的人都会记得，1974年1月，我国在西沙群岛进行一次自卫还击作战，此战决策正确、指挥有方，守岛民兵和海军战士打得英勇机智，严惩了南越军队，捍卫了国家主权，保卫了祖国领土完整。而这一胜利，正是周恩来、叶剑英共同指挥的杰作。

1974年的1月11日上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出重大新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的声明，重申我国对南沙、西沙、中沙和东沙群岛的领土主权，严厉警告南越反动当局妄图吞并我国西沙、南沙群岛的非法行为。

在这样的严重时刻，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正在反复思考着一个问题：如果南越反动当局不顾我国的声明和警告，继续入侵我领海和岛屿，向我发动武装进攻，我军应该如何进行

自卫还击？

1月19日凌晨，敌人突然派出兵力，强行登上我深航、广金两岛，并首先向我开炮射击，我守岛民兵英勇地进行自卫还击。这一情况，无线电波迅速传到了北京。

叶剑英得到报告，立即给广州军区指挥员打电话，了解详情，然后向周恩来总理做了详细报告。

周恩来当机立断，在电话中指令叶剑英：

“立即组织领导小组，由你负责，到总参谋部指挥作战！”

接着，周恩来指示，由邓小平、陈锡联、苏振华等人组成领导小组。

根据周恩来的命令，早上7点多钟，叶剑英第一个到达作战指挥室，有关人员立即向他报告情况。不一会儿，邓小平、陈锡联、苏振华等人陆续到达。叶剑英立即同大家一起研究情况，调配兵力，向前线发出了一道道命令。

我守岛民兵在自卫还击作战中，打得十分英勇，迫使上岛敌人狼狈逃回。到了上午10点多，敌人的舰艇突然向我军舰艇开火。我舰艇立即坚决还击。这一情况传到北京，作战指挥室的空气立刻紧张起来。

“情况怎么样？后续部队到达什么位置？”叶剑英不断地向参谋人员询问情况，同时，命令参战舰队：“狠狠地打，坚决消灭敌人！”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作战室内几乎没有什么声响。叶剑英在室内不停地来回踱着步，等待着战斗消息，此时此刻，其心理压力，没有亲自指挥过战争的人是很难理解和体会到的。

一个多小时以后，捷报传来了：我军在作战中取得了胜利。敌舰一艘被击沉，其余各舰被击伤后狼狈溃逃。

叶剑英同邓小平等人商议后，立即发出命令：我军舰艇立即疏散，防止敌舰报复袭击。一有情况，立即集中，打击敌人。接着，他又命令在我民兵守卫的岛屿上构筑防御工事。若敌人再来侵犯，坚决回击。

中午，值班参谋得到一份情报，急需向叶剑英报告。他走到叶剑英休息的门边，又犹豫起来，想到首长刚休息，不忍心打扰。但军情紧急，还是敲门走了进去，参谋一看，叶剑英根本没有休息，正在打电话呢。叶剑英立即招手向他示意：就在房子里等一会儿。参谋只好站住了。只听叶剑英对着话筒说：

“那好，您给主席报了，再告诉我，我在此等您的电话。”

参谋这才明白，叶剑英在给周恩来打电话。

接着，叶剑英又接过参谋手中电话记录的情报草稿，认真看过，再次用电话报告给了周恩来。

当天下午和晚上，叶剑英一直守候在指挥室。前线虽然未再发生战斗，但情况却很紧张。特别令人担心的是，当时支持南越反动当局的一个大国，派出一支舰艇编队，从菲律宾向我南海方向驶来。

叶剑英立即向周恩来报告敌情，经周恩来同意，很快派出了一支舰队南下，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

叶剑英同邓小平等人经过研究，决心乘胜收复被南越反动当局侵占的甘泉、珊瑚、金银三岛。为此，叶剑英专门给毛泽东写了报告，得到批准。1月20日，叶剑英签署并向前线部队发出了坚决收复甘泉、珊瑚、金银三岛的命令。前线部队立即出动，向侵占我岛的敌人发起攻击。经过激烈战斗，我逐次收复了三岛。至此，西沙群岛的永乐群岛全部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然而，江青却贪天之功为己功，将周恩来、叶剑英共同指挥的西沙之战，通过文艺作品的方式，暗示是她指挥的，真是无耻之至。

## 十、共斗“四人帮”

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怀有不可告人目的的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林彪自我爆炸之后，竭力掩盖他们同林彪勾结的真相，把自己打扮成“反林英雄”，他们利用批林整风之机，网罗党羽，进一步发展帮派势力。

林彪摔死以后，林彪反党集团彻底失败，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得到重用，周恩来自然而然成了党内第二号人物，叶剑英被毛泽东委托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意欲趁“文革”之机乱中夺权的江青一伙，又把矛头对准了周恩来和叶剑英。为了保护叶剑英，让大家知道叶剑英是毛主席信得过的人，是有大功的人，周恩来煞费苦心。在1972年6月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周恩来就氏征路上党中央、毛泽东与张国焘作斗争时，叶剑英截获张国焘的密电，立即报告毛泽东这一史实讲了很长一段话。他说：

“……叶剑英同志先得到张国焘的命令，一得到，马上就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得到这个消息，决心北上……剑英同志先将密电报告了毛主席，因而脱险，立了大功。这件事情，是毛主席经常讲的，在座的不少同志听到过。不是主席总是拿这个古人的事来比喻吗？宋朝不是有位吕端嘛。古人有两句话：‘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主席拿这个例子多次说这个事。当时军队就行动了……。后来陈昌浩看到电报，知道了这件事，要追。据这一次徐向前同志在小组会上说，他制止了。他反对这件事情，不让追。他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我们相信徐向前同志的话，因为总有

顾全大局的同志嘛。所以那一次是一个很险恶的环境。就是说，没有剑英同志立这个功，要不是毛主席出来制止……那个局势就很坏了。所以就是主席说的，人心，党心，党员之心，都是要团结的，不要分裂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要分裂是极少数，那是一个惊险场面，在关键时刻才显出是同志嘛。古话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嘛。”

1972年9月，王洪文从上海调到中央工作，很快成为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江、张、玉、姚结成“四人帮”，密谋策划，制造混乱，一心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毛泽东对江青这帮人虽然予以重用，但并不完全放心。他坚持让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工作，让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这样一来，“四人帮”便把攻击的主要矛头对准周恩来，同时也指向叶剑英，他们大造舆论，反党乱军，处处与周恩来和叶剑英为难作对，妄图削弱他们对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周恩来、叶剑英在湍急的漩涡中，力挽狂澜，辛勤工作，既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又讲究策略的灵活性，与“四人帮”一伙苦苦周旋，极力维护稳定的局面，艰难地把各项工作推向前进。

1973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江青就突然发难，她阴阳怪气地说：

“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问题上有错误，要做检查。”

在江青一伙的鼓噪下，政治局的扩大会议连续开了几个下午和晚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在会上疯狂攻击周恩来和叶剑英“丧权辱国”，搞“投降主义”。这当然完全是对历史事实的颠倒。事实是，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是毛泽东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江青一伙之所以如此，只是为了扫除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而已。从1969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以后，美国

方面就通过多种方式同中国方面进行接触。

1971年7月，尼克松派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来北京，叶剑英奉命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协助周恩来同他会谈。7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布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1972年2月，叶剑英又协助周恩来与公开访华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会谈。以后，叶剑英又协助周恩来多次与基辛格会谈。双方经过多次会谈，于2月28日在上海签订了《中美联合公报》，从此两国结束了长期的敌对状态，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叶剑英还协助周恩来，开展了其他许多外事活动，如1972年9月25日参加接待访华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等。通过这些工作，打开了中美、中日关系的大门，是中国外交事业的重大突破，大大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也有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光辉业绩，哪里是什么“丧权辱国”、“投降主义”呢！江青一伙故意变功为罪，纯属造谣诽谤，栽赃陷害！

在周恩来遭到围攻的日子里，叶剑英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安危，仍在忙碌于军委的日常工作。江青一伙有意不让叶剑英参加政治局的会议，以削弱周恩来的力量。他们以为打倒了周恩来，叶剑英也将随之被打倒。叶剑英非常关心和理解周恩来的处境，知道自己也是被攻击的对象，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既不申辩，也不去做违心的检查，而是冷眼观察，泰然处之。

然而，江青批判“中美会谈”的调子越来越高，继续“上纲上线”，提到“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高度，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妄图将其打倒。同时提出要将她自己和姚文元、汪东兴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们满怀希望地将此事上报毛泽东。江青还让王洪文把他们围攻周恩来的会议记录抄成大字本，一并报送。

谁知大字本还未报上去，毛泽东的指示就已经下来了：“不要提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增补常委，不要。”

这样，江青一伙企图抓住中、美会谈问题打倒周恩来、叶剑英的阴谋，才未得逞。

围绕着筹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酝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周恩来、叶剑英同“四人帮”的斗争更为惊心动魄。

早在1973年8月党的“十大”开过之后，党中央即开始酝酿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人帮”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召开之前，加紧活动，阴谋组阁夺权。他们狼狈为奸，私下密议，拟定名单，在政治局会议上互相唱和，妄图窃取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领导职位。

对“四人帮”这种宗派活动，毛泽东有所察觉，并在政治局会议和其他场合对江青多次提出严厉批评，警告她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扣帽子”，“不要搞四人小宗派”。

叶剑英也打电话给王洪文，要他站稳立场，和江青划清界限，不要同她搞在一起。王洪文不仅不接受叶剑英的忠告，反而把叶剑英的话看成是挑拨他与江青的关系，与江、张、姚拉得更紧了。

1974年10月中旬，“四人帮”背着政治局和周恩来，派王洪文飞往长沙，向在那里休息的毛泽东告周恩来的黑状。王洪文对毛泽东说：“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总理虽然有病，但昼夜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

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

同志。”“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接下来，王洪文在毛泽东面前极力吹捧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企图让毛泽东表态，由他们这些人出来组阁。

毛泽东听了王洪文的一番话后，严厉地指出。

“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要注意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

王洪文受到毛泽东批评后，垂头丧气地返回了北京。

虽然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但“四人帮”的阴谋活动仍然有增无减，面对江青一伙的嚣张气焰，重病中的周恩来不顾病痛的折磨，找来叶剑英商量，他要去长沙面见毛泽东。

这期间，医务人员发现周恩来有便血现象，需要立即检查治疗，请示叶剑英是否同意周恩来去长沙？叶剑英为此颇费思量，周恩来的身体确实非常虚弱，需要很好地休息、治疗。但是此时正值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时刻，如果总理能够亲自出马向毛泽东建议，对击败“四人帮”“组阁”的阴谋将十分有利。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他立即与医疗专家、教授商量，制定了一个保护治疗方案，坚持总理依期南行。

临行前，叶剑英向随行医疗小组的同志千叮咛万嘱咐说：

“你们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总理的安全，这是政治任务。”

于是，周恩来在12月下旬冒着严冬的风雪，驱车机场，以重病之躯远行千里，到达长沙。他向毛泽东报告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说到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以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毛泽东立即表示同意，并提议邓小平也任军委副主席。

从12月23日至27日，周恩来在长沙，经过与毛泽东四次交谈，确定了四届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完成了历史使命。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以坚定而有策略的斗争，挫败了“四人帮”企图通过“组阁”，进一步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

1975年1月中旬，酝酿已久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终于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抱病作了“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德高望重的朱德继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周恩来任政府总理，邓小平等人任副总理，叶剑英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四人帮”的“组阁”阴谋至此彻底破产。

## 十一、 接见外宾后，叶剑英掏出周恩来的血尿标本给毛泽东

1975年下半年，周恩来病情越来越严重了。叶剑英的心情十分沉重。他对周恩来疾病的治疗，倾注了大量精力。早在1972年，周恩来被确诊是膀胱癌以后，江青、张春桥二伙便幸灾乐祸，以保密为名，封锁周恩来的病情，不止毛泽东知道详情，也不积极组织治疗。一向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奉为座右铭的周恩来，只知拼命为党和人民工作，很少顾及自己的重病。

周恩来的保隆医生心急如焚，他想到了一向敬重周恩来的叶剑英，便找到叶剑英想办法。叶剑英十分焦急，他知道，只有让毛泽东知道病情，才能得到充分的治疗。于是，在一次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后，他拿出了周恩来的一瓶血尿标本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这才了解到周恩来病情的严重，不禁吃了一惊，当即指示要抓紧治疗。

很快，中央成立了周恩来医疗领导小组，由叶剑英牵头，汪东兴等人参加，负责领导周恩来疾病的治疗工作。1973年3月9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了自己大量便血的情况，并说已经毛主席同意，请假两周，到玉泉山检查身体。这期间政治局会议和报告由叶剑英主持和签署，军委事情由叶剑英处理。

1974年周恩来住进医院以后，叶剑英和其他一些老同志亲自领导医疗小组，制定方案，为周恩来治病。为此，他想了许多办法，耗费了大量心血。他到处打听、搜集治疗膀胱癌的秘方、验方，一旦发现，即指示解放军总医院检验采用。他还亲自到医院通过仪器直接观察治疗效果。

每当周恩来做重要手术时，叶剑英总是守候在手术室门外，直到手术结束，问清情况后才离开。即使出差在外地，他也经常打电话到医院，详细询问病情。每当同身边工作人员和医院的医护人员谈起周恩来的病情时，常常禁不住热泪盈眶，有时竟痛哭失声。

叶剑英眼见癌细胞在一天天地吞噬着周恩来的生命，心中焦虑万分。在这中国的万事之秋，他非常明白。周恩来是一棵屹立于中华大地上的参天大树，这棵大树一旦倒下，对党、国家和人民将是巨大的损失。而“四人帮”一伙则认为，一旦周恩来倒下，将给他们造成天赐的夺权良机。对于这一点，叶剑英十分清楚明白，所以，每次到医院看望周恩来，只要见他精神稍好的时候，总是要向他汇报党、国家和军队的大事。他们共同关心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同“四人帮”的斗争。

1975年8月，周恩来又做了一次电的治疗，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叶剑英为此感到十分欣慰。8月13日，叶剑英准备离京到外地视察工作前，特意亲笔致信周恩来，在信中他满含深情地说：

“此次电的，又取得一场大家庆祝的胜利，至为欣慰！惟对多发的顽疾，必须乘胜进剿，加以歼灭，否则任其循环往复，对体质消耗太大。”

信中接着写道：

“继续革命，国步艰难，千万为党珍重，为国珍重。敬祝早日康复！”

最后，叶剑英又在信后附言：

“今天得到三 一医院送来的药方一份，请参阅。听说吴阶平同志正在研究。”

一封短信，寥寥数语，包含了叶剑英对周恩来的无限深情！

周恩来对于“国步艰难”的情况，感受比谁都深刻。这难，来自诸多方

面，但最大的难是来自“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因此，周恩来在医院同叶剑英的谈话中，曾语重心长地告诉他：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大权不能落在他们手里。

这一嘱咐，使叶剑英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不但增加了勇气和信心，也更注意了斗争的策略和方法。

到了1975年11月，情况又起了变化。在“四人帮”的策划、煽动下，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又开始在全国掀起，邓小平正在着手进行的全面整顿的工作，被迫陷入停顿状态。在这关键时刻，能与“四人帮”相抗衡的就只有周恩来了。叶剑英基本上天天都来看他。在处理重大问题时，他更是必来请示汇报。他一再指示医生：

“要想办法，能延长一天就延一天，哪怕是多延长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一切努力和责任。”

周恩来也明白自己活着的意义，他顽强地与死神搏斗。他常常是数着数，一口一口地强迫自己咽下食物。

12月13日，周恩来咽下最后了两口食物，从此再也无法进食。12月以后，周恩来不断发高烧，说话越来越艰难。20日，他约罗青长来谈对台工作，没谈多久就昏迷过去。

叶剑英仍然天天来，两个人的谈话时间越来越短，终于，周恩来难以出声了。叶剑英就贴近周恩来，紧紧握着他的手坐下。两个人泪光闪烁，默默无语地互相望着。

在他们最后一次交谈后，叶剑英走出病房，严肃地吩咐守护周恩来的工作人员：

“你们准备好纸和笔，24小时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想法和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中央里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话要说，你们一定要记下来……”

工作人员每时每刻都守在周恩来身边，时刻准备拿笔记录，但周恩来始终没有说一句这样的话。

周恩来逝世后，工作人员把空白的记录纸交给叶剑英，看着这无字的纸，叶剑英流出了眼泪：

“他一生都是顾全大局……”

1月8日上午9时57分，中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了。9日清晨，在凛冽的寒风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和哀乐，巨星陨落，江河呜咽，大地哀号，整个中国在寒风和哀乐中震颤！

此时此刻，80高龄的叶剑英也为总理佩戴了黑纱，陷入无限悲痛之中。

1月10日，叶剑英在北京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从大革命时代就与周恩来密切交往的一件件往事又涌上心头，仿佛就在眼前。那是令人神往的友谊，令人刻骨铭心的交往，整整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呀。热泪禁不住一行行滚落下来，模糊了他的双眼。此时，他的耳旁仿佛又听到一个微弱而熟悉的声音：

“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大权不能落在他们手里……”

这是周恩来在病榻上对前来看望的叶剑英等老战友的最后嘱咐。叶剑英深深懂得这句话的分量。他没有辜负周恩来的殷切希望，在这年10月，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对安邦定国起了决定性的

作用。

## 后 记

怀着对周恩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限深厚的感情，写完了《周恩来与共和国元帅》、《周恩来与共和国将军》两书。在写作过程中，曾参考了数千万字的有关文献、回忆录、传记、年谱及党史、军史、国史资料，如果没有这些书籍、文章及资料，两书都是难以完成的。由于书目繁多，恕不一一列出。这里，谨向有关书籍、文章及资料的作者、编者、出版者致以诚挚的谢忱。两书的写作，得到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第二图书编辑部刘增新主任的悉心指导，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的张光彩研究员在百忙中审阅了书稿，并作了认真勘正，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感谢。参加本书写作和提供资料的，还有阎霞、白尘、盖小华、隋建军、支敏、刘惠、刘大伟、李晓严、刘奇、张颖等人。由于作者水平有限，错讹之处在所难免，还请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作 者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